



## 邓绍基

邓绍基，男，1933年生，江苏常熟人。195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文革”前担任古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文学所学术代理秘书，“文革”后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并曾任中国社科院院务委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论文。60年代初曾协助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余冠英主持编纂《中国文学史》（三卷本），是当时著名的两部文学史著作之一。80年代以后，撰写了一系列从宏观方面探讨五四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论文，如《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回顾和探讨》、《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等，分别在《文学遗产》和《文艺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对文学史界拨乱反正工作较有影响。同时参加或主持若干大型学术著作的编写工作，如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多民族文学史著作《中华文学通史》副主编，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编委会主任等；其中，主编的《元代文学史》是一部近百年来最全面系统的元代文学史著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 学术研究

##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李恒瑞

主 编：郑英隆

副主编：叶金宝 陶原珂

编辑部主任：雷比璐



# 学术研究 (月刊)

2005年第3期 总第244期 出版日期: 3月20日

· “和谐社会与和谐广东” ·

从和谐审美文化把握和谐社会的文明演进	庞跃辉	5
生态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方世南	10
新闻出版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朱仲南	14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与资本形成机制分析	刘大志	蔡玉胜	19
论寡头企业的先动优势与后动优势		施卓敏	23
中美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比较		李安民	28

· “泛珠三角”研究 ·

“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		程玉鸿	35
“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工业结构关系测度研究	郑少智	陈萍	40
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综述	龚唯平	韦前	46

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释义		左亚文	49
---------------	--	-----	----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系列笔谈 ·

马克思主体观的反思		刘森林	55
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王新生	61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的越迁		马捷莎	68
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一种方法论反思		张亮	72
论评价分歧		江传月	79

世界史: 理解现在	[德国]汉娜·西斯勒 著	邹建华 译	83
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周兵	93
略论美国“新左派”史学之兴起		徐良	99
清末禁烟背景下的海军经费筹措		刘增合	105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历史 hst@gdskl.cn  
哲学 phi@gdskl.cn 文学 lit@gdskl.cn  
经济 eco@gdskl.cn 语言 lng@gdskl.cn  
政法 law@gdskl.cn 教育 edu@gdskl.cn

(1958年创刊)

· 岭南文化 ·

客家历史文化的承传方式

——客家人“来自中原”说试析

郑德华 111

客家文学的繁荣、得失与期望

罗可群 117

张资平早期小说与客家文化

巫小黎 120

· “辽金文学研究态势”笔谈 ·

对弱势学科与方法论的思考

邓绍基 125

辽金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张晶 127

金代文学文献研究的成就及不足

薛瑞兆 130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胡传志 133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

赵维江 135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两次错位

张建华 138

· 学海酌蠡 ·

《元史·阎复传》勘误一则

赵树廷 143

《释名疏证补》的“先谦曰”探微

魏宇文 王彦坤 143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介

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陈永祥 145

评《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

周力 146

英文摘要

148

· “和谐社会与和谐广东” ·

# 从和谐审美文化把握和谐社会的文明演进

◎ 庞跃辉

[摘要] 和谐社会是文明演进的一种社会结构优化状态,也是一个多维有序的社会文明系统。这一社会文明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所组成,而和谐审美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在社会文明的生成历史中,和谐审美文化始终伴随其中,并从四个重要层面影响社会文明的演进:和谐审美文化是显现人类文明生成的历史端倪;是影响现代物质文明演进的重要取向;是推动现代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是促发现代生态文明演进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和谐社会 审美文化 文明演进

[中图分类号] B83-Q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05-05

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和谐社会是文明演进的一种社会结构优化状态。构建和谐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文明多维有序发展态势的必然选择。社会文明演进历史表明,社会文明的发展是由多种人文因素推动的系统运动过程,而和谐审美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定的社会文明渗透着一定的和谐审美文化意识取向,而一定的和谐审美文化意识取向又影响着一定的社会文明的生成。因此,推进社会文明发展,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培育科学健康、积极向上的和谐审美文化价值观。

## 一、和谐审美文化是显现人类文明生成的历史端倪

从和谐审美文化视角把握社会文明演进的态势,必须首先考察人类文明的内涵与生成历史。哲学、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文化学等一般把文化看作过程,而将文明视为结果。从内涵上分析,文化与文明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文明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历程,初始于德国。1838年德国学者L·佩圭因提出“文明——文化科学”的概念,主张建立独立学科来研究文明的内涵与表征。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出版了《初民文化》一书,认为文明是多维文化的结合体,即“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能力与习惯的复合整体”。<sup>[1](P930)</sup>泰勒虽未明确使用和谐概念,但其“复合整体”已蕴含和谐之意。文明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群体的行为特质:清晰的语言、伦理规范、法律制度、审美艺术、知识积累等等,都从不同层面显现了人类文明的特征。美国人类文化学家A·L·克罗伯和L·怀特也认为,一个民族的行为轨迹和特征是其文明作用的结果,文明是由人造就并为人类需要服务的。虽然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文明进程,但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文明素养,而不是取决于固有的天性或遗传素质。尽管人亦是一个“体质的抑或生物的热功能和谐系统”,但人之所以有别于其它动物种类,就是因为“人是其特定文明的演绎者”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推进者”。

从社会文明的内涵与表征可见,文明既是人类的特定创造产物,也是一个多维的系统结构。文明的系统结构是由多种要素所组成,和谐审美文化取向就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实,在人类文明的

---

作者简介 庞跃辉,重庆交通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重庆,400074)。

生成演进历史中，和谐审美文化活动始终伴随其中，并成为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远古时代，神话是最为原始的和谐审美文化形式之一，而神话的诞生则标识着人类文明雏形的生成。神话文化意蕴是以自然崇拜为内在的语言结构，其显现则成为了“初民们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最有意义的对话”。<sup>[2]</sup>神话与人类早期文化意识（尤其是宗教意识）有着密切联系。此外，原始审美艺术与生产技艺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指与天然相区别的人工创造。例如从原始人洞穴构造到茅屋搭建就标志着建筑艺术的和谐萌芽。原始审美艺术还受图腾影响。原始人的纹身、住宅、用具以及舞蹈中的图腾形象，皆表现了原始人的和谐审美文化意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审美艺术从实用技艺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以追求和谐精神生活为主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的高度，进一步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生成与和谐审美文化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sup>[3](P19)</sup>这里，马克思明确把审美艺术作为人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世界事物具有多种属性，人在历史活动中与世界发生多种关系，人有多种感受、思维、认识世界事物的心理功能，因而人对世界有多种不同的掌握方式。审美艺术掌握与其它文明形式掌握世界的方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审美艺术掌握相同于科学理论掌握，都不是局限于只认识事物现象而游离其本质，都服务于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它是通过对事物形象的审美属性的感知体验而激起和谐美感（伴随着想象、感悟和强烈的情感活动）的。审美艺术掌握相同于宗教掌握，主要都是运用形象思维，以通过对某种具象、情景的和谐感知和体验，诉诸感情，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但它是对客观世界真实的和谐感知和体验。

## 二、和谐审美文化是影响现代物质文明演进的重要取向

从人类物质活动的文明意义上看，人类社会文明既体现于物质产品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又显现于物质产品生产加工的结果上。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已经确证，当原始人类制造出最早的石器工具后，就在不断改进工具的实用功能的同时，还尽量将工具加工得美观、精致，以体现和谐之蕴。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祖先就已经能制作各种较高质量的石器和骨器，有些器具上还饰上精美浮雕和优美刻线，给人以和谐美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生活的进步，人们不仅对产品的实用价值有越来越高的需求，而且对产品的审美文化价值也同样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纵观诸多现代产品，从高速公路纵横立体而有序交错的优美曲线，航天飞机和空间实验室新颖奇特的优美造型，到各种日常物质产品的优美造型和式样，都蕴含着丰厚的和谐审美文化取向，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硕果。由于在现代物质产品的生产加工中渗透了大量的和谐意识取向，因而物质产品在不断提高实用功能的同时，其审美文化价值也日益显著，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物质产品内在质量与外在形象的有机结合，人们对现代物质产品的需求由“单向度追求”改变为更加注重其“适用美与欣赏美的统一、功能美与结构美的统一、流行美与个性美的统一”<sup>[4](P100)</sup>等和谐效应。

从现代物质文明的演进态势上看，技术美学的开发和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美学是将生产工艺设计、制造加工技术、人体工程学与美学、艺术、心理学等加以综合运用的交叉学科。从产品设计的审美角度来看，技术美学着重把握产品和谐形态的构思美和韵律美。就产品和谐形态的构思美而言，就是在对产品的属性、外形、质量、用途、档次、特色以及销售对象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后，寻找到改进产品造型、色彩、装潢等形式美要素的最佳方案，捕捉到诱发产品形态和谐美的设计灵感的激发点，从而抓住产品的品牌、商标、用途、原料、产地、制造工艺等方面的特点而巧妙运用联想、夸张、比喻、象征等审美艺术手法，使产品设计具有高度的和谐审美力。就产品和谐形态的韵律美而言，就是通过对产品结构立体和平面的构成中的高低、长短、明暗、虚实等的综合研究，有效运用视角审美原理，造成均匀或有计划的间歇或停顿，从而使其产品的结构及色彩形成和谐的节奏感；有



效运用审美心理原理，把握产品结构的形、色、质等有规律的变化组合，并结合富有韵味的审美想象，塑造独特优美的形态结构，展现产品的时代律动感和鲜明个性；通过合理恰当地运用反复（即两个以上的同一要素以一定间隔排列并重复连续下去）、渐变（即造型或构图的排列渐次地变化或以级数变化）、错位（即把原来整齐的排列切断并改变其间隔方向或位置）等设计手法，来巧妙处理产品线型变化、形体分割比例，使产品与材质、形态、包装等协调一致、和谐宜人。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演进态势上，物质产品形态的民族性、古朴性、现代性也是影响其产品能否得到人们青睐的重要因素。而从和谐审美文化视角来把握这些因素，亦可见其显著的特征。就产品结构形态的民族性来看，其和谐审美文化特征着重表现为产品形态在造型、色彩、装饰等方面充分体现出民族风格与时代感的统一协调；民族传统工艺手法与现代工艺手法、自然材料与现代新材料的组合运用既经济又别致、既富有地方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感；采用民族传统的艺术技巧来进行产品的装饰性处理、包装设计制作、附件配置等，能够真正有效地渲染、突出产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审美意蕴。就产品结构形态的古朴性来看，其和谐审美文化特征着重体现为在表现怀旧情绪、重返大自然的产品设计风格上恰当运用朴素简洁、古拙粗犷的艺术手法突出产品的古朴特色；在选材、加工的“返璞归真”中切实体现产品与人的和谐关系，如使用的便捷感、亲切感；在追求产品结构形态古色古香的仿古设计制作上，力争达到古朴而不陈旧、自然而不平庸、粗犷而不粗糙、简约而不简单。就产品结构形态的现代性来看，其和谐审美文化特征着重表现为在产品的设计制造中能恰当采用现代高新技术，突出地展示现代产品之科学美的风格；通过合理运用现代艺术手法（例如抽象艺术法、反平衡法、趣味中心法、错觉效应法等），体现产品的现代意味和个性追求；在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之中能够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从而使现代物质产品更具人性化与亲和力。

### 三、和谐审美文化是推动现代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

从人类精神活动的文明意义上看，人类精神文明既是体现社会和谐进步与发展的演进标志，也是人与其它动物种群相区别的重要界限。人不仅是物质性的生命存在体，也是精神性的生命存在体。作为精神性的生命存在体，决定了个人与社会的文明演进必须建立在丰富与和谐的精神需求满足的基础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人借助于智力、智商和智慧，能够使用工具和符号，形成经验、技艺、技能，能够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利用知识，产生动物世界所没有的人的精神和谐世界，形成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同人的物质生活一样，也不是单调呆板的，而是丰富和谐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随着人的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也就不断产生新的利益、幸福、理想等等的价值追求，朝着更高层次、更加美好的和谐生活目标前进。而和谐审美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演进上发挥着特殊重要的功能，具有其特殊重要的作用。人类早期兴起的神话审美文化活动所形成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习俗以及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尤其是“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精神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于人类图腾审美文化活动中的纹身及住宅、用具上的图腾和谐形象，以及摹仿图腾和谐形象的舞蹈和歌唱，对于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也起了特殊的作用。此外，早期人类的雕塑、壁画、篆刻等艺术活动中所讲求的和谐美感，对于大力提高人们的审美艺术品位和能力，进而有力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演进，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现代精神文明的演进态势上看，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正确引导人们进行健康有益的审美文化活动，积极丰富人们的审美文化生活，大力提高人们的审美艺术修养，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亦将产生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就曾深刻指出，劳动者的生活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方面；劳动者为生存所必需花费的时间是劳动时间，而用于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时间是闲暇时间。恩格斯在其名著《论住宅问题》中展望未来的社会“不仅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

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sup>[51](P479)</sup>在这段精辟的论述中，恩格斯指明了审美文化艺术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进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审美艺术活动，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提高审美鉴赏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认识社会的能力。马克思在谈到 19 世纪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时就指出，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sup>[6](P402)</sup>

在现代精神文明的演进态势中，虚拟时空（或称“网络世界”）的文明建设亦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等高科技的支持下，人们可以“突破”既定的现实时空而“构筑”超现实的虚拟时空，已不是想象的神话，而是摆在眼前的场景。事实上，关于虚拟时空的把握，可以说具有悠久的审美文化历史。从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到敦煌的洞窟壁画、雕塑和唐墓壁画等，都可说是古人尝试超越文字表现的局限，用形象、色彩和周边条件创造的虚拟环境。18 世纪西方的全景画，创建了沉浸式的虚拟体验景象的早期技术。20 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又发展起来了全景电影，进而设想出了“体验剧场”，力图突破银幕的壁障，获得身临其景的效果。<sup>[7]</sup>近 20 年出现的虚拟技术，主要是一种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系统通过由电子形成的一连串的“数字包”，把文字、图像、声音等媒体集成起来，先在物理时空把现实物转化成“影像符号”，然后再在虚拟时空演化出来。<sup>[8](PXIII)</sup>影像符号具有综合处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类信息的和谐功能，达到了图文一体化、视听一体化，从而创造了更大的活动自由度。然而，在虚拟化的网络时空中，尽管行为主体面对的是一个大开放、多元化的世界，可直接跨越或消解许多现实时空的限制，及时、便捷、综合性地传递、存储、创造、利用信息，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可是这并不能模糊或消解不同审美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因为有人企图将自己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人，也把网络作为一种工具来推销其丑恶、伪善、庸俗、低级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因此，虚拟时空既是便于人们沟通与交流的广阔世界，同时也是其不同审美文化价值观对垒搏杀的特殊舞台。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加强网络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提高人们对于网络文化的审美鉴别力，真正营造出健康有益、优美和谐的网络世界。

#### 四、和谐审美文化是促发现代生态文明演进的理性选择

现代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演进的一大趋势，它既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共进的客观需要，也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人类在许多方面“粗暴”地干预自然，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内在平衡，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理性地思考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问题。有人甚至把近代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的畸型大工业视作一种“恶性膨胀”方式，是制造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消费危机、心理危机、社会异化、人性异化等灾难的罪魁祸首。如法国学者皮埃尔·普拉德旺就用《圣经》中一个名叫该隐的人为争权而杀死亲弟弟来作比喻，把这种恶性膨胀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称为“该隐综合症”。<sup>[9](P82)</sup>而一部分未来学家则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以撰写《未来的冲击》而闻名于世的 A·托夫勒就直截了当地说：“大烟囱，这个工业生产线社会的标志，快要成为古董了。”<sup>[10](P13)</sup>法国学者 G·博诺认为“我们正在经历工业生产制度大危机的阶段”，并处于“走向另一种类型的发展的起点”。<sup>[11](P82)</sup>走向“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持续发展，遏制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恶性膨胀。

从现代生态文明的演进态势上看，以整合生态美学、景观美学、建筑美学的审美文化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环境美学，在倡导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营造“天人合一”和谐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环境美学是环境科学与美学交叉的分支学科，着力研究人类对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审美要求和环境质量的审美价值。从环境审美属性的生成意义上，自然环境由于鲜明的色、光、线、音、质等呈现出来的某些特定的形式构造，特别是天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生机，使人身心愉快、精神振奋，具有满足人的审美要求的重要意义。因此，传统的美学早已把自然美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在人工改造自然的规模日益增长的现代，人们往往把更趋人性化的家园感寄托在对大自然的审美要求

中。但是，近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在一些方面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自然美，这就使得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在大规模建设中，要求必须进一步考虑满足人类审美要求的价值取向，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早期的环境健康标准，除了对有害物质的限制外，已有了反映人的审美要求的指标。如规定健康水质无色、无异味，保持相当的透明度等。近十几年来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更进一步针对风景旅游区等特殊环境提出了明显的审美要求。在环境科学中，美学与经济学、卫生学的理论乃是制订环境标准的综合依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现阶段，总的来说，具有法规性质的环境标准反映审美要求的参数还不多，内容也不够具体。这除了因为审美需求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等因素外，与一些人缺乏生态文明的和谐观，忽视环境美化建设，甚至大肆破坏优美环境不无关系。因此，科学认知生态环境的审美属性，积极创造生态环境的审美价值，在生态文明发展观规约下改造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切实提高和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生态文明的演进态势中，城市化建设与审美文化的关系亦日益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演进的过程。自 3000 多年前古城镇产生以来，就有了城市化的历程。但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现代工业化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而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环境和社会问题。目前，不少人对城市化的认知，往往只想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成群结队的各式车辆，灯红酒绿的豪华酒店，五光十色的娱乐场所，人声鼎沸的贸易集市。殊不知，这种非理性的认识，给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和谐的病根。例如，城市中一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由于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方便，因此数量倍增。但由此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大气污染、噪音以及伤亡惨重的车祸，又反过来使人们对汽车产生了厌恶的感觉，称之为“讨厌的铁皮匣子”。又例如，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反映了房地产业的兴旺发达。然而“见缝插针”的高楼大厦所带来的大片阴影，极不利于草树、鸟类生长和人的健康，因而使人对之产生丑恶的印象，成为被诅咒的“冰冷水泥物”。如今，积极消除“城市病”的隐患，已是城市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从和谐审美文化的角度理性审视城市化建设，把握城市化建设与审美文化的内在联系，就是以生态文明的和谐观为指导，促进城市化与人文化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环境的和谐之美：既有雄奇壮观的高楼大厦，又有花草芳香的长廊亭榭；既有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又有幽静曲深的林荫小道；既有集市贸易的欢声笑语，又有小区园林的百鸟啼鸣；既有富丽堂皇的宾馆酒店，又有风格别致的影院音乐厅；既有耀眼醒目的商业广告，又有栩栩如生的艺术雕塑。总之，城市化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提升的进程，应是环境优美化和人的现代化和谐发展的进程。

#### [参考文献]

- [1] 汝信. 社会科学新辞典 [Z].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2] 张强. 自然崇拜: 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 [J]. 江海学刊, 2003 (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庞跃辉, 邓伟荣.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3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7] 曾国屏. 虚拟现实——一项变革认识方法的技术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 (7).
- [8] Heim M eta M ichael *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9] 转引自陆象淦. 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10] A·托夫勒. 预测与前提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4
- [11] G·博诺. 1980-2000年: 将推翻一切的二十年 [J]. 巴黎: 新观察家, 1980

责任编辑: 罗 苹

# 生态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方世南

[摘要] 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现代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态现代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目标取向和根本保证。

[关键词] 生态现代化 和谐社会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10-0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系统工程。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要通过协调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推动民主和法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构筑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通过走生态现代化的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以此为基础,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

## 一、生态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人们,人类非生态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模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也是引发人际关系、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认真检讨和更新传统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模式,把生态现代化视为社会整体现代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通过发展绿色科技、绿色生产力、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绿色营销以及倡导以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绿色行为方式等为内容的绿色精神文明,使人类走上一条资源可持续利用,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并使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现代化道路。

全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对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系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检讨现代化成败得失,对发展进行价值评价,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成果纷纷问世。人们在反思现代化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灾难的同时,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的理论,如第二次现代化、再现代化、后现代化、新现代化、继续现代化、超越现代化、解构现代化等理论。对现代化的走向尽管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新的现代化理论都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诱因。现代化作为因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功能的伟大变革进程,不能建立在一味地剥夺和削弱生态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相反,它应该始终朝着有益于生态环境建设,从而最终也有益于人类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方向前进。现代化并不是人类实践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人类达到稳定和谐、幸福安康的重要手段。现代化需要追求价值,这一价值应该是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各民族和国家的局部价值和全人类整体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现实价值和下代人的未来价值的统一。因此,现代化并不是非生态的,而是积极支持生态环境发展的现代化。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水平和程度,应该而且也必须将生态现代化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

---

作者简介 方世南,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苏州,215021)。



所谓生态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生态环境领域之内但意义又超越了生态环境范围的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和重要内容，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确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和现代化发展理念，倡导工业生态学，注重环境责任制度化，强调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地位，通过大力发展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学技术，不断提高资源劳动率，科学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地利用和悉心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支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使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人类能够世代地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是一场波及面十分广泛的社会整体性的变革，必将引发现代化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体制层面、管理层面、教育层面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层面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变革。生态现代化要求人们在运用生产力标准或经济增长速度来评估现代化水平和程度时，还必须评估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生态资源状况。生态现代化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原动力。生态文明的发展又有助于加快人的现代化步伐，通过人的文明来带动社会整体文明，在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三者的交互发展中，人类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等会发生全面的革命；催生着绿色自然力、绿色生产力、绿色消费、绿色科技、绿色政治文化等新生事物，推动着社会文明进入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的美好景象。

## 二、生态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生态现代化是事关小康社会建设能否达到全面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能否成功、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畅通无阻、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能否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重大事情。生态现代化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是由生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决定的。现代化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超越传统的革命性变革，始终奠基于生态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基础上。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且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是人类生命有机体的血脉，还是社会关系和谐的坚实基础。

长期以来，人类所奉行的非生态的现代化实践模式，已经成为人与自然不和谐以及人与人不和谐、人与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其错误弊端主要表现为：

第一，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生态价值。认为经济价值是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导向，生态价值必须服从和从属于经济价值。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就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的不断积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而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就是倡导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受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就要采用威力巨大的生产技术的工业生产体系，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让它向人类奉献财富。现在，因为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现象，正在把人类从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成果慢慢地抢夺过去。印度洋大海啸以堆积如山的尸体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印度洋沿岸这些年来一味发展海水养殖业和旅游业，极大地破坏了沿岸自然形成的遏制海啸威力的生态系统和地形地貌，从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片面强调生态资源的无限性而忽视其有限性。为了保证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不惜极大地消耗生态资源，甚至达到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地步。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物质世界的无限性概念的误解，从构成物质世界的宇宙的无限性引申出地球资源的无限性。不了解地球上的生态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也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有限性。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不但表现为不可再生资源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复生性；还表现为可再生资源也是有限的。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在使用可再生资源时，也要可持续性地利用。现在，在过去水资源十分丰富的一些地区，即使是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过度地利用水资源

加上环境污染，已经拉响了水资源短缺和一些水资源无法利用并且危害人类的警报。

第三，过度利用和浪费自然资源而忽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对污染的治理。认为在发展经济中可以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忽略不计，地球是容量无限的天然的“垃圾箱”和“阴沟洞”。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环境问题说到底人的问题，环境危机说到底人的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在忽视环境污染和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指导下，人们过度地利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降低了它们的自净能力和缓冲能力，导致它们自身内在整体系统的不和谐。同时，大量有毒物质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进入环境，导致温室效应和臭氧层越来越稀薄等整个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现象，对动物、植物和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第四，无节制地发展和运用科技而忽视对科技的价值评价与适度发展。科技在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业革命的累累硕果就是凭借科技这一锋利的犁铧耕耘和栽培出来的。但是，科技在帮助人们使用先进的手段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断地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以致于美国就有人将环境危机归结为科技的发展。美国学者巴来·康芒纳在《封闭圈》一书中说“迅速发展的技术，它的规律就是利润，许多年来一直毒化着我们的空气，腐蚀着我们的土壤，剥露着我们的森林，并且毁坏着我们的水资源。”<sup>[1](P4)</sup>“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它是一种灾难，不仅影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而且也影响到我们耕种的土地和了解甚少的空间。但是这一切，最悲惨的还是现在隐伏在人们身体中的化学物品对人类所造成的污染，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默默地吞食自然。自然选择已成为过去，最后剩下的只是技术。”<sup>[2]</sup>这决非危言耸听。现在，滥用化肥和农药已经直接危害到了人们的健康。

### 三、生态现代化是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路径

将生态现代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强大推动力，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就必须深刻反思传统现代化实践模式，采取科学的发展模式，进行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其一，变革传统的非生态实践模式，确立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实践模式。实践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变革和改造，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真善美，并不必然地体现出价值。实践具有双重性，会造成不同结果。以生态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绿色实践会给人类带来和谐稳定，使人类享受到幸福安康。而非绿色的实践，如毁林造田、过度地放牧和捕捞、随意地污染环境，只会给人类带来负价值。抽象地、不加分析地抬高和夸大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总是值得肯定的，实践就是一切的做法，会摧毁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对现代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工业革命时期，人们高扬实践的大旗，推行生产第一和高消费战略，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污染的发展范式。正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所说：“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sup>[3](P5)</sup>非生态的实践模式，在给人类带来暂时的和短期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否定了人类长期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还造成了许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痛苦的负价值的现象。绿色实践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只是从单一的主体需要和满足的尺度衡量价值的思维误区，将人的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近期价值和长期价值、局部价值和整体价值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将实践的功能定位在符合人性和给人类社会带来和谐的基础上。

其二，加强环境保护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为生态现代化提供动力机制。生态现代化的基础工作是加强环境保护，它在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带有消极防范和被动应付的性质，但是环境保护仍是生态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抑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方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环境保护一般是指自然和生态的保护、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环境管理、环境检测等一系列活动。

环境保护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点。企业开发和采用新的生态技术、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绿色科技，就为自己赢得了一种新的竞争力，即生态竞争力。根据现在的环境状态，环境保护重点在于污染的治理和预防、植树造林、发展生态产业，从各方面堵塞破坏环境的途径，遏止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步恢复、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扭转环境系统的失衡局面，保证环境内部的自身发展。

生态现代化的主体工程是发展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生产力的源泉的抽象形式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环境系统，也就是以土地、河流、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矿物等自然资源为核心的自然力。它构成了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是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源泉。以对生态环境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可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力：促进发展的生产力（建设性生产力）和阻碍发展的生产力（破坏性生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如推广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绿色农业，发展生态工业和生态产品；治理沙漠、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优化水环境等，是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而发展非绿色的生产力，如采取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以获取经济增长，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的源泉从源头上加以扼杀，是对生态系统的极大破坏。

绿色科学技术在生态现代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绿色科技是充分考虑环境问题，不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有助于生态环境发展的科学技术。科技对生产力的进步作用应该在于，不损害生态系统自组织的优化，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如果科技对环境产生负面作用，就不是第一生产力，相反，会成为第一破坏力。绿色科技在生态环境中大显身手的另一表现是让资源循环利用和循环替代。包括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能源、矿产资源的循环替代；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还包括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绿色科技既可以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的和技术的保证。

其三，进行体制创新，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推动生态现代化健康、有序和高效地发展。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开出了很多药方。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社会秩序理论、哈丁的公有地悲哀理论，还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制度激励与可支持发展理论，都突出了制度设计对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有效的制度设计，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上的严格的法律条文、科学的规划、有效的监督管理、完善的环保科技政策、务实的科技开发和科技创新措施、主动积极的政府管理环境的职能行为，都能够推动生态现代化的发展。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是制度之母。在重视制度设计的同时，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氛围，确立科学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只有把制度（硬管理）和文化（软约束）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推动生态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崭新的和完备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绿色实践运动，带给人类的必将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即生态社会。在生态社会中，绿色的政治文明、绿色的物质文明、绿色的精神文明、绿色的管理和制度文明以及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等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必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人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诗意般地工作和生活、经济增长和生态进步双赢、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紧密结合的高度和谐的崭新时代。

#### [参考文献]

- [1] [美] 巴来·康芒纳·封闭圈 [M]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 [2] 转引自赵红洲·论反科学思潮 [J] .科技潮，1992（10）.
- [3] [美]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罗 莘

# 新闻出版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 朱仲南

[摘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上重要位置”。中共广东省委十分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和谐广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新闻出版业怎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本文通过对新闻出版业的行业特点和存在的“不和谐”问题的论述,提出了新闻出版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及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新闻出版业 构建和谐社会 责任 作用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14-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备受世界瞩目。20多年来,广东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带来了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矛盾与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被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所困扰。如今,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正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一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也从不同角度指出,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充分认识到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政策把握得当,社会环境和谐,就能较顺利地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不相适应,势必引起冲突,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经济社会一旦徘徊不前,又动摇了发展的根基,有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因此,在这个非常时期里,各行各业如何从自己的角度,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广东省委也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把建设和谐广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新闻出版业怎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新闻出版业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重要部门、党的喉舌、大众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发出什么声音、唱出什么调子,是否善于引导,如何引导,怎样更好地唱响主旋律,奏响和谐曲,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影响各行各业的协调发展,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因此,新闻出版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传播文明、传承美德、促进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 一、广东新闻出版业的现状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其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也令人瞩目,书报刊和声、光、电、磁多种媒体,采编队伍、印刷业、发行网络、报刊零售市场、版权贸易、出版教育与科研等全方位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大出版”的格局。

近年来,广东省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发展势头良好,成绩较为突出。一是精品双效战略初见成效。现全省有21

---

作者简介 朱仲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广东 广州,510075)。



家出版社，2003年共出书5316种，总印数2.63亿册，图书出版蒸蒸日上，居于全国中上水平。在坚持精品双效战略和“三贴近”原则的基础上，严守舆论导向，严把质量关，获全国大奖的出版物和作品明显增多。二是集团化发展和规模经营成绩斐然，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为代表的省市党报，率先在全国组建报业集团，形成了“新闻大省”的兴旺格局。现广东省有报纸134种，期刊374种，报纸期刊居全国前列。其中，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报纸有5种，期刊有6种，广告收入超过1亿元的报纸有8种，这标志着广东新闻出版的内容生产力和影响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和家庭期刊集团的组建和发展，表明广东省出版改革起步早、势头好，为全国试点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其中出版集团成立四年来，到2003年底，总资产增加了31亿，总额17亿；所有者权益增加6.8亿，总额15亿；年均国资增长率达16.2%，总营业收入42.7亿，创利7.5亿，利润人均水平在全国出版集团中排行第一，四年来上缴税金4.2亿，是省直宣传系统企业纳税大户之一。三是发行业走上了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化之路，出版物营销市场活跃。现全省有发行单位和零售网点近18000个，书报刊营业额达58亿，销售畅旺，市场发育较好。四是印刷业独占鳌头，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的重要生产基地。广东省现有15267家登记备案的各类印刷厂家，其中珠三角地区有11597家，固定资产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从业人员50万，印刷工业总产值486亿，固定资产总额598亿，名列全国第一。五是音像制作业坚持以技术领先带动质量领先，规模和效益都领先于全国。广东省现有光盘复制企业53家，各类光盘生产线394条，音带复录厂42家，电子出版物（软磁盘）复制单位3家。去年广东省光盘复制加工6.75亿片，其中可录光盘约1.5亿片，光盘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占据了全国半壁河山。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新闻出版系统的总资产年均递增25.1%，销售收入年均递增19.1%，利润总额年均递增18.8%。

## 二、新闻出版业的行业特点

新闻出版业在改革开放的26年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紧迫感，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练就了一支践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过得硬的队伍。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考验。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如何认识行业的特点，如何认识新闻出版业的“二重特性”，“双重责任”，这对新闻出版业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闻出版业既不同于一般的产业，也不同于一般的事业，它既具有事业性质，在管理方面又必须符合企业的一些基本要求，这就是新闻出版业的二重特性。这种二重特性决定了新闻出版业的产品二重性，职业行为的敏感性和政策环境的限制性。

一是产品价值的二重性。一般物质产品虽然也有多方面的价值和用途，但它们的价值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价值。精神产品不仅有经济价值，同时还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张报纸、一本期刊、一本图书，既是一般产品，也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特殊产品。因此，新闻出版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创造社会效益。

二是职业行为的敏感性。新闻出版单位虽然也讲成本和效益，但它毕竟不是纯经济性质的企业单位，而是含有事业性质的企业单位。由于新闻出版单位的产品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所以如何保证新闻出版单位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注企业发展、从业人员个人事业发展的同时，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注产品的社会影响、政治影响以及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行为影响，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对这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以及对个人角色定位的“双重责任”，也是新闻出版业不同其它行业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新闻出版业工作中遇到与其它行业相比的“难”，在这里；新闻出版业任务的“重”，在这里；新闻出版业工作的“神圣光荣”，也在这里。

三是政策环境的限制性。新闻出版业的政治敏感性决定了从事这一行业必然受到政策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要求，都有不同的手法，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都有着各自的限制。只是由于不同的国情、社情，对新闻出版的政策限制性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恶意炒作、不真实、有损国家声誉、引起百姓恐慌、无中生有等产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抵制或限制。一般性企业，只要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完全可以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其产品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只要符合行业标准，一般不具有政治属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不受政治的影响和限制。但新闻出版业不同，它的特性决定了它会受到限制。如果没有政策、纪律、法律的限制、把

关，低劣的、粗俗的、格调低下的、恶劣的、反动的精神产品就会出笼。政策环境的限制性是新闻出版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又一突出特点。

正确把握上述特点，是正确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的重要前提，是决定是否从讲政治的高度、为大局服务的高度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是为构建和谐广东而努力工作的重要前提。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的理念下，唱响主旋律，奏响和谐曲，是新闻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新的任务。

### 三、新闻出版业存在的“不和谐”问题

面对新任务、新挑战，需要我们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分析查找当前新闻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利于新闻出版工作今后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构建和谐广东服务。目前，新闻出版工作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不和谐”问题。

一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大局意识不强。

政治的敏感性不够强，大局意识不强，表现在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对“产品”的生产加工缺乏一种大局意识。有些同志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看成是一件虚的东西，纯文字的东西，没有深刻意识到在国家运转的整个机器里，文字的产品可以转化为活生生的、物质性的东西。经过任何一张报纸、一本期刊、一本图书的长期熏陶，它们会形成一种文化，文化又会影响人，会使我们的城市建设、乡村乡规民约以及各式各样由人去创造的另外的产品，都带有文化和政治的印记，再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政治上不敏感，大局意识不强，导向就容易出现偏差。有了偏差又不清楚原因在那里，这是一些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时常会犯的错误。比较常见的是只按市场的“指挥棒”转，着眼短期效益，缺乏品牌意识，工作带有盲目性，什么“热”就追什么，如热衷于打擦边球，热衷于炒作，热衷于追热点，热衷于评价已有定论的历史问题，热衷于猎奇，热衷于追踪名人等。这类做法，是对国情、社情、民情缺乏正确的了解和认识的表现。这虽然适合市场上一部分读者，虽有为某一层读者服务的意识，但在改革深入发展的转型期，我国社会的利益群体已呈多元化格局，所以又显得不太受欢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媒体更要以“三贴近”为原则，围绕如何开发新品种，拉宽服务面，有针对性、创造性地规划、策划、采编符合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产品”，提供给广大读者予时代性突出的好作品、好产品。我们有的从业人员似乎有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以上那些新闻报道、连续报道、热点报道、热点评论、猎奇的东西群众喜欢看，这是一种眼浅的认识。这要求我们新闻出版工作者要主动了解党的中心工作，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研究广大读者的心理现状，了解群众期望解决什么问题以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那些炒作的新闻报道、作品、图书，解决不了引导群众如何适应“变化”的需要，提供的服务群体不分，心中无数，缺乏对群体多元化格局的了解，不够主动。因而，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引发出不和谐的因素。

新闻出版工作者，应该有政治敏感性，有大局观念，不要不顾大局去评论把握不准的问题；不要在敏感的政治、政策问题上打擦边球；不要对民族宗教问题无原则地随意议论；不要图痛快对不了解的事、缺乏核实的事随意指责批评。把握好这些原则，将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利于我们整个转型期的过渡。

二是随意、片面性的评价。

评价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逐步走向成熟所必需的一种判断或取向。社会的急剧转型，需要我们确立新的评价指标和系统。过去评价一个工程师表现良好，或许用埋头苦干就够了，现在恐怕还要“开拓创新”，或者“成效显著”。在不同利益群体里，多元化格局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于是各种各样的评论、评价多起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在各种种样的评价中有随意的评价、片面的评价，夸大的评价、失实的评价、违反科学的评价，庸俗的评价、无中生有的评价等现象。混乱的评价会产生出混乱的标准，混乱的标准会产生不和谐。构建和谐的社会需要有一种权威的、有指导性的、科学性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事件，评价一个地方的变化，评价人物，要坚持辩证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不能感情用事，唯心的、武断的、自我的、片面激进的评价，只会产生不和谐音，会极大地削弱媒体的权威性、影响力，造成对被评价的对象的不公平、不客观，没有多少好处。

和谐社会的构建，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包括父母子女之间、师生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公务员与服务对象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企业工人与老板之间等。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客观的、中肯的、成熟的评价。任何充斥着不平等、不客观评价的地方，绝对是不团结、不和谐的地方。新闻出版工作者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手中的权力，尤其对有可能损害国家形象的；可能导致国内社会关注，但目前难以解决的；可能导致省与

省之间、地区之间矛盾的；可能导致青少年价值观、审美观、价值取向混乱模糊的；可能导致政府与群众之间误解的；可能导致企业发展严重受损的；可能导致民众不安的；可能使民众焦虑感产生的种种评价，要加强防范。要提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提高协调各方的能力，营造一种安祥、稳定、正气、大气、和谐、宽容的氛围。

三是“焦虑文化”的传播。

焦虑可以是一种个人现象，也可以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媒体既可以传播稳定的信息，也可能传播焦虑的信息。如果一味传播没有科学分析，没有正确疏导的焦虑信息，那么这种焦虑就会对和谐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2004年，我们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期间，英国的几位学者严厉批评英国的一些媒体，不负责任地大肆报道暴力事件，报道“恋童癖”事件，使许多英国家庭陷入了恐慌焦虑之中。因此我们的媒体，要慎防焦虑文化负面地影响民众。人有了焦虑，就产生压力、不安，情绪就容易波动，就会相互抱怨。严重的还会引起骚乱，诱发精神病，诱发人的错觉、猜疑，甚至成为诱发人自杀的原因之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媒体没有很好把握群众的心理动态，过分披露一些血淋淋的案件；过分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娱乐界一些名人的负面行径以及“民工荒”等进行报道，这些报道，如果过于集中和过分渲染，都会对人产生焦虑起作用。如现在的一些招工启事，确实存在年龄歧视，一般注明女的要35岁以下，男的要40岁以下。这些招工启事经报纸刊登，不少群众心理就容易不平衡。女的35岁，男的40岁就感到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了，什么工作都干不了，受排斥了，是负累了，是家庭和国家的包袱了。有的人心里乱如麻，产生焦虑情绪，甚至会诱发悲观、失望、厌世情绪。这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都没有好处，对构建和谐社会更没有好处。再如一些报道“神童”的文章，把神童渲染得几近完美。有创造力的神童当然求之不得，但几乎都是写小孩子如何背诵文章，是关于记忆力的故事。不少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看了，就自然拿“神童”和自己小孩比，觉得自己小孩是不是“多动症”，是不是有“智障”，是不是大脑不好，十分焦虑。有的更甚，孩子比不上别人，就打骂、训斥，甚至出现为读书的事把小孩打死的情况。

以上两例，只想说明，看似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也要下功夫去把握。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对每一篇稿、每一张报、每本期刊、每本书，都要有一个左右衡量，有一个把握上级意图、把握群众需要的良好动机。职业的敏感、职业的要求要和政治的敏感、大局的要求、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围绕稳定、围绕引导、围绕和谐去思考问题。

#### 四、新闻出版业在构建“和谐广东”中的责任

建设和谐广东，内涵丰富而深刻，具有战略的眼光。和谐广东的构建，关系到可持续发展中精力集不集中，力量集不集中，情绪高不高涨，声音和不和谐，步伐统不统一的问题。

为构建和谐广东，新闻出版业必须认真领会贯彻中央有关精神，积极推进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不断提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能力；努力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能力；坚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能力；加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的能力；坚持“三贴近”的原则，不断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的能力。

这六个能力，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营造和谐社会、和谐广东的前提，是我们的工作能否做到对党和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关键，是考验我们工作有没有创新，如何创新的标准，是我们的事业能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践行科学的发展观，不断取得突破的要求。新闻出版业要根据这六个能力的要求，结合广东的实际，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结合从业人员的特点，去研究新问题，化解新矛盾，寻找新的突破口，创造新的方式方法，为构建和谐广东而努力。

构建和谐广东，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要善于查找出一些容易诱发争论、诱发不团结、诱发社会不安、使群众心理混乱，相互指责以及偏激、随意性、主观性的“产品”。一张报、一份刊、一个出版社，完全杜绝这类产品是不可能的。在社会转型期，每个人都在重新定位，都在不断调整的社会大格局背景下生活。新闻出版业作为内容生产的特殊行业，遇到的同样是新问题、新矛盾，同样要花费时间去寻找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要善于排查，要善于驾驭，要善于化解问题，稳定社会、稳定民心、鞭挞丑恶、弘扬正气。因此，有几个原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新闻出版活动中应当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因此，舆论监督要讲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思考在时间上、角度上、社会承受力上、群众心理上能否适应；思考在时机把握上，社会认同感上，社会效果上是否合乎时宜；思考在促进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的“度”掌握得好不好。总之，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宣传纪律，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这是把握正确舆论监督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回顾历史重大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把“准不准”，“妥不妥”，“稳不稳”，对构建和谐广东“利还是不利”作为一个衡量的尺度。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为我们开了先河，它既站在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真实而客观地传达了群众的呼声，又尖锐地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反映国计民生的问题，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既坚持了党性原则，又履行了正确引导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因而领导喜欢，人民群众也喜欢。

二是批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我们的批评报道，既要匡扶社会正义，稳定社会秩序，规范伦理道德；又要服务于党和人民，稳定政治大局、社会大局，稳定民心，规范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对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揭露，“促其转化”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促其恶化”；促其稳定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促其不稳；促其和谐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促其“不和”。所以，要坚持说道理，既一针见血，又不感情用事。要坚持辩证法，防止片面性，多用事实说话，避免为片面追求爆炸性、轰动性、独家性而掺杂记者、编辑的个人感情色彩。

三是时刻把“引导”作为我们工作的重要任务。新闻出版业要正确树立一种“引导”责任，引导受众正确领会党和政府的政策和策略。从大局着想，从两个角度着想，上下沟通是“引导”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引导不好，是我们常说的导向不对，引导好了，导向就把握得比较准确。做好“引导”，不仅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情，要有战略思维，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全局观念，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促进社会和谐。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大局问题，为广东的稳定发展作贡献。

做好“引导”，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力求做到心中有数。如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企业人员分流；劳资纠纷和外来工利益；城市交通发展的障碍；教育中文凭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别中如何引导仇富心态和“等靠要”的心理问题；各种文化激荡中怎样鞭挞腐朽落后文化，弘扬先进文化；新阶层的出现有什么不同的文化需求；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怎样造声势，打击邪恶；老人问题如何体现社会人文关怀；中年人压力大如何减缓；青年人突出的思想问题如何把握；环保问题怎样宣传，怎样提高我们整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造福千秋；体育事业发展改制中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娱乐圈中的名人怎样起到良效应等等。怎样围绕各种各样的问题思考我们的工作，用战略思维去思考大问题，突出问题，怎么去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从大的角度去思考，势必感到力不从心，感到事压如山，感到迷惘；势必在工作中不能做到主动，不能把握时代脉搏，不能很好地践行“三贴近”，不能做到有针对性、有引导性。

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广东，新闻出版业担子重如泰山，这是历史大发展、大转型所赋予的，是一种既艰难又神圣光荣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抓好“理想、责任、能力、形象”，“爱国、守法、诚信、知礼”八字教育的推进，在重大题材上树立权威解读；在平凡题材上增强可信度，角度鲜活；在手法上、策划上讲究艺术性和感染力；在为大局服务上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促进和谐，促进发展。总之，新闻出版业一定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作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雨 童



· 经济学 管理学 ·

#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与资本形成机制分析

◎ 刘大志 蔡玉胜

[摘要] 文章从地方政府竞争这一横向视角,对转型期我国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及其成因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绩效的深刻影响,提出了区域竞合是对资本形成“囚徒困境”的求解思路。

[关键词] 资本形成 囚徒困境 地方政府竞争 区域竞合

[中图分类号] F0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19-04

经济发展史表明,资本形成的规模、结构与一国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由于资本的规模和结构严格说来是由社会消费剩余向投资转化过程的直接结果,所以决定这一过程的资本形成机制与格局就显得至关重要。但是,相对于整体经济转型来说,我国资本形成的主体机制仍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不相配合,资本形成格局的动态演进正在经历着一个滞后的、迟缓的二元阶段,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绩效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受西方经济学研究思路的影响,目前对中国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多从货币金融体系、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外贸汇率机制等纵向方面入手,或对储蓄决定、投资结构以及资本形成的要素贡献等进行实证分析,而对影响资本形成机制与格局的重要因素及由其所形成的横向方面——地区差异和地方政府行为——重视不够。这使资本形成市场化逻辑的部分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因此,本文的考察将基本上从地方政府行为的横向角度出发来解释和探究我国的资本形成状态与经济增长绩效,进而发掘其中的政策含义。

## 一、资本形成格局演进中的地区分化与合成

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来说,其由分权而强化的巨大的空间(地区)差异是以“点经济学”理论假设为特征的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和描述的。在这种假设中,政治权力完全集中,转型政策能够同时、全面、不分空间差异地在全国范围内同步执行。这与中国转型实践的现实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一旦放弃了这样的假设,转型政策在全国各地所得到的不同程度的贯彻与执行,以及转型过程中地区间差异与不同步就会突出地浮现出来。以此观察中国资本形成格局的演进过程,就会发现,总体格局演进只能是各种极具差异性的地区演进过程的复合结果。从地方的角度来说,资本形成的总体过程就表现为本质相近,但推进形式与进展各异的分化与合成相统一的过程。无论是由微观主体自主进行的自发演进,还是由各级政府贯彻推动的强制演进,都将在具有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空间的地区差异约束下,形成不同的演进路径和进度,并互相影响。最终的总体格局由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合力决定。

## 二、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

德国学者何梦笔(Hermann-Pillath)提出,“观察表明,在俄罗斯或中国这样具有巨大疆域、

作者简介 刘大志,上海国际集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200002);蔡玉胜,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所副研究员、博士(天津,300191)。

资源和政治经济实力的国家……由布雷顿 (Breton) 所引入的‘政府竞争’ (Competitive governments) 概念是一个或许极为恰当的分析工具。”<sup>[1]</sup>因为,“无论在欧美国家还是在我国当代,政府间的竞争是现实存在的……在地方化格局的基础上,中国的政府体系实际上表现出竞争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竞争。<sup>[2]</sup>

就地方政府而言,扩大当地资本形成规模是追求其公共收益目标和自利目标的重要手段。由于全社会储蓄供给总量构成投资需求进而实现资本形成规模的上限,所以,从一个地区角度考虑,只有尽力扩大投资需求,争取尽可能多的储蓄供给以提高资本形成规模才符合本地区和地方政府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地区间的博弈更强化了这一思路。在博弈中,一个地区扩大了资本形成规模而其他地区未能扩大时,前者就将在地区经济增长、就业、居民收入、可支配财政收入、政府租金以及官员政绩等多个方面获得更大收益,并在下一步的竞争占据优势。因此,不论其他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都会有强烈的动因选择尽力刺激当地的投资需求,争取储蓄供给,扩大资本形成规模,以免在博弈中处于下风。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资本形成的时候,对提高资本形成质量,改善资本形成结构等方面也是十分注重的。但是缺乏区域协作的竞争使得各地方政府以促进升级、调整结构为初衷的努力导致了资本形成结构在产业、产品等方面的新一轮同构与趋同。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政府盲目刺激投资,意识到的地方政府欲罢不能,即使双方都意识到了也要“两军相逢勇者胜”,谁能获得投资上的优势谁就争得了先机,从而使地区间的政府竞争仍然主要归结为资本形成规模上的角逐。由此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均衡。最终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致力于超规模扩大本地资本形成总量,从而造成宏观国民经济总体的资本过度形成,导致整个社会无效率。

从表面看来,这一理论分析结果与中国的经济现实颇不相符。尤其与前几年通货紧缩、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相对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背道而驰。经验数据表明,即使是 1998 年

通货紧缩以前,虽然出现过多次经济过热,但从储蓄—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在 1978—1997 年 20 年间,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有 12 年出现正值。”<sup>[3]</sup>(P103)除 70 年代末改革初期以及 1985、1986、1989、1993 年等年份较特殊地出现负缺口外,实际投资都没有对国内储蓄产生过分的压力。而且,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拉美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与实际 GDP 增长率基本持平,9.3% 的实际投资年均增长率并不为高,20 年间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投资增长率仅为 13.9%。<sup>[3]</sup>似乎不能说出现了资本过度形成。

实际上,判断资本是否过度形成至少有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产业和企业标准。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标准。从一国的宏观经济总量角度出发,存在着三条递进的标线:一是投资的生产资料与基础设施容量;二是消费容量;三是储蓄容量。当资本形成面临生产资料与基础设施瓶颈时,意味着投资需求已经超过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自然增长率,继续扩大将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当资本形成对应的消费需求不足时,意味着消费与投资的内在比例被打破,资本形成过度导致需求萎缩,经济有进入不景气阶段的可能;当资本形成的投资需求超过储蓄供给时,将面临资本形成上限的硬性规定,国内储蓄供给出现缺口,积累压力加大。此时引进国外储蓄的需求上升,资本过度形成往往意味着对外依赖性的过分增强,经济的系统风险提高。一般来说,欠发达国家(或短缺经济)多受储蓄容量与生产瓶颈限制,发达国家(或过剩经济)则更多地遵循消费容量标准。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短缺经济局面基本结束,消费需求的制约大幅上升。1996—1998 年消费率延续了改革以来的基本走向,年均下降 0.07 个百分点,与 1991—1995 年均下降 0.66 个百分点相比,呈减速下降之势(见表 1),1999 年后有所恢复,但即使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偏低。由内需不足而引致的通货紧缩使这一时期以来的投资需求受挫,不仅使当期资本形成相对过剩,也突出地反映了此前资本过度形成的滞后效应。

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改革以来我国资本经常

处于过度形成的状态，不如说是持续具有过度形成的作用倾向和内在机理。地方政府竞争的“囚徒困境”更强化了这一倾向，放大了其机理作用效果。实践表明，我国资本形成的格局演变呈现出非国有经济投资规模扩张与市场性资本形成的制度空缺相对应的不对称的特殊局面。这一局面既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多方博弈中分化、合成，又反过来对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构成直接的制约。在此局面下，各地方政府的资本形成竞争与努力虽然具有市场化与行政性的双重倾向，但由于资本形成渠道的市场化制度空缺约束，很大一部分往往更直接地体现在国有部门的投资上。因此，由政府竞争导致的资本形成依然遵循了政策性的周期，并从总体上继续表现为资本行政性形成过度与市场性形成的不足。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延续了资本形成的“倒逼机制”，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然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

表 1 1988-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状况

单位：亿元%

年份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消费率	投资率	国有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	非国有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	国有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1988	9360.1	5495.0	62.7	36.8	11.20	16.98	64
1989	10556.5	6095.0	62.4	36.0	-15.27	-15.84	64
1990	11365.2	6444.0	61.3	34.7	0.77	-10.03	66
1991	13145.9	7517.0	60.8	34.8	14.83	13.42	66
1992	15952.1	9636.0	59.9	36.2	32.79	21.90	68
1993	20182.1	14998.0	58.3	43.3	17.54	72.76	61
1994	26796.0	19260.6	57.3	41.2	10.91	33.92	56
1995	33635.0	23877.0	57.5	40.8	7.45	169.91	54
1996	40003.9	26670.2	58.9	39.6	6.17	15.58	52
1997	43579.4	28457.6	58.5	38.2	7.34	6.94	52
1998	46405.9	29545.9	58.7	37.4	19.6	7.98	56
1999	49684.6	30496.3	60.3	37.0			
2000		32917.73					50.1
2001		37213.49			6.7		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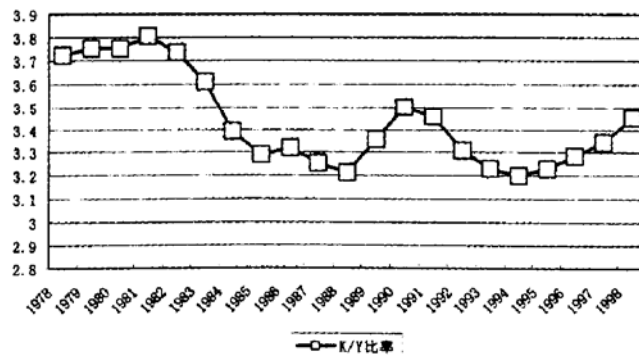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 三、资本过度形成与经济增长动力减弱间的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的聚焦在放大了资本过度形成倾向的同时，更直接加剧了我国工业部门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见图 1、图 2）和技术选择路径的偏差。陈剑波、大塚启二郎、张军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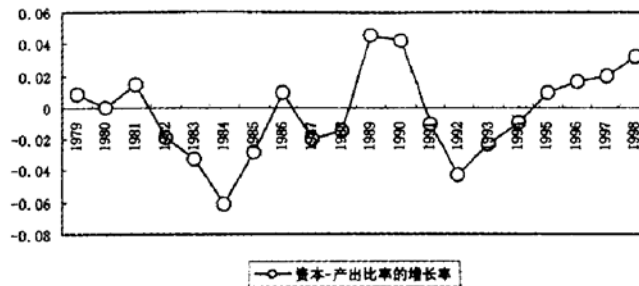
国有和集体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表现出了持续、显著的上升趋势。而且，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企业部门在地方政府的信贷支持下，上升速度甚至比国有企业更快。<sup>[4][5][6]</sup>“在比较容易获得更多的政府及银行的廉价资本的情况下，企业将选择较多资本密集的技术，并且通过从政府交易中得来的廉价资本进行不断的投资扩张”。<sup>[5]</sup>稀缺的资本要素被过度利用，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从工业部门整体来说，资本深化的进程在 90年代以后被显著地加速了，技术选择过分偏向于资本替代劳动。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资本要素的过度密集持续降低了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在此意义上，过度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减弱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图 1 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



资料来源：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 6 期。

图 2 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



资料来源：张军：《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 2 期。

因此，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资本快速积累的过度工业化过程，<sup>[6]</sup>其中，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的特定时期，具有社区产权性质的乡镇企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政府竞争的格局下，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角度出发，有很大的积极性干预当地金融系统和信贷市场，以行政性手段人为降低乡镇企

业的资金成本，提高其利润空间，推动乡镇企业进入市场、增加积累、扩大投资，提高装备水平。地方政府的介入虽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扭曲了其成长和发展的环境。一方面迫使乡镇企业过早进入资本密集性的竞争领域，面临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又人为降低了其实际融资成本，改变了资本价格，从而使得乡镇等集体企业的资本形成偏离其比较优势而过度形成，并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行政性。

#### 四、破解资本形成“囚徒困境”的地方政府竞合思路

由上可知，转型期地方政府间竞争引致了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资本行政性形成过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对目前资本形成“囚徒困境”的求解的一个可行思路是推动区域竞合，以消减地方政府竞争的行政博弈倾向，实行资本形成的制度创新。

竞合关系的形成意味着参与各方最高利益的不一致。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框架中，各地方政府在争取本地区和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不考虑其他参与方的利益得失的。而且，由于地区间竞争的外部性存在，一地所得正是其他地区之所失，因此，会形成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局面，对社会整体福利贡献不大。对这一状态的改进直接导向地区间的竞合（co-opetition）关系。

表 2 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博弈方法	游戏结构	参与方最高利益	对其他参与方利益的认知	参与者的行为与利益分配		
				先发行动者利益	其他参与者利益	其他参与者的回应
竞争	零和游戏	完全不一致	完全不考虑	有所得	有所失	对抗
合作	正和游戏	完全一致	充分考虑	基于长期互信来分配额外价值		合作
竞合	正和但可变的	不完全一致	双方认知和行为的互动	有所得	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损失	倾向合作
					溢出效应小于直接损失	倾向竞争

资料来源：引自朱文晖《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对比看区域经济的竞合过程》<http://www.colbz>。

根据有关研究，竞合关系的出发点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及目标）不完全一致” [incom-

plete interest (and goal) congruence]。<sup>[7]</sup>在此状态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又有相互矛盾之处。此时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极有可能呈现正和博弈（positive game structure）性质。即通过协调、合作与分工能够产生溢出收益。这一收益大于双方各自为政时的收益之和。合作与分工得越好，溢出收益或额外的共同价值就越大。但是，在面临收益分配时，由于各地方的收益最大化倾向，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将会显化。如果分配不能合理进行，则后续的合作情况就不会产生。地区之间退回到单纯的竞争关系。反之，则可能进一步走向合作。但是，因为争取利益分配份额的博弈过程必然重复进行，其结果也往往不能准确预期，所以，竞合关系的正和博弈性质是随时可变（variable）的。

表 2 对比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合作与竞合等三种博弈行为类型。从中可以看到，竞合与合作关系中的地方政府博弈都具有摆脱囚徒困境的理论基础，而竞合关系的形成更具现实性。

#### [参考文献]

- [1] 何梦笔. 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 [C]. 维藤大学讨论文稿第 42 期中译文. 陈凌译, 1999.
- [2] 冯兴元. 中国辖区政府间竞争理论分析框架 [C].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http://www.uniuale.org.cn/>).
- [3] 王小鲁, 樊纲.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4] 大塚启二郎, 刘德强, 村上直树. 中国的工业改革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5] 陈剑波. 市场经济演进中乡镇企业的技术获得与技术选择 [J]. 经济研究, 1999, (4).
- [6]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经济研究, 2002, (6).
- [7] 赵儒煜. 东北三省产业发展状况与对策分析 [J]. 当代经济研究, 2001, (12).

责任编辑: 黄振荣

# 论寡头企业的先动优势与后动优势\*

◎ 施卓敏

[摘要] 先进入市场的寡头企业可以通过抢先占有各类资源而获得先动优势,而后进入市场的寡头企业仍然可以在创新、差异化以及进入时机等方面谋求后动优势,本文从产生机制及实现途径两个角度对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后动优势理论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 寡头企业 先动优势 后动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23-05

研究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中后进入者(Second Mover或 late Mover)的竞争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文献检索表明,国内学术界对后动优势的研究被大大忽略了,即使在西方这方面的研究也显得相对薄弱。因此本文从借鉴现有国外文献的角度对寡头垄断市场后进入者的后动优势问题进行梳理,并从后动优势的产生机制与实现途径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 一、先动优势的研究及研究缺陷

要研究后动优势,就必须首先了解先动优势效应。

先动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或 Pioneering advantage也译为先发优势)一直是战略管理、营销管理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对先动优势的一个通常的解释是先进入者可以抢先占有各类资源来获得先动优势,包括对市场空间、产品技术空间、消费者偏好空间等方面资源的抢先占有。

自李伯曼和蒙哥马利(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88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先动优势》并因此获奖(1996年)以来,许多

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先动企业往往具有市场抢先效应。李伯曼和蒙哥马利认为先进入某一市场的企业(firsmover或 Pioneer)往往会获得好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同时获得较好的经济利润,如超过资本成本的利润率等,先进入者可以通过技术上的领先、对稀缺资源的先占以及消费者存在转换成本这三方面因素而获得先占优势(Lieberman和 Montgomery 1988)。随后,Tufano(1989),Kerin(1992,1996),Robinson(1994,2002),Kalyanaram(1992,1995),Lieberman和 Montgomery(1998)等人先后论证了市场进入顺序与市场份额及企业利润显著正相关。Richard(1998)验证了先动企业在市场需求方面容易获得优势,表现为先动者往往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市场规模,而且这种先动优势可以减少特定的与转换成本相关的风险(Schmalensee1982)以及抵消作为市场先驱者所承担的风险(William.Robinson和 Sungwook Min 2002)。

在先动企业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研究中,Carpenter等人(1996,1990,1989)发现先动企业对消费者偏好结构的形成以及消费者学习过程有着显著影响(Kardes和 Kalyanaram 1992),由此

\* 本项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项目名称:“跨国公司在华策略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批准号:70132010)

作者简介 施卓敏,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获得先动优势。另外, Samuelson 等人 (1988) 和 Muthukrishnan (1995) 在消费心理研究中发现消费者存在维持现状的消费动机也会对在位者的品牌产生特殊的偏爱, 并且消费者基于对先动企业的产品使用经验, 更希望原来的产品升级, 从而先动者可以通过扩展产品线来锁定其产品市场的特征空间, 进而维护其先动地位 (Ratchford 2000, Schmalensee 1982)。因此, 从消费行为学的角度, 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可以通过塑造消费者偏好结构来建立先动优势, 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消费者对产品的最初印象有特殊偏好; 第二, 消费者积累起来的对先动企业提供产品的使用经验, 会形成特定的买方转换成本, 增大了消费者的退出壁垒, 从而使得后进入企业的营销活动的有效性比在位者差; 第三, 在位者产品很容易成为产业标准。这三种情况下产生的先动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先进入市场的支配性企业本身, 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形成的偏好。Carpenter 认为消费者对支配性品牌 (Dominant Brand) 的评价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品牌来说总是正面的, 即便后进入企业提供了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 人们仍然认为后者是劣等的, 换一个角度看, 先动企业的品牌优势为后动者实施差异化战略提供了压力, 同时也为后动企业的差异化战略指出了方向, 即后动企业应该从影响消费者偏好形成的因素上去设计能够改变及重塑消费习惯的营销策略才是有效的。

尽管许多实证研究证明了先动优势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 特别是仅仅考虑市场份额这一变量时。但是关于先动优势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1) 作为实证研究的一个主题, 先动优势的概念太过一般化, 一些已有的研究对先动者 (first-mover 或 pioneer 或 early-mover) 的定义不统一。(2) 实证研究的基础大多数来自于美国的 PM 数据库, 一方面, 这些数据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是令人怀疑的, 另一方面, 缺乏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3) 研究中选择的变量多采用市场份额指标来替代经济利润指标, 虽然这两个指标有相关性, 但是它们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4) 虽然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研究, 但是缺乏先动优势

在具体行业中的应用分析, 而先动优势在行业间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

## 二、后动优势的产生机制

后动优势 (second mover advantage 或 late mover advantage, 也译为后发优势) 是相对于先动优势而提出来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美国经济史学家 A·加欣克伦在研究工业化的后来者能够赶上工业化的先行者的原因和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时提出了后动优势的观点。加欣克伦认为, 后进国的工业化进程中, 由于经常受到来自先进国家的威胁, 因此企业一开始就规模化发展具有绝对的战略意义。日本学者将这种观点称为“A·加欣克伦模式”。该模式着重于讨论企业的扩展路径, 较少涉及后动企业后动优势的来源、实现途径及市场表现 (如市场需求、市场份额、消费者偏好等) 等关键性问题。而国外理论界对后动优势的研究也较为单薄。后动优势的研究往往是对先动优势经验研究后所得出的先动优势不存在或不明显结论的反证, 也就是说, 更多的研究是从先动优势没有得到验证的角度来讨论后进入者后动优势产生的机制性问题。

事实上, 先动优势并不是绝对的, 许多因素的存在给后进入者提供了后动优势。这些因素包括: (1) 对于先进入者投资的“搭便车” (free ride) 行为, 后进入者可以不费力地获得先进企业在 R&D 投资、消费者教育及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利益。(2) 先进入者承担了由于先进入市场而带来的技术和市场选择的不确定性 (风险), 后进入者可以避免先进动企业所犯的错误的获得竞争优势 (Wernerfelt 和 Kamani 1987)。有研究表明, 当市场需求是不确定的, 而同时后进入者能够从先动者的行动中观察到在位者的私人信息时, 后进入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 (Gal-Or 1987, Shinkai 2000)。(3) 技术的不连续性及消费者需求的动态性给后进入者提供新的进入机会。当替代性技术出现的时候旧的技术却依然在发展, 在位的先动企业很难意识到替代技术的威胁, 所采用的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措施也不充分, 再加上消费者的需求总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这些都为后动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机会。Scherer (1980) 在研究产业结构及经济绩效的关系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表明在位的支配性企业属于迟缓的创新者, 而追随的后来者在创新意识上却是积极进取的。(4) 各种类型的“在位者惰性”(incumbent inertia) 使在位者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Arrow (1962) 首次论证了在位的寡头企业相对于新进入者来说是不愿意创新的, 因为创新会破坏在位寡头现有产品盈利的能力。由于在位者的沉没投资使其很难转型, 同时它也不愿意用同类新产品去夺取现有产品的销路, 而且组织结构缺乏适应环境的灵活性, 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为后动者通过创新而取得较好的市场表现提供了机会。

### 三、后动企业获取后动优势的路径

既然上述因素赋予了后动者发挥后动优势的机会(机制), 但后动企业又如何获取后动优势及何时进入才能获取最好的竞争优势(路径)呢? 下面我们主要从后动者通过创新以及与在位者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来获得后发优势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论证。

在创新带来后发优势的研究方面, Dutta等人(1995)发展了一个双寡头企业运用产品创新战略(产品质量的不断改善)而进行博弈的一般性模型, 并推导出了潜在的后动者占优是双寡头竞争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解。Tellis (1996) 在经验研究中发现的先动者失败率高的结果也支持了Dutta的观点。Hoppe (2001) 在Dutta模型的基础上将产品创新的研发成本(R&D cost)整合到模型中来发现, 当R&D成本成为影响企业进入时机决策的支配性因素时, 后动者优势就产生了。Shankar和Carpenter等人(1998)对后动企业通过创新来获得竞争优势进行了研究。他们考察了创新型的后动者、非创新型的后动者以及最早进入市场的先动者的品牌扩散程度和营销费用支出对品牌试用率和品牌重复购买率产生的影响, 并通过对两大类药品的13个品牌的实证研究发现, 创新型的后动者比先动者和非创新型后动者都有更高的市场份额和重复购买率。创新型的后动者比先动者成长得更快, 它的创新可以减

慢先动者品牌的扩散速度以及降低先动者营销活动的有效性。而非创新型的后动者却面临着比先动者更少的市场份额、更低的重复购买率和更差的营销活动效果; 因此后动者可以通过产品创新或策略创新来重订产品标准及竞争的游戏规则, 进而获得比先动者更好的市场销售业绩 (Bemdt et al 1995, Carpenter et al 1997, 1996)。

在差异化带来后发优势的研究方面, 李伯曼和蒙哥马利(1998)总结了自1988年以来学者们对先动优势的研究后指出, 进入顺序效应虽然重要, 但相比之下, 企业的营销组合工具(价格、广告、渠道等)的安排显得更为重要, 后进入者可以利用差异化的营销组合策略赶超在位者。一些学者认为缺乏异质化的资源难以形成竞争优势, 因此无论是先动者还是后动者都应该积极寻求资源的差异化 (Bamey 1991, Robinson 1992, Murthi et al 1996, Boulding W 2003)。Shankar和Carpenter进一步指出, 后动者除了可以通过创新的途径赢得竞争优势外, 还可以通过研究消费者对先动者品牌形成偏好的影响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战略。他认为, 在某个市场上, 如果没有哪个企业能将自己的品牌树立为具有唯一独特性或与某类产品有紧密关联性的话, 那么消费者就会认为品牌与品牌之间在知觉上是相等的, 这时的消费者偏好是对称的, 在这种情况下, 后动者的最佳战略就是价值战略(value strategy), 即定位在支配者附近并以低广告投入和高价格的价值战略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先动者竞争。而在消费者偏好不对称的情况下, 后动者的最佳战略就是利基战略(niche strategy), 即寻求与先动者最大可能差异化的产品定位以及高价格和低广告支出的差异化战略来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先动者竞争。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消费者偏好对称还是不对称的情况下, 低价格的价格战都被认为不是后动者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后动者选择低价格策略只会很快使经营情况恶化, 其结果只会成为一个低利润的廉价品牌。因此, 处于非支配地位的后动企业与先动企业的竞争并不是一个由寻找最低成本所能提供的最大价值品牌所驱动的竞争过程, 而是一个通过寻找能创造独特

价值的手段所驱动的竞争过程 (Carpenter G. S 1996)。

在进入时机的问题上, Shankar和 Carpenter (1999) 等学者后来又研究了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进入效果问题。他们对 6个药品市场的 29个品牌进行了采样, 分别研究了不同品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进入、成长期进入和成熟期进入的市场效果后发现, 在成长期进入市场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最明显。图 1表明了成长期进入市场的企业的成长速度最快; 图 2则说明越晚

进入市场的企业受竞争者品牌渗透的伤害程度越小; 图 3反映了消费者对在不同阶段进入市场的品牌的质量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在成长期进入的品牌获得消费者的最高评价; 图 4揭示了在不同阶段进入的品牌的营销费用支出的有效性, 最早进入市场的品牌 (企业) 的营销效果最好, 在成熟期才进入的品牌的营销效果最差。综上所述, 在市场成长阶段进入市场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最明显。

Figure 1 GROWTH RATE TO ASYMPTOTIC SALES LEVEL  
不同阶段进入者的销售成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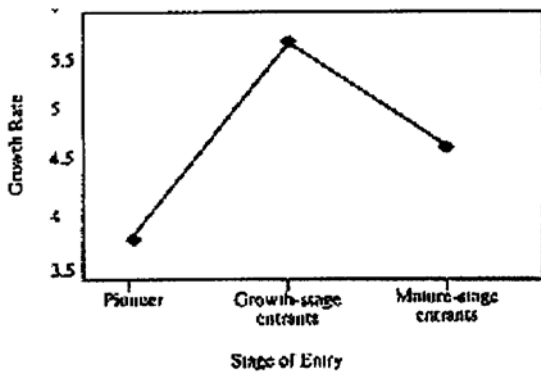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MPETITOR DIFFUSION EFFECT  
竞争者品牌渗透所产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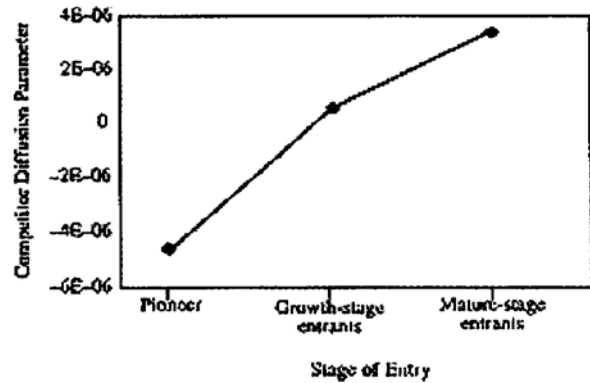


Figure 3 RESPONSE TO QUALITY  
不同阶段进入者的质量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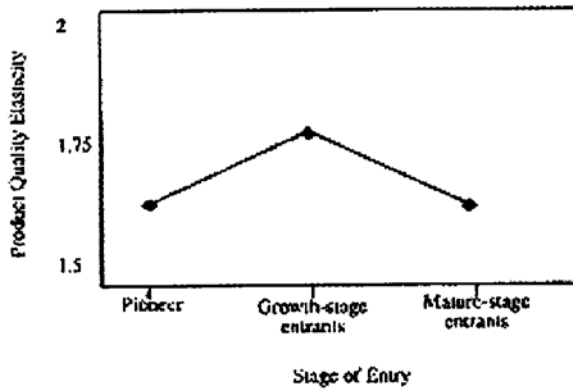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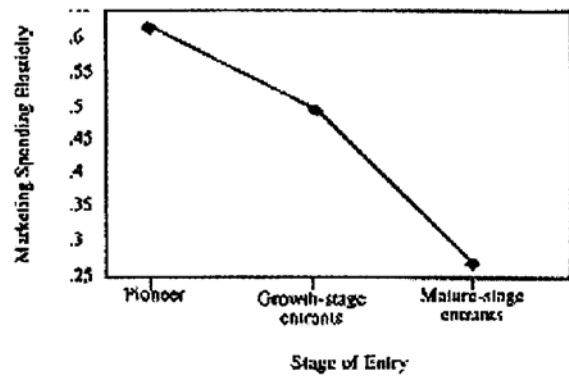


Figure 4 RESPONSE TO MARKETING SPENDING  
不同阶段进入者的营销支出效果



资料来源: Shankar V and Carpenter G. S The Advantage of Entry in the Growth Stag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May 1999 pp 269-276

####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先进入市场的寡头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和消费者偏好, 但是后动企业仍然有很多机会来谋求竞争优势, 特别是企业可以采用新的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 以差异化的竞争方式来寻求企业的成长。由于我国的公用事业, 如电信、电力、煤气等仍属于国家垄断产业, 随着我国入世后各行业的逐步开放, 我国在

这些垄断行业中的先动企业就应该巩固和发挥先动优势, 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 研究其后动优势, 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先动优势与后动优势的研究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1] Lieberman M. B and D. B. Montgomery. First-

Moover Advantag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ummer Special. 1988 Vol 9.

[2] Tufano P.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rst-Moover Advantag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 Vol 25.

[3] Kerin R. G and P. Peterson First-Moover Advantage A Synthesi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2 Vol 56

[4] Kerin R. G and D. Howard Product Hierarchy and Brand Strategy influences on the order of entry effect for consumer packaged good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996 Vol 13.

[5] Robinson W. T, G. Kalyanaram and G. Urban First-Moover Advantages from Pioneering New Markets A Survey of Empirical Evidence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4 Vol 9.

[6] Robinson W. T and Sungwook Min Is the First to Market the First to Fai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Feb 2002 Vol 39.

[7] Kalyanaram G, W. Robinson and G. Urban Dynamic Effects of the Order of Market Entry on Market Share, Trial Penetration and Repeat Purchases for Frequently Purchased Consumer Goods Marketing Science 1992 Vol 11.

[8] Kalyanaram G, W. Robinson and G. Urban Order of Market Entry: Established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Emerging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Marketing Science 1995 Vol 14.

[9] Lieberman M. B and D. B. Montgomery First-Moover (Dis) Advantages Retrospective and Link with the Resource-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Dec 1998 Vol 19.

[10] Richard Makadok Can First-Moover and Early-Moover Advantages be Sustained in an Industry with Low Barriers to Entry/Initi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ul 1998 Vol 19.

[11] Schmalensee 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dvantage of Pioneering Bran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 1982 Vol 72.

[12] Carpenter Gregory S and Nakamoto K Impact of Consumer Preference Formation on Marketing Objectives and Competitive Second Moover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996 Vol 5.

[13] Carpenter Gregory S and Nakamoto K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Late Entry into a Market with a Dominant Br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90 Vol 36.

[14] Carpenter Gregory S and Nakamoto K Consumer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Pioneering Advantag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9 Vol 26.

[15] Carpenter Gregory S, D. R. Lehmann, Nakamoto K and S. Walchli Pioneering Disadvantages Consumer Response to Differentiated Entry and Defensive Initiation 1997. Working Pap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6] Kardes F. R and G. Kalyanaram. Order-of-entry effects on consumer memory and judgement A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2 Vol 29.

[17] Samuelson W and R. Zeckhauser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88

[18] Muthukrishnan A. V. Decision Ambiguity and Incumbent Brand Advantag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Jun 1995 Vol 22.

[19] Tellis G. J and Golder P. N First to Market First to Fail? Real Causes of Enduring Market Leadership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Winter 1996 Vol 37.

[20] Wemerfelt B and A. Kamaní Competitive Strategy under Uncertain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Mar-Apr 1987 Vol 8.

[21] Shinkai T Second Moover Disadvantages in a Three-Player Stackelberg Game with Privat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0 Vol 90.

[22] Dutta P. K., S. Lach and A. Rustichini Better Late than Early: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Adoption of a New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995 Vol 4.

[23] Hoppe H. C. and U. Lehmann-Gube Second-Moover Advantages In Dynamic Quality Compet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Fall 2001 Vol 10.

[24] Robinson William T and Mary W. Sullivan Are Market Pioneers Intrinsically Stronger than Later Entra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Nov 1992 Vol 13.

[25] Shankar V, Gregory S Carpenter and L. Krishnamurthi Late Moover Advantage How Innovative Late Entrants Outsell Pioneer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Feb 1998 Vol 35.

[26] Shankar V., Carpenter Gregory S and Krishnamurthi L. The Advantages of Entry in the Growth Stag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May 1999 Vol 36.

责任编辑: 黄振荣

# 中美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比较

◎ 李安民

[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 2002年以来中国迅速发展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和在美国资本市场中作为重要投资工具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总结了中美两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在设立条件、期限和规模、种类和流通机制、收益和波动特性、销售和保管制度等方面的异同,发现了中美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因为监管制度和历史传统不同而产生的强烈的国别特征,提出了发展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重大意义和方向。

[关键词] 房地产 信托投资 产品比较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28-07

## 一、引言

2002年以来,中美两国的房地产信托投资业务发展较快。自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信托自最高峰跌落之后,2000、2001年全美没有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简称 REITs)产品发行。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至2002年美国房地产信托终于结束了自1992年以来从没有间断过新产品发行的历史,至2003年,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值由2000年的138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末的2241亿美元,增幅83%,约占2003年纽约证券市场市值的4%。

中国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一法两规”的实施,经历了五次清理整顿后的信托公司获得重生。信托公司紧紧抓住央行121号文和房地产企业迫切希望得到融资安排的市场需求,因此以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Scheme,简称 REITS)从零开始发展。笔者统计,至2003年末,已累计发行共77只,累计84亿元,房地产信托业务占总业务量的43%,在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然而,由于两国发展房地产信托的外在环境、监管制度不同,因而产品内在结构显示出强烈的国别特征。

## 二、产品结构和特征的比较

### (一) 产品的构成条件

中美两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成立都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为了免缴公司所得税,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必须满足《国内税收法》第856-858条的法定要求。<sup>[1](P856-858)</sup>这些要求被业内称作是取得房地产投资信托免税资格时的一系列“测试”要素。美国大多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是由某个组织或某个机构采取公司或者商业信托的组织形式发起。这些信托的发起人可以自己管理信托,也可以从组织之外聘请信托经理进行信托日常业务管理。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发起人,早期主要是包括房地产公司、商业银行、独立经纪人、联营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等,现在,大多数房地产投资信托转而由房地产公司发起。其次,必须由董事会或基金管理人管理,管理人早期主要由金融机构管理,1986年以后,房地产公司也可作为受托人管理。再次,其股份可转让,必须至少有100个股东;后半个课税年度,任意5个股东(或更少)所持股份之和不能超过其股份总数的50%。最后,公司至少要有75%的资产投资于房地产,至少有75%的收入来源于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及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息收入;房地产投资信

作者简介 李安民,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广东 广州,510300)。



托每年把应税收入的 95%（2001年 1月 1日降低至 90%）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如果要上市，则需 3年经营业绩。若不足 3年，则股东权益不得低于 6000万美元。

中国的房地产信托计划主要合乎监管层制订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暂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在投资方向、资产组合、收入构成等方面没有具体规定。

表 1 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信托计划法定构成要素

主要要素	具体要求
发起人	信托投资公司
发起人公司治理	严谨的公司治理结构
组织形式	信托形式
信息披露	每季度不得低于一次
认购人数	最高不超过 200人
认购最低金额	5万元
最短持有期限	不低于一年
产品审批方式	产品发售前五日至银监局备案
收益分配	一年不能低于一次
资产构成	不得与国有资产混淆，不同信托计划不得相互投资

## （二）产品规模和期限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成长迅速、规模大、期限长。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市值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呈低水平徘徊，在 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的 226只，然后逐步下调，2002年开始回暖，2002和 2003年分别发售了 3只和 8只基金，募集约 400亿美元。至 2003年末，全美共有 170只上市房地产信托产品，单只信托平均市值规模 13亿美元。从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数量上来看，1962~2003年，共计有 497家房地产投资信托首次上市发行，有 293家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先后摘牌。这些被摘牌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在市场上的平均存续时间为 8年 5个月，最长 28年 7个月，最短的 6 6个月。过去的 20年（1983-2003年）里，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值增加了约 6倍，信托产品总数翻了 2 9倍。

在中国，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暂行管理办法》在产品规模和持有期限上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体现为期限短、规模小。根据对已知的 70个项目的金额划分，可以看到大部分信托产品在 1亿元以下，占 53%。5亿元以上项目只有 3个。产品平均金额为 1 2亿元。这与目前信托监管当局不允许信托

机构公募，单个信托产品合同不得超过 200份，不准异地开设网点，信托机构刚刚恢复运营、行业信誉仍未能普遍建立等现状相吻合。

中国信托计划期限较短，未能像美国那样体现出信托的中长期特征。通常而言，信托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发挥的是长期融资的角色，这一点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规定。它要求“信托投资公司接受由其代为确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资金，其信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但就现有的信托计划而言，尽管符合这一要求，但并不像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那样具有中长期融资功能。中国目前大部分信托产品年限在 1-3年。两者合计共 82%，3年（含 3年）以上的中长期产品只占 18%。

## （三）产品的种类与组织结构

1. 在组织运营上，中美两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较普遍采用信托形式，但两国又体现有不同特点。在中国，目前房地产信托计划全部采用信托形式，由信托公司受托管理，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在美国，在 20世纪 60至 90年代以前普遍使用公司型和信托型，自 90年代以来，借用高科技风险投资的合伙制成为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主流。

合伙制基金主要指通过至少一位普通合伙人的组织发起，将其他若干有限合伙人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信托契约的约定进行房地产投资。有限合伙不同于普通合伙。普通合伙情况下，每一合伙人的地位是相同的，利益与损失由每个合伙人按照其所投入资金的比例，或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分配或分担，合伙人之间担负与合伙投资有关的连带责任和无限责任，每个合伙人都有参与投资决策和管理的权利。而有限合伙中，普通的主要合伙人作为受托人，负责投资运作和管理。这要求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经营技能，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虽有财产所有权，但并无经营决策权，也不必承担无限责任，仅以所投资金负有限清偿责任。由于该投资方式可转让，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具有股票的灵活性，因此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获得飞速发展，产品结构也不断创新。

2 按照投资人能否赎回分类,中美房地产投资都可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类。中国的房地产信托计划几乎全部为有固定期限的封闭型产品,77支产品中只有1只类似于开放型。在美国,采用互惠基金(Mutual Fund)和共同基金(Common Fund)组织形式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本属于开放式房地产投资信托。由于开放式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流动性相对较强,比较容易控制风险,具有面向投资者更为广泛的优点,所以一般要求其通过在股票市场发行股票(IPO或增发)募集资金后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金额要达到其信托融资规模的90%以上,但对投资对象有所限制。如,该类信托一般不能直接投资于房地产资产,而是投资于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房地产相关债券、房地产信托50指数等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产品。美国开放式房地产投资信托相对较少,所占比率为30%左右。

美国70%以上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是封闭式组织结构。主要直接投资于房地产资产。一般会规定其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若在此时限内投资者需要赎回,信托管理人一般会对其持有的信托份额打一个较大的折扣。它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这样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只能投资于房地产;二是其估价容易,资产价值不必像开放式产品那样每月清算。

3 根据房地产投资信托资金投向的不同,可以分为股权性房地产投资信托(Equity REIT)、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Mortgage REIT)和混合房地产投资信托(Hybrid REIT)等三种类型。

(1) 股权类(Equity): 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以购买、管理、更新、维护和出租、出售房地产物业为主营业务,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物业的租金收入。这里的权益最主要指拥有房地产资产的权益,而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股权,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权益类。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目的在于通过投资获得房地产的产权以取得经营收入。他们较少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如果有项目开发,也只是为了自己开发成功后出租经营,而不会将开发的房地产出售盈利。通常他们直接投资已成熟的房地产资产或通过合营公司来控制该资

产。

(2) 抵押类(Mortgage): 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主要为房地产发展商和有意购买物业的抵押人提供贷款,或经营被背书证券的抵押贷款(MBS)业务,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抵押贷款的利息收入。目前抵押型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通常只向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提供抵押信贷。

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主要从事一定期限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和购买抵押证券业务。机构本身不直接拥有物业,而将其资金通过抵押贷款方式借贷出去,从而获得商业房地产抵押款的债权。在过去,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既可以投资于现有的物业,同时也可以投资于正在建筑的物业。但是现在的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则只通过向现有物业提供短期或长期的抵押贷款服务,以获得各种相关手续费及贷款利差。通常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股息收益率较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高。不过根据风险-收益原理,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抵押房地产投资信托受利率的影响比较大,其风险主要来自利率风险。抵押类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投资魅力在于: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介入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获得较高借贷利差的机会;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将募集的资金用于多个房地产项目的抵押贷款,分散了房地产借贷风险。

(3) 混合类(Hybrid): 它是介于股权类和抵押类之间的一种房地产投资信托,混合类房地产投资信托采取上述两类的投资策略,具有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和抵押类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双重特点,即在从事抵押贷款服务的同时,自身也拥有部分物业产权。在理论上,混合类房地产投资信托在向股东提供该物业增值空间的同时,也能获得稳定的贷款利息。

股权类投资信托在早期比较盛行,但在20世纪70年代抵押信托更加流行。但近年来,股权类再次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数量和市场资本总额方面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房地产投资信托种类。据统计,至2003年末美国171只上市房地产投资信托中144只为股权类,占有房地产投资信托的84.2%,市值占房地产投资信托总市值的92.8%,其次是抵押型房地产投资信托,数

量占 11.6%，市值占 6.3%，混合型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比重最低，数量只有 7 只，占总量的 4.1%，市值占 2.3%。<sup>[2]</sup>

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同样也可以分为如上三种类型。但抵押贷款型信托占据主导地位，占整个项目总数的 75%，股权投资方式和组合股权与贷款的混合方式分别为 22% 和 3%。而且中国的股权型信托最主要是信托公司因应央行 121 号文关于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时所有者权益不低于 30% 的规定而采取的阶段性股权型投资，而似美国那样主要是对优质物业投资的信托计划只有北京国际信托发售的法国欧尚信托计划等少量产品。这与目前信托机构人才具有银行信贷从业经验、房地产业在 121 号文件之后所遇到的困境密切相关。但这决定了中国房地产信托投资的主要收益来自于贷款利息收入，而不是租金收入。

房地产信托的贷款利息收入是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种固定利息收入与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利息收入也有很大的区别。国内的按揭市场不成熟，同时按揭证券化市场也没有开始，所以，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投资于抵押贷款证券获取利息收入的情况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是中美房地产信托投资抵押利息收入的差异。

4 根据发行方式，除了公开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外，还有一小部分房地产投资信托不公开上市，也不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这些房地产投资信托被称为“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private REIT）（见表 2 附后）。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是一种介于公募和私募之间的类似于美国非公募上市型房地产投资信托。

5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还有很多分类方法。按是否有确定期限，可分为定期型和无期限型。定期型房地产投资信托是指在发行信托之初，就事前约定确定期限出售或清算，将投资所得分配予股东；无限期型则无约定。按照投资标的确定与否，分为特定型与未特定型。信托基金募集时，特定投资于某不动产或抵押权投资者为特定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反之，于募集资金后再决定

适当投资标的者为未特定型房地产投资信托。

#### （四）产品的销售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的销售渠道多种多样。不仅信托管理人可以直销，而且全方位的服务经纪人、折扣经纪人、商业银行、保险代理、金融顾问师和策划师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主要销售渠道是通过金融策划师和投资顾问行，其次是公司直销，银行并不是最主要分销渠道。对投资者的服务、佣金、方便程度均是影响投资者购买渠道的主要因素。金融顾问师能提供最好的投资顾问，折扣经纪人能提供优惠的佣金服务，银行则因网点多而能为投资者提供购买的方便。显然，美国的投资者是把能否为投资人带来收益的服务作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中国信托机构没有自己的营销网点，销售网络优势基本不存在。受制于监管政策的规定，信托机构不得开设分支机构，不得异地经营，加之信托机构重新登记不久，客户积累不多，直销有限，居民购买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以方便性为首选。在 77 个信托产品中有明确销售说明的 35 只信托产品，说明了当前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产品的销售状况。63% 的分销渠道主要依靠作为信托资金收付银行的银行网点，34% 主要为自己信托机构直销，3% 由证券公司销售。

#### （五）产品的流动性

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是衡量一个金融产品的重要标准，也是现代审慎管理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信托产品本身的非标准性，所以当前它的市场流动主要依赖受托人信托公司来维持。较之其他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中国房地产信托产品的流动性仍显不足，表现在：（1）转让对手必须自己寻找，增加了转让成功的难度；（2）转让的交易成本较高，按照每份信托合同 5 万元的最低限额，交易双方共计要支付 100 元手续费；（3）交易所不集中，信息披露不完整，产品价格发现功能差。在 2002 至 2003 年我们的研究中，77 个产品明确了可转让的仅占 23%，而未明确的占了 77%。

而在美国，与传统的以所有权为目的的房地

产投资相比，房地产投资信托具有相当高的流动性。上市交易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与房地产业直接投资相比，经营情况受独立董事、分析师、审计师、商业和金融媒体的直接监督，信息不对称程度低，透明度高，因此 20 世纪 60 年代《房地产投资信托法》允许房地产投资信托上市交易以后，该产品获得快速发展，并成为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的主流。经过不断的摘牌或上市，至 2003 年 12 月，大约有 170 只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在全国各类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市值 2200 多亿元。<sup>[2]</sup>

表 3 美国房地产投资基金在各交易所的分布  
(2004 年 1 月)

交易所	纽约交易所	美国交易所	NASDAQ
家数	149	27	12

### (六) 产品的资金投向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行业。写字楼、商业用房、土地、住宅、公寓、别墅等各类房地产均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对经营管理所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样，而且房地产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种细分的房地产信托投资越来越多。美国每个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人根据各自的专长选择投资领域。

2003 年全美房地产投资信托协会根据具体的房地产类型，把房地产投资信托细分为 8 大类型：<sup>[2]</sup>工业办公类、零售类、住宅类、住宿度假类、医疗保健类、自用仓储类、特殊类和抵押类。至 2003 年底，在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金投向中，办公工业占有最大的比重，住宅、零售类次之，三者合计超过总投资的 74%。

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金投向与美国不同。大部分资金投向了房产，占了信托产品的 83%，只有 17% 投向了地产。而商品房的开发占最大份额，商业办公只占 10%，显示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后，房地产投资信托成为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来源之一，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呈现为融资的特点。

### (七) 产品的收益率特性

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类似于固定收益型证券，具有紧贴利率、收益固定的特点。在已知的 61 家有预期收益率的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

计划中，63% 是 4-5% 之间的收益率，5% 以上收益者只占 21%。这与中国房地产信托计划投向大多是商业贷款，期限为 1-2 年相关。根据目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运作规则，信托机构在实施固定收益的贷款业务时，因为有贷款利率的封顶，扣除营销费用、其他中介费用和信托机构的管理费用后，投资人普遍获得高过一年期定期存款收益 50% 左右的收益。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收益特性是高分红和适度成长。在有效的资产市场结构中，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收益特性表现为其投资总收益比股票高增长公司低，但高于股票平均水平，比债券收益高。自 1999 年以来，摩根士丹利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的表现，一直跑赢标准普尔 500 指数，升幅高达 108.5%。而 2003 年起，房地产投资信托平均增长率达 21.4%，较标准普尔 500 指数高出 6.8%。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行业协会比较了从 2002 年到 2003 年 11 月各投资产品的收益状况，显示 NASDAQ 市场指数的收益最高，平均年收益率在 2003 年达到 46.78%；房地产投资信托同年的行业指数收益率为 33.88%，介于大盘股和债券的收益率之间，基本与小盘股的收益持平。下表说明了在不同年期内，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股票和债券的回报数据。以 10 年期为例，这三类资产实现的复合年回报差不多。<sup>[3] (P5)</sup>

表 4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股票和债券的复合回报数据

REITs、股票和债券的复合总回报数据 (%)

年期(年)	REITs 股本	股票	债券	
5Y	3.1	0.3	8.7	
10Y	10.4	9.9	9.4	
18Y	10.3	12.7	11.2	
30Y	12.0	10.5	NA	
收益率 (%)				
5Y	平均	7.2	1.4	5.3
	标准误差	0.8	0.2	0.7
	差距 (%)	11	14	12
10Y	平均	7.0	1.9	5.9
	标准误差	0.8	0.5	0.9
	差距 (%)	11	33	15
30Y	平均	7.9	3.4	8.1
	标准误差	1.2	1.4	2.4
	差距 (%)	16	40	30

NA = 不适用

在 2002 年股市全面下跌时，美国房地产投

资信托 50指数的收益率为 5.22%，比 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高。与规模相似的小盘股相比，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分红比例要高出很多。房地产投资信托在 Russell 2000小盘股指数中占 6%的比重。在 1995至 2000年中，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平均分红收益率为 7.3%，是同期 Russell 2000中公司平均分红收益率的 6倍。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都有分红，而相对应的 Russell 2000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有分红派息。

不过，美国三种形式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其市场回报率是不一样的。按市场回报由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抵押类房地产投资信托 - 混合类房地产投资信托 - 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而投资增值幅度由大到小排列顺序是“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 - 混合类房地产投资信托 - 抵押类房地产投资信托”。所以，股权房地产投资信托能提供更好的回报、更稳定的市场价格、更低的风险和更高的流动性，对个人投资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其投资收益率也远远高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 (Standard & Poor 500 S&P500)。<sup>[4] (P13)</sup>

#### (八) 产品的波动特性

房地产投资信托收益回报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相关度较低，可以为资产组合提供资产分散的选择。从美国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收益与其他投资产品的相关系数 (见表 5) 看出，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与 Russell 2000的相关系数最高，与 NASDAQ 100的相关系数最低；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房地产投资信托与其他投资产品的相关性在逐步降低，与 NASDAQ 100的相关系数在 70年代是 0.34，到 90年代末降为 0.01。<sup>[5]</sup>

表 5 股权类房地产投资信托收益与市场的相关系数

市场指数	1972- 2000	1972- 1979	1980- 1989	1990- 2000	1990- 1994	1995- 2000
Russell 2000	0.63	0.83	0.74	0.5	0.67	0.36
S&P500	0.56	0.64	0.65	0.39	0.53	0.28
NASDAQ Composite	0.54	0.73	0.71	0.29	0.64	0.09
S&P Utilities	0.38	0.65	0.38	0.33	0.29	0.37
NASDAQ 100	0.34	NA	0.68	0.23	0.57	0.01
Merill Lynch Govt/Comp	0.23	0.47	0.17	0.25	0.39	0.1

衡量证券市场产品波动性的  $\beta$  系数更证明了这一点。在 1987- 1996年的 10年中，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的  $\beta$  系数平均为 0.59，也就是说，

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波动性只及 S&P500的 0.59。正因为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波动性很小，其价格水平、资产总量及价值本身的变动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对那些不擅于经营股票等金融资产且对未来现金支出又不确定的人们来说，投资房地产投资信托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 (九) 产品的托管制度

为保护投资人利益，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普遍实施第三方监管制度。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法规定，必须由信托投资公司或商业银行作为财产保管人托管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金和资产。这一财产的管理方式已获得广泛的推广，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从美国近 40年房地产投资信托历史看，基本上没有发生挪用客户资产的现象。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普遍没有这种意识，对建立强制性独立财产保管制度还缺乏应有的认识。2002至 2003年信托产品已公布材料中，可以见到有第三方监管的财产保管人只占有很少的比例，即 1%，99%的信托产品没有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保管。财产托管制度是花很小的成本，保证财产安全完整、交易合法合规的制度安排，在国际和国内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一种资产管理制度。但在目前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中还没有普遍推广。

### 三、结 论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汇集投资者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管理的集合资金投资制度。它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缓解房地产企业过于依赖银行的困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安全，调整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而且能为投资人增加稳定的投资收益来源，完善和增加资本市场的投资品种，促进我国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转变和房地产市场的稳步健康发展。因此，中美两国都把房地产投资信托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来开发和管理，把它作为完善本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然而，中美两国由于各自的历史与背景不同，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差异很大，因此中美两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的成熟程度不同，产品内在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中国刚刚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初级阶段，借鉴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



的经验, 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 Secs.

[2] 全美房地产投资信托协会网站 www. NAREIT.

com. 2004- 12- 01.

[3] Peter Churchouse. 全球房地产行业报告 . 2004.

[4] 张红, 陈洁 . 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房地产投资信托 [J] . 中国房地产金融, 2002, (3) .

[5] NA REIT, “ REIT: Low Correlation to other Stocks and Bonds is Key Factor for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 2001.

表 2 公开上市交易房地产投资信托、非上市交易房地产投资信托特征比较表

	公开上市交易 REITs	非上市交易 REITs	私募 REITs
总体特征	在美国证监会备案, 股票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交易。	在美国证监会备案, 股票不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交易。	不在美国证监会备案, 股票也不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交易。
流动性	股票上市并每日进行场内交易, 具有最低流动性标准。	股票不在公开交易所交易。股票赎回程序因公司而异, 而且有一定限制。一般有最短股票持有期限限制。投资者的退出策略一般有两种: (1)一定时期 (经常为 10 年) REITs 清盘时退出; (2) REITs 在全国性交易所上市时退出。	股票不在公开交易所交易。是否存在股票赎回程序以及最短股票持有期限的长短, 因公司而异, 而且有一定限制。
交费费用	经纪商的佣金视服务质量高低一般为每笔 20~ 150 美元。投行在承销 REITs 的 IPO 和增发时一般收取 2~ 7% 的费用。发行费用因规模而异。	每次交易中, 金额的 10~ 15% 一般用来支付经纪商的佣金、发行费用和前期承购 (up front acquisition) 或咨询费用 (费用一般在关联中介和第三方经纪商之间分摊)。	因公司而异。
管理	一般自己提供咨询和管理。	咨询和管理一般均外包。	咨询和管理一般均外包。
最低投资额	一般。	一般为 1000~ 2500 美元。	一般为 1000~ 25000 美元; 私募 REITs 主要针对机构投资者, 因此认购起点较高。
独立董事	新的交易所规则要求大部分董事必须独立于管理层。新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规则要求在审计、提名董事时做到完全独立, 要求建立完全独立的薪酬委员会。	受到北美证券管理机构协会 (NASAA) 有关规定的制约。NASAA 的规定要求董事会多数成员必须是独立董事; 董事会下的各个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也必须是独立董事。	没有规定。
投资人控制权	投资人可以重选董事。	投资人可以重选董事。	投资人可以重选董事。
公司治理	证券交易所有相关的具体规定。	受到州和北美证券管理机构协会 (NASAA) 有关规定的制约。	没有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	必须向投资者定期披露财务信息, 包括季度和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信息, 并报送证监会。	必须向证监会披露财务信息, 包括季度和年度财务信息。	没有规定。
业绩衡量	可以通过多种独立的业绩评估标准来跟踪公开交易的 REITs 行业。投资者也能获得多种分析报告。	没有独立的业绩数据来源。	没有公开或独立的业绩数据来源。

资料来源: NAREIT。

责任编辑: 黄振荣

· “泛珠三角”研究 ·

# “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

◎程玉鸿

[摘要] “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本文在阐述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圈战略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对泛珠三角经济圈内部区域差异的多角度对比分析和层次划分,深入探讨了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的客观基础及其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泛珠三角经济圈 区域差异 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35-05

2003年由广东率先提出,并很快得到其他成员积极响应的“泛珠三角”,又称“9+2”,是指以珠三角<sup>①</sup>所在的广东省为地域中心,包括其周边的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海南8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共11个地区所构成的广大地域。该地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市场潜力巨大。九省区陆域面积达199.4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20.8%。2003年,九省区户籍总人口4.5亿人,占全国的34.8%,GDP总量39011亿元,占全国的33.3%。同时,由于经济区位、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各具特色,九省区各具相对优势。因此,若把这一地区的经济协作与港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构建“9+2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即广东及周边8省区加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必将构筑起一个以“大珠三角”<sup>②</sup>为核心、带动辐射南中国、影响东南亚的举足轻重的共生互动型经济圈。这一地区在我国

未来经济发展中无疑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尽管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开始由理论探讨阶段逐渐向具体实施阶段迈进,但由于“泛珠三角”概念是对大珠三角概念的进一步扩展,是在大珠三角开启我国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货币种类、不同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工业化水平的行政区域之间紧密合作、经济互动之先河的基础上,将我国更为宏观的东、中、西发展战略融入其中,使其更彰显出不同于国内现有的一般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因此,当我们对泛珠三角经济圈进行评估、思考和实施区域互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有必要在认清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的战略意义基础上,通过区域差异的分析,深入探讨经济圈构建的客观基础及其面临的主要障碍。

## 一、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的战略意义

泛珠三角经济圈概念的提出及其构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尽管这一

作者简介 程玉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讲师、博士(广东 广州,510632)。

① 指珠三角经济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经济区域是指1994年确定的开放区,包括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江门市、中山市、东莞市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市、惠东县、博罗县,以及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四会市和高要市。

② 大珠三角特指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经济区。

经济圈在概念诠释、边界界定、框架设计、战略选择等方面，尚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间，但对其所隐含的现实而深远的意义不容置疑。

首先，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构建有利于大珠三角竞争力的持续提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珠三角与港澳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基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前店后厂”式的区域合作模式，不仅使珠三角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对外开放的先发优势，20余年间获得GDP年均16.2%的高速增长；而且也使港澳地区顺利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延续了其国际竞争力，保证了回归过渡期的稳定和回归后的持续发展。<sup>[1](P9-10)</sup>至2003年，三地GDP达3021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4939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21%和58%。大珠三角地区不仅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竞争力最强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之一。伴随“前店后厂”模式的不断演进与发展，珠港澳三地之间已形成了一个共生互动的经济实体。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大珠三角地区的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入世及2010年与东盟10国自由贸易区的共建，将使其更高层次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同时，CEPA的顺利实施，进一步加快了大珠三角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作为外向依存度最高的一个区域，大珠三角地区有可能再次率先获得各种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其他城市密集地区的奋起直追，尤其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近十年来的迅速崛起，已使大珠三角地区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竞争压力显著增强，整个大珠三角地区战略腹地欠缺的弱势日渐凸显。因此，构建以大珠三角为龙头的“泛珠三角”经济圈，不仅有利于大珠三角战略腹地的培育和建设，而且对大珠三角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次，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构建有利于推动我国中西部后发地区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东南沿海几个发展较快的经济区的推

动。大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沿海地带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拓展其发展的空间，直接把中西部若干省区纳入其辐射腹地促其发展，实施泛珠三角经济圈发展战略，对于中西部若干省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长期发展战略分析，大珠三角地区担负着带动周边后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重任。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圈，积极加强大珠三角与周边后进地区的经济合作，则多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将会出现，这将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此外，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构建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一国两制”。泛珠三角经济圈将为CEPA的实施提供更大的组织化的合作空间，地缘邻近优势，有利于提高港澳与内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将为港澳经济的持续繁荣提供有力支撑，对于我国更好地实施“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将具有重要意义。

## 二、“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的客观基础——区域差异分析

### （一）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单要素比较

从地理位置来看，泛珠三角整体处于中国的华南和西南，毗邻东南亚。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梯度均有省区囊括其中，同时，包括两个特别行政区（港澳）、多个经济特区市、一个特区省，区域构成非常复杂。

从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人均GDP）来看（表1），2003年，泛珠三角11个地区中，从人口规模来看，以四川（8700万人）、广东（7954万人）和湖南（6663万人）人口最多，3省合计已占到泛珠三角总人口的51%以上。从国内本地生产总值来看，广东（13625.87亿元）和香港（12913.32亿元）经济总量大体相当，两者合计则占泛珠三角地区的50%以上，显示出两地在经济总量上远大于其它九个地区，居绝对优势。但人均国内本地生产总值的比较显示，11个地区中，港（189818元）、澳（146945元）优势突出，明显与其它九省区不在一个层次。内地9省区中由高到低依次为广东（17213

元)、福建 (14979元)、海南 (8316元)、湖南 (7554元)、江西 (6678元)、四川 (6418元)、广西 (5969元)、云南 (5662元)和贵州 (3603元)。显然,泛珠三角内部区域在上述三个指标上均有较悬殊的差异。

表 1 2003年泛珠三角各地区国内本地生产总值及人均GDP比较

地区	总人口(万人)	GDP(亿元)	人均GDP(元)
香港	680	12913.32	189818
澳门	45	653.91	146945
广东	7954	13625.87	17213
福建	3488	5232.17	14979
海南	811	670.93	8316
湖南	6663	4638.73	7554
江西	4254	2830.46	6678
四川	8700	5456.32	6418
广西	4857	2735.13	5969
云南	4376	2465.29	5662
贵州	3870	1356.11	360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香港、澳门数据根据当年港元、澳门元与人民币的平均汇率统一折算为人民币。<sup>[2]</sup>

从产业结构来看(表2),结合人均GDP分析,香港、澳门已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内地9省区(结合城市考虑)全部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并具有明显差别,基本涵盖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及各过渡阶段。工业化阶段的差异反映了工业化技术结构的差异和资本结构的差异,进而为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省区市之间提供了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合作空间。

表 2 2003年泛珠三角各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省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香港	0.1	11.8	88.1
澳门	0	12.6	87.4
广东	8.0	53.6	38.4
福建	13.3	47.6	39.1
海南	37.0	22.5	40.5
湖南	19.1	38.7	42.2
江西	19.8	43.4	36.8
四川	20.7	41.5	37.8
广西	23.8	36.9	39.3
云南	20.4	43.4	36.2
贵州	22.0	42.7	35.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sup>[2]</sup>

综上所述,泛珠三角内部差异性突出、经济梯度明显。区域差异与经济梯度的客观存在无疑是泛珠三角区域间经济互动、优势互补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圈的构建则便于区域资源整合,发

挥规模效益,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 (二) 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层次划分

从前述单要素比较来看,泛珠三角11个区域在不同要素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区域之间比较优势差异性明显。为进一步了解泛珠三角各区域之间的异同,我们拟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前述单要素指标在综合的基础上予以比较,并进行类型划分。这里,我们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1.0 for Windows进行计算处理,以欧氏平方衡量组间距离,进行聚类计算。聚类结果产生的树形图形象地反映了各地区的差异,0-25的标尺刻度则表示了类别之间的亲疏距离。

### 1. 聚类结果及特征

通过对泛珠三角11个区域的聚类,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本地生产总值)与区域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聚类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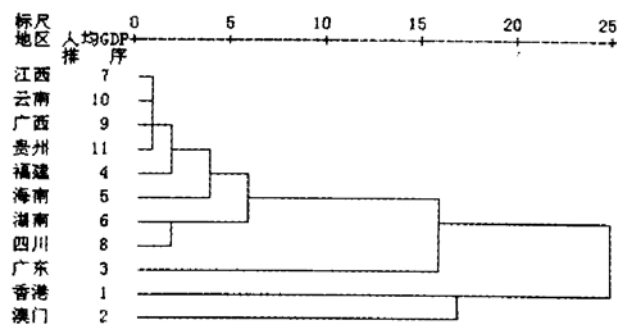


图 1 泛珠三角区域聚类图

### 2 区域类别层次分析

根据图1,泛珠三角经济圈总体可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包括香港、澳门两个地区。这两地聚为一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本地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上比较接近,同属一个数量级,并与其他9个地区相差悬殊所致。从它们的产业结构来看,两地也颇为类似。2003年,它们的第一产业在国内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均不足0.1%,而第三产业则高度发达,在国内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港、澳分别在88%和87%以上,均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从聚类图中可明显看出,港澳之间差异性也颇为明显:从规模来看,香港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均远大于澳门,分别是澳门的15

倍和 19 倍多；从区域功能来看，香港的地位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国际性的金融、物流、信息和旅游中心，也是统领泛珠三角地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科技经济合作的龙头。澳门则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博彩）享誉世界，并与欧盟、葡语系国家关系密切，是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资金、建立经贸合作关系的重要桥梁。

第二层次包括了其余 9 个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之于第一层次的巨大差异无疑是其聚为一类的主要原因。结合 9 省区三次产业构成（表 2）分析，9 个省区均尚处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在聚类图上则表现出各省区亲疏关系构成的复杂程度上。依据亲疏距离来看，这一层次内部又可划分为三类。表 1、表 2 的数据表明，三类区域呈现出类内一致性较强，类间差异性明显的特征。具体来看：

第一类，即广东省自成一类。与其他两类区域比较，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均远高于其他 8 省区，三次产业构成呈现二三一结构，是 9 省区中唯一一个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小于 10%、第二产业比重大于 50% 的省份，说明其工业化水平领先于其他省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珠三角完善的产业配套、良好的融资体系、活跃的市场因素、充足的劳力供应和便捷的交通系统，使其成为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理想之地。

第二类包括福建、海南、湖南和四川四省。这一类成员较多而构成复杂，既有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福建），又有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湖南和四川），还有我国的特区省份（海南）。其中，福建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与广东省较为接近。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二三一结构，工业化水平居第二类之首；海南的旅游发展优势突出，虽然经济总量较小，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呈现三一二结构，工业化水平很

低；湖南、四川两省具有较大相似性，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居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二三产业发展相对均衡。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务输出明显是其共同特征。

第三类包括江西、云南、广西和贵州四省区。这类成员区域，除江西地处我国内陆中部外，其他三省区均属我国西部。整体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水平偏低。而矿产资源、水电资源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比较丰富。

### 3 合作基础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广东的经济实力已位居泛珠三角之首，但由于其经济结构<sup>①</sup>的关系，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在周边省区的龙头地位还不太明显。分析显示，广东与周边省（区）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周边各省（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而广东毗邻港澳，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有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大珠三角的经济实力已超过长三角，影响力将日渐增强；而周边省区也急于寻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带动，以求经济起飞。显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构建经济圈的客观基础与主观愿望均已初步具备。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成功构建，必将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以更强的经济实力参与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甚至国际产业分工中，最终谋求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或发挥较大影响力。

### 三、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区域差异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与前提，然而，事物具有两面性，差异过大有时又会成为区域合作的障碍因素。根据前述区域差异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 政治制度的差异。“9+2”中，港澳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后仍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其余 9 个省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sup>①</sup> 一直以来广东的经济结构呈现出经济外向度很高，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这使得广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进而导致了其发展腹地及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



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有时会影响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当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仍不乏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在区域合作及构建合作机制时仍不能忽视政治制度在其中的反作用。尤其是“9”与“2”不同的民商法律体系的交叉与融合,给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up>[3]</sup>

2 市场化水平发育程度的差异。区域合作的主角是企业,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是市场,市场化水平发育程度的有效对接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但仍不完善,区域市场化发育程度很不均衡,总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市场化水平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就泛珠三角地区来看,区域市场化发育程度明显存在两个梯度差:即广东与港澳的梯度差以及周边8省区与广东的梯度差。由此,必然导致在区域对接与合作中出现摩擦和碰撞。在市场化发育水平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国行政区划固有的地方保护、地方封锁、人为的市场分割等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政府本位主义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消失。基于利益考虑的经济体制性摩擦,可能使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有流于形式或者演变成概念炒作的可能。

3 经济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泛珠三角各区域间在经济实力与发展水平上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在区域合作中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从经济互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能使双方或多方在发展博弈中产生合作意愿,成为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但经济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大差异可能会涉及到合作双方在诸多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问题(如生产要素流向不对等、技术要素投入不平衡等)以及合作双方对各自的经济成长空间与对合作领域的关注存在较大差异问题等。此外,过大的发展差距也不利于区域间产

业的梯度转移和有效对接。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圈,克服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障碍性因素,首先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 设立区域协调机构,构建发挥协调作用及各利益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包括相关城市政府之间的协商机制或城市联盟(经济协作区)机制,建立泛珠三角发展协调委员会,由中央政府牵头组织由广东省、香港、澳门及珠三角周边省区共同参加的跨省区的发展协调机构,作为中央、广东与香港、澳门现行协调机制的延伸和补充。2 建立健全区域协调机制和手段。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协调发展基金、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杠杆等手段,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开发,鼓励对生态环境、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3 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构建生产要素统一市场。4 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协调规划,尤其是强化在规划上的相互衔接。以区域交通规划为例,目前应重点关注的铁路有:广东与福建相连的汕潮漳铁路,与江西相连的龙赣韶铁路,与广西相连的黎湛铁路、洛湛铁路、罗定至岑溪地方铁路,与海南相连的粤海铁路,与湖南相连的武广客运专线等的规划与建设。通过改善区域交通通道,加大投入,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构建和区域经济互动创造有利条件。

#### [参考文献]

- [1] 李惠武. CEPA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J]. 南方经济, 2003(1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200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 [3] 齐峰, 张稷锋. 构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障碍及对策[J]. 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1): 19-24.

责任编辑: 黄振荣

# “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工业结构关系测度研究

◎ 郑少智 陈 萍

[摘要] 一个经济区域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关系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设计了一个测度体系,对“泛珠三角”区域中内地九省间的工业结构关系进行了定量测度,并就结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泛珠三角” 工业结构 相似系数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40-06

“泛珠三角”是一个涵盖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九省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大经济区,它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与东南亚国家在地理上直接相连,通过港澳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联系在货物和服务交易上实现对接,因此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and 开放优势,在全国三大沿海经济圈中独占鳌头。该区域的经济合作,对整个国家、“泛珠三角”区域及各成员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工业合作的角度看,由于港澳地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与内地统计口径的差异,本文仅对内地九省间的工业结构关系作定量测度与分析,其意义在于提出一种方法和基本思路,为进一步研究整个“泛珠三角”工业结构的数量关系抛砖引玉。

## 一、“泛珠三角”九省工业结构关系的涵义及其判断方法

地区工业结构关系是指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各地区工业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该经济区域长远发展的影响。根据这种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工业结构关系被分为两种类型:互补型工业关系和竞争型工业关系。互补型工业关系是指该区域内各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各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互通有无,互相促进。而竞争型工业关系是指该区域内各地区间的工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构性,使得各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会对有限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及市场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如果各地工业在产业组织上有合理的分工,也仍有一定的协作和共赢空间。

本文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相似系数法,对地区间的工业结构的差异性 or 同构性进行定量测度,从而对各地工业结构关系是互补型还是竞争型做出判断,具体步骤如下:

### (一) 选择评价指标

---

作者简介 郑少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陈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510632)。

由于本文是对工业内部各部门进行测度分析，所以选取的指标是来自工业主要部门的相关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工业本身发展的特点，本文选择了“泛珠三角”工业内部的九大部门及其相应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作为分析对象和分析指标。将选中的指标记为  $X'_{ik}$ ，其中  $i$  表示省份， $k$  表示工业内各部门。

### (二) 选择判断方法

各地区产业或部门关系判断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根据距离的远近来判断关系的疏密，另一种是根据相似系数来判断其差异。第一种方法注重的是总量上的差别，不能反映出结构的差异；第二种方法则突出体现了结构上的相似与差异，与地区规模无关。本文选择相似系数法作为其判断方法。

### (三) 计算相似系数

记  $i, j$  两省间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  $S_{ij}$ ，计算公式为：

$$S_{ij} = \frac{\sum_{k=1}^n X_{ik} X_{jk}}{\sqrt{\sum_{k=1}^n X_{ik}^2 \sum_{k=1}^n X_{jk}^2}}$$

式中， $X_{ik}$  和  $X_{jk}$  分别为  $i$  省和  $j$  省的工业部门  $k$  的工业总产值在本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X_{ik} = X'_{ik} / \text{第 } i \text{ 省工业总产值之和}$$

$$X_{jk} = X'_{jk} / \text{第 } j \text{ 省工业总产值之和}$$

### (四) 根据计算出的相似系数矩阵，对各地区的工业结构关系进行判别

由相似系数公式可知， $S_{ij}$  值越大，说明  $i, j$  两省工业的同构性越明显，竞争性就越强；反之  $S_{ij}$  值越小，则说明同构性越不明显，结构互补性也就越强。

## 二、“泛珠三角”九省工业结构关系的测度

为确保各省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本文根据相关省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统计表，确定了其中 21 个主要工业行业（原始数据见附表 1），再参照广东省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将它们分别汇总为九大工业部门，即是：电子信息业、电气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化学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建筑材料制造业、森林造纸业、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分别用  $(X'_{i1})$ 、 $(X'_{i2})$ 、 $(X'_{i3})$ 、 $(X'_{i4})$ 、 $(X'_{i5})$ 、 $(X'_{i6})$ 、 $(X'_{i7})$ 、 $(X'_{i8})$  和  $(X'_{i9})$  代表这九大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具体数据如下（表 1）：

表 1 2003 年“泛珠三角”九省九大工业部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X'_{i1}$	$X'_{i2}$	$X'_{i3}$	$X'_{i4}$	$X'_{i5}$	$X'_{i6}$	$X'_{i7}$	$X'_{i8}$	$X'_{i9}$	总计
广东	5932.21	3033.04	2044.67	1593.85	1161.84	739.77	538.44	246.56	918.6	21513.5
广西	14.14	94.32	132.72	26.23	317.75	88.72	57	51.68	227.74	1436.43
云南	0	41.51	125.58	10.07	528.72	50.43	29.11	37.39	25.18	1320.62
贵州	27.34	32.51	119.16	6.14	182.26	65.43	5.15	51.39	53.99	977.64
四川	269.64	232.48	421.64	125.72	383.21	222.5	72.07	113.61	212.6	3387.43
湖南	74.14	221.74	408.34	112.93	407	173.12	106.03	56.03	193.61	2611.45
江西	31.96	70.88	167.82	73.43	152.47	92.08	32.73	84.87	164.53	1472.33
福建	473.21	385.81	342.69	601.63	445.22	269.59	173.09	44.72	278.14	4953.74
海南	1.02	7.63	26.28	15.45	57.78	11.57	6.84	25.57	91.45	333.6

然后对指标进行预处理，按照公式： $X_{ik} = X'_{ik} / \text{第 } i \text{ 省九大工业部门总产值之和}$  对各指标进行处理后可得如下表（表 2）：

表 2

	$X_{i1}$	$X_{i2}$	$X_{i3}$	$X_{i4}$	$X_{i5}$	$X_{i6}$	$X_{i7}$	$X_{i8}$	$X_{i9}$
广东	0.28	0.14	0.1	0.07	0.05	0.03	0.03	0.01	0.04
广西	0.01	0.07	0.09	0.02	0.22	0.06	0.04	0.04	0.16
云南	0	0.03	0.1	0.01	0.4	0.04	0.02	0.03	0.02
贵州	0.03	0.03	0.12	0.01	0.19	0.07	0.01	0.05	0.06
四川	0.08	0.07	0.12	0.04	0.11	0.07	0.02	0.03	0.06
湖南	0.03	0.08	0.16	0.04	0.16	0.07	0.04	0.02	0.07
江西	0.02	0.05	0.11	0.05	0.1	0.06	0.02	0.06	0.11
福建	0.1	0.08	0.07	0.12	0.09	0.05	0.03	0.01	0.06
海南	0	0.02	0.08	0.05	0.17	0.03	0.02	0.08	0.27

根据上表中的指标值，使用 SPSS11.5 软件，便可计算出“泛珠三角”九省间工业结构的相似系数矩阵：

表 3 “泛珠三角”九省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矩阵

地区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四川	湖南	江西	福建	海南
广东	1	0.42264	0.27122	0.46891	0.75605	0.58264	0.54051	0.8214	0.3238
广西	0.42264	1	0.83639	0.91866	0.84929	0.90559	0.91528	0.70605	0.90875
云南	0.27122	0.83639	1	0.89325	0.69083	0.77433	0.6584	0.53684	0.59972
贵州	0.46891	0.91866	0.89325	1	0.90742	0.93613	0.89219	0.69277	0.74536
四川	0.75605	0.84929	0.69083	0.90742	1	0.96032	0.92863	0.88084	0.70712
湖南	0.58264	0.90559	0.77433	0.93613	0.96032	1	0.93963	0.81914	0.73877
江西	0.54051	0.91528	0.6584	0.89219	0.92863	0.93963	1	0.80559	0.88023
福建	0.8214	0.70605	0.53684	0.69277	0.88084	0.81914	0.80559	1	0.60676
海南	0.3238	0.90875	0.59972	0.74536	0.70712	0.73877	0.88023	0.60676	1

相似系数越大，表明两省工业结构越相似，地区间的竞争就激烈；相似系数越小，则表明两省工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一定的结构互补性。根据 SPSS11.5 软件分析的结果，给出判别临界区间，对九省间的工业结构关系进行判别。具体判别结果见下表（表 4）：

表 4 “泛珠三角”九省间工业结构关系

关系类型	S 值	所属地区
强竞争型	$S > 0.9$	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海南 贵州——四川、湖南 四川——湖南、江西 湖南——江西
一般竞争型	$0.7 \leq S < 0.9$	广东——四川、湖南、江西、福建 广西——云南、四川、福建 云南——贵州、湖南 贵州——江西、海南 四川——福建、海南 湖南——福建、海南 江西——福建、海南
一般互补型	$0.4 \leq S < 0.7$	广东——广西、贵州 云南——四川、江西、福建、海南 贵州——福建 福建——海南
强互补型	$S \leq 0.4$	广东——云南、海南

### 三、“泛珠三角”九省工业结构关系的分析评价及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结果不难发现，“泛珠三角”区域内工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突出，多数省份间的工业结构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竞争关系，其中四川、湖南、江西、贵州这四省间的竞争尤为激烈，特别是四川和湖南，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竟然高达 0.96，区域内工业结构趋同可能会导致地区之间不能按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各省要使自身的经济获得更高增长，则可能会竞相抢夺区域内有限的资金、技术、

人才、资源以及市场，这将影响相关区域的持续协调发展。因此，要形成区域内的良性竞争，促使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首先就必须调整好各省间的工业结构关系，通过正确产业政策引导促使各省建立紧密的工业合作关系，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迅速提升整个区域的工业竞争力，以达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目的。

为了具体地了解各省究竟在哪些工业部门存在竞争？在哪些工业部门具有优势？下面使用SPSS11.5软件对“泛珠三角”九省上述九大工业部门进行对应分析，以获得各省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如下：

表 5 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

因子	所有特征值	方差贡献	累积贡献	提取特征值	方差贡献	累积贡献
1	0.24865	59.1531	59.1531	0.24865	59.1531	59.1531
2	0.09923	23.60609	82.75919	0.09923	23.60609	82.75919
3	0.03176	7.554499	90.3137			

表 6 R 型因子载荷

指标	因子	
	F1	F2
x1	0.37164	-0.03274
x2	0.13887	-0.02029
x3	-0.01800	-0.03356
x4	0.13183	0.06439
x5	-0.22390	-0.18029
x6	-0.01624	-0.00822
x7	0.00964	0.00416
x8	-0.09102	0.06602
x9	-0.12155	0.23564

表 7 Q 型因子载荷

地区	因子	
	G1	G2
广东	0.37208	-0.02835
广西	-0.11624	0.03052
云南	-0.18802	-0.21575
贵州	-0.08590	-0.05860
四川	0.05864	-0.01344
湖南	-0.01576	-0.02544
江西	-0.04124	0.07516
福建	0.15574	0.02179
海南	-0.15597	0.20139

从表 5 可知，前两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的百分比已达 82.76%，说明使用两个公共因子就己能代表变量与样品中的主要信息，所以本文就提取两个公共因子进行分析。其中第一个公共因子占 59.15%，第二个公共因子占 23.61%。

从表 6 可以看出，第一因子轴 F<sub>1</sub> 上“贡献”最大的指标是 X<sub>1</sub>、X<sub>2</sub>、X<sub>4</sub>，第二因子轴 F<sub>2</sub> 上“贡献”最大的指标是 X<sub>5</sub>、X<sub>9</sub>。

通过对应分析的平面图，我们可以发现：

(1) 强互补型三省广东、云南、海南的工业具有自己的特色，广东正着力打造知识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电子信息业，云南主要是发展传统产业——食品饮料业，而海南则侧重于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一潜力产业。这三个省份与其他六省的工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属于互补型，这表明这三省的工业结构正朝着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区域内整体工业结构的优化，因此这三省应继续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对于广东而言，更应该充分利用毗邻港澳这一地缘优势，通过港澳与国际接轨，将工业发展的重点放在有高加工度和高技术化特征、质量与附加值较高、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高精尖产品生产上，引领其他欠发达省份的工业结构向着优化方向发展。云南就应该从省情出发，适当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使之更具竞争力。

(2) 四川、湖南和江西三省工业结构高度趋同，主要体现在石化、建筑材料、森林造纸这三大工业部门上。这种重复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彼此的工业规模都不经济，并且还极大地浪费了资源。因此，四川、湖南和江西应该一方面根据自己资源禀赋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选择能够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以避免出现三省间的工业结构过分趋同；另一方面对于部分趋同化的工业部门，三省也可利用现代技术改造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产品档次，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品牌。

(3) 福建与纺织服装业以及电气设备制造业的关系紧密，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与其他省



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根据表 7 的 Q 型因子载荷矩阵, 可以发现在第一因子轴  $G_1$  上, 福建与广东在纺织服装业与电气设备制造业这两个产业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众所周知, 广东珠三角以制造业见长, 正逐渐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而福建的纺织服装业却是驰名中外。因此, 福建应该避免与广东在相同部门制造业上的过度竞争, 着力打造自己的优势制造业——纺织服装业, 使其规模更经济、更具特色。在第二因子轴  $G_2$  上, 福建与广西在医药制造业这一部门上也呈现结构趋同现象。由于福建的经济水平高于广西, 并且又拥有沿海这一地缘优势, 因而它比广西更有条件引进和研发高新技术,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新产品; 广西可以在中国传统医药项目上取得比较优势, 双方都能为各自开发新产品争取更大的空间, 从而实现双赢格局。此外, 从对应分析平面图上还可以发现, 福建与贵州的工业结构相似性不大, 在某些制造业上还具有互补性, 两省应利用这一互补优势, 通力合作, 错位发展。

(4) 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六省间的工业结构或多或少地存在竞争关系, 这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很正常的。只是今后各省在投资推进产业升级时, 应注意从实际出发,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 在有效竞争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合作, 以促使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工业结构逐步走向有序的分工与合理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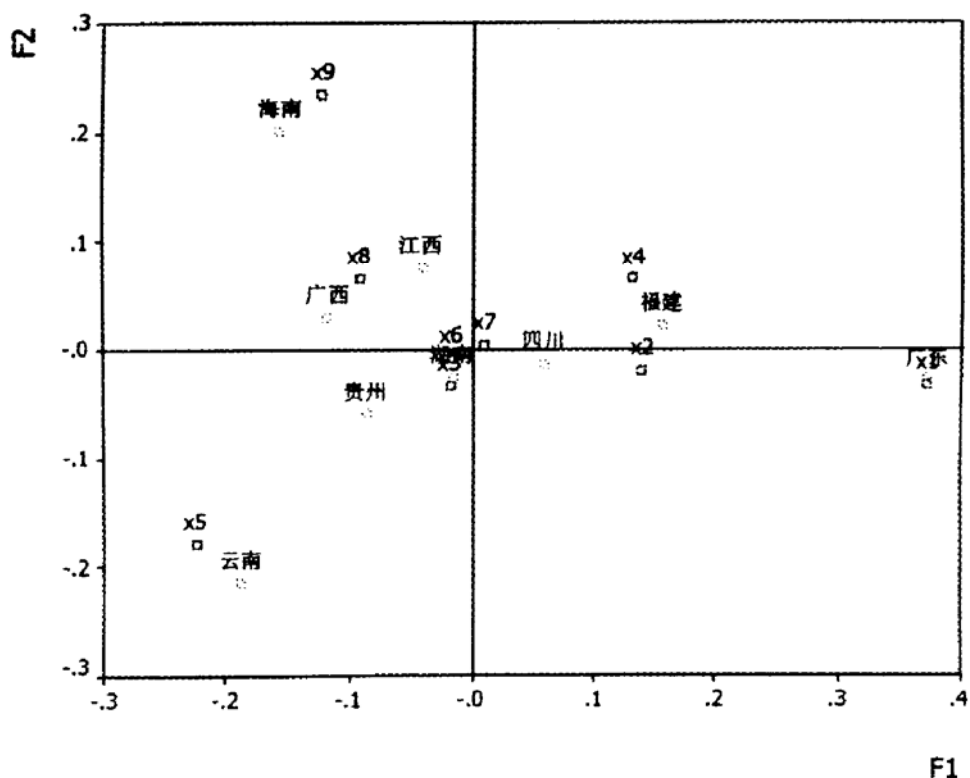


图 1 “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与各工业部门间的对应分析平面图

#### [参考文献]

- [1] 广东等九省统计局. 广东统计年鉴 2004 [Z], 广西统计年鉴 2004 [Z], 贵州统计年鉴 2004 [Z], 四川统计年鉴 2004 [Z], 湖南统计年鉴 2004 [Z], 江西统计年鉴 2004 [Z], 福建统计年鉴 2004 [Z], 海南统计年鉴 2004 [Z], 云南统计年鉴 2003 [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 [2] 简新华, 魏珊. 产业经济学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 [3] 高洪深. 区域经济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4] 潘学标. 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 [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3
- [5] 张文彤. SPSS11.0 统计分析教程 [M]. 北京: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2

附表 1

2003年“泛珠三角”九省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单位: 亿元)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四川	湖南	江西	福建	海南
$X'_{1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932.2	14.14	0	27.34	269.64	74.14	31.96	473.21	1.02
$X'_{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18.3	52.9	18.17	9.88	101.83	131.8	18.04	109.65	1.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160.4	35.12	17.58	20.19	113.17	79.31	42.98	199.03	5.8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654.31	6.3	5.76	2.44	17.48	10.63	9.86	77.13	0.28
$X'_{1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52.73	0	0.09	0	111.53	0	0	0	1.56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553.03	21.08	1.86	2.9	30.88	178.18	87.75	89.63	4.4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141	106.17	121.26	92.66	264.29	216.7	73.21	200.75	19.88
	橡胶制品业	97.93	5.47	2.37	23.6	14.94	13.46	6.86	52.31	0.37
$X'_{14}$	纺织业	784.52	23.74	5.17	3.39	94.18	77.71	57.09	265.82	5.2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765.07	1.19	0.96	2.16	7.44	15.2	9.48	261.83	4.22
	化学纤维制造业	44.26	1.3	3.94	0.59	24.1	20.02	6.86	73.98	5.97
$X'_{15}$	农副食品加工业	503.65	242.35	55.47	22.12	8.39	137.18	59.54	197.18	32.25
	食品制造业	297.51	17.19	5.39	11.62	55.49	47.3	23.18	99.21	17.42
	饮料制造业	240.88	22.18	11.31	41.5	252.07	40.49	22.17	69.18	3.8
	烟草制造业	119.8	36.03	456.55	107.02	67.26	182.03	47.58	79.65	4.31
$X'_{16}$	非金属矿采选业	54.63	6.35	6.6	28.18	21.9	25.44	7.96	15.37	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85.14	82.37	43.83	37.25	200.6	147.68	84.12	254.22	11.57
$X'_{17}$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34.04	23.23	8.41	1.11	14.15	31.99	19.31	50.59	5.05
	造纸及纸制品业	404.4	33.77	20.7	4.04	57.92	74.04	13.42	122.5	1.79
$X'_{18}$	医药制造业	246.56	51.68	37.39	51.39	113.61	56.03	84.87	44.72	25.57
$X'_{1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918.6	227.74	25.18	53.99	212.6	193.61	164.53	278.14	91.45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1513	1436.4	1320.6	977.64	3387.4	2611.5	1472.3	4953.7	333.6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04》、《广西统计年鉴 2004》、《云南统计年鉴 2003》、《贵州统计年鉴 2004》、《四川统计年鉴 2004》、《湖南统计年鉴 2004》、《江西统计年鉴 2004》、《福建统计年鉴 2004》、《海南统计年鉴 2004》。

注:各地工业结构中,除九大部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细小的行业,其产值此表并未列出,而总计栏中的数值是各地所有工业行业产值之和,所以此表中九大工业部门产值之和并不等于总计栏中的数值。此外,在缺少《云南统计年鉴 2004》的情况下,只好使用《云南统计年鉴 2003》上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一般说来,一省的工业结构在一年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由于相似系数的计算只取决于工业结构,而与总量无关,因此使用《云南统计年鉴 2003》上的数据来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内九省间的工业结构关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责任编辑:黄振荣

# 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综述

◎ 龚唯平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韦 前 (广东省社科联)

“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于2005年1月8-9日在广州召开,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点和《经济动态》杂志社共同主办,香港政策研究所、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广东佛山市高明区委协办,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和香港、澳门等地的专家学者约80人出席了会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教授等20名专家作了专题演讲。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在CEPA框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香港、澳门在泛珠三角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粤港澳经济合作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等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现将研讨会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 一、提出“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的依据与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崛起,使珠江三角洲区域成为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一片神奇的热土。2004年6月,广东等九省区和香港、澳门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揭开了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新篇章,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阐明“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的依据与背景,一致认同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创举。

清华大学殷存毅教授指出:(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三大板块,其中惟独珠三角地区市场腹地狭小,这势必导致珠三角地区扩大资源要素聚集规模处于不利境地。在这个背景下,广东将大珠三角合作扩展为泛珠三角合作,其根本目的是要利用广东现有优势拉长经济发展的“市场链”,以确保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广东周边省区也期望借助珠三角的优势,来带动自身经

济发展。这样,泛珠三角合作兼顾东部、中部和西部共同发展,在迄今为止各种区域发展战略中最富有政治和经济的宏观视野。(2)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与过去其他的区域发展战略不同,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不是中央政府规划设计的,而是由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要求提出和组织的,是一个真正具有区域经济含义的区域发展战略构想。由于启动机制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供给,也就势必基于市场经济环境来考虑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内涵及推动机制。因此,泛珠三角设想的提出本身意味着对我国过去的区域发展模式与体制的创新与挑战。

中山大学陈广汉教授认为,区域经济的整合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而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的提出顺应了这个发展新趋势。(1)改革开放2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的经济融合,为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泛珠三角”是“大珠三角”的延伸和拓展。(2)从国内几大经济区发展的态势看,珠三角经济区迫切需要做大做强,一方面利用CEPA提供的机遇,提升粤港澳经济合作水平;另一方面加强与邻近省区的经济合作,拓大珠三角的经济腹地。(3)泛珠三角经济区包括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省份合作发展,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符合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认为,成功的区域合作应具备四个前提:一是处于龙头地位的核心区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二是各地区之间有互补优势,并存在经济落差;三是地理上相互毗邻,原来已有合作传统渊源;四是必须形成利益共享、成果多赢的共生型协作机制。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基本具备这四个前提,因此泛珠概念提出之后,得到中央的肯定、支持和有关省区的积极响应。

暨南大学程玉鸿博士认为，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利于大珠三角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还为 CEPA 的实施提供了更大的组织化合作空间，有利于提高港澳与内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有利于港澳地区更好地实施“一国两制”。

## 二、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的战略目标

早在泛珠三角区域概念酝酿中的 2003 年 7 月，广东省政府就提出，要“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近期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一系列的相关协议中，也强调要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立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然而，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的战略目标究竟如何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与会专家看法也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

大多数人认为应以建立泛珠三角统一市场为目标。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润生认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总体目标是消除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构筑商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统一、开放、有序的区域性共同市场。中山大学陈广汉教授认为，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区域的分工，实现共同发展，是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的基本目标。由于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局部利益驱动下产生的“诸侯经济”，阻碍着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区域经济合作和整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资源自由流动和价格信号真实的统一市场。

清华大学殷存毅教授认为，以基于商品和要素无障碍流通的统一市场为目标，其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经济合作而言，商品及要素市场的统一是一种外在的条件，而不是由于合作产生的因变量。即使不提出泛珠三角概念，有关省区之间的统一市场也会在国家政策法规推动下实现。因此，泛珠三角合作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政策协调来追求区域性的经济协调发展乃至区域性经济一体化。

## 三、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合作的困难及障碍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联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跨区域合作，其复杂性及其难度由此可想而知。不少专家认为，从目前泛珠三角合作所呈现出来的内涵来看，它只能起到促进有关省区发展中扩大跨区经贸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只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松散型合作，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各方的共同目标及组织形式，还不是一个把有关省区发展

融为一体的区域性发展战略或规划。

香港理工大学陈文鸿博士认为，泛珠三角从概念进入到政府协商协议的阶段，但真正成为中国的一个区域经济体系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泛珠三角以广东省为中心，并以其他省区作为广东的经济腹地，未必可为各省接受。目前珠三角的市场牵引力只可达湘桂两省，广东的企业也对其他省没有显著影响力，企业之间、产业之间与地区市场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并不明显，也不易发展。泛珠三角能否落实为地方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体制，可能要五年以后才见分晓。

暨南大学程玉鸿博士指出，泛珠三角内部差异性突出，经济梯度明显，这是泛珠三角区域间经济互动、优势互补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区域资源整合，发挥规模效益，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但由于差异过大，又会成为区域合作的障碍因素。一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将影响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市场化水平发育程度的差异，这导致地方保护和封锁。三是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的差异，造成了生产要素流向不对等和技术要素投入不平衡等问题，造成利益分享不均衡。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本立等专家认为，阻碍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合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制障碍，二是基础设施障碍，三是产业的同构。这是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市场机制不能在区域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以及区域内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难以形成的基本原因。此外，还有地区政治环境的障碍。根据《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享有完全的经济决策权和对外经济交流权，而内地省区的决策权从属中央政府。内地省区与港澳的政府职权不均衡，在经济政策上的决策力不均等，这造成了经济合作谈判的障碍。

暨南大学郑少智副教授对泛珠三角九省区工业结构关系进行定量测度后指出，区域内工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突出，多数省份间的工业结构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竞争关系，这将影响泛珠区域工业合作和经济协调发展。还有不少专家认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着三大障碍：一是没有市场机制作为利益分配的保障，二是“条条专政”的垂直管理体制下各种职能部门的干预，三是区域经济协调组织自身的缺陷。由此形成的矛盾使合作首创者（广东）的预期与其他合作伙伴的预期有落差，容易产生“机会主义”的行为和“搭便车”心理，出现了面上热热闹闹但并非齐心协力的问题。内地九省区之间能否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成败的关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要想成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现有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协调由于区域差异导致的利益矛盾冲突。

#### 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策略重点

虽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着种种困难和障碍,但与会专家们都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发展策略,就能使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地启动和推进。不过,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重点,大家的见解很不一致。

暨南大学封小云教授认为,CEPA启动了珠三角与港澳之间新一轮的经济互动,与上一轮的经济互动不同,新的经济互动的核心是服务业。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大珠三角有希望形成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循环体系。一是以香港为服务枢纽的外向性体系,一是以广州为服务枢纽的内向性体系。香港和广州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服务资源与产业聚集城市,从而为大珠三角及泛珠三角的经济增长释放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在CEPA框架下,泛珠三角合作的重点应是服务业。

暨南大学冯邦彦教授认为,策略重点是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由中央政府统筹长远规划,协调各省区之间的长短期利益关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各省区容易达成共识和建立起协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资源配置机制,应该采取“市场+制度”的模式,首先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其次是强化政府的协调作用。同时,要重视“超区域”主体的作用,需要中央政府从“超区域”的角度进行统一协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左连村教授认为,泛珠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问题是珠三角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而辐射和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交通。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必须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而目前广东与周边省区之间尚未形成纵横交错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特别是缺少大运量的轨道交通网络。因此,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

济合作必须交通先行,其中轨道交通建设是提升大珠三角经济辐射力的重要环节。

暨南大学龚唯平教授认为,在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中,旅游业的开发合作应该处于先行或优先地位。其主要根据有三:一是粤港澳及周边八省区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深厚,旅游资源丰富且互补性强,现有的开发合作基础较好。二是旅游开发的物质技术条件要求较低,旅游合作最为简便易行和容易见成效。三是旅游业的网络化经营,影响面广、收益多且利益分配机制较为完善,容易达成产业合作的共识,并可带动其它产业的合作。因此,在CEPA制度框架下,“泛珠三角”旅游合作可以先行一步,在粤港澳旅游一体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规模更大的“泛珠三角”旅游经济圈。而合作的重点在于首先打造粤港澳旅游金三角,并以开发精品旅游干线为泛珠旅游合作的突破口。暨南大学代明副教授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相邻区域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合力,获得“1+1>2”的整合效应。而提高整合效应的最佳途径,是打造能够影响整个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链。因此,珠三角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重点,应该是选择汽车、石化和IT等优势产业,来合力打造战略产业链。暨南大学吴江教授则认为,策略的重点应该放在大珠三角经济合作上。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来看,港澳地区从内地省区获得产业结构升级的人才与技术支持,广东则紧跟港澳之后完成工业化和向后工业化过渡,其他省区则接受粤港澳的制造业转移。在这个合作模式中,起关键和核心作用的是粤港澳地区这个龙头。只有建立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这个龙头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潜力,也才能更好地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黄振荣



· 文 化 ·

# 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释义

◎ 左亚文

[摘要] 彰显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这不仅仅是一个表现形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文化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本文从论析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入手,联系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对于如何在改造和重释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克服文化建设上种种错误偏向,凸现文化的民族特色,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浅见,以就教于学术同仁。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文化 哲学社会科学 传统文化 民族特色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49-06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对于文化建设的这一基本原则是没有什么疑议的。但有一个必须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我国民族文化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还是把这两个东西合并成一个东西?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融合为一个东西,而融合的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吸收一些经过改造了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并使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之具有中国民族的气派和风格。这样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它实质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上的基本思想有两个要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文化建设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而不是另外杜撰出一套思想体系。恩格斯曾经以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为例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

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sup>[1](P355)</sup>这是文化理论发展必然遵循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文化也不例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新型形态的文化,它要与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而和其他的文化发展不一样,它更多地不是在继承而是在反叛传统文化中建构起新质文化的。这种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观点早已受到列宁的无情批判。他这样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sup>[2](P348)</sup>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充分领会了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

作者简介 左亚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430072)。

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sup>[2] (P347)</sup>列宁的这些论述再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是以往全部文化合乎规律的产物和必然发展的结果。把同传统文化的“决裂”推到极端，把社会主义文化渲染成与以往文化迥然不同的东西，这不是抬高了社会主义文化，而且是贬低了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原则，而不能代替民族文化建设。恩格斯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3] (P742-743)</sup>恩格斯还针对当时一些青年著作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作“套语”，然后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以及把它变成按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的做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sup>[3] (P691-692)</sup>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面已经包含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成内容，我们的任务只是把这些现成的内容从马列的本本里发掘出来，无需具体研究全部历史包括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反对的。

## 二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大的领域。在科学文化这一领域，自然科学是没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但哲学社会科学却有民族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是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但是即便如此，它也不能取代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做的却是从经典作家书本里讨生活的学问，就像恩格斯当年所批评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现成的“公式”和“套语”，先验主义地从中推演出哲学和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来，然后

给各门具体科学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变成了“知识的总汇”和“科学的科学”，这不但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反而把马克思主义拉回到了旧的时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时时记取恩格斯的指示，哲学、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道德等等都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中推导出来，而应该详尽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现实社会存在的状况，然后从中总结和概括出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在这里所起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决然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诚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我们要加深对它的研究，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它的发展。但是，是不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我们就不能在具体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包括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了呢？当然不是。例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中国哲学，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深入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这些学科的发展，但这些学科的发展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个民族的哲学以及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

固然，马克思主义除了方法论的原则以外，还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也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并且有一个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实现其民族化的问题。在我国来说，就是如何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或民族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命题，后者包含了前者，但不能归结为前者。社会主义文

化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又不能把社会主义文化的无比丰富的内容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在实际中，我们往往把两个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别的命题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或民族化问题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它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必然使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烙上中国民族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或民族化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现实的主体它只能是各个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可能是一个无差别的抽象体。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是内生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变革中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来的。因此，这种民族特色不是外在输入的产物，而是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然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是从西方传入的，所谓中国特色不过是在其中加入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而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不仅是这样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从传统文化中直接产生出来，就像资本主义文化不能直接从封建文化中产生出来一样。社会主义文化是从各个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但就文化本身的传承来说，它主要通过批判改造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而来。正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立足各个民族的具体实践才能巩固和发展一样，社会主义文化也只有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才能繁荣兴旺。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一个外显的“色彩”问题，特色不是点缀，不是形式主义的外在装饰。从本质上看，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它深透于内容而外显于形式。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并据此进行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

### 三

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具有怎样的民族特色，又该如何构建这样的特色呢？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违背这种规律，甚至不能过多地人为地去干预它。我们过去的错误恰恰在于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一种先验的模式去设计文化的发展，然后利用行政的和舆论的力量向全社会加以推广。这样的结果使得我国的文化建设在许多方面偏离了客观实际，超越了现阶段的发展，并且打上了“左”的教条主义影响的印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泛化。前已论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化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后者所包蕴的内涵和外延要宽广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无疑，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具体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建设。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把马克思主义一再加以泛化，以至不仅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乃至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原理等等，都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观点的阐释。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被引入进来，但却被机械地填充在原来的理论构架之中，再加盖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哲学和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教科书版本越来越厚、论证越来越繁琐，但却没有大的突破的原因。

二是生搬硬套的西化。与前一种倾向相反，另一种倾向即照抄照搬西方观点的做法在一些学者中间流行。这些人不满意现行的状况，但却滑到另一个极端，以为凡西方的就是好的、新的，其中有的人甚至对西方文化尊崇有加，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却百般贬损。这是一种洋教条主义，他们总是带着洋教条的眼光去看待传统和现实，甚至对民族文化抱着一种蔑视的心态。他们既不

认识传统，也不愿了解现实，像所有教条主义者一样，只在书本里讨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一切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积极地加以学习和借鉴的，惟恐学之而不精、挂一而漏万；但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搞“全盘西化”，做照搬照转的傻事。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依了这些洋教条主义者，把西方的一些古人或现代人请出来，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来治理中国的事情，而把中国传统和现行的东西统统砸个稀巴烂，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三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当一种文化建设离开了传统和现实的基地之后，它就只能按照一种自认的理想模式来进行自我设计。翻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原理教科书，不难找到这些和实践对不上号、挂不上钩的东西。正是这些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和主观化的东西，使社会主义文化的信誉度和感染力大打折扣。这尤其表现在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上。一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它扎根于社会现实，同时从传统美德中获得思想养料。离开了这些，道德就无法被一个社会真正接受并得到贯彻。可是，我们过去却不是这样。我们直接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中汲取道德的养料，根据至纯至善至美的原则制定道德的规范，把道德建基于革命激情和良好的愿望之上。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的道德都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统统抛弃了。这造成了一代甚至几代人思想道德传统的断裂，它的遗害现在正日益显露出来，恐怕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断裂的优秀传统重新弥合起来。

上述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偏向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离开中国的客观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依据本本上的原则和模式来规划文化的建设。传统不是过去了的死的东西，它既是昨日的现实又作为昨日的传统存活于今日的现实之中，它是一个巨大而真实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的意义上，它往往比物质的存在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更加持久和有力。因此，从阐释学的观点看，文化传统是寓于现实之中并对其发生影响的要素，因而不仅成为现实中一个构成部分，而且是支配和推动现实的内在精神动力。我国的文化建

设要从现实出发，这一命题也就内蕴着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要从优秀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并根据现实加以变革，而不能脱离这一文化发展的正常轨道。

#### 四

显然，从优秀传统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中内生出来的文化，就必然从里到外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内容和形式却是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即民族特色首先是指内容，它是内在的形式；其次才是外显的形式，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就是这种内在形式和外显形式的统一，亦即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在文化建设上任何人为主观的设计都是有违文化发展规律的。正像经济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样，文化发展也是如此，它们都统一于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对于社会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主观地干预它的基本行程，它有其自然的和自发的内在发生机制，它往往比人类的有意安排还更加合理和完善。现代的协同论已从自组织的理论上揭示了这一普遍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一般规律，无需详加论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在客观的规律面前就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为了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减少主观主义的错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媒体应在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历史的责任感积极承担起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尤其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过去“左”的思想的干扰，我们的文化建设中存在着种种脱离传统和现实的做法，如果社会的有识之士和有关政府机构不主动地行动起来，动员整个社会成员参与文化的重建活动，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尽快重新回归社会，回归人们的心灵，而是让其在时间的流逝中自发地消长变迁，那么，社会主义文化重建过程将大大延长。如果说我们过去因为太多的不切实际的干扰使文化建设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的话，那么，现在则需要有更多的自觉行为来矫正这一历史遗留



问题，使其纳入历史发展的正轨。

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这里我们要着重探讨的是如何针对过去存在的偏向，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续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与5000年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

首先，重新清理和诠释被遗弃的传统文化，重建社会主义道德。不可否认，理想主义的道德观曾在革命和建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人们至今难以忘怀20世纪50—60年代那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岁月，那种舍生忘死、勇于奉献的冲天热情，那种全民学雷锋、乐于做好事的社会景象。但是，这种“德治”的盛况，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即大一统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基础之上的，也是以革命胜利后不久社会领导者和管理者个人崇高的思想品格作保证的。这种自然淳朴的道德观念，还以外部的封闭环境为条件，一旦打破这种封闭，“淳朴”就不复存在。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的地理分割，是以牺牲效率、自由和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本身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这种体制注定要被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打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计划体制被冲破，在这种体制上依附的道德就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价值失落”的一个深层原因。

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对现实的超越必然以废弃传统为前提。中国人同样不会忘记，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传统的东西都被视为封建的垃圾遭到了唾弃，甚至遗留在人们头脑里的文化记忆，也要通过灵魂里面爆发革命，把它驱赶出去。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使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所有的传统美德甚至包括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孝道也因与阶级感情不相容而被贴上革命的封条，以致现在许多青年人连孝道为何物都不知晓，遑论其他，传统道德被遗弃、荒芜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论述“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时候，提出要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就把“承接”传统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纳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去了。中华传统美德如崇尚自然、追求天地人和谐的境界，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操，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胸襟，修身齐家、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为人准则，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淡漠名利、知足常乐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存和发展中积淀而成的道德精华，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生根于我们民族的沃土之中，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面，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有些已经内化为一种民族个性，一种世代相沿的自然习惯和习俗，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起着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一个社会里，道德和法律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同时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信念、信仰和精神追求，它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社会成员大都是通过道德践履来接受和承续民族文化的。当一个社会突然宣布要立即废止沿续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时，它对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危害决不仅仅是外部秩序的破坏，而是道德自身的劫难。因此，重建社会主义道德，必须以承接优秀传统道德为前提。现在，党中央已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任务，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我们过去对一些优秀传统道德所进行的错误批判并没有得到澄清，以致人们至今还不敢提“忠孝仁义”、“礼义廉耻”这些为老百姓所熟悉的道德范畴，甚至还有一些人误把“父慈子孝弟恭友信”当作封建的东西大加批判。可见，承接传统美德的当务之急是对传统道德进行一番重新的清理，以分清究竟哪些是过时的糟粕，哪些是具有现实价值的精华，对于精华部分我们也不能现成地加以搬用，而是要进行“扬弃”、改造，赋予其时代的新义，使之升华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范畴。这种重新认定和诠释的工作不完全是一种纯理论的思辨，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活动，必须把它放到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加以检验和鉴别，才能区分



真伪。但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理论上正本清源，让人民群众明白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却是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职责之所在。

其次，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还处于古代的朴素形态，尚未进化到近现代的水平，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只能吸取和借鉴西方既定的成果。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甚至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成果也不能用，于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取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西化”的倾向，有的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例如，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必称欧美，以能引和多引西方人的话为荣，而对自己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却一知半解，有的甚至一无所知，连古文也看不懂却不愿学习。这种现象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是很不正常的。一个连自己民族文化都毫无所知的人，是谈不上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的；脱离本民族的文化去研究外国文化，是不可能结合本国实际科学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的。我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但却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并不是一片空白。对于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料，我们应该加以有效的利用，经过改造和提炼后，把它们吸收到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之中去。至于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它们对人类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更应该认真加以总结，使其合理的精华能得以发扬光大。

再次，运用群众便于理解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文化的民族特色既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现在，理论文化界有一种很坏的风气，这就是不好好说话，一些人成天琢磨如何更多地套用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新名词、新术语表达思想、装璜门面，有的甚至不惜生造或臆造词汇，一篇文章不是在思想上求新，而是变着法儿在用词上造作，这在哲学界尤为突出。这实在是

思想贫乏的痛苦挣扎，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悲哀。各个民族的语言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征，它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生存和发展的产物，中华民族语言之优美，词汇之丰富，是世所公认的。善于运用本民族的语言特别是群众所喜爱的新鲜活泼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阐明深刻的理论，让群众能够理解和掌握，以便更有效地发挥文化理论的社会功能，而不只是自我欣赏或向学术小圈子“吐露”，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文化的生命力及其发展方向的学风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使用常人不能理解的语言形式表达是为了突显学术性，似乎学术性越强就越难懂，越难懂就证明学术性越强。这种观念近乎荒谬。确实，在学术史上，有些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其语言晦涩难懂，像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这样。但是，第一，黑格尔著作的难懂是同其所要传达思想的高深性相一致的；第二，黑格尔著作的晦涩难懂并不是它的优点，而恰恰是其思辨唯心主义的缺陷。马克思曾针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缺陷，表示要用几个印张把黑格尔的哲学重新阐释一遍，以便让常人的理智能够接受，可惜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面向实践，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运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抽象的思想，让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然后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学风，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特点之一。今天，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学风，擅长于和热心于运用民族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和其他的形式反映科学的内容，这不仅是彰显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所需要的，也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所需要的。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雨童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系列笔谈·

# 马克思主体观的反思

◎ 刘森林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体观变革后留出的问题和值得继续探讨的空间: 主体的社会性构成的不断强化, 势必导致社会性以各种形式侵入个人主体, 导致无个性大众人的大批出现; 价值维度上仍未走出主客二分或“我(们)一它”分析模式; 忽视承担传统主体职能的群体的内部异质性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严重到威胁群体主体能否理性地凝聚为主体的程度; 忽视群体主体中更多社会身份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体观 大众人 群体主体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55-06

在《近代主体观念的社会性重建》<sup>[1]</sup>一文中, 通过考察马克思对近代主体观念的批判及其根基的重建, 我探讨了他在何种意义上承续了近代主体概念、又在什么意义上批判了它和重构了它。通过考察,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近代“我思主体”的批判取得了怎样的重要进展。但今天我们阅读 100 多年前马克思取得的这种进展时, 必须看到沿着这种进展之路向前还有哪些有待继续考察的问题和探讨的空间。如果我们停留在马克思取得的进展处沾沾自喜, 置 100 多年来的进步于不顾, 那我们就不但没有资格做一个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对于探讨马克思的主体观的我们来说, 工作只做了一半。工作的另一半是, 从现在的观点看来, 这种批判重建中没有足够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何在, 或者说, 继续探讨的空间应从何处拓展。

—

沿着社会学路径思考主体得以成立的社会根

基, 强调主体的社会维度, 走到最后常常就是主体的消解: 千人一面的标准人、或者大众人(mass man)的产生。因为“社会性”的“人”就是越来越受各种制度关系、技术和文化意识形态牵制的“人”, 或者说就是这些东西已经渗透、内化进自己内部的“人”。这种理性化的“社会人”已经被种种制度、技术和文化关系相互扯拉成没有个性的标准化的“常人”(海德格尔)或“样品人”(克尔恺郭尔)。这种“人”已经与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所主张的具有内在灵性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各种品性内在协调统一的“人”分裂了。为了取得相互之间更高密度的社会认同, 人们越来越磨平自己那不为周围人欢迎的个性, 而向大众化的、平均型的、正常化的“常人”靠拢, 这种自我塑造成了最容易和轻松、风险最小、探索成本最低的社会选择。如果说马克思和克尔恺郭尔时代的个体还乐于寻找自己所属的固定的社会群体, 并拼命致力于加入更高的“参考

作者简介 刘森林,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群体” (reference groups) 而找寻生存的意义依托, 他们乐于成为这一群体的成员并甘愿受此群体规范的支配, 那么, 如今社会中群体的多样化和身份的多样化使面临太多选择的个人走进了“普遍观照” (universal comparison) 境遇之中: 在那里, 个人目标依周围人状况而定, 状况处于说不清的多变之中, 目标亦是莫名其妙地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化的“人”就可能沦为千人一面的样品人, 社会性就会成为肢解主体性的熔炉。阿伦特就曾把马克思主张的人的社会化解释为社会对人的入侵。<sup>[2](P54)</sup> 如果真是这样, 在社会性背景下, 主体性何以存在? 那些依存于主体性的价值理想还如何存在? 难道社会性维度的充分展开就是主体性的消解和破碎吗? 可是, 马克思在批判近代我思主体时并没有走到彻底否定启蒙、以社会性否定主体性的地步, 相反, 他比几乎仅仅坚持个人自主性这一启蒙理想的阿多诺更多地坚持着启蒙的种种理想目标。看来, 在启蒙主体性和它的社会学根基之间, 直接存在着某种矛盾冲突。相信两者之间肯定是一种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天然和谐关系的马克思, 在面对发现两者之间处于永远冲突关系之中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质疑时, 在面对韦伯的“铁笼”质问, 面对勒庞和弗洛伊德所谓群体的破坏性以及集体无意识相比理性的巨大威力的提醒, 面对 20 世纪启蒙现代性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种社会性维度上施展出种种扼杀人的个性的种种成功运作的机制时, 肯定会重新加以思考。在主体性和社会性之间保持一种怎样的张力关系才是合适的, 成了一个需要求解的重要问题。

社会性的不断扩张驱使个人日益按照社会中他人的期望和要求来塑造自己, 众多他人的期望与要求使个人的个性日益没有存在和发挥的余地。社会性日益成为一种标准性、平均性、完全可期望性、无惊奇性、中庸性的代名词。启蒙原来致力于造就的理性人应是这样: “一个名副其实的人, 其言行举止必定符合理智, 判断人和事物必定冷静客观, 行动时必定胸有成竹, 接受他人的观点时, 必定深思熟虑, 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方面的理由, 而不是屈从于权威或者大

多数人的判断。我们期望每个人都三思而行, 期望他无论作为单个人, 还是与其伙伴同在时, 都能受到理智及其利益的指导。”可是, 现代社会通过社会性机制实际造就的大众人却与此相距太大: “经验观察表明,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时不时地被迫服从其领导和上级的决定。他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其朋友、邻居或者政党的观点。他还常常采纳周围人的观点态度、语言和品味格调。更为糟糕的是, 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族群, 深陷于一个群体之中, 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惊慌、热情或者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道德良心相抵触, 与其利益也违背。在这种情况下, 他似乎已变成了另一个人。”<sup>[3](P25-26)</sup> 这就是大众人, 这种人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都雷同一致, 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个人生活、却把自己交给一个莫名其妙的他者来塑造; 这些人不谦逊, 不会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和才能, “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个人完全相似’”的人。<sup>[4](P7)</sup>

## 二

在价值方向维度上的主体性方面, 马克思仍然坚信“主体是人, 客体是自然”<sup>[5](P3)</sup>的主客二分法, 把人与自然的和解理解为人对自然的统治, 从而把理想社会建构在更深度、更科学地开发自然或从自然获取更多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 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内, 第一, 他虽然反对盲目、无节制地开发自然, 认识到对自然的开发有一个限度, 但这个限度仅仅在于不违背规律。只要遵循规律, 就应该更大规模地开发大自然、获取更大更高的生产力。理想社会就建立在更深度地开发大自然获取的巨大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第二, 他批评资本如此贪婪地开发自然, 以至于违背了上述限度, 但并没有走到理想社会应与自然达致和解从而不再统治自然的程度。他指望通过社会世界使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有一个过渡。而对这个过渡缺乏足够清晰的说明使得于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产生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逻辑空白。也就是说, 马克思没有、或缺乏足以连接两者的途径和手段。他只是说, 必然王国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多会为自由王国的到来准备更加雄

厚的基础。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已经表明，物化财富的增多并不一定促进自由王国的到来，反而可能继续使得物化局面更加积重难返。“这样，必然性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便只有量化意义和机械意义了，而完全被置于异化境地的自然，就像早期的神话一样，不仅具有了极权性质，而且把自由和社会主义一并吞噬掉了。”<sup>[6](P38)</sup>就像霍克海默所说，迈向自由王国的人类就像一个待发射的火箭。火箭属于必然王国，坐落在十足的必然王国大地上。自由王国需要与生命、自然协调一致。为了真理的斗争不仅是在社会中，也是在自然中。他把视阶级之间的和平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即把这两种和平、和谐看作一回事的思想当作是马克思的第三个失误。<sup>[7](P269-270)</sup>

用布伯的概念来说，马克思把传统的“我-它”模式改变为“我们-它”模式，但仍然没有真正走出“我-它”框架来思考问题，即过多地依赖于物质性工具性的“它”，指望“它”中所蕴涵着的物质生产力来支撑起担当历史使命的“我”或“我们”，从而尚未深刻触及“我-你”问题。在“你”是多样性的“你”的意义上，马克思对布伯所说的“我-你”问题的确触及不多。如果说有所触及，那也是在两大群体的意义上二分性地简化处理了“我-你”问题。这种不足也势必影响到他对群体的分析，对制度变迁的内在问题与复杂结构的分析，难免使这些分析陷入某种现在看来较为简单化的境地。

### 三

由内在理性支撑起来的个人注定不能普遍地完成自我拯救的重任。马克思在否定了个人主体自我拯救的逻辑之后转向了群体主体的自我拯救之路。一般而言，马克思之前的近代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在普遍、同质性的意义上谈论主体性的。如果说他们看到了这种普遍同质性个人主体只是在先验或抽象的意义上才是普遍、同质性的，那么在经验形态上并不存在标准化的主体，或者说，这种主体只有在现代性不断延展的意义上才能呈现出来，那么在现时的经验形态上，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类理性程度颇为不同的“主体”：

一是合乎其本质规定性要求的自主主体，理性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即使尚不具备启蒙他人的资格，也已经成功地被启蒙了。二是依赖于这种自主主体并多半能在进一步的启蒙教育过程中转变为自主主体的依赖者或学习者，如未受教育的儿童、妇女或其他愚昧者、精神病人等。这些人就其现时状态而言只是潜在的主体。尚未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但他们已经处在启蒙的范围之内，处在第一类主体的包围之中和引导、统治之下，可以指望他们通过一个学习训练过程而成为合乎本质性要求的主体。三是处于愚昧之中、尚未进入现代文明的外围人，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众。他们连学习过程也没有开始，虽然他们也具有理性培育的潜力，但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还颇为遥远，需要某种促进他们与文明社会紧密交流的历史过程才能加快他们成为主体的步伐。而这种历史过程在历史上常常是以血和火的残酷方式展开的。为了更多地塑造历史主体，不但需要在本国实施启蒙教育、义务教育，而且还必须通过“自由贸易”和征兵对不发达国家实施殖民主义入侵（义务教育、民主革命、自由贸易就这样奇异地与持续性地大规模征兵、殖民主义战争处在同一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启蒙思想逻辑中的普遍同质性主体起码可以分为以上三个不同的类别，但马克思显然不同意这样的分类，他主张的是一种不同阶级的分类差别。根据占有不同生产资料以及在社会中占有的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资源的不同，把社会性的人分类成几个不同的阶级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只有无产阶级通过联合才能完成启蒙思想家们赋予个人主体的那种自我拯救的历史任务。自我拯救之说如果说还能成立，就必须把主体的成立限度从个人转变为群体。但这个继续承担自我拯救重任的近代主体在变为群体性主体后，其内部构成仍然基本上是同质性的，就是说，群体仍然是由同质性的成员构成的。其主体品质依存于同样的阶级成员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等方面的共同性特质之上。这就造成了对主体异质性及其相应问题的忽视。这起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群体内在异质性的忽视。在现代性背景下，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经济学上的理性人。自我利益与群体利益常常并不一致和群体利益的获得每个群体成员都有份的情况就会导致每个理性人在面对群体利益时都试图尽量少地付出成本而尽量多地获取收益，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付出成本而分得集体利益。按照这种人人都试图“搭便车”的逻辑，“如果组成阶级的个体采取理性的行为，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sup>[8](P128)</sup>对马克思有很高评价的诺斯也说，马克思“简单地忽视了搭便车问题，而使人们的信念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认为人们将会置自我利益于不顾而按一个阶级的利益行事，甚至作出相当大的个人牺牲”。<sup>[9](P11)</sup>“参考群体”(reference groups)时代人们的群体意识还颇强，但在社会身份急剧多样化的背景下，群体的理性联合势必面临着更严重的“搭便车”困境。在一个群体中，随着空间和时间范围的扩大，异质性会急剧扩大并使群体的联合成本亦随之急剧增大。在个体和小群体身上能成功完成的联合，在更大群体身上则更难做到，在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那儿就更难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群体联合按照奥尔森和诺斯的逻辑似乎暗含着这样的设定性前提：第一，即使有个体或小集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冲突，也会优先选择群体利益和群体使命的实现。也就是设定了群体成员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中的道德善。第二，群体成员对本群体承担历史任务和使命具有理性认知，这种理性认知对个人来说优先于个体理性人那种自我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理性。群体的长远利益优于本人的暂时利益。第三，群体成员是同质性的个体，没有多样化之别。如果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舍弃了每个个体分别具有的不同社会关系而径直把个体视为抽象同一的人，马克思构想的群体中的每个人成员也都具有相同的社会关系而仍然是抽象同一的。用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话来说，“集团实际上被当作这样一个东西：仿佛它有一个头脑而有多重的肉体现身。”<sup>[10](P207)</sup>当然，这么说有些过分。实际上，恩格斯就谈到过无产阶级的分化与差别，并指出在英国出现了

“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sup>[11](P552)</sup>但对无产阶级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并没有再进一步的认识。列宁、卢卡奇等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进展。卢卡奇即使不同意别尔嘉耶夫关于统一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思维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观点，在晚年他也发现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整体，无产阶级中有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也有很多的默默顺从者，更有起破坏作用的小人。<sup>[12](P621)</sup>

何况，市场体制中不断培育和强化着的个人自为精神与理想在不断蚕食着群体联合。一方面，在存在生存机会的情形下，比起成本更大的反抗，服从既定秩序可能更被优先选择。<sup>[13](第四章)</sup>即使深陷困苦之中，在尚不存在消除之的现实可能性或办法之时，民众往往表现出巨大的忍耐潜力。这种忍耐力的保持就与获取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密不可分。托洛茨基在谈到民众对穷困的忍耐力时说过，“历史确实证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忍受两三倍的穷困”。<sup>[14](P746注)</sup>其实，不只是穷困，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公或其他困苦都是如此。“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消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sup>[14](P746)</sup>压抑在心底的“怨恨”会在出现发泄机会与可能时总爆发，而且往往采取异常激烈的群体方式——这又往往造成对发展的一种中断与毁坏。另一方面，本来，“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培育各种居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生气勃勃和自主的自治共同体”，孤立个人无法抗拒强大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存在着这样的社团共同体，但“与培育这种民主多元主义相去甚远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出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荒原。”<sup>[10](P180,181)</sup>这虽然不能说纯粹是市场逻辑毫不留情运作的结果，而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策深思熟虑的目标，但是，理性自为个体特别是其经济运作机制的确是构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尽管主张理性自为个体的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家并



不认为以工具行动为基础的个人自主模式能够和应该形成社会实践的普遍模式，而是多半把这一点限制在经济领域，如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但说他们没有或缺乏对政治哲学层面上个体主体与经济运作机制关系的认识、缺乏对经济运作机制的辐射效应的应有关注是能够成立的。说他们缺乏或不重视更多社团共同体的功能——除了只是重视民族主义和家庭这两个共同体之外，便没有其他了——无疑是可行的。

二是对社会中更多异质性身份的忽视。无产阶级只是一种身份，阶级群体只是一种群体。除此之外还有性别、种族等固定身份和各种“××族”等非稳固性身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实际上常常被人们视为优先于阶级和国际主义。<sup>[15] (P24)</sup> 单从利益角度来看，正如“左派”经济学家阿吉里·埃曼纽尔所分析的，由于全球各民族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贸易不平等，这种贸易的不平等交换构成了剩余价值被榨取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中心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从不平等交换中获益，即以边缘国家劳动力的付出为代价，这就明显地说明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劳动者的国际团结是不可能的”。<sup>[16] (P138-139)</sup> 所以，在如今的世界体系中，“总的说来，工会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者，学术界的左派更多的是国际主义者”。<sup>[17] (译者前言 P13)</sup> 由此视之，把阶级群体与理性、意识联为一体的见解在此不能不面临一种内在的困境，原本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认同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而发生分裂，似乎也恰恰证实了这种困境的威力。而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与理性、意识相对立的“无意识”对于阶级群体的巨大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甚至说阶级与性别和种族都是平等的身份，马克思主义可以与性别主义、种族主义相对接，而不仅仅与阶级有固定必然联系，<sup>[18] (P70)</sup> 这是有道理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左”派都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身份、新社会运动连接起来，也是更为现实的想法和做法。

这就引出了群体连接方式的多样化问题：情

感而非理性才是支配其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勒庞、麦克杜格尔、弗洛伊德等看来，群体的组成与运作都不可能那么合乎理性。运作中的群体往往因为人数的增多而产生一种群体效应——它使参与群体之中的个体失去处在彼此分离状态时的个体理性品质以及责任意识；一种情绪的相互感染和彼此间的暗示效应会从群体组合中凸现出来并左右群体的行为运作。这种更具非理性性质的群体运作主要靠思维简单、情绪感染或冲动取代理性、个人放弃自己对自己行动的自主权并把它交给他人（特别是领袖或群体）、短视、多变、偏执、总是寻求主子等方式来完成。因而，这种群体运作很可能产生的是专制甚至疯狂等消极结果。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对阶级这种社会群体的探讨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阶级群体理性运作的可能性，而大大地忽视了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所凸现的消极和负面效果。就是说，无产阶级从个体分离态转变到群体组合态时，受科学理论指导而理性地营造合理秩序、为社会全体谋求解放和自由的美好愿望可能会被某些凸现出的非理性力量吞噬掉，甚至走向反面（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陷入自己反对自己的矛盾之中）。这样一来，勒庞、麦克杜格尔、弗洛伊德等对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研究，以及阿伦特“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sup>[19] (P34)</sup> 的提醒就被看成尚未进入马克思 19 世纪思考的视野——这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对群体实践怎样防止专制、极权、暴力、单一的统治的注意与研究非常不够。

马克思非常看重理性资质在主体形成中的功能效果，以至于把工人视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虽然主体并不是个体性的，而是群体性的。个人作为阶级群体的一员会对预先给定的集体利益据有正确的认识，就像他所批评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分析个人主体时主张个人对自己的先定利益具有正确的认识一样。所以，在鲍尔斯与金蒂斯看来，马克思虽然认同社会性地构成个人的概念，但“这些洞见仍然没有以一种克服自由主义行动理论的弱点的方式得到发挥”。<sup>[10] (P188)</sup> 就是说，自由主义无视集体行动的中心地位；而马

克思则把集体行动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种简单不但表现在轻视异质性上,也表现在过于简单地看待了、或本质主义地对待了话语、经济等社会现象——比如把话语看作经济结构的简单表达,没有看到它是社会斗争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具有变动性、复杂性而没有本质主义设想的那种一劳永逸、永恒不变的本质——并且一旦把握到这种本质就把握到了历史变动的根本方向和历史如何向前发展的决定权。鲍尔斯与金蒂斯继续批评道,话语不是经济构造的表达,而是与社会斗争的实践活动过程相关。“在创造和改变政治的‘我们’与‘他们’的过程之中,语词、手势、纪念碑、旗帜、服饰,甚至建筑发挥的重要性不亚于人们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工人或母亲身份所发挥的作用。”<sup>[10](P199)</sup>对此萨林斯也作出过类似的批评。<sup>[20](P17-26)</sup>鲍尔斯与金蒂斯写道,“作为社会原动力元素的话语结构的重要性在社会理论里通常被大大地淡化了。我们认为,这种淡化的基础是对处于与意识和文化联系之中的交往的绝对地位的基本误解。”<sup>[10](P201)</sup>话语是人们内心观点、态度和思想情感的外在表达,它只是由内在状态向外在状态过渡的通道。这种古老的假定中蕴涵着外在行动是内在观念的表达和反映的本质主义二分法逻辑。20世纪语言哲学的进展已经把语言看作传达信息的中立的约定体系。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话语工具也有多种用法,它们是通过实践得到改变的。“意义依赖用法,用法是时时处处变化不定的。”(维特根斯坦)<sup>[10](P215)</sup>

看来,鲍尔斯与金蒂斯的如下观点值得我们深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把个人的社会构成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有关个人和社会行动的替代概念,后者能够论述民主文化和共同体的种种关切。”他们认为,“出于极其不同的理由,情况并非完全如此”。<sup>[10](P187)</sup>如果我们想用这个“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反过来评价鲍尔斯与金蒂斯的上述结论,就必须针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切实的研究,付出更多的理论努力。

#### [参考文献]

[1] 刘森林. 近代主体观念的社会性重建 [J]. 教

学与研究, 2005 (2).

[2] 阿伦特. 人的条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 Serge M oscovici *Das Zeitalter der Massen* [M]. Fischer Verlage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6

[4]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7] M 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M].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1

[8]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9]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0] 鲍尔斯, 金蒂斯. 民主与社会主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1] 恩格斯 1858年 10月 7日致马克思的信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2]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下卷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3] 参见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4] 转引自费正清等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5] 参见哈耶克编.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6] C·P·欧曼, G·韦格纳拉加. 战后发展理论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17] Bruce Robbins, Feeling Global p 173 参见布鲁斯·罗宾斯.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8] 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像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9] 阿伦特. 极权主义 [M]. 蔡英文译. 中国台北: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2

[20] 刘森林. 实践的逻辑与哲学终结的困境 [J]. 现代哲学, 2002 (3).

责任编辑: 何蔚荣 罗 苹

# 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 王新生

[摘要] 对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而言, 在政治正义的限度内寻求对人和社会的终极解释, 已经成为替代宗教解释世界的现代方案。可是, 这一现代方案不仅取消了对终极自由的渴望, 从而自构了伦理困境。黑格尔洞察到现代性的伦理难题, 试图用一种“补偿性方案”克服之, 却又陷于对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抽象肯定。马克思建立了在历史的实践中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从而确立了一种颠覆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正是这一政治哲学的确立, 为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立脚点, 为他走向实践哲学建立了基本通道。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哲学 超越政治正义 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61-07

长期以来,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大概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方面, 马克思关于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实践观点尚未确立的时期, 因而也就常常被看作是他的哲学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偶然性环节而遭到忽视。另一方面, 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 马克思关于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被简单地当作唯物史观的一部分, 因而作为对社会生活进行正义追问的政治哲学, 就失去了其独立地成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地位和意义。人们甚至怀疑,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否能够容纳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讨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传统理解中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 因为对于坚持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简单的决定论的观点来说, 为应当的人类生活进行伦理的辩护是与它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理论相抵触的。可是, 在关于哲学的实践转向的讨论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今天,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应引起哲学界的高度关注, 因为这关涉到怎样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性的重大问题。

## 一、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sup>①</sup>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哲学观

我国近 20年来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讨论, 可以说主要是一场以各种不同的理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加以强调和进行诠释的思想运动。可是, 在这场观点纷呈而又讨论热烈的思想运动中, 人们似乎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即马克思的哲学是在与近代主流政治哲学的对峙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表面上看, 人们似乎也关注马克思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黑格尔法哲学所进行的批判, 但一当涉及到马克思的哲学观, 这一批判便因其理论上的过渡性质而变得无关紧要了。至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等正义理论所进行的道德追问, 就更不能算作是哲学的追问了。这种忽略或许不是有意的但却绝不是偶

---

作者简介 王新生,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 300071)。

① 本文中所谓的政治正义, 是指正义的一种实现方式和限度, 是指以政治活动的方式在政治活动的范围内达致的正义。但是, 政治总是历史的, 马克思力图超越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的正义诉求。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因其对社会主义正义的追求而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正义, 因此, 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本身就是超越政治正义的实践活动。

然的，它是将马克思哲学学院化的倾向中必然附带的“理论遗忘”。与这种倾向相反，笔者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性，只要遗忘了它在形成过程中所依赖的伦理关怀，就只能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理解他的哲学变革，就不可能懂得他关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将近代政治哲学欲在现实的政治秩序内实现政治正义的终极理想和马克思欲超越这样一种终极理想的正义观相比较，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实践哲学何以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同时也就还会以他一贯反对的方式不断建构一些“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就此而言，我们强调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在强调对一个具体领域中存在的哲学问题的关注，而是在强调从一个特殊的视点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性。

究竟应当怎样从政治哲学的特殊视点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性呢？或许我们应当求证于马克思较早的文本，但在这里我们仍然要首先求证于人们已经一再求证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sup>[1] (P54-57)</sup> 因为这样做会消除因文本依据的差异而引起的误解和分歧。不过，与以往人们对《提纲》的解读不同，本文将采用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倒序的阅读方式。在阐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此做些简单的说明。首先，采用这种阅读方式取决于一个假设，即那著名的 11 条并非一种随意的罗列而是一个序列，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从前至后的叙述逻辑；其次，采用这种阅读方式是为了显示马克思的思维逻辑，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叙述的逻辑恰恰就是倒置了的思维的逻辑，《提纲》就是如此；第三，采用这种阅读方式是因为它能够使本文的论题获得更清晰的呈现。

在《提纲》的最后一条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 (P57)</sup> 这被理解为马克思新哲学的宣言。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所要改变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它将立足于怎样的世界去改变世界？显然，这是在宣布新哲学之前就应当确定的，是建立新哲学的立脚点。因此，马克思在《提纲》第 10 条和第 9 条中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sup>[1] (P56-57)</sup> 可见，马克思首先是在确立了不同于“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新的立脚点之后，才开始谈论“改变世界”的新哲学的。也就是说，这一新的立脚点是新哲学之所以区别于旧哲学的前提，不理解新旧哲学在立脚点上的这一区别就不可能理解新旧哲学之间的区别。认识到这一关联是重要的，不过，问题的难点显然不在这里，因为要想说明新的立脚点对于新哲学的重要性，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新哲学，而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的旧哲学则是“解释世界”的哲学？笔者以为，只有通过对比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与欲在政治正义的限度内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比较，这一问题才能够得到清楚的说明。

对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而言，在政治正义的视野内寻求对人和社会的终极解释，已经成为替代宗教解释人类生存问题的惟一方案。在这一新的解释世界的方案中，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戳穿，原本存在于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市民社会与政治正义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所取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消除了生存的矛盾而达到了终极自由，而只是“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罢了。<sup>[2] (P174)</sup> 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建构了理解世界的一种现代模式。这种模式试图以不同于宗教的方式，重新把握人类生活中无法消除的紧张和冲突，即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这一现代冲突模式中，市民社会在伦理上的不完善替代了原本的世俗世界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现在只能通过政治正义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克服。因此，在除魅后的现代世界中，人的终极自由以及体现这一自由的生存方式就只能靠政治正义来落实，除此之外人类不能有更高的奢求。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无论它们以何种抽象的语言和特别的论题表达其内容，最终都只是这种立足于市民社会之上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所以说这些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就是因为它们把自己建构的这一冲突模式看作是终极的和亘古不变的，因而只是把它看作审视、省察和言说的对象，而不是看作改造的对象，因为改造本身就意味着

与主体活动相关的突破和超越。

可是，马克思确立的超越政治正义的哲学立场，却为他的整个哲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立脚点。这个新的立脚点越出了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类型及其所要求的伦理原则，因而超越了政治正义的视野，也突破了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所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跳跃，因此只能通过一种全新的哲学来完成。由于这种新哲学所主张的超越性原则本身就是超越性活动的“头脑”，因此它不是站在历史活动之外来解释历史，而是作为超越性活动本身参与“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新哲学所要改变的那个“世界”，就是作为旧哲学的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它所从事的那种改变世界的“活动”，就是超越政治正义的历史实践活动。如果不需要超越市民社会的实践，也就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正如麦金太尔正确理解的那样，在马克思的《提纲》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核心的立场：“市民社会仅借助于理论是不可能克服的，其局限也不可能被恰当地理解和批判。这一理论是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它只能被一种特殊的实践所克服，这种实践是由植根于该实践中的特定的理论所决定的。哲学家们试图去理解它，但它们的理解并不是为了以必需的方式去改造这一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提纲》第 11 条并没有告诉哲学家们放弃去理解世界的企图，而是告诉他们，指导他们理解任务的则是一个特定目的的实现。”<sup>[3]</sup>

以最直观的眼光看，在《提纲》中马克思大致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第 1-8 条中，指出了旧哲学的基本缺陷，说明了新哲学的基本特性；第二，在第 9、10 条中，阐述了新旧哲学在立脚点上的区别，因而也就说明了它们区别的原因；第三，在第 11 条中，明确宣布了“改造世界”的新哲学与“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根本对立。如果倒着阅读，我们或许可以对《提纲》中的思想脉络进行这样的表达：新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这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立脚点上；因此，它有着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实践特性，这也使它与以往的一切哲学区别开来。在这样一个简化的图式中，马克思所确立的新的立脚点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是理解他新唯物主义的前提。在这个图式中，我们一贯重视的马克思对实践特性的强调，只不过是对在最后 3 条中才明言的那种因果关系的具体展开。因此，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最后 3 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后，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在前 8 条中对其哲学观的阐述。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中的那个“世界”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要“改变”这个世界，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新哲学为什么是“改变世界”的。一方面，马克思并不是抽象地谈论改变世界，他所要改变的那个世界就是他所要超越的那个“市民社会”及其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由于旧哲学属于这种社会意识，因而它必然作为一种哲学与新哲学相区别；由于旧哲学只是想在政治正义的限度内解决人类问题的政治哲学，因而它只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不是站在任何立足点上谈论“改变世界”的哲学的，只有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立足点上，新哲学通过与它的“物质武器”相结合而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才变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超越政治正义的哲学批判才能够造成世界（市民社会及其制度和意识）的改变，新哲学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说：“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sup>[2] (P200)</sup>新哲学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就是因为它通过揭露国家这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而使自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

应当说，马克思早期的政治哲学研究，是他走向实践哲学的基本通道，是他建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基本立足点。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确立一种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立场，即确立一种超越于政治正义之上的政治哲学对于建立一种新哲学的重要性，尽管这一认识在当时还只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不自觉地摸索到的。他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



决的那些课题。”<sup>[2](P207)</sup>在《提纲》中，马克思同样是立足于政治哲学的考虑，进一步认识到，一种以改变世界为使命的新哲学只有超越了旧哲学的立脚点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因为对于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旧哲学来说，“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旧哲学并不是因为想要解释世界才成为旧哲学的，而是首先因为它缺少超越于政治正义之上的伦理立脚点。这使它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直观的对象，无法理解改变世界的意义，因此只能成为“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也并不是因为想要改变世界然后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而是因为首先确立了一个值得追求的正义目标，然后才建立“改变世界”的哲学的。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显明的道理，可是，在一些对马克思哲学非常“哲学化”的解释中，这一点却变得模糊难辨了。难怪人们会将这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说成是“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难怪人们会感到他们把马克思哲学变成了苍白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些人总是力图通过对“世界”和“实践”概念的学院式解释，把马克思从他的立脚点上拉开，使他变成一个远离政治的哲学家。似乎经过了哲学魔杖的点化，就能消除过去简单地附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革命话语。殊不知，能够使那种简单化的革命话语发生“哲学的转换”的恰恰是解放的话语，因为简单化的革命话语本身就是从对解放话语的非哲学理解中生发出来的。

## 二、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性的伦理困境

以往，我们对《提纲》第10、11条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没有认真理解“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将它们解读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不揭示出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类型及其所具有的伦理精神之间的差异，就难以避免对马克思思想的流俗理解。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直接继承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则是在对近代自由主义伦理观念的反思中建立起来的。在黑格尔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在德国但却至少在英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深刻后果是社会关系的变迁和与这种变迁相随的伦理观念的变迁。作为对这些变迁的反应，自由主义颠覆了对人的传统理解，将人看作是独立于每一个他者的自足个体。这种原子式的个体在道德上的自主性，不仅因其自主而对立于自然，而且也因其自主而无需求助于上帝、共同体，只需求助于理性。这样一来，把世界看作是上帝设计之秩序，把个体看作是共同体的一部分的传统观念就被合理地排除了，原子式的个人之间的契约性结合就成为理解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所肯定的“社会”，就是艾德蒙·佛格森（Edmund Forguson）明确表述而洛克未曾明确表述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这样理解的社会秩序中，国家只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工具性的实体，而不像传统共同体那样承载着伦理的价值。于是，在对人和社会的现代性理解中，“普遍伦理”和上帝一道消失了，原子式的个人成为世界的支点；人只能在市民社会中追求个人意志的实现，在政治国家中寻求政治正义的伸张，而不能指望更高的善。

黑格尔沿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这种理论区分，但却试图挽救这一区分中失落了的“普遍伦理”，并以之消弭市民社会中无限扩张的个人欲望所导致的社会差异与冲突。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相互冲突的特殊意志在寻求其特殊性实现时必然发生相互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无法通过其自身得到解决。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中“普遍伦理”的缺失。黑格尔并不反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相反，他认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sup>[4](P11)</sup>自由意志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他洞察到了（至少是早期的）自由主义理论所未能看到的伦理难题：当善需要以个人为基础加以规定时，怎样将个体的道德自主与社会的伦理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为现代社会中无限增长的个体理性在追求道德自主的冲动中找到一个稳固的伦理根基？他认识到，市民社会所达到的意志自由必然导致人的本质和伦理精神的异化，因而是必须被超越的。黑格尔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因为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来的社会联合只是利益的联合，它与“社会的人类”所要求的伦理关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不把克服这种冲突作为一种伦理目标，就无法追求人的完善；不追求人的

完善，就等于认可了物役的合理性；而承认物役的合理性也就等于放弃人的自由，等于最终否定了人的存在的意义。这实质上是自构了伦理困境。可以说，从自由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这一根源于现代性自身的伦理困境，始终是它挥之不去的阴影。查尔斯·泰勒把黑格尔的理想归结为“对绝对自由的渴望”，认为它根源于克服现代性缺陷的诉求。但与许多人不同的是，泰勒同时反对将这种渴望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而是将其看作是对现代性的补偿。他说：“对绝对自由的渴望可以看作是补偿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的这个缺陷的一次尝试，是为了某人对社会的认同寻找根据的一次尝试。那个渴望充分地体现在现代主体性精神中。在社会成为我们的创造物的强烈的意义上，并且在它是我们的最好创造物并且是我们的最真实的创造物——我们的道德意志（卢梭、费希特）或我们的创造活动（马克思）——的意义上。……因为再一次地，社会将反映或体现某个绝对的价值。只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宇宙秩序，而是与现代革命相一致的、绝对的人类自由本身。”<sup>[5] (P632)</sup>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泰勒认为，正是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中介作用，他说：“由于他（黑格尔一作者注）把卢梭和康德的激进自由主体性要求同源与赫尔德的表现主义理论连接了起来，这为马克思思想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背景。”<sup>[5] (P632)</sup>这无疑是有见地的。这提示我们，马克思是在试图克服现代性所自构的伦理困境的意义上，将旧哲学的立脚点指认为“市民社会”的；这也提示我们，只有在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中，在作为近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一种替代性方案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新哲学的立脚点，才能被合理地理解为是对“市民社会”这个旧哲学的立脚点的超越。

可是，对于阐明马克思的新哲学来说，揭示他对黑格尔的超越和揭示他们之间的联系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在黑格尔止步的地方马克思走向了新哲学；正是在黑格尔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弥补现代性的缺陷时，马克思却站在激进的立场上颠覆了现代性，建立了一种替代性方案。黑格尔看到了现代性的伦理困境，却又将走出这一困境的最终希望寄托于国家。他认为，国家并不是因契约而联合起来的工具性实体，而是代表了最高的善的“最终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地上的神”是“神（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在规定着普遍生活的；他们进一步的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出发点和结果。”<sup>[4] (P254, 258, 259)</sup>总之，在市民社会中追逐特殊利益的个人，在国家中找到了作为社会化的人应当皈依于其中的普遍伦理。马克思说，这样，“黑格尔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内在的目的。国家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据说就在于个人对国家所尽的义务和国家赋予他的权利是同一的。（因而，例如，尊重财产的义务同对财产的权利是吻合的。）”<sup>[2] (P9)</sup>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个政治联合体的国家并不能为人的自由提供终极的保障，因为它只诉求在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正义的范围内实现自由。对自由的理解必须超越这些本身就是其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真实的自由只有在超越这些意识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够实现，而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揭示并实践这一真理。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黑格尔抽象地肯定了国家的地方，马克思否定了抽象的国家；在黑格尔止于政治正义的地方，马克思超越了政治正义；在黑格尔背叛了自己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地方，马克思继承了这一方法。正如美国学者亚当·赛里格曼指出的：“马克思追随黑格尔，试图结合私人领域（个人利益存在于其中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政治的考虑）。不过，与黑格尔相反，他把这一结合体看作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而进行的说明，而不是具体化为真实的存在状态。”<sup>[6] (P45)</sup>

### 三、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唯物史观

肯定马克思哲学以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为立脚点，是否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诉求相矛盾？这是颇有价值的理论忧思。因为马克思本人在1845年之后不仅很少涉足伦理道德和政治正义问题的讨论，而且他还的确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的批判，反对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的辩护。这使许多人坚

信马克思认为说明一种正义立场是不必要的。换言之，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依其必然性而达到的结果只是一种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科学结论，与人的价值诉求无关，因此也与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的正义立场无关。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反对进行这样的道德论辩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已经制造出了旨在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提供辩护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如果把辩论引向道德论证的领域，就会使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去转移工人的注意力并妨碍他们去从事革命任务。”<sup>[7] (P304)</sup>

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它们所引发的理论讨论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可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无需再对未来的生活进行应当的伦理责问？肯定历史的发展应当合乎某种正义的目标会导致目的论吗？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些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然而，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将这些问题重新摆在我们的面前，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它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或许当代政治哲学史家金里卡的说法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当过去的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是必然的（inevitable），就没有必要去解释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合意的（desirable）”可是，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来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就要说服人们并使他们相信，值得追求这些理想是因为这些理想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sup>[7] (P304-305)</sup>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不久，伯恩施坦、福伦德和考茨基等人就围绕着是否应当对其进行一种伦理学的“补充”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伯恩施坦等人以其“伦理的社会主义”为依据，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都不能使自己与伦理观相分离，即必须建立在某种正义观念的基础之上。而考茨基等人则站在其“科学的社会主义”立场上认为：“科学只与认识必然性有关……伦理应该只是科学的对象……科学高于伦理学，它的研究结果与必然性一样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sup>[8] (P196)</sup>不过，这些争论并没有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继续下去，因为伯恩施坦等人为社会主义进行伦理辩护的哲学和他们的其他观点一样，因被归入于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而很快被人们“理论性地”遗忘了。可是，在最近20年中，在一贯对马克思哲学保持沉默的英美哲学中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重新将政治哲学中的正义、平等、自由等伦理问题变成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问题。柯亨、胡萨米、伍德、布伦克特等一大批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甚至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在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念时，也对马克思没有沿着《提纲》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发展出“适应于反抗的道德所要求的一种善和诸多的德性概念”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工人的实践形式”而感到遗憾。<sup>[3]</sup>在这些同情甚至自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看来，为社会主义进行伦理的辩护比在遥远的未来验证其历史的必然性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像是一种哲学的辩护。这些见解未必都是合理的，但是，它们的存在的确表明在今天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探讨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的政治哲学，就是要探讨他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显明性而从未遭到过忽视。可是，当从理论上细致分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人类解放理论和以正义理论为基础的人类解放理论之间的差异时，问题就变得扑朔迷离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关涉到对人类终极自由问题的理解。在现代哲学中，“终极”是刺耳的，就像“超越”是刺耳的一样，因为它们都极容易将问题引向宗教救赎和思辨的形而上学所欲求的那种彼岸关怀。但是，新旧哲学的区别也正在这里。当旧哲学在以经验实证的或抽象思辨的方式考察终极自由时，马克思却将它置于历史的和实践的视野中加以理解。这就使他所理解的“终极”和“超越”根本区别于旧哲学。对于旧哲学来说，“终极”和“超越”只能意味着彼岸；对于马克思来说，彼岸和此岸是因人的实践而相通的，也是因实践的历史性而连续的。在马克思那里，“终极”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就意味着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的生存。如果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生存方式的话，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这一点。当马克思说“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时，他实际上是说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才能理解自由；当马克思说“人类社

会或社会的人类”时，他实际上说的就是一种能够体现人之终极自由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如果说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中为人的解放提供了一种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式的科学论证的话，那么，这一论证无疑是建立在上述政治哲学的正义立场的价值指引之上的。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因要求一个更高的善而否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追求政治正义的必要性，因为在他那里这种追求本身就是超越政治正义的历史实践的一部分。其实，对于马克思而言，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只是他的政治哲学的一个超越性层面，另一个层面则是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并不像考茨基等人所说的那样，由于马克思将道德看作是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因而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对现实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进行伦理断定的问题。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马克思即使不为奴隶的被奴役和工人的被剥削而欢呼，至少也应该对之置之漠然，因为它们都只不过是客观的事实而并非不正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冷漠的看客形象不属于马克思，而是属于那些把马克思当成技术型的经济学家和简单经济决定论者的人们。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尺度和道德的尺度、超越的层面与现实的层面从来都没有混淆过，也从来没有机械地分离过。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强调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强调超越现实秩序的正义并不是要取消现实秩序，而是强调应当在超越的正义立场上批判性地理解现实秩序。

就伦理关怀而言，终极自由无疑是一种悬置的理想而不是一个具体化了的事实，因此，超越于政治正义之上的正义关怀也就不可能是对现实伦理准则即时的具体否定，而是对它的超越性批判。人类因不断完善自身的需要而需要这种批判，世界也因从未达到过终极的善而需要这种终极的关怀。所以，人之所以需要终极自由和超越性的正义是因为现实的不完善，而不是因为人要把这个悬设的目标变成当下合理的存在。在伦理上，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摆脱完善论的诱惑，但即使是最具幻想精神的宗教也乐于承认，完美天国的存在只是为了昭示俗世的丑恶。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揭露了“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所以，他所渴望的终极自由和期许的超越性正义绝不是彼岸神圣形象的现实化，而是引领着人们实现其理想的价值承诺。

当然，全面地阐述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及它与实践哲学的关系，无疑将是一个挑战性的系统工程；它也一定会像历史上曾经发生和当代西方正在进行的那些争论一样，产生出众多的理论分歧。这是因为，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而且必将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涉及到如何发展和实践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如果确如麦金太尔所说，在马克思的《提纲》中展示了其哲学未能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那么，丰富和发展这种可能性所包含的理论内容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最好发展呢？这种发展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的实践所迫切需要的呢？我们不想简单地肯定麦金太尔，或许他借助于马克思表达了过多的社群主义理想。但是，如果这些理想中包含着一些通向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通道的话，我们又何妨不借助于这些通道探索走向马克思的路径呢？

(本文受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麦金太尔.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条未走之路 [J]. 国外社会科学，1995 (6).
- [4]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5] 查尔斯·泰勒. 黑格尔 [M]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
- [6]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M] .New York, 1990
- [7] 维尔·金里卡. 当代政治哲学：上册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 [8] 考茨基.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 [A] .余文烈. 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M] .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何蔚荣



· 哲 学 ·

#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越迁

◎ 马捷莎

[摘 要] 黑格尔建立了世界历史的理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 并对其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科学性上,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从黑格尔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越迁。在实践性上,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越迁。

[关键词] 马克思 黑格尔 世界历史理论 科学性 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5) 03- 0068- 04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世界历史理论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而达到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和互相胶着的整体化状态, 旨在研究人类在超越了狭隘民族地域界限后的历史发展。因此, 它是揭示历史发展特定阶段规律和趋势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并非世界历史理论的开山。此前, 黑格尔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但是,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相当的局限性。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 并对其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

## 一、在科学性上,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从黑格尔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越迁

在黑格尔之前, 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 历史的发展基本上都被视为无规律的状态。历史发展要么是神的意志的体现, 要么是伟人的意志的产物。黑格尔第一次以理性的方式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规律、本质和动力等问题。

第一, 关于历史的过程性问题。黑格尔将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考察历史, 把以往看似孤立的历史发展视为一个从东方到西方演进的世界性的历史行程。因之, 黑格尔阐释的历史就不是狭义的某个国家某个阶段的历史, 而是在宏阔的世界视野中的历史; 不是五光十色的历史事件, 而是具有普适性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 使历史发展具有了世界意义的第一人。

第二, 关于历史的规律性问题。黑格尔认为, 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砌, 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的。历史的发展服从某种法则, 呈现出有规律的演替。而历史演进的过程与太阳的行程是一致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而人类历史也从东方开始, 沿着从中国起始, 经由希腊和罗马, 完成于日尔曼的轨迹, 从低级向高级递进, 普鲁士德国则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第三, 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动力问题。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动力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体现为“民族精神”, 又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而体现为“世界精神”, 而世界精神的本质即自由。他说: “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 世界历史 - 是属于‘精神’领域”,<sup>[1](P54)</sup> “‘精神’却是依靠

---

作者简介 马捷莎, 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自由’。”<sup>[11](P56)</sup> “‘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上的。”<sup>[11](P503)</sup> 这即是说，世界历史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发展程度，而其不同的发展程度正是由于“自由意识的不同程度”决定的。因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即使不符合时代精神，但是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也必定符合世界历史的某一特定阶段的时代精神。而且，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将被“自由概念”所统摄并最终达到世界历史的共同发展程度。

黑格尔将分散凌乱的历史理论用世界性的尺度来梳理，并将其规律化，使其世界历史理论达到了以往历史哲学难望其项背的高度。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方面，他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归因于绝对精神，未能超出唯心史观的藩篱。另一方面，他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终结于普鲁士德国，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倾向。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合理内核，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改造了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世界历史理论走向了科学。

第一，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即历史的世界性和规律性。首先，关于历史的规律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即唯物史观的前提之一即是认为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sup>[21](P12)</sup> 其次，关于历史的世界性。马克思于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之后他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动力，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等各个角度全面研究世界历史，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

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克服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形而上学性。黑格尔是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证法思想家，但是他的辩证法在其历史哲学中并没有贯彻到底。原因之一是其欧洲（日尔曼）中心主义在作祟。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起点是重合的，即是说，从人类迈入文明门槛之始，即开始了世界历史。但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有高级低级之别，从低级的东方历史发展到高级的欧洲历史，在日尔曼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历史由此而进入了完美的境界，如果说有什么发展，也只能在这种境界中循环，而不再有新形态的飞跃。在这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成为其欧洲中心论的政治哲学的注脚，就如19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拉布里奥拉所说，历史“一开始就具有某种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sup>[31](P109)</sup> 由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不可避免地历史辩证法陷入了历史形而上学的泥淖。这是一个思想巨擘的悲哀。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并非源于人类文明的发轫期，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他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sup>[41](P114)</sup>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有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sup>[41](P89)</sup>的过程。这样，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欧洲并不是世界历史的顶峰和终结，而是世界历史的发端。世界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并终将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第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克服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他的自然哲学一样，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在黑格尔看来，由于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是受绝对精神支配和控制的，因而整个世界的本质就是绝对精神。马克思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哲学颠倒了过来，将世界，包括历史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并不是绝对精神的运演，而是生产力的推动。他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sup>[41](P68)</sup>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sup>[41](P88)</sup>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

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sup>[41] (P89)</sup>

## 二、在实践性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越迁

黑格尔创立了哲学史上最为宏大的哲学体系，在这个精神宝库中蕴藏着后人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黑格尔是一个书斋型的哲学家，他的极其深奥的范畴运演、纷繁复杂的推理过程和严谨缜密的逻辑架构，只是为了向世人昭展他所认定的穿透现象世界的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只是建构其庞大哲学体系的一个环节，因此其整个思想体系包括世界历史理论都不具有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分水岭。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可以具有两个视角：其一，从哲学的基础上看，实践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无论是世界观、历史观，还是认识论、方法论，马克思哲学都一以贯之着实践的观点；其二，从创立哲学的目的上看，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他的全部理论一样，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而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践性突出表现于为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学和东方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灾难，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sup>[51] (P438)</sup>但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由于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就为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了历史机遇。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落后国家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卷入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中。因此，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转移的结果。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sup>[41] (P276)</sup>“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41] (P277)</sup>由于资本主义使世界连成整体，因此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就超越了国界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其国内发展空间日益缩小。由于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无限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不断向海外扩张，从而造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化，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落后国家中去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转移，不仅引起落后国家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引起这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深化，阶级矛盾加上民族矛盾，使得落后国家的矛盾空前加剧，从而在这些国家首先形成了革命形势。

第二，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落后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这种机遇既表现为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利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成果，也表现为可以直接受到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一个基本事实是，没有西欧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十月革命的发生。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产生。拉布里奥拉曾说过：“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的历史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换言之，那些对某个社会内部矛盾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由于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而总是愈来愈复杂……例如内部困难常

常促使某个社会或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sup>[3](P111)</sup>按照拉布里奥拉的观点，整个历史都是在内部和外部冲突中发展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由于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规模不同，因此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的规模。在古代，内部和外部冲突主要表现为部落之间的冲突，后来又发展为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历史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因此使“外部冲突影响内部关系的改变”这种历史现象发展为世界性的规模。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突破国界，影响了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革命。

第三，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形成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在落后国家形成了无产阶级。又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超强经济剥削，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从本国转嫁到了落后国家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假如从一国范围孤立地看，中国确实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但是，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观点来看，中国恰恰是在世界历史中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以作为资本的国际生存条件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非人道的历史进程。在资本主义向世界的进军中，究竟有哪一种灾难没有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面临绝境的中华民族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殊死搏斗中孕育锻炼出了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从而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sup>[6](P7)</sup>

第四，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2](P11)</sup>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血与火铸成的历史，减轻新社会分娩的痛苦。但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不经历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过程。建立在落后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不同，是一种低级的社会主义。因此，它更加需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迅速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当前，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比如，苏联的解体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也是因素之一。斯大林当初就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观点，没能作到对外开放，也没有巩固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物质基础尽管远远落后于苏联，但是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已经走上了繁荣昌盛之路。历史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是在跨越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否则，就可能重返资本主义老路。历史还充分说明，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跨越的只能是社会制度，而不能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阶段。

####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历史哲学 [M]·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安东·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M]·杨启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6] 刘奔·哲学研究，1987，(5)。

责任编辑：罗 苹

# 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一种方法论反思

◎张亮

[摘要] 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卢卡奇研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方法论问题。由于思想内部存在着认同的因素，卢卡奇最终在中年以后与斯大林主义达成了“被迫的和解”。而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卢卡奇后来的思想发展，使之陷入一种可怕的思维成式之中，丧失了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现实与理论（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的理论）的能力。卢卡奇晚年自传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自我辩护，其本意是为了自我澄清，但客观上却起了一种自我遮蔽的作用。研究卢卡奇首先必须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关键词] 卢卡奇 晚年自传 斯大林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72-07

和同时代许多重要思想家一样，晚年卢卡奇也曾留下相当数量的自传文献，<sup>①</sup>对自己经历过的思想和事件进行说明和自我评价。这些自传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晚年卢卡奇为自己早年、青年和中年时代发表的各种作品所撰写的新版序言或后记，如“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1957年后记、《小说理论》1962年版序言和《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英文版序言等；第二类是他的自传准备材料，即1971年的“经历过的思想：自传笔记”和“自传对话”；第三类是晚年卢卡奇会见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英国等国记者时留下的一些访谈录。研究卢卡奇当然要关注这些自传文献。但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在怎样理解和运用这些文献的问题上，学界实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具体地说，凡是认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是卢卡奇一生哲学思考的顶峰和对20世纪人类思想最重要的贡献的学者，都会毫无保留地重视这些文献，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研究；<sup>②</sup>而凡是认为

---

作者简介 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江苏 南京，210093）。

① 在卢卡奇的思想分期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见解。卢卡奇本人（Georg Lukács “Gelebtes Dankert Notes towards an Autobiography”, *Record of a Life: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Verso, 1983, pp. 143-170）、曾深受卢卡奇思想影响的詹姆逊（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7-138页）以及前苏联官方哲学家（别索诺夫、纳尔斯基：《卢卡奇——哲学家与社会思想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4期）都曾对此发表过不同的意见，但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主要还是卢卡奇的学生扎尔坦·塔尔的分期方案（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40页）：“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时期（1885-1918年）；救世主式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19-1929年）；斯大林主义时期（1930-1945年）；批判的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45-1971年）。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分别称为早年卢卡奇、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晚年卢卡奇。

② 例如国内学者所撰写的两部卢卡奇思想传记就是如此。参见宫敬才：《睿智圣殿的后裔：捷尔吉·卢卡奇》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西平：《卢卡奇》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历史与阶级意识》方才代表了卢卡奇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的学者则对这些文献保持着一种谨慎批判的态度，认为“不能囫圇吞枣地对待”它们。<sup>[1](P301)</sup>由于晚年卢卡奇的自传文献是直接支持第一种观点的，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因此批评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没有看到卢卡奇本人的态度，<sup>[2]</sup>其言下之意是：既然卢卡奇都这么说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自以为发现了真理，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传仅仅从文字上表达了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反思”，<sup>[3](P30)</sup>“任何自传：主观的；不是从社会情境中来看人的一般发展——而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展示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他自己或者如何没有能够成为他自己的。”<sup>[4](P143)</sup>对于卢卡奇而言，这个“给定的情境”就是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复杂纠葛。如果对卢卡奇的研究不能够利用客观的思想文本和传记文献对其晚年自传进行必要的修正，那么，卢卡奇就只能被封闭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种充满政治辩护色彩的自传阴影之中。

### 一、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被迫的和解”

1958年，卢卡奇出版了题为《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的论文集。卢卡奇本人出版这一文集的目的是想批判现代主义的一切表现形式，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文集的出版恰恰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中年以来的思想进行严厉批判的契机。阿多诺、多伊彻、齐塔、里希特海姆等人纷纷发表评论，批评卢卡奇偏离其青年时代所确立的正确方向，与斯大林主义达成了“被迫的和解”。<sup>①</sup>一些激进的新“左”派更是抨击卢卡奇已经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了，虽然还有一些保留和限制。<sup>[5](P61-82)</sup>今天，我们面对上述批评时自然会有所保留，因为在卢卡奇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为代表的晚年著作中，我们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发展中超越斯大林主义、向着其青年时代回归的新趋势。<sup>[6]</sup>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卢卡奇二战以后出版的理论作品中，他对斯大林主义的认同是一个不能掩盖的事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年和晚年卢卡奇是否与斯大林主义发生了思想认同，而在于这种认同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对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学界始终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卢卡奇认同斯大林主义完全是一种被迫的、策略性的政治反应，<sup>[7](P15)</sup>因为他要想继续留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就必须屈服。<sup>[8](P26)</sup>这种观点的肤浅性就在于它只是看到了矛盾的一个方面，即来自共产国际高层对卢卡奇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忽略了矛盾的另一面，即卢卡奇思想中的认同基础。事实上，作为一名出身豪门、富于反叛精神的理论家，卢卡奇没有理由仅仅为了一种必须远离政治的政治生命而进行违心的理论妥协，其早年和青年时代的政治思想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sup>[9]</sup>换言之，如果卢卡奇思想中不存在可能与斯大林主义进行认同的理论因素，他是不可能忍受卑躬屈膝的自我批判，并再次选择苏联作为自己的流亡之地的。——1930-1931年间，卢卡奇曾在莫斯科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向本雅明4年前预言的不好的方向发展了。<sup>②</sup>但在1933年再次流亡的时候，他还是毅然选择了敌视他的莫斯科，而非法兰克福学派选择的英美、布莱希特选择的北欧！更重要的是，在二战后的斯大林主义化时期，他也没有像自己早年的朋友布洛赫那样选择离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阿多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和解”，尽管具有“被迫的”因素在里面。

在研究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达成“和解”的内在机制时，有三点是必须看到的。第一，卢卡奇对

---

① Adorno “Reconciliation under Duress”, NLB, ed.,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NLB, 1977, pp. 151-176; Isaac Deutscher “Georg Lukács and ‘Critical Realism’”, *Marxism in Our Time*, The Ramparts Press, 1971, pp. 283-294; Victor Zita, *Georg Luká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The Hague, 1964; 里希特海姆：《卢卡奇》，王少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5-172页。

② “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景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那里的人民和生活环境已明显表现出这种迹象，一点也不掩饰。”（本雅明：《莫斯科日记 柏林纪事》，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77-178页）



社会主义充满乌托邦激情的坚定信念。晚年卢卡奇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总是认为，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也要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强。”<sup>[4](P181)</sup>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卢卡奇说这样的话，总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言不由衷，但这却是卢卡奇内在观念的真实表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反对者，卢卡奇很早就致力于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就像研究者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在早年和青年时代，他的这种寻找始终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伦理主义色彩。虽然这种伦理主义倾向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但它却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卢卡奇的社会主义信念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和稳定性。事实证明，不管卢卡奇对共产主义阵营中具体的人和事有怎样的不同意见，但他的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创举的崇尚之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这点，他与睁着眼睛观察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等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就此而言，卢卡奇认同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信念的一个必然要求，因为在一战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然消退的情况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是直接同一的。第二，卢卡奇思想中的实践—行动主义倾向。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sup>[10](P41)</sup>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但同时也是片面的。因为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开创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时候，他们的本意是希望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让理论重新与实践统一起来。这在卢卡奇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从早年到晚年，卢卡奇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鲜明的实践—行动主义倾向，他从不满足于解释世界、批判世界，而是渴望和致力于改造世界，尽管他没有多少机会去从事实践。如果实践与理论发生冲突，那么，他无疑更愿意服从实践的权威。他对卢森堡和列宁的态度充分展示了他的这种倾向：他坚决反对第二国际而热情支持卢森堡，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后者的行动主义才能达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但他又有保留地批判卢森堡而无条件地支持列宁，因为他认为只有从事成功实践的列宁方才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钥匙交到了我们手中。<sup>[8](P40-41)</sup>由是观之，正在领导苏联进行成功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无疑代表了正确的、因而是必须服从的新的理论方向。第三，卢卡奇对列宁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的真诚拥护。《历史与阶级意识》无疑是反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和物质定义的，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青年卢卡奇是反对列宁哲学或者列宁主义的，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的深入分析让我们相信：卢卡奇是拥护列宁哲学或列宁主义的，列宁哲学或列宁主义构成了他后来思想发展的一个支柱。<sup>[11]</sup>对于青年卢卡奇来说，拥护列宁就意味着应当拥护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及其思想的唯一权威阐释者，或者说斯大林成功地让包括他在内的人们相信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卢卡奇后来会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反思斯大林主义，认为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能够像列宁那样很好地处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sup>[12](P61-67)</sup>

斯大林去世之后，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在这场政治成分多于理性成分的批判运动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拼命地为自己开脱，仿佛自己从来都知道真理，始终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反对者似的。卢卡奇也不例外。在写于1957年的“我在斯大林时期”一文中，卢卡奇努力让读者相信：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一个游击队员和占领军的关系，虽然自己为了学术思想而在形式上曾表现为一个斯大林主义的“顺民”或支持者，但这种举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影响到自己对真理的更高层次的把握。<sup>[13](P225-235)</sup>因为有了卢卡奇的这种“本人的态度”，所以，许多研究者才理直气壮地向我们宣布：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从初步真理走向高级真理的线性进化过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卢卡奇哲学思想发展的顶点！不过，卢卡奇显然错了。他与斯大林主义达成的“被迫的和解”决不是一幅可以随意清洗掉的水彩画，而是一道深入肌体的创伤。这道创伤可以愈合，但不可能消失。他将永远经受这道创伤！

历史地看，首先，“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自我脱节于世界历史的最新发展，真正与实践发展相

脱离。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脱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坚持和发展的。青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肯定是有欠缺的，但之所以《历史与阶级意识》能够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向产生那样经久的影响，完全在于它是青年卢卡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去分析正在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充满原创精神的思想成果。一旦他脱离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他就必然会丧失思想的鲜活源泉，从而被不断前进的现实所超越。法兰克福学派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阴影中走出来，获得独立的理论形象并产生广泛影响，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说明。<sup>[14](P210-218)</sup>其次，“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脱离于现代思想发展凝结出的最新成果，日益变得贫乏和僵化。《历史与阶级意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经典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关键在于它是对20世纪初期德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优秀成果的一种批判的升华，而之所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没有能够像卢卡奇本人及其追随者希望的那样产生广泛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割断了与现代思想的血肉联系，是一个缺乏精神营养的残疾儿。<sup>[15](P176-228)</sup>第三，“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失去自由思想所必须的宽容，日益变得狭隘和封闭。但凡读过《理性的毁灭》这部将哲学还原为政治立场的杀气腾腾论战性著作的人，对此大概都会有所感受。因此，当有人说在《理性的毁灭》中遭到毁灭的其实是卢卡奇本人的理性的时候，<sup>[16](P177-189)</sup>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在一次访谈中，卢卡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布洛赫曾不屑地表示：卢卡奇中年时代的那些作品只能供12岁的小学生去读！

“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思维成式之中，丧失了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现实与理论（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的理论）的能力。曾经对他绽放的真理已经因为他自身而被重新遮蔽起来了。

## 二、卢卡奇晚年自传的政治辩护本质及其自我遮蔽

在自传的扉页上，伽达默尔写到：“对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sup>[17]</sup>这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思想家的心声。但这纷繁的世界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逼迫思想家们进行自我表白，这其中，政治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晚年卢卡奇。

卢卡奇的第二任妻子波尔什梯贝·盖尔特鲁德是一位具有现实感和“本能的严谨”、其反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女共产党人、经济学家，<sup>[4](P157)</sup>也是卢卡奇年轻时代的偶像。<sup>[18](P130)</sup>自1918年他们在维也纳重逢、相爱并结合之后，盖尔特鲁德就在政治立场、思想态度和生活选择等各个方面对卢卡奇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盖尔特鲁德，“围绕着实际决定的复杂问题和做出那种选择（指走向共产主义——引者注）的极其重要的个人含义肯定完全不同。我一生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也会因此而不同。”<sup>[4](P157)</sup>1963年去世前，盖尔特鲁德曾不断敦促卢卡奇写一本完整的自传，<sup>[4](P14-16)</sup>而这不过是因为她觉得应当提醒自己已是垂暮老人的丈夫，关注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政治异端身份及其可见未来的政治评价问题罢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年卢卡奇绝对不希望自己死后会像托洛茨基一样被打入“党史”的另册，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自传就是他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武器。在自传提纲中，尽管他反复提醒自己的注意：自己“不是诗人。仅仅是一个哲学家”，<sup>[4](P144)</sup>“只是一个思想家”，<sup>[4](P167)</sup>但对自传提纲和自传对话的主题和篇幅的分析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与自己的理论形象相比，他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形象！他努力让后人明白：修正主义只是那些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官僚主义者强加给他的政治污水，自己的一生是不断探索、发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因为是在辩护，所以他就非常自然地按照辩护的需要去展现自己的生命历程：“他已经通过他的记忆，把他曾经当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来体验的那些时刻挑选出来，并且加以强调；而对于其他那些时候来说，他则听其自然地让它们沉入遗忘的深渊中去了。”<sup>[3](P29)</sup>如果说卢卡奇仅仅是在裁剪自己的记忆，事情倒也简单。糟糕的是，“被迫的和解”已经使他失去进行客观公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这就与其过于强烈的自我辩护意识共同强化着他努力地去塑造生命中的“连贯性”

意识，结果，他的自传在提供了大量事实细节之余，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自我遮蔽。

首先，自传遮蔽了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之虚构成了一个向着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不断进化的线性过程。虽然晚年卢卡奇在思想表达上有所晦涩和重复，但他的基本意向还是明确的。在他看来，从发现文学到转向哲学，尽管自己早年经历了一些小的过渡阶段，但这些过渡都是相对次要的或者说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当属在一战期间发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因为正是它们使自己早期反对资本主义的愿望找到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sup>[41](P159)</sup>之后，自己经历了一个“生活和思想的学徒期”，通过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真正的研究，自己掌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但依旧保持着一些“左”倾的错误，因此，作为这个学徒期的主要成果，“《历史与阶级意识》仍然是一个大杂烩”。<sup>[41](P162)</sup>经过不断地自我实现的尝试，自己最终在晚年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原则”，即完成了“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真理”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sup>[41](P169)</sup>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在我这里，所有事情都是其他事情的继续。我并不认为在我的思想发展中存在什么非有机的东西。”<sup>[41](P81)</sup>

其次，自传遮蔽了早年和青年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真实意图，为其一生的思想发展虚构出了一个目的即本体论。正如晚年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在康德批判过本体论之后，本体论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相当微不足道了，“在上几个世纪，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哲学思维，而且就是在今天，这种统治也还远未被其他理论的统治所超越。”<sup>[19](P1)</sup>不仅如此，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作为新康德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名现代哲学家，卢卡奇其实也始终处于认识论路线的强力支配之下，甚至“1950年代晚期，他还是在谩骂的而非建设性的意义上来使用‘本体论’这种表述”。老年卢卡奇主要是为了能够构想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从而“在历史主义和普遍类属层次上的分析之间，在实践的居中性和哲学的普遍性之间实现一种综合”，以解决“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困境”，<sup>[20](P130)</sup>方才重新举起本体论的旗帜。但由于他坚信：《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它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sup>[20](P133)</sup>所以在进行思想回溯的时候，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将本体论问题凸现出来了。他不仅突然发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因素越来越明显了；<sup>[41](P161)</sup>而且认为早在1906-1907年间，在自己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地占据着中心地位”，<sup>[41](P149)</sup>更重要的是，自己在1903年前后钟情于文学批评的时候，“马克思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了！<sup>[41](P149)</sup>他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构想成了一个目的论的过程，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则成了一个将来完成式的必然结果！

最后，自传遮蔽了作为卢卡奇思想源头和早年、青年时代的运思背景的德国现代思想，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其早年和青年时代思想发展的过程、本质、影响的正确理解，以致妨碍了人们对其一生思想发展的正确评价。从在1933年“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开始有意识地凸现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发展的长期影响之后，<sup>[13](P210-215)</sup>卢卡奇就不断地想让人们知道，他很早就受到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起先还是间接的和模糊的，但却始终顽强地存在着。而对于狄尔泰、西美尔、韦伯这些真正影响到了其早年和青年时代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的思想家，他却不愿过多涉及。这与卢卡奇青年时代的自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up>[13](P206-209)</sup>当我们听从卢卡奇本人的态度，非历史地将他从其赖以运思的历史情境和思想史情境中超拔出来，而仅仅在一个单调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上去审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就自然会像卢卡奇所希望的那样，将其整个早年时代作为一段蒙昧的史前史忽略掉，并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一个“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一个充满错误的起点来看待。<sup>[21](P63)</sup>按照晚年自传的这种说法，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应当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那里找到自己的新起点。但令晚年卢卡奇及其追随者感到尴尬的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已经充分表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上来的却是跳蚤；真正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提供了强大思想资源的倒是被晚年自传遮蔽起来的，作为《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早年卢卡奇和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晚年卢卡奇就像《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之后的谢林一样，尽管还在创作，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却已经被思想史本身扬弃了。

### 三、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一篇论文的结尾，笔者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对于现时代的中国研究者来说，卢卡奇决不仅仅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思想史对象，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今天正在走入卢卡奇曾直接面对和批判过的世界，所以，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研究卢卡奇，更需要借助他的思考来实现对我们自身状况的正确理解。<sup>[22]</sup>这样我们就自然不会认为当下对卢卡奇研究进行方法论反思和修正是一种陈腐的学院做派了。国内卢卡奇研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在这充满荆棘的道路上，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第一，必须破除对卢卡奇晚年自传的迷信，让历史自身成为评价自身的尺度。之所以许多研究者坚持认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代表着卢卡奇思想发展的顶点和归宿，除了他们自身的理论认同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强调这是卢卡奇本人的看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自传迷信。因为就是最重视自传的狄尔泰也指出，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即自传已经与整体意义建立起了某种联系的情况下，自传（理解）也只有在与传记（经验事实）的结合中，方才能够实现对“总体性和一般性”的领会。<sup>[3] (P34-43)</sup>而作为一个极大地受惠于狄尔泰的现代哲学家，卢卡奇并没有像自己的这些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将自传确立为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评价的标准，相反，他将这种评价的最终权力交给了历史本身，因为自传作为自我反思和自我评论的主观性是“不能被克服的”，真正具有裁决权的是历史，“它的判决不能驳回，即只有被历史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过程所驳回”。<sup>[4] (P144)</sup>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卢卡奇本人的态度，就应当将他还原到其赖以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情境中去，加以历史的评价。

第二，必须在现代德国思想史的完整视阈中观照卢卡奇。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卢卡奇毫无疑问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现代思想史舞台上的。但并不能就此说，只要以马克思主义史为背景，就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卢卡奇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和批判者，而且在它诞生之后，也从来没有脱离过西方思想传统获得过一种绝对独立的地位。事实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凡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真正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来都是在与西方主流思想的对话和批判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卢卡奇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本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sup>[23] (P1)</sup>并不在于他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哲学，而在于他充分汲取了德国现代思想的精华。正如他所说的，“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西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到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sup>[13] (P206)</sup>因此，如果我们不对现代德国思想有一种深入完整的认识，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早年和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会具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而曾受惠于早年和青年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又会那么尖锐地反对中年和晚年卢卡奇的了。就此而论，在现代德国思想史的完整视阈中观照卢卡奇，就是要严格按照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从早年、青年、中年到晚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具体的研究。而在国内学界，《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早年和青年卢卡奇无疑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遗忘的代价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卢卡奇的精神世界，与他同在；在与他一同思维中，真正理解他的所思所想及其当代价值！

第三，必须摆脱进化论、目的论思维的束缚，按照文本学的要求对卢卡奇进行深层历史解读。大多数国内卢卡奇研究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首先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设立为卢卡奇思想之合目的的线性发展过程的终点，然后再以此为标尺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进行比对，从而找出其后



期科学认识的诸胚胎形态，进而证明卢卡奇的思想是朝着马克思主义的高级真理不断发展着的。就像福柯尖锐指出的那样，这种与传统历史研究类同的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化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sup>[24] (P7)</sup> 惟其如此，是因为这种研究不过是以历史的名义在座架历史，是主体基于自身的自我认识，在历史（文本）黑暗的身体上它看到的只是研究者自身的投影，客观的历史（文本）本身则消退了。我们要想找回本真的卢卡奇，就需要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不自觉束缚，按照文本学的要求，对他进行类似于考古学的深层历史解读，在平滑的连续性底下探测非连续性的存在，并在对非连续性阐明中让真实的（福柯不同于“全面历史”的“总体历史”意义上的）卢卡奇呈现出来。在这个方面，南京大学已故孙伯鍈教授的工作具有首创之功，<sup>[25]</sup> 我们今后应当做的就是按照他为我们指出的这一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 [参考文献]

- [1] 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 [M]. 范景武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 张西平. 要注重卢卡奇本人的态度——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J].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 1989 (5).
- [3] 狄尔泰. 历史中的意义 [M]. 艾彦等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4] Georg Lukács *Record of a Life: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M].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Verso 1983
- [5] Michael Löwy. Lukács and Stalinism [A]. *New Left Review*, e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C]. NLB, 1977.
- [6] Ernest Joós. *Lukács's Last Autocriticism: The Ontology* [M]. Humanities Press 1983
- [7] 张翼星. 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8]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杜章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9] Michael Löwy. *Georg Luká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M]. trans. Patrick Camiller NLB 1979
- [10] 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M]. 高銛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1] Norman Levine. Lukács on Lenin [J].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Spring 1978).
- [12] Georg Lukács. Reflections on the Cult of Stalin [A]. *Marxism and Human Liberation: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Revolution* [M]. ed. E. San Juan B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3
- [13] 杜章智编. 卢卡奇自传 [M]. 李渚青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 [14] 张亮. “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15] 俞吾金.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A]. 俞吾金集 [C].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 [16] 里希特海姆. 卢卡奇 [M]. 王少军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17] 伽达默尔. 哲学生涯——我的回顾 [M]. 陈春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8] István Mészáros. *Lukács Concept of Dialectic* [M]. The Merlin Press 1972
- [19]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上卷 [M]. 白锡堃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20] Anges Heller etc. Notes on Lukács Ontology [A]. Agnes Heller ed. *Lukács Revalued* [C].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 [21] 别索诺夫. 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 [M]. 德礼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
- [22] 张亮. 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 一个批判的回顾 [J]. 现代哲学, 2003 (4).
- [23] Tom Rockmore. ed. *Lukács Today: Essays in Marxist Philosophy* [M].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24] 福柯. 知识考古学 [M]. 谢强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5] 孙伯鍈. 卢卡奇与马克思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罗 苹



# 论评价分歧

◎ 江传月

[摘要] 从形式方面看,句子的其它部分相同,而谓语或宾语不同,才是真正的评价分歧。从内容方面看,评价分歧就是对同一价值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出现评价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对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的事实认定不同;评价标准即价值观念不同。对于纯粹与个人相关而不涉及他人的事情的评价,评价分歧是可以允许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有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评价;对超越个人范围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现象的评价,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评价。

[关键词] 评价 分歧 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79-04

评价分歧是人类生活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自从人类开始评价,评价分歧便产生了。从此,它像个幽灵,如影随形般地困扰着人类,一直挥之不去。古希腊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希望凭借他的富有被梭伦评价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梭伦根本就没有把他评价为幸福的人之列。苏格拉底甘当“牛虻”和“精神催产士”,终身不懈地追求智慧和美德,却被政府认为是“一个作恶者,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阶级的评价是“好得很”,而地主阶级的评价是“糟得很”。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评价分歧不胜枚举。那么评价分歧表现在哪里?出现评价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对待评价分歧?

## 一、评价分歧的形式表现

评价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的,而表达评价的形式中,语言是最经常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从形式上分析评价分歧就以评价的语言表达形式为例——我们不妨把评价的语言表达形式叫价值判断句。评价最典型的语言表达形式即价值判断句是“X是有价值的”,我们就从这种典型形式入手。

当我们说存在评价分歧的时候,一般说来,“X是有价值的”这种句子的主语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评价的分歧一般是指对同一价值关系的不同评价,而不是指对不同价值关系的不同评价。可见,评价分歧不是价值判断句的主语的分歧。

从句子的谓语看,句子的谓语可以是“是”,可以是“不是”;在主语和宾语相同的情况下,谓语是“是”的评价(即“X是有价值的”)与谓语是“不是”的评价(“X不是有价值的”)是相反的,因此,这是评价分歧的一种形式上的表现。

从句子的宾语看,在谓语和主语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宾语不同,句子的意思就可能不同甚至相反,也就出现了评价分歧。宾语可以是“有价值的”,也可以是“无价值的”,还可以是“有负价值的”。对同一对象做出的这三种评价当然是有分歧的评价。句子的宾语“有价值的”可以用不同的价值词替换,如“利”、“善”、“美”、“好”等。后者也都

---

作者简介 江传月,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

有自己的反义词“害”、“恶”、“丑”、“坏”等。在主语和谓语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它们与使用它们的反义词所形成的评价当然是不同的、相反的，是评价分歧中最极端的情况。

“X是有价值的”是评价的最典型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是最简略的形式，仅仅分析这种最简略的形式当然不够。评价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做出的，因此有许多参照。例如：当我们说某物是有价值的时候，这里有“对谁”、“就什么方面而言”、“与什么相比”、“以什么为标准”等参照系。因此，价值判断可以扩展为“X……是……有价值的”，<sup>[1](P76)</sup>句子的空处所填充的内容如果是不同的，做出的价值判断即句子的谓语和宾语也相同，显然不存在评价分歧；句子的空处所填充的内容如果是相同的，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即句子的谓语和宾语不相同，那么就存在评价分歧。如果空白所补充的内容不同，句子的其他部分无论相同还是不同，我们一般也不认为存在评价分歧。如“下雨对干旱的华北是好事”与“下雨对干旱的长江流域是好事”，“下雨对干旱的华北是好事”与“下雨对发洪水的长江流域是坏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所谓评价分歧，如果补充各个方面的变量，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我们所说的评价分歧，应该是各个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做出了不同的评价。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形式方面看，句子的其它部分相同，而谓语或宾语不同，才是真正的评价分歧。

## 二、评价分歧在内容上的表现

有分歧的评价除了在形式上有不同以外，其内容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张三是好人”与“张三不是好人”或“张三是坏人”表达什么不同的内容么？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评价究竟要表达什么。

情感主义认为，评价只是表达感情，因此，有分歧的评价只是所表达的感情不同。罗素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各自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sup>[2](P124)</sup>所以，如果两个人在价值问题上意见不一，那么它们不是对任何一种真理有不同的看法，而是一种口味的不同。正如一个人说“牡蛎好吃”而另一个人说“我认为牡蛎不好吃”，二者没什么好争的。<sup>[2](P127)</sup>

规定主义认为，评价主要是表达命令或指令，因此，有分歧的评价只是所发出的命令或指令不同。

我们认为，评价所要表达的主要是，或者说，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对客体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价值、多大价值做出判断和评定。第一，价值词有特定的含义。中国古书《说文解字》中对“善”的解释是：“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牛津英语词典》中“善”的词义是：“表示最普通的褒义形容词，意指一种高尚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们或者本身值得赞美，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有益。”石里克说：“善之所以为善，仅仅是因为它被社会认为是有用的。”<sup>[3](P90)</sup>其它各种各样的价值词都有不同的意思，如勇敢、诚实、凶残等，都是有特定含义的。“你善良（或凶残）”不同于“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前者的意思；而“你！”是什么意思，我们无从知道。第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评价，都有一定的事实内容。例如，当我们说一辆车是好车时，我们不只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表达赞美之情，而是指它跑得快、性能稳定、节约燃料或什么的；当我们说一个草莓是好草莓时，我们可能指它大、红、甜、新鲜等。第三，评价虽然有情感表达的意思，但表达情感只是附属的功能，一个价值判断句不同于感叹句；评价的主要功能也不是规定、规劝或命令。评价的功能主要是对客体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价值、多大价值做出判断和评定。

既然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对客体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价值、多大价值做出判断和评定，那么，有分歧的评价在内容上的区别就主要是对价值关系有不同的判断和评定。“张三是好人”这个评价是表达张三品德高尚、对他人和社会有益；而“张三不是好人”或“张三是坏人”这种评价是表达张三品德败坏、对他人和社会有害。这两种评价有不同的内容，表达了对同一个对象的价值有不同的判断和评定。

## 三、出现评价分歧的原因

为什么存在评价分歧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同的评价者对同一个价值关系会有不同的评价呢？评价就是在对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的事实认知的基础上，用一定的评价标准也就是一定的价值观念做出一个价值判断。因此，出现评价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事实的认定不同。价值关系的形成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客体的属性，一个是主体的需要。我们所做出的评价，总是建立在对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的事实认知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评价总是在对一定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有不同的事实认定，就可能形成不同的评价。这里的事实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体本身的状况，另一方面是主体的需要。因此，一种情况是，对客体本身的状况的认识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评价。我国在

1956年的时候，人们看到麻雀在秋冬吃粮食，便把它列入“四害”进行捕杀。后来发现麻雀在秋冬也吃草籽，而且在春夏繁殖育雏时，主要吃害虫，益大于害。于是，1960年毛泽东在文件中批示不要再打麻雀了，麻雀就从“四害”之列中被剔除了。在这个事例中，对麻雀的利弊的评价，是根据对它的生活习性的认知做出的；对它的生活习性有了不同的认知，也就会做出不同的评价。另一种情况是，对主体的需要有不同的认定，可能产生不同的评价。评价与认知不一样，评价的最大特点是不仅仅反映客体本身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而是反映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所以，即使对客体的状况有相同的认知，如果对主体的需要有不同的认知，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对孩子上小学时需要学习什么有不同认识，就会对中国现在的小学教育做出不同的评价；对学生是需要学习知识还是培养能力有不同认识，就会对中国现在的学校教育做出不同的评价；对中国目前需要扩大大学生的数量还是提高大学生的素质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对中国目前的大学生扩招政策做出不同的评价；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是需要速度还是最需要效益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做出不同的评价。

第二，评价标准不同。评价只能是以一定的评价标准对一个价值关系做出评价，这个评价标准就是在评价之前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的、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有价值的”等的价值观，评价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对当下的价值现象做出判断和估价。我们总是根据“诚实是善的”、“谋杀是恶的”等价值观来评价某一个人的行为。因此，以不同的价值观、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去评价相同的价值现象，会得出不同的评价。根据“助人为乐是善”的价值观，就会评价雷锋是道德楷模，而根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价值观，就会得出“雷锋是傻子”的评价。对于农民运动，地主阶级以破坏现有的统治秩序、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为评价标准，自然会得出“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评价，而农民阶级以社会发展为评价标准，自然会得出“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评价。上面出现的评价分歧，主要是因为评价者的价值观不同。还有一种情况，评价者的价值观是相同的，但在评价某一个具体的价值现象时，由于对几个方面不同价值的排序不同，几个价值观在他们价值观体系中的优先等级不同，因而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对于吸烟的评价，一般人们现在都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因而评价“吸烟不好”。有些人也认为“吸烟有害健康”，但同时又还认为吸烟能刺激大脑神经，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而且认为少活多久那是“遥远的事情”，而提高工作效率更现实、更迫切，因此更重要。这样，他们就会做出吸烟利大于弊的评价，并且为了“产生灵感”，大量吸烟，牺牲健康来换取工作效率。“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等也是这方面的表现。除此以外，关于“问题与主义”、“效率与公平”、“科技的好坏”等的争论，不同观点的双方都不否认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因为对价值的排序不同，几个价值观在他们价值观体系中的优先等级不同，因此做出了不同的评价。在我们的价值观体系中，主权是至高无上的、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如果在你的价值观体系中，公平是更重要的，那么你可能更倾向罗尔斯而不是诺齐克。

#### 四、如何对待评价分歧

如何对待评价分歧？是否必要、是否可能消除评价分歧？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来分别对待。对于纯粹与个人相关而不涉及他人的事情，存在评价分歧，是可以允许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有千篇一律的评价。关于饭菜口味、衣服款式乃至艺术品的美感等纯粹属于个人领域的评价，是一个无比广阔的自由空间，个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对于超越个人范围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事情，消除评价分歧，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 （一）必要性

列宁认为，“真理性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他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因此，“真理是全面的”。<sup>[4] (P209)</sup>现实事物都是由许多方面构成的，并与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孤立地、单个地反映事物的某些方面，并达到真理性，这还不够。只有关于事物的一切方面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反映，都达到真理性时，才能算达到了“全面”的真理性。这告诉我们，虽然每一个价值事实会有一个真理性的评价，而有多少价值事实就可能有多少个真理性的评价，但我们往往需要综合这多个方面的多个真理性的评价，最后根据从全面和整体的角度做出的真理性评价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例如，吸烟能使你的头脑兴奋，使你的工作效率提高；但吸烟也会危害你的身体健康，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吸烟对你（这里是指整体利益）有害”和“吸烟对你有利”这两个评价都具有真理性呢？不能！如果就单个方面说，“吸烟对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有利”是真的，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吸烟对你的整体利益的影响。按目前医学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的吸烟的危害，恐怕我们只能说“吸烟对你有害”这个评价具有真理性，并根据这个评价指导行动，比如戒烟，而不能只根据“吸烟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放纵你成为瘾君子。

安乐死、婚外恋是善还是恶，死刑、克隆人、传统文化是好还是不好？只要我们把它们与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将能产生积极效果的规定为善和好，反之就归于恶和不好。如果对这些事情的评价不能统一，那么，我们的道德和法律如何对待这些不纯粹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自己在可能遇到这些情况时该如何抉择？否认对它们的评价能够统一，就意味着否认对事情进行预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否认评价和知识对行为的指导，将所有的评价看成任意的，这就重蹈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覆辙。而社会生活中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导致的恶果，已经从反面告诫我们，获得相对统一的评价，是与人类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评价只有相对统一并根据它们指导实践，人类才有可能获得幸福。

## （二）可能性

我们认为，评价除了具有个性的一面，也具有共性的一面，价值判断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首先，价值判断中的价值客体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价值客体总属于一定类的事物，它与同类事物有共性，因此，判断某物有某种价值，不只对个别事物适用，而且对同类的所有事物适用。例如，我们说“吸烟有害健康”，不是指某些香烟或某些吸烟行为而是说所有烟和吸烟行为都有害健康。其次，价值主体也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人的需要都带有共性，无论将其归纳为马斯洛的五个层次，还是我们主张的生存、发展和享受三个层次，无论是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凡人都是一样的。说“吸烟有害健康”不是说只对某些人有害，而是对所有人有害。最后，虽然发生价值关系的具体情景是各不相同、千变万化的，但在相似的情景下，价值关系的发生具有共同性的一面。所以，凡是遇到与某价值判断相同或相似的情景时，该价值判断同样适用。韦斯特马克在《伦理的相对性》（1932）一书中指出，“在道德判断中存在着某种近似的普遍性，正如在感性知觉中一样。”<sup>[5] (P20-21)</sup>斯巴达人、楚克奇人杀死或遗弃老弱病残，在今天看来，这是不人道的，但在古代原始社会，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认为是不人道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整个氏族的生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说：“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也就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道德”，“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回答应该是“如果就绝对的终级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sup>[6] (P434)</sup>可见，运用唯物史观，站在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高度，我们能够看清评价分歧。而且，对同一个价值现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相对统一的评价。这个评价，从最终意义上讲，就是符合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评价。

## [参考文献]

- [1] 冯平. 评价论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 [2] 罗素. 宗教与科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 石里克. 伦理学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 列宁. 哲学笔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5] D. D. 拉斐尔. 道德哲学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罗 苹

· 历史学 ·

# 世界史：理解现在

◎ [德国] 汉娜·西斯勒 著 邹建华 译

[摘要] 本文从历史教育的角度，论证了理解世界，尤其是当今世界，教材和课程安排必须包括世界史，这需要对历史定位、历史思维及历史书写的方法论做出审慎的考虑。作者指出，世界史有助于师生认识到世界并非远在天边，而是浸透于我们的生活，并且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助于忍耐现代性的模棱两可性，并有助于抵制原教旨主义的诱惑。在致力于当今的历史性时，世界史有助于师生在现代社会把握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制止弥漫世界的不平等性。

[关键词] 世界史 历史教育 世界想象

[中图分类号] K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83-10

人们如何设想社会、建构历史时间，如何在时空中为自己和所处的社会定位，已随时间发生了变化。有时这个变化异常显著。过去被建构的方式引起诸多分歧与矛盾。课程与教材则成了冲突的主战场，因为在那里社会书写着他们的历史并投射自己与未来。是否使用教材以及如何使用教材来促进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具有决定性意义。信息对学生因人而异，取决于：（1）他们是否关心自己的社区；（2）国家史是否将其他历史排除在外；（3）是否像在美国，国家史与世界史并存；（4）或像是在德国，社区和地方被无形地融含在欧洲叙事中。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 (Novalis)<sup>①</sup>在 18 世纪末写道：“历史总是世界史。只有在总的历史关系中才可领会个别史。”<sup>②</sup>诺瓦利斯欲论证个别史的意义源自普遍心态，然而我却要将这个观点倒过来，试图论证个别史传递着世界的信息。历史塑造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观念、范围和地位。有关整个世界和事物意义的信息总是通过教学传播，无论这一信息存于“世界远在天边，无关紧要”的内隐假设中（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或存于我们这个“容器”中<sup>③④</sup>所发生的事情与其外所发生的事情同等重要、居于次位、根本不同或充满威胁的公开声明中。隐含的与言明的同等地构成意义。本文将论证为了理解世界，尤其是当今世界，教材和课程安排必须包括世界史。这需要对历史定

---

作者简介 汉娜·西斯勒 (Hanna Schissler)，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教授，历史教育家；邹建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上海，200433)。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

① 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 年)，德国诗人。代表作有《夜颂》、《基督教或欧罗巴》和《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译者

② 诺瓦利斯 (Novalis) 的德语原文是 “Jede Geschichte muss Weltgeschichte sein, und nur in Beziehung auf die ganze Geschichte ist die historische Behandlung eines einzelnen Stoffes möglich” 转引自科泽勒克 (Koselleck, 1975: 690)。

③ “容器”在此是指国家，出自法国都市社会学家列斐弗尔的《空间的生产》。——译者

④ 国家史的“容器模式”本文后有叙述。——著者



位、历史思维及历史书写的方法论做出审慎的考虑。

## 一、单数大写历史 (History) 的解构和复数小写历史 (histories) 的出现

过去的几十年改变了历史书写并在某种程度上给教材留下了痕迹 (Novik 1988), 这场历史编撰革命揭示了在变换着的世界中, 人们需要重新明确方向的多样化需求。国家叙事存在的时间最长, 在以往也从未被质疑过。不在场的国家叙事直至今日还被当作历史,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家叙事受到了历史编撰革命的挑战。正在确立中的对方向感的需求, 尤表现在历史探究的三个领域: 地理范围、时间观念和历史的动力因素。如此分类可运用于各时段的历史写作。人们所重视的过去和他们所生活着的现在密不可分。他们塑造假设, 激发问题, 从而使人们关注一些历史动因而忽视另一些, 在比实际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探究历史。影响历史探究的假设通常是无意识的, 要不然就是被推入某种“自然”、“客观”的模式, 其自身的历史性不明显, 只能在回溯中得以解码。典范的、不在场的国家历史也不例外。晚近在美国日益流行且有走进欧洲教科书趋势的世界史和全球史亦然 (Allardyce 1982, Schissler 2002, 有关在欧洲的发展, 见 Middell)。<sup>①</sup> 如果探究的范围、时间的观念及历史的动因是回应当前需要的, 那么就他们所致力于的那个当前 (present), 历史叙述能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在民族国家建立时期, 国家政策是历史探究的中心。历史的动因一直被归于政治家、政治领袖——即一种“英雄造就历史”的视角。或把国家推作演员: 德国做了什么, 英国作为回应又做了些什么。国家运转如人, 甚至有感情: 如德国由于英国建立海军而受到威胁。国家叙事照搬社会模式, 正如查尔斯·布莱特 (Charles Bright) 和迈克尔·盖耶 (Michael Geyer) 所言: “(国家叙事) 趋于将国家作为假定的、潜在的牵制单元置于历史的中心 (2002: 64)”。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被想象成“独立实体”、“容器”。国家史的“容器”模式有力地划出中心与边界并赋予事件以意义。对于绝大多数人, 即便在今天, 也难以想象不如此的话, 历史该是什么样。但是, 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超越了国家史的边界。<sup>②</sup> 在国际冲突与利益纷争的年代, 变革的主动力量被认为源自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的方法和全球时代的跨民族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前者与国家史密不可分, 国家作为“准主体”继续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动因而发生作用。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方法多是对 19 世纪世界观的回应, 然而在 20 世纪, 至少在 20 世纪后半叶, 这些方法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家史之上或之下立场的冲击。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当今” (present) 的需求在历史编撰上留下了印迹, 使历史书写走出了民族主义的域阈, 转向开拓人们具体生活的方面, 关注本土、家乡<sup>③</sup>和区域的发展。这些变化一方面表明历史探究的地理范围发生了改变,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我们理解历史进程有更持久影响力的历史动因获得了权力。关注社会各阶层: 妇女、少数民族、种族群体的复数历史对原有的历史动因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这些新近的关注与原有的国家史并存, 二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历史探究的范围和新创立的历史主体的地位问题。其他的方法还提出了历史定向的想法, 提出了历史的目标与目的等目的论问题。不仅仅是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多少也有历史朝何处去, 怎么去的确定想法。在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塑造社会的能力所抱有的无穷乐观主义精神的驱动下, 现代化理论除了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向有假设外, 还有着明确的因果观念。在它表达最清楚的版本中, 60 年代的现代化理

---

<sup>①</sup> 此文中我没有刻意区分世界史和全球史。但是当我提及普遍史时我是指启蒙时期的观念。二者之区别请见科泽勒克 (Koselleck 1995)。他对这些术语的演变有详细的论述。——著者

<sup>②</sup> 原文为 National history, national 有两个意义, 一指国家的, 一指民族的; 本文将 national history 译为国家史; nationalism 则据表达通顺与否, 译为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 同理, transnational 译为跨国界的或跨民族的; 而 nation building 中的 nation 和 nation-state 则译为民族国家。

<sup>③</sup> 本文由英语写成, 从作者简介中我们知作者为德国人, “家乡”在此用的是德文 Heimat。——译者

论，假设发展是按照或多或少明确的阶段进行的 (Rostow 1971)。这个假设试图说服人们，只要“第三世界”的国家按照一定的步骤，采取一定的政治、经济措施，他们就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进入现代性天堂。现代化理论就这样，推广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顺序性和可预测性。现代化理论也倾向于以国家的方式进行思考，有时也以跨民族的地区性方法为补充。今天，由于西方“模范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诸如经济增长、生态灾难、政治非法化、社会融合和文化冲突的困境，学者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目标与步骤以及全球范围内保持持续发展所给定步骤的可能性明显地不再那么热情，也不再那么乐观了。自 1973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限度的报告问世以来，对现代化所付代价的日益深刻的认识破碎了对“西方模式”、“福音”天真的信仰，如此出现了一个有力的后殖民话语。现代化理论主要在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中盛行，历史学家出于复杂的原因瞧不起它，他们主要是对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及其基础的理论构架表示怀疑。使 60 年代的史家更为不安的是他们中的一些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狭隘的国家主义历史范式，从而拒绝任何更广意义上的或以比较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的过程。当现代化理论在他们无尽的乐观主义中昙花一现，亦已凋零之际，关注社会各阶级、群体、性别、种族和事发场所的对国家叙事的解构悄然来临。小写多元的历史对 19 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大写单数的历史所造成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历史的过程和国家主义叙事层面以下的历史动因。教育者明白他们必须致力于解决全球化世界的问题及其它的复杂性：全球范围的经济交换、政治与往来、跨国移民及对移入国所带来的改造性影响。近年来，世界史除了在美国取得了显著的地位，在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世界史所采取的都是一个文明接一个文明的处理方法。<sup>①②</sup> 从世界范围内将历史观念化的构架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有缺陷的。本处不予评估美国从西方文明史课程中演变而来的在美国大学和中学讲授的历史课程 (Allardyce 1982, Segal 2000)，但正如迈克尔·盖耶所指出的：世界史在各个层次上都永久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历史思维。世界史不仅走进了教室，并且开始深刻地改造美国的历史系。跨民族史作为大趋势无法置之不理，在教材中，在德国的统一中都显而易见。但是即便如此，在学者中仍又一次激起了对国家主义历史的讨论 (Conrad 2002)。在德国，国家主义与其他影响，尤其是德国的欧洲观念相抗衡。但是，1989 年以后的东欧诸国，对他们的历史公开宣扬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信念。这看似跃回了 19 世纪的状况，似乎是对长久以来所忍耐的共产党国际主义所作出的抗议。如此，在众多的事物中，这也是对令人不解的当今作出的一种并不是人人都欢迎的反应。除去这一“二次民族化”的倾向，整个欧洲开始喜欢上了超越民族和欧洲范围的历史。慢慢地他们明白了必须开阔视野，具有世界眼光。这一眼光，超越民族史，也超越欧洲联盟。但是，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和日益超民族的世界紧密相关时，有关世界史的辩论才可驻足丰肥的沃土。

## 二、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史

世界史过去就有先兆：即普遍史的观念深蕴于欧洲启蒙运动中，但和今日所理解的世界史相去甚远 (Allardyce 199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使历史时间世俗化了。哲学家宣称历史不再被上帝决定，是人创造了历史 (Koselleck 1975: 687)。这种推理与当时启蒙了的世界观相投合，在他们的世界中个体千差万别。它同时反映了当时基于理性与可行性的乐观主义精神。普遍史像任何历史一样，其支撑点深植于对“当今 (present)”的假设中。当弗里德里希·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那年于耶拿大学作题为“这意味着什么：研究综合历史至哪个阶段？”<sup>③</sup> 的就职演讲时，他深深意识到了这种关联。他说：“从事件的整体性来说，治普遍史的史家关注

① 这属于一种进化论模式，文明史多采用此种方法。——译者

② 对赋予文明研究以活力的进化论模式所作的评论，请参见思高 (Segal 2000)。——著者

③ 席勒 (Schiller) 的这个演讲题目在文章中为德语，“Was heiss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译者

对当今世代有明确重要性和决定性的事件。为了收集世界史的资料，需考察史实与当今世界构成的关系。”<sup>①</sup>

席勒是欧洲知识分子运动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分子致力于从康德所谓的人文学科自予的狭隘性中解脱出来。对席勒而言，他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史计划和在历史进程中进步的观念及历史的动因一样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法国大革命后兴起的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历史方向、历史动因在当时并没有构成太大问题。也正是针对这三方面，当代的史家提出了异议。对那时欧洲的知识分子而言，白种、受过教育的男子是世界的推动力量，这再清楚不过了。妇女、奴隶、少数民族等没有公民地位的人在世界上和世界中无法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个体履行责任。启蒙运动时所设想的世界并不像今天这样令人绝望地无中心。那时，中心与外围被清晰地界定着。历史的演员与非演员亦如此。在当今世界，只有男子创造和塑造世界的想法如同每个地区都必须达到欧洲水准一样受到挑战。我们不再确信欧洲或美国制定标准，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在各方面都应与之保持一致。从现代化理论萌生而出的历史由低到高、分阶段直线发展的观念其缺点至此暴露无遗。

启蒙时期的普遍史观念纲领性地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是一项跨国界的普世救赎计划，它从未被遗忘过。事实上，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普遍史已经成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Allardyce 1982）。但是，在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随着历史编撰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民族化，普遍史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魅力。事实上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和民族化是同步发生的（Novik 1988, Allardyce 1990, Koselleck 1975: 690, Middell 2002）。

### 三、正典知识受到的挑战

历史编撰，尤其是为学校教育所作的历史编撰，和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18、19世纪的民众教育与国家对课程、教材的控制，以强化国家专政的方式构成了民族国家形成的一部分（Assmann 1995）。德国的历史学同其他国家一样，热情地服从民族被认可的热望，心甘情愿地为民族国家效劳。一个国家越是身处危机或感到危机，事情往往越是这样。由于历史、地理的课程和教材对国家控制的知识生产有特殊的亲和感，在这样的领域研究为国家目的而使知识正典化和工具化的过程，问题就比较容易表现出来。（自二战以来，社会研究课程也加入了历史、地理的行列，生产一种接近于社会自我认识的知识）事实上，自义务教育有史以来，历史知识的生产就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密不可分。但是民族国家对教育造成的影响直至今日才必须予以处理。通过对教材正式的控制和非正式的影响，国家热衷于一种反映理想状况的历史。虽然这和国家形成时期的岁月更为相关，但决不仅限于此。历史学家詹娜·泊玛忒（Gianna Pomata）写道：

教材不是中性的。当历史被引入学校时，人们所发明的这种形式带着明确的教育意图。委托于历史教材的根本信息是一种“普遍的”、“合成的”历史意象。这一普遍的纬度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呢？通过表面上不明确否认，私下里以不相关为由而省去的一种概括。历史经验的差异，如男、女之别被忽视了。这就是为什么编年格式对此种文本至关重要的原因。这样的教材需要一个普遍抽象的支点来组织材料。将历史时间视为中性时间，使得事件能够脱离经验者的立场，通过“客观的”媒体得以再现。如此，普遍的、统一的历史幻想就被造了出来。（Pomata 1993: 42）

换言之，国家叙事促发了某种程度上的抽象，忽视了与之不兼容的观点，它依赖于年代学的时间观，追随着“崇高的理想”，促进了历史探究的客观主义立场（Novik 1988）。自从历史在学校被教授

---

<sup>①</sup> 这句话的德文是：“Aus der ganzen Summe der Begebenheiten hebt der Universalhistoriker diejenigen heraus, welche auf die heutige Gestalt der Welt und den Zustand der Jetzt lebenden Generation einen wesentlichen, unwidersprechlichen und leicht zu verfolgenden Einfluss gehabt haben. Das Verhältnis eines historischen Datums zur heutigen Weltfassung ist es also, worauf gesehen werden muss, um Material für die Weltgeschichte zu sammeln”（席勒，1970: 359）。——著者

以来，通过创造和传播合成的客观主义历史意象激发效忠家国的忠诚。但是学校里的这种具有统一性和客观性特色的历史知识并非没有缺陷。反对这一特质的研究、无法归于其类的视角都被排除或边缘化了。因为它们或强调特殊性或促生颠覆性的知识，这二者有时可能说的就是同一件事。结果在正典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知识的去留由政治决定，这种决定由构建课程和控制教材生产的人做出，也由有意于促进某种知识或压制另一种知识的人做出。

詹娜·泊玛忒从女性角度就统一化的教材观作出批评，并主张将国家叙事层面下的部分知识放在课程及教科书中。对于这种综合的、统一的历史知识形式自女权运动全盛时期就开始受到批驳与拓宽。鼓舞着历史学家的许多问题，诸如性别、阶级、种族、代际、地区、信仰，虽然是以非常初步的形式，也成功地步入了教材。但是，国家叙事没那么容易就走开，它仍然是不在场的历史。以国家方式对个人历史作直接了当的重复至今仍被大多数人视为最“自然的”叙事方式。即便有来自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国家叙事层面以下历史的解构，且这种解构已对人们原先所理解的历史留下了鲜明的标记，但上述情况仍是现实存在的。确切地说，主要是在学术界，碎化、大写的历史在晚近以来为人们所关注。教科书和课程在对主叙事的解构过程中与他们一起落在了后面。欢迎者有之，谴责者有之，恐惧者有之的去中心的历史观可能也光顾了教室。在大学低年级及以下的各级教学中，更是仿效了学界的状况。但是到目前为止，可以有把握地说，被人们所恐惧的历史碎化到目前为止并无恶行，正典知识仍是教室里的主流。

事实是，为大众提供教育的国家作为实体，对教科书传播的知识感兴趣。这一点，自18、19世纪以来在原则上都没有改变过。但是，不单限于西欧和美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知识生产的内容和过程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Frank等2000）。虽然“自下而来”的历史在解构国家叙事方面非常成功，但至今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跨国界历史在被研讨着。跨国界史不像“局部历史”或“自下而上”的历史那样宣称自己反对国家叙事的主导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软化了这种地位。的确，世界化的国家史可能是课堂教学的上选。<sup>①</sup> 在今天的西欧，国家控制远不如以往，如，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白热化竞赛时期，那样森严。跨国组织，如欧盟，肯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世界各国，国家中心依然普遍盛行。尤其是在东欧地区，1989年后民族国家又被造了出来。国家历史在呼吁中被恢复和重构，以便为国家服务。

将这种发展仅限于东欧，尤其是巴尔干是不对的。在美国，国家史对历史专业和教学也是迟迟不肯松手，将美国历史国际化也是晚近的事情（Bender 2000, 2002, Guameri 2002, Osborne 2003）。但是，在美国国家史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课程开发与教学领域，就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标准，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文化战（Appleby 1995, Jones 1995, McDougall 1995, Nash 1994/95, Nash等1997, Nolte 1997, Stearns 1994/95）。<sup>②</sup> 这些文化战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有助于世界史向课堂的进展。但是国家主义者不会轻易投降，布什总统于2002年签署的教育法案，再次下令要加强学校的国家史教育。<sup>③</sup>

---

① 世界化，这一表述出自现在美国哥伦比亚教授日本史的卡罗尔·福子（Carol Gluck），意指努力地将国家史置于世界整体的发展中，并且关注跨国界的发展。——著者

② 还请参见英特网上自1998年以来的高等教育记事中题为“A re the Culture Wars Over? If so Who Won?”的讨论。撰文有托德·格尔林（Todd Gitlin）的“A Truce Prevails For the Left Many Victories are Pyrrhic”；安妮特·柯罗尼（Annette Kolodny）的“If harsh reality Prevail We All Will Continue to Loose”；劳伦斯·W·列文（Lawrence W. Levine）的“Struggles are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Better Universities”；格尔涂德·汉姆发布（Gertrud Himmelfarb）的“The 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is Still at Stake”；奈尔·欧文·品特（Nell Irvin Painter）的“Battles are Far From Over in Culture’s Private Clubs”；艾文林·胡蒂哈特（Evelyn Hu-Dart）的“The Spotlight is Shifting to Students of Color”；瑞·苏尔瑞兹（Ray Suarez）的“Too Many in Academia Stayed Grandly Above the Fray”。——著者

③ 参见 Perspectives 总第40期，2002年第2期第16页。——著者



按照教科书研究者所认同的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纲领, 一些民族, 尤其是自认为种族纯真的国家, 如二战时期的德国, 前南斯拉夫, 对本国独特性的坚持, 过去是, 仍将继续是矛盾激化的原因。因为国家叙事太易于堕入国家的陈词滥调中, 增加了诱发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敌意。所以, 以狭隘的国家史为中心问题很多。虽然在教科书和课程中使国家、种族相对化不能阻止矛盾产生, 但它可以以温和的方式促进人们之间的和睦共处 (Jeismann 1979, Pingel 1999, Schissler 1991)。

#### 四、全球化时代理解单数大写历史的方法

除了动不动就被提及的“全球化”之外, 单数大写的历史在开拓情境和提供理解整体世界的模型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论据。虽然世界性的历史事件通常是在追溯中彰显他们的意义, 但是, 有时我们对世界及我们所在地的觉悟却是瞬息完成的。以以下四例为证: 柏林墙的倒塌, 前苏联的迅速解体, 随之而来的两极世界的消解, 9 11恐怖袭击, 这些事件作用于我们对世界认识的效果, 可谓立竿见影。这些事件及发展使我们感到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得复杂而难以预料。人们越来越痛苦地认识到只理解自己的所在地和国家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理解外面的世界, 了解全球关系及文化。不如此, 人们就没有方向感, 无法生活下去。对学生有意义, 且能满足目前人们有待明确方向之需求的世界史应该是对相互关联着的、正在全球化进程之中的世界作出得当的回应。

但是, 全球化是一个模棱两可且有欺骗意义的术语。它什么都包括亦就什么都不包括。当我提到“全球化”, 显然不是指彼得·斯特恩 (Peter Stearns) 所谓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势力及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高声认同” (Stearns 2003: 153)。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一背景下, 当世界级的政治、经济头面人物会晤于瑞士一流的旅游风景区时, 越来越多的人在试图每年更换一个居住地。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 也成了后殖民作家辛辣的讽刺和分析对象 (Chakrabarty 2000, Guha 2002)。查尔斯·布莱特和迈克尔·盖耶 (2002: 65) 写道: “对全球化观念的抵制是可理解的, 尤其是它浮夸的赘述。人们怀疑它将只不过是对于世界新版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化可能是支持管制的最后一个概念, 正如盖耶和布莱特在他们最重要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中所说的那样, 应该分析地、历史地来使用这个术语, 而不应如此殖民化地使用。世界已全球化了几个世纪, 尤其是在 15、16 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国际贸易关系建立时期,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将其推至了高峰。但是今天也有发展, 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些事件预料不及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过程。这种突飞猛进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 历史时间观念的转变和个人生活非中心化。欲了解当下的情景, 只把民族和国际关系相对化是不够的。跨国界联结比民族关系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为了开阔历史视野, 为了把兴趣点从“容器模式”移至“跨国界性”需要很多的实证和理论操作。世界史传达人们在区域和全球范围联结和交换的观念。卡伦·维根 (Karen Wigen) 区分了四种治世界史的方法: 追踪具体的事件流、分析对事件流的回应、分析一个时段、叙述一个接一个的全球化形态。迈克尔·盖耶讲述了叙述全球性的详尽方法, 并将全球史引进教室。正如本尼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所说: “当世界史是对历史时间以及跨国界叙事的回应时, 很显然它并不认为民族国家是无关系的” (Anderson 1991)。事实上, 民族国家是为了控制全球化进程, 应运而生的历史产物 (Bright 和 Geyer 2002: 66, Middell 等 2003)。经验地, 用黑格尔学派的术语说, 在全球化进程中, 是包括并超越<sup>①</sup>民族国家; 并且, 观念地说, 在世界史中它必须有自己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 世界史是另一股解构的力量, 它使民族叙事相对化、情景化, 清除了它们获取历史意义的夸张宣言。

如此, 世界史在原则上和以往的西欧中心论是有区别的。正如丹尼尔·思高 (Daniel Segal 2000) 所指出的, 世界史教材以文化进化论的模式对西方文明史教材亦步亦趋, 所以, 教授世界史和编写世

---

① 原文在此是德文加英文 “aufgehoben (included and transcended)”。——译者



界史教材的尝试也并非全然成功。用迪派士·查克拉巴蒂 (Dipesh Chakrabarty 2000, Wasserstrom 2001) 的话说就是它尽力在使欧洲地方化。在其纲领性的陈述中, 世界史对西方思想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正如它在美国发展的那样, 世界史只不过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的一种新理解。西方文明谈论美国的欧洲渊源, 世界史则告知美国人口的多移民组成。由于男性白人具有美国正统性及其历史的霸权性, 自民权运动以及妇女运动以来就遭受严厉谴责, 学者们一直在揭示美国的非欧洲根源。是文化多样性和对差异的认同, 将世界史和启蒙时期的传说区别开来 (Allardyce 1982)。在成为有组织力的叙事前, 世界史不得不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书写作解构的努力。在纲领性的层面上, 这一目标不时地被达到。请看一本在美国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中所述:

(教授世界史) 的原因显而易见: 美国的人口构成在不断地改变, 这增加了对国际状况理解的需求。欧洲遗产虽然仍有生命力, 却合乎逻辑地和非洲、亚洲各地、以及拉美的文明之源共享我们的注意力。第二, 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长, 它在太平洋沿岸、加利比海岸和大西洋沿岸长久以来就是一大势力, 但是美国将它的利益画定在欧洲。在 20 世纪后半叶, 参与了三场亚洲战役后, 再加上全球范围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往来, 美国及其公民已拥有了全球观念。这一观点强调当前国际事务和所有文明的重要性。我们同时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除政治和高雅文化之外的涉及妇女和非精英的经验与事件。(Steams 等 1992 13)

这一观点维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沉浸于解构工作的世界史, 反对无法为师生指明方向的文明游行般的世界史研究方法。

虽然全球史本身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 但又有很多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怀疑国家是意义的来源, 同时不满以前从抑制而来的安全感, 它论证应在课堂讲授全球化的历史。那么这些史无前例的东西是什么呢? 在众多的中我们来看看卡斯特 (Castells 1998 336)。以下的东西是新的: 计算机、因特网、传播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交往方式变革; 挑战男性地位及两性关系的社会运动; 从事通讯技术劳动大军形象的改变; 从业人口模式的改变, 其中妇女、少数民族人数的增加, 结果代际间关系发生了变化, 文化革命发生了。它不仅仅使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等级制”被相对化了, 而且促进了新的获取知识的方式产生。对教育的需求发生了相对的改变; 世界范围的跨国界移民, 世界人口向都市的汇集; 国际贸易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使世界上没有地区不受牵连; 全球金融市场, 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畅行无阻; 全球及地区性新的不平等现象。这些都有待我们去认识。这种全球化的力量给当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而这一改变仍未被充分理解。

急剧的变化使人们必须不断地学习新事物。30年前所谓扎实的知识今天已经贬值。孩子们、年青人所处的世界与其父母大不相同。工作生活也已改变, 有偿工作已成为稀有商品 (Sennett 1998)。家庭生活, 由于被战争中断, 也由于世界范围内对家长制的攻击, 也发生了改变。这又进一步改变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生活并使很多个体疏离于家庭网络之外。20世纪后半叶被认为是靠得住的事物, 如将来或年老时的经济地位, 兴旺状况在很多国家要么销声匿迹, 要么变得不可靠起来。对已经削减或正在削减福利的西半球国家, 这些都已成现实。1989年从苏联势力范围走出来的人们, 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这种不安全感更是突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时这些人们还知道期盼些什么, 但是现在却被抛入不知所措的处境, 而且常常处于极端的贫困中。

人们现在以更快的速度穿越时空。人们的方向感以及对方向感的需求无法跟上新的变化。断裂无处不在。尤其是经历了政权更替、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崩溃的人们, 这一点尤为深刻 (Castells 1998 第二章)。在从原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中, 以往人们行事为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戏剧性地变得不管用了。在西欧其他国家, 过去 30年的生活轨迹亦处处是急转弯。这些变化为一些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把许多人抛在了后面。这些人要么太穷, 要么年纪太大, 要么受教育程度不高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住在现代性外围, 无法利用全球化进程中的机会。按照布莱特和盖耶的说法, 全球化一方面加深融合, 一方面激增不同。新的不平等出现了: 全球化远非在建

造一个均质的世界，相反，它使分歧和不平等触手可及（Bright和 Geyer 2002 68~ 69）。卡斯特恰当地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第四世界的产生过程”。在其中，一些人高升，一些人则被抛入赤贫、无靠和无知中（Castells 1998 第二章）。无论在全球或社区层面上，中心与外围无情地赠予与剥夺人们的生活机会（同上）。最终是只有一个世界，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应于西方现代化标准的同一世界。“世界各民族被迫卷入全球交往的进程，却在各自的多样性中转型而以新的分裂方式出现”。结果世界是多样性的现代化（Bright和 Geyer 2002 68）。

多内涵是全球化的标志。相互关联性、变快的生活节奏、开阔的视野、少数幸运儿的世界主义是多元现代性的一方面。<sup>①</sup>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公开的阴险凶恶，也是晦暗暧昧。后现代，一种无中心的状况，正如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97, 2000）所说，迫使人们不时地构建新身份来适应一种“流动的现代化”（Giddens 1991, 1994）。<sup>②</sup>意义的流动和新身份的找寻对以往受传统、宗教、性别压制的诸多人而言是一种解放；同等地，这种状况也不易忍受。如果中心不再，自由对一些人意味着迷茫，对另一些人甚至是崩溃。一个人也可能同时经历自由与迷失。无法拥抱新自由的人们，可能找寻“拐杖”以求得稳定的象征。这种情形将成为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养儿场，在那里，人们挖了土放在脚跟上来抵抗过于复杂的世界。

当前的情形要求人们重新思考各级教育。随着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和全球事务日益发展，人们需要新知识来建立方向感，这不容忽视。对教育标准的不断改变，影响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现代生活的两面性使教育者重荷难负。学生能力低下，没有明确的生活方向，教育总是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但是教育危机只是表征而非罪魁。诚然，老一套的东西不管用了。如果老的方式不足以理解世界，尤其是作为“容器模式”的国家史，那我们就必须想出更合适、更有效的方式来了解世界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在努力装备人们迎接多元现代性及路径不等的融合世界所带来的挑战这场战役中，教育处在前沿。世界史是帮助学生应对当前需要的尝试。

世界史有助于师生认识到世界并非远在天边，而是浸透于我们的生活，并且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助于忍耐现代性的模棱两可性，并有助于抵制原教旨主义的诱惑。在致力于当今的历史性时，世界史有助于师生在现代社会把握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制止弥漫世界的的不平等性。但是，任何涉猎从史前到当代所有世界史的尝试都是令人生畏的。看一看美国教科书就十分清楚。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通常上千页，仅目录插图一路下来就十几页，重 2.5 公斤。民族心态不管用了。晚近以来我们期待历史学家注重差异性，对性别应保持敏感；<sup>③</sup>现在我们还希望历史学家开阔视野，为他们的学生能在当今世界上游刃有余，不迷失方向寻找出路。

#### [参考文献]

- Allardyce, Gilbert 1982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rs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695-725
- 1990 "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no 1: 23-76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Appleby, Joyce 1995 "Controversy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9, no 3
- Assmann, A. 1995. *Arbeit am nationalen Gedächtnis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ildungsidee*. Frankfurt

① 我的后现代理论主要源自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尤利西·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者

② 流动的现代化亦称轻现代性，出自齐格蒙鲍曼的同名后都市社会学专著。——译者

③ 如何将性别和世界史融合起来，请参加康奈尔（Connell 1993）。——著者

## Campus

- Bauman, Zygmunt 1995.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 199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nder, Thomas 2000. *The La Pietra Report: 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Bloomington: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 ed. 2002.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ntley, Jerry H. 1996. *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Bright, Charles and Michael Geyer 2002. "Where in the World is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Age." In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ed. Thomas B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 The Power of Identity*. New York: Blackwell
- 1998.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I. End of Millennium*. New York: Blackwell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lub of Rome (Dennis Meadows, Donella Meadows, Erich Zahn, and Peter Milling). 1973. *Die Grenzen des Wachstums: Bericht des Club of Rome zur Lage der Menschheit*. Hamburg: Rowohlt
- R. W. Connell 1993. "The Big Picture: Masculinities in Recent World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2: 597–623
- Conrad, Sebastian 2002. "Doppelte Marginalisierung: Pädoyer für eine transnationale Perspektive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28: 145–69
- Dunn, Ross E. 2000. "Construct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In *Know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Histor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ed. Peter Stearns, Peter Seixas, and Sam Winebur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ckart, Andreas 2002. "Gefangen in der Alten Welt: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st hoffnungslos provinziell. Themen jenseits der europäischen Grenzen interessieren die Historiker kaum. Eine Polemik." *Die Zeit*, no. 40 (26 September): 40
- Erdmann, Elisabeth 1998. "Was verstehen wir unter 'Weltgeschich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istory Didactics: Information, Mitteilungen, Communications*, vol. 19, no. 1: 14–26
- Frank, David John, Suk-Ying Wong, John W. Meyer,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2000. "What Counts as History: A Cross-Na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y of University Curricul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4, no. 1: 29–53
- Geyer, Michael and Charles Bright 1995.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1034–60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eds.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ameri, Carl J. 2002. "Internationalizing the United States Survey Course: American History for a Global Age."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5, no. 1: 37–64
- Guha, Ranajit 2002. *History at the Limit of World-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Jeismann, Karl Emst 1979.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Aufgaben und Probleme."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vol. 1, no. 1: 7–22
- Jones, Amita A. 1995. "Our Stakes in the History Standard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9, no. 3
- Koselleck, Reinhart 1975. "Geschichte" section: "Von der 'historia universalis' zur 'Weltgeschichte'." 686–91 in *Begriffsgeschichtliches Lexikon*, eds. Otto Brunner et al., Stuttgart: Klett
- Lindvedt, Ane 2001. "Pluses and Minuses of a Secondary School World History Text."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4, no. 3: 383–7
- McDougal, Walter A. 1995. "Whose History? Whose Standard?" *Commentary*, vol. 99 (May): 36–43

- Middelj Matthias 2002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oder *global history* – *master narratives* oder Fragmentierung?" in *Die historische Meistererzählung Deutungslinien der deutschen Nationalgeschichte nach 1945*, eds Konrad H. Jarausch and Martin Sabrow.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14– 52
- Middelj Matthias, Susanne Popp, and Hanna Schissler 2003 "Weltgeschichte in deutschen Geschichtsunterricht Argumente und Thesen."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vol 25 149– 54
- Nash, Gary B., Charlotte Crabtree, and Rob E. Dunn 1997. *History on Trial: Culture War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New York Knopf
- 1994/95 "The History Standards Controversy and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9 39– 49
- Nolte, Paul 1997. "Ein Kulturkampf um den Geschichtsunterricht Die Debatte um die National Standards in den USA."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48 512– 32
- Novick, Peter 1988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borne, Thomas J 2003 "Implementing the *La Pietra Report* Internationalizing Three Top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Survey Course."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6, no 2 163– 75
- Pingel Falk 1999. *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 Hannover Hahn
- Pomata Gianna 1993 "History, 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On Reading Some Recent Women's History Textbooks." *Feminist Studies*, vol 19 7– 50
- Rostow, Walt W. 1971.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Friedrich von 1970 Nationalausgabe, vol 17. Weimar Böhlau
- Schissler, Hanna 1991. "Der Beitrag der internationalen Schulbuchforschung zur Friedensforschung." In *Friedensforschung – Eine Handlungsorientier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ed Ulrike C. Wasmuth.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79– 91
- 2003 "Weltgeschichte als Zeitgeschichte Orientierungsbedürfnisse der Gegenwart am Beispiel der USA und Deutschlands." In *Curriculum Weltgeschichte Globale Zugänge für den Geschichtsunterricht*, eds Susanne Popp and Johanna Förster-Schwalbach. Wochenschau 173– 95
- Schmidt, Marianne 1991. "Was kommt nach Europa? Überlegungen zur Didaktik einer neuen Weltgeschichte." In *Geschichtsunterricht in vereinten Deutschland. Auf der Suche nach Neuorientierung*, part 2, ed Hans Süßmuth. Baden-Baden Nomos 121– 31
- Segal, Daniela 2000 "'Western Civ' and the Staging of History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770– 803
- Sennett, Richard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 Steams, Peter, Michael Adas, and Stuart B. Schwartz 1992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1994/95 "The World History Standard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28 441– 46
- 2003 "Treating Globalization in History Surve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6, no 2 153– 60
- Strasser, Ulrike, and Heidi Tinsman 2003 "Engendering World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forthcoming no 91, Winter 2005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1989.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2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sserstrom, Jeffrey 2001. "Eurocentrism and its Discontent." *Perspectives* (January).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 周 兵

[摘要] 微观史学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诸多新的潮流之一，它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张缩小历史分析的范围，用“显微镜”去聚焦研究个体的人物、家庭和村落社区。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最早开始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微观史学派，影响遍及西方史学界。

[关键词] 微观史学 意大利 卡洛·金兹伯格 《乳酪与蛆虫》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5) 03-0093-06

历史学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越来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目，日渐多样化的格局使得历史学家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施展才华，丰富人类对过去的认识，但同时也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者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既然从总体上把握和梳理当代西方史学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我们也不妨效仿微观史学家们的做法，由细微处入手，或可渐渐窥得整个森林的宏大。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新史学和年鉴学派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immobile history）的倾向受到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微观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所采取的应对、力图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的诸多新的史学潮流之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在微观史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意大利微观史学派。本文即旨在对这个学派作一简要的介绍与评价。

西方微观史学的研究风气最早开始于意大利，它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洛·波尼（Carlo Poni）、埃德尔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ari）等，他们最早创造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 即 Microhistory）这个词，用来界定这样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sup>[1] (P99)</sup>的研究方法。后来，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和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就曾专门撰文讨论历史微观分析问题，并发展了意大利微观史学的若干方法。而 20 世纪 80 年代年鉴学派史学研究中的某些趋势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对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可以说都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意大利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研究。

1977 年，爱德尔多·格伦迪撰文《微观分析与社会史》（‘Micro-analisi e storia sociale’），首先

---

作者简介 周 兵，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200433）。



提出了利用微观分析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倡议。1979年, 卡洛·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发表《名称和游戏: 不平等的交流和史学市场》(‘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一文, 详细讨论了推动微观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在意大利开展微观史学具有有利的条件, 如丰富完整的历史资料; 主张开拓微观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相互间的理论借鉴, 在意大利建立历史人类学; 并提出了进行微观史学的实践的关键问题——“名称”, 包括人名、地名等等, 金兹伯格和波尼称之为“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聚集到名称和从名称发散开的线索, 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 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 而个人便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他们进而生动地勾画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前景, “一方面, 通过缩小范围, 在许多情况下它(微观史学)使得在其他史学门类中难以想象的‘真实生活’能够得以重建。另一方面, 它提出了去研究那些能够反映人们鲜活的生活经历的无形结构。”他们希望意大利史学家能够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展广泛深入的微观史学研究, 改变意大利史学在与法国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交流中长期所处的被动局面, 即接受远远多于付出的窘境, 而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史学的合作和交流, 提高意大利史学的地位。<sup>[2](P1-10)</sup>

事实上, 早在格伦迪等人的登高一呼之前, 一些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了。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论文, 就是在看到了新出现的一些“以非常近距离地分析高度封闭的现象——如一个村落社区、一个家族群体、乃至一个个体的人为特征的历史研究”<sup>[2](P3)</sup>后感而发的。金兹伯格的名著《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最早出版于1976年, 如今已被奉为微观史学的经典著作。同一时期, 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 类似的微观史学研究也先后问世, 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 被看作是微观史学先驱之一的乔治·杜比(George Duby)的《布维纳的传说: 1214年7月27日》[*La Dimanche de Bouvines (27 juillet 1214)*, 1973年],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1975年),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讨论中国史的著作《妇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年)等。

可以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 微观史学在整个西方史学界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史学趋势, 尽管在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并不一致, 甚至存在种种争论, 但仍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一般说来, 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 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 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 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 一个或几个事实, 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 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 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 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 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sup>[3](P22)</sup>

那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整个的潮流之中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 诚如金兹伯格和波尼所期望的那样,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充分利用了本国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 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 大大发展了微观史学的研究, 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

## 二

卡洛·金兹伯格无疑是众多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之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位, 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通过简要地介绍和分析他的代表作《乳酪与蛆虫》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微观史学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

《乳酪与蛆虫》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外号梅诺乔(Menocchio)的意大利农民, 他一生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叫做蒙特利勒(Monteraiale)的偏僻山村, 以经营磨坊为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

农民，梅诺乔能读会写，因而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宣传新教及异端思想的书籍，由此形成了与普通村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另一方面，由于其出生于底层社会，背景、经历又不同于当时的知识阶层，其思想完全形成自个人的想象和理解，因而显得更加与众不同。除了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诺乔还敢言善辩，一直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宣传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和世界的观点，因此于 1583 年被当地宗教法庭以“异端和亵渎上帝”的罪名起诉，经过前后两次长达十多年的审讯，于 1599 年前后被宣判处死。

历经几个世纪，宗教法庭对梅诺乔的审讯记录等相关文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金兹伯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由于资料丰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梅诺乔）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失望。”<sup>[4](P11)</sup>金兹伯格利用大量的史料将研究聚焦在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去放大和解读这个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

其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根据梅诺乔零散的供词记录，描绘 16 世纪意大利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关系。在 1976 年最早的意大利版的序言里，金兹伯格首先便批评了过去史家仅关注“帝王将相的伟大功绩”的做法，表示要转向那些他们先前“以沉默、抛弃或完全忽视而置之不理”的人们，也就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普通人。<sup>[4](P13)</sup>由此建立起一种与上层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历史，因此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首先是一本文化史的著作，微观的历史分析是他研究的一种手段。

那么，如何从特殊的、个体的人的身上去解读某个特定时代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呢？以梅诺乔的例子而言，他本身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体，既不容于天主教会，又同他周围的普通村民显得格格不入，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可以从中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通俗文化？况且微观史学经常聚焦的一些对象，如叛逆、异端、罪犯等往往都来自下层社会，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都属于另类，这是微观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格伦迪认为如同在统计过程中可以允许一定的例外一样，少量的特例是完全正常的现象。<sup>[5](P14)</sup>金兹伯格则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

首先他指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无论是奥地利的贵族还是 17 世纪英国的下层教士。”<sup>[4](P20)</sup>一个人，不论他有多么普通或是多么特殊，首先是从属于他所属的时代和自己的社会阶层的，梅诺乔的与众不同仍然要受制于他的时代和文化。此外，“对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来说，某种形式的触犯权威属于正常的行为，社会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即那些违法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对那些没有其他调整方式的人们来说是正常的。因此，一些违规者从政府或教会当局制定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异己分子，但却往往是他们自身社会背景的最佳代表。”<sup>[5](P14)</sup>

其次，针对当时盛行的社会史和计量史研究虽然重新认识到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却只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无声的”统计数据的做法，金兹伯格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个体的事例用叙述的方式重现一段通俗文化史，至少能够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片面认识，“甚至是一个有限的例子（梅诺乔即是如此）也具有代表性：消极地讲，因为它有助于说明那些在特定的情况下被理解为‘统计数字的大多数人’；或是从积极的角度讲，因为它使得我们得以确定一些事情（通俗文化）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和一些被歪曲的文件才能了解，而几乎所有这些都出自‘统治者的档案’。”<sup>[4](P21)</sup>

于是，金兹伯格透过梅诺乔个人的精神世界向我们展示了 16 世纪意大利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化”。在梅诺乔看来，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气、水、火混杂；世界即由此形成，就像牛奶做成的

乳酪一样，而蛆虫也出现其间，这些就是天使”，<sup>[4](PP5-6)</sup>而上帝也是出现于这个时候。梅诺乔奇怪的宇宙观来自于他用当时通俗的思想和传统对其所阅读的书籍的解释，在梅诺乔向宗教法庭交代的长长的书目当中，有意大利方言版的《圣经》、薄伽丘《十日谈》未经删节的版本，甚至还有一本意大利文的《古兰经》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历史、游记类书籍。奇怪的是，这些文本的真正含义与梅诺乔的诠释大相径庭，那是因为他将自己阅读到的模糊文本概念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经验相结合，并投射到其思想和言论之中。金兹伯格认为，“正是这些印刷的书籍和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口述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sup>[4](P33)</sup>

在梅诺乔这个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当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书写文化 (written culture) 和口述文化 (oral culture)；在《乳酪与蛆虫》一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梅诺乔的案例，通过描述法庭上梅诺乔与宗教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 16 世纪主流文化 (dominant culture) 和次要文化 (subordinate culture) 之间的强烈对抗。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向读者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通俗文化 (更准确的说是农民文化)。”<sup>[4](P12)</sup>而梅诺乔的所谓宇宙观，正是他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 16 世纪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会依然存在的泛神论 (pantheism) 的一个变种。”<sup>[5](P10)</sup>

### 三

在金兹伯格的开山力作之后，加上其他一批历史学家的共同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在研究的规模 and 影响上，还是在理论的完善、实践的創新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此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和一本学术刊物功不可没。

1981 年至 1992 年间，在都灵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 (Giulio Einaudi) 的支持下，由金兹伯格和列维任主编，连续十多年先后出版了一批微观史学研究的专著，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影响的“微观史学” (Microstorie) 系列丛书。其中主要是一些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的研究论著，<sup>①</sup> 也包括部分翻译的微观史学经典论著。<sup>②</sup> 出版商在宣传这一丛书时宣称，“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融合。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sup>③</sup> 这一丛书的问世，奠定了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

① 如卡洛·金兹伯格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卡的专著《皮尔罗之谜：皮尔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基督受洗〉、阿雷佐的拱顶画、乌尔比诺的〈鞭笞基督〉》 (Indagini su Piero Il Battesimo, il ciclo di Arezzo, la Flagellazione di Urbino, 1981 年)，佩德罗·雷东迪 (Pietro Redondi) 对伽利略受到宗教法庭异端指控事件的专题研究《异端伽利略》 (Galileo eretico, 1983 年)，乔万尼·列维的人物研究《继承权力：一个 17 世纪皮蒙特的被魔师的故事》 (L' eredità immateriale Carriera di un esorcista nel Piemonte de Seicento, 1985 年) 等。

② 如 1981 年编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P·汤普森 (Edward P. Thompson) 关于结合人类学方法进行 18 世纪英国史研究的一组论文，以《贵族社会，平民文化》 (Società patrizia, cultura plebea: Otto saggi di antropologia storica sull' Inghilterra del Settecento) 为题结集出版，1984 年翻译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那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 的微观史学名著《马丁·盖尔的归来》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986 年翻译出版的荷兰人类学家安东·布洛克 (Anton Blok) 有关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暴力活动起源发展的专著《一个西西里村庄的黑手党，1860-1960 年》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1860-1960) 等。

③ Presentation to the “Microstorie” collection in EINAUDI 1993 转引自 Henrique Espada Lima ‘Historical Microanalysis and Social History: Exchanges Between British Marxist History and the Italian Debate on Micro-history’, unpublished paper for conference ‘Making Social Movements -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by Edge Hil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on June 26-28 2002, p. 19 另见 <http://www.edgehill.ac.uk/research/smg/pdf/20-20Conference/EspadaLima-HistoricaMicroanalysisandsocialhistory.pdf>

1966年创刊的史学刊物《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也在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保守的意大利学术界,《历史笔记》一向以创新求变而独树一帜,成为了一个“鼓励试验创新、少数派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避免任何意识形态或党派之见”<sup>[5](PP8-9)</sup>的理论阵地。微观历史学家们充分利用这个阵地,第一部分中提到的1977年格伦迪及1979年金兹伯格和波尼的两篇呼吁开辟微观史学研究的文章均发表在《历史笔记》上,以后各类微观史学研究的论文更是频频出现在这一刊物上。

综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文化微观史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主流,它以金兹伯格为代表,主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所谓“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观点在文化微观史家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异曲同工的是,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在金兹伯格那里,就是通过对审判记录等资料的细致研究,发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微观史家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历史的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它们仅存在于那些接受了具体规则和信仰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有名有姓的个人的身上,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语境区别地加以考察,进行微观化的历史分析。

社会微观史则主张“社会边缘人群的行为可以用来说明社会权威的本质。”<sup>[5](P15)</sup>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列维和格伦迪,他们在理论上主要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传统有很大的联系。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意大利历史学家中,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日后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建立宏观历史学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据列维的说法,“那些投身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通常与马克思主义都颇有渊源,即一种并非空谈的偏左的政治倾向和激进的世俗主义。尽管事实上这些特点在表现中往往多种多样,但我相信它却使这些历史学家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项讲究文字和追求美感的活动。”<sup>[1](P98)</sup>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的比较中,也认为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项重要因素,“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sup>[6](P124)</sup>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更多地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到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它们的文化和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上。

1977年,格伦迪在《微观分析与社会史》一文中就把微观分析定义为“社会史,即‘人与人群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步骤。”<sup>①</sup>列维1985年出版的《继承权力》一书,尽管同样是以一个人物而展开的微观史研究,但不同于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中自始至终围绕梅诺乔的心态、命运为中心的做法,“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是看两样不可捉摸的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力和威信)是如何维护的和转移的。”<sup>[3](P27)</sup>同时,“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即契耶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sup>[6](P129)</sup>这本书是社会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它标志着意大利微观史学在

---

① 转引自 Henrique Espada Lima ‘Historical Microanalysis and Social History’, p. 19 利马在这篇论文中,以格伦迪为代表,详细地讨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尤其是爱德华·P·汤普森)对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

文化微观史之后又取得了新的进步，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

#### 四

新兴的微观史学对传统意大利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触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反对之声。乔万尼·列维在其讨论微观史学理论的论文《论微观史学》（‘On Microhistory’）中，就引用了老一代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一段批评，他说：“研究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是毫无意义的，如今却频频出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研究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思想的起源，而不是写小说。我只需举一个例子：今天有大量的讨论是关于要求恢复市场的问题。是谁创造了市场？18世纪的人们。在意大利又有谁关注于此？是启蒙思想家杰诺维西（Genovesi）和维埃里（Verri）。至关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研究中心牢牢地放在当代生活的根源问题上。”<sup>[1] (p100)</sup>文图里的批评集中在微观史学的两个最大的特征上——注重局部、细节和强调叙述性，而这正是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们力图摆脱和超越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并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国际史学界尊敬的关键。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微观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不少微观史学研究在进行微观分析的过程中，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宏观的、总体的历史背景，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琐碎的问题上，由于“见木不见林”而流于简单。要纠正这一问题，“理想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sup>[3] (p29)</sup>这是微观史学突破自身局限的途径，也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大势所向。

今天，梅诺乔的故乡蒙特利勒已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如它的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成就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篇章。

#### [参考文献]

[1]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M]. edited by Peter Burke,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M]. edited by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translated by Eren Branc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陈启能. 略论微观史学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2 (1).

[4]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M].

[6]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郭秀文



# 略论美国“新左派”史学之兴起

◎ 徐 良

[摘要] 美国“新左派”史学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激进的史学流派，从它登上美国史坛的那一天起，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激进的史学观点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史学流派，“新左派”史学的形成和出现是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美国 “新左派” 史学 流派 兴起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099-06

纵观20世纪美国史学发展史，连续性之匮乏乃其一大通病，流派的林立及其更替变迁更是当代美国史学的一大特色。在美国史学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时期的历史解释都受到当时社会状况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影响。正如美国著名老左派史学家菲力普·丰纳(Philip S. Foner)教授所言，“从古到今的史学都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对任何一个史学流派的分析 and 评价都必须同研究当时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sup>[1]</sup>“新左派”史学正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从它登上美国史坛的那一天起，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激进的史学观点引人注目，并活跃了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讨论，造成了美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革命性变动。对“新左派”史学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史学乃至美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 一、社会批判思潮的涌动

“二战”以后的美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美苏在战后世界重建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很快进入“冷战”之中，“恐共”、“反共”思想开始弥漫美国社会。特别是在“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影响之下，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衰退，美国人开始重新强调民主传统的重要性及美国政治体制的连续性与一致性。<sup>[2](P96)</sup>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日趋发展，社会彰显繁荣，美国社会思想逐渐脱离20世纪20、30年代的改革精神，而渐趋保守，强调美国社会的丰裕与和谐。以彼德·维利克(Peter Viereck)和卢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歌颂美国的传统思想和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sup>①</sup>

但是，到了60年代，<sup>②</sup>美国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

---

作者简介 徐 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学及文化(上海，200433)。

① 彼德·维利克和卢塞尔·柯克被认为是“二战”后初期，完成对“新保守主义”最后进行明确的界定并系统阐明其信条工作的两位著名学者。前者的主要作品有：《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对反叛的反叛》(*Conservatism Revisited: The Revolt against Revol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49)和《知识分子的羞耻与荣耀》(*Shame and Gl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3)等。后者的重要著作有：《保守主义的头脑》(*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保守主义者纲要》(*A Program for Conservativ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等(详见钟文范：《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这里所说的“60年代”，一般泛指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的一段历史时期。

先，美苏两国的“冷战”关系在这一时期趋向和缓，美国国内的反共意识开始弱化。其次，1954年麦卡锡主义的倒台进一步淡化、弱化了美国国内的“反赤”宣传，人们可以重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不同言论。再次，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改革计划，是以承认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端为前提的，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社会批判的气氛。<sup>[3](P299)</sup>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的那种一味歌颂美国民主自由传统的态度到了60年代，开始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不满，他们发现在自称为“丰裕社会”的美国，仍然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种族问题、越战问题、贫穷问题和教育制度问题等等。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60年代的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强烈的抗议运动，黑人的抗暴斗争、学生的反文化运动与群众性的反战风潮一起，汇合成为一股激荡的洪流，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一群激进的社会成员开始聚集在一起，成立各种团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他们改变美国社会的目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则开始尝试由历史来说明一切，认为过去的历史解释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并不正确，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便是最好的明证。他们要从历史的“沉积岩”中找寻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在解释美国历史的方式和态度上与前截然不同，一股社会批判的思潮开始在美国历史学界勃然兴起。可以说，美国“新左派”史学的出现，正是在史学方面对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宁和阶级斗争尖锐的自然反映。

## 二、对新保守史学派的反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50年代，在当时美国社会繁荣稳定和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抗的形势下，美国历史学家纷纷强调美国过去历史中“一致与延续”的重要。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和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作品里，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延续观念。它强调美国社会的整体性、制度的稳定性和国家的延续性。正如约翰·海厄姆在他的论文里所指出的，“当前学术界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平整工作，以掩饰美国的社会动乱”。<sup>[4]</sup>当时的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看法十分保守，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静温和的过去，“许多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恢复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精神。他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在近年来已摆脱了20世纪初期特有的那种被人忽视的状态而重新出现了。恰似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前所做的那样，今天的历史学家正在展示出一片人间乐园，外表上是大胆冒险，骨子里却是稳健保守，而且首先是明显地单一的。”<sup>[4]</sup>

在以路易斯·哈茨、霍夫斯塔特、海斯、波特和布尔斯廷等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史学家那里，美国历史的特点就是连续性、满足和“利益一致”。在他们看来，美国历史上要么没有存在过斗争，要么斗争并不是由于真正的不公正，而是由于某种想象的不公正所造成的，正所谓“不是某一历史学家自己的幻觉，便是支持他的一些人的幻觉”。<sup>[4]</sup>他们认为，美国的历史并没有经过突然的、愤怒的、紊乱的大动荡，相反几乎是静止的。如果说美国人彼此之间也有不同意见，这些意见也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或者是涉及财产和政治民主这些根本问题的。在他们的描绘中，美国历史是单一的、静止的，基本制度是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牢固的，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美国人具有一种统一的文化和共同的“美国经验”。

在“新保守主义”史学家中，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1955年）和布尔斯廷的《美国政治的天才》（1953年）这两本书可以说勾勒了一个对美国反进步解释的纲要。他们两人不仅修正了美国历史的一些细节，而且改变了整个布局。前者在书中宣布：美国除了自由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传统，后者则干脆否认美国有任何思想体系。在布尔斯廷看来，美国没有产生系统的、基本的政治理论，“但这个缺点不能证明美国的幼稚，相反地，它恰好说明美国并不存在深刻的对抗性矛盾，因此无

须求助于某种政治理论的保卫。”<sup>[5]</sup>他在 1958 年出版的另一本书《(美国人：殖民时期的经验》中，又把观点加以发挥，认为美国的繁荣正是摆脱欧洲的社会和思想影响而走向单一社会的结果。这样，“布尔斯廷以使人难以置信的精湛技巧，转动他自己智慧的圆规，绘出了一幅新的美国历史图。”<sup>[4]</sup>

“新保守主义”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霍夫斯塔特的作品也构成了“新保守主义”史学的重要部分。他指出整个美国史恰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流行相吻合，任何像美国那样已经创造物质繁荣的社会，都必有其潜在的一致性。他认为，美国人有时对当前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但是他们却都接受了一套共同的基本观念，使他们在选举之后仍能共同合作。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暂时与地方性的冲突之下，美国文化具有一贯与普遍的传统。他还认为，农民运动与进步运动不是自由或激进的改革，而是保守甚至反动的改革运动，<sup>[6](P11)</sup>从而推翻了 20 世纪前期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史学家对美国进步运动的肯定。

在当时的史学作品中，保守主义意味较浓的还有布朗的《共和党的罗斯福》(The Republican Roosevelt)、《威尔逊及其道德政治》(Woodrow Wils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ity) 和林克的《二十年代的进步运动》等。前者在其作品中，通过对罗斯福与威尔逊在权力使用、处理国会问题的方法、对待政党的态度和对传统的尊敬等方面的考查，最终得出他们都是保守的总统的结论。后者则在其作品中通过大量论述，论证了进步运动是沿袭美国传统改革的一种运动。

除了以上这些带有明显保守色彩的纯粹的“利益一致论”者外，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还存在着一些反对其前辈史学家的“二元冲突”观点，而代之以“多元论”观点的人，他们被称为“批判自由主义史学家”(Critical Liberal Historians)。<sup>[7](P386)</sup>他们当中很多人对社会矛盾还是很重视的，但他们所指的矛盾比他们的前一代“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指的矛盾在范围上要广得多，除了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贫富之间的传统对立之外，在他们对矛盾的理解里又加上了诸如天主教与基督教、禁酒与反禁酒、农村与城市、白人与黑人、老年人与青年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立。“这些都是真实的矛盾，但是它们只限于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因而容易被归咎于思想上的病态幻觉。”<sup>[8]</sup>这种对矛盾进行“泛化”和“中庸化”的理解与分析方法实际上消融了进步主义者对美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矛盾的批判，会在感情上减少对过去各种历史运动的指责。正如昂格尔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这种作法不但暗示所有不满的人都不过是些无病呻吟的人，而且谁是英雄谁是坏人也难以分辨了。”<sup>[8]</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雷塞赫(Ernst Breisach)在他的《历史编纂学：古代、中世纪与现代史学》一书中评价说：“许多人用社会多方面的冲突观来代替阶级冲突的论点，这种以‘多元论’来解释历史的方法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变种。”<sup>[7](P386)</sup>

由上观之，尽管在战后“后比尔德派”时期的美国史学界出现了各种不同于“比尔德模式”的史学思维和史学分析方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强调美国历史的和谐一致性、连续性与稳定性，认为美国本身具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的精神。到了 60 年代，“新左派”的史学家们开始怀疑上述历史解释的正确性。他们认为，新保守派史学至少有三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第一，一味盲目歌颂美国的历程，其史学研究只会为“美国名流社会”服务，助长贵族阶级对社会的支配；第二，新保守派史学家把持了东部名牌大学，唯我独尊，以“学阀”的态度和力量排斥和打击异己观点；第三，新保守派史学家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有用的过去”。<sup>[8]</sup>在他们看来，新保守派史学只注意过去的和谐与持续，抹杀了激进观念，对当时的“新左派”运动毫无帮助。为此，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激进的史学传统，遂在对新保守史学派展开猛烈批判的基础上，致力于重建美国历史解释，逐渐提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

### 三、“新左派”史学之特立独行

继新保守派史学之后登上美国历史舞台的“新左派”史学，是美国史学界 20 世纪 60、70 年代突

起的一支狂飚。正是由于对新保守派史学的诸多不满，他们在分析和解释美国历史时采取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史学方法和态度，表达了其特立独行的史学思想。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激进主义。在批判新保守派史学的过程中，“新左派”史学确立了自己的史学目的，那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历史学，特别是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美国史学”。<sup>[8]</sup>在年轻的左派看来，历史对他们这一派人最明显的用途就是使激进主义美国化。所以，在美国历史中寻找激进主义传统就成了“新左派”史学立足的根本。

在历史上，美国右翼的史学家一直坚持说激进主义不是美国本国的产物，是一种非美的舶来品，它不适合美国的国情。这引起了“新左派”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激进主义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一条红线，正是激进主义推动着美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众多“新左派”史家那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激进主义情怀。哈罗德·克卢斯在新左派历史的主要论坛《左派研究》期刊上曾写到：“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激进主义纲领美国化，我们的办法是：把我们历史中的本国激进主义延续到现在。”<sup>[9]</sup>诺曼·波拉克（Norman Pollack）认为，在美国本身的确曾有一个有生命力的激进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农民暴动联系在一起，这种暴动在平民党的反抗中达到了最高潮。《左派研究》的编辑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则把该杂志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美国历史发展主流的工具。他反驳那种盛行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在美国失败是由于它本身内在的各种缺陷。相反，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自己倒下，而是被打倒的。社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一段大发展之后，被威尔逊政府在爱国的名义下进行的镇压所粉碎。

作为“新左派”史学的主导思想，激进主义贯穿在“新左派”史家的著作和相关论文之中。他们以二元冲突理论代替此前的“一致论”及其变种“多元冲突论”，来重新解释美国历史，以激进的观点批评美国的内外政策，试图以此找到美国社会冲突和对抗的根源。在以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拉菲贝（Walter LaFeber）等为代表的“新左派”外交史学家的著作中，美国成为一个完全堕落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扩张主义色彩。他们认为，“19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帝国主义的冒险事业既不是一件偶然的历史事件，也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它是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就开始的一个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它的根源主要是经济的。……美西战争与兼并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并非是无意之间造成的，这些都是企业家们的需要。”<sup>[8]</sup>他们还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义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是美国“新左派”史学家中内战史的研究者，他抛弃了以菲力普斯为代表的传统官方奴隶制史学的观点，<sup>①</sup>认为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前的一种社会形态，而种植园主哲学是对抗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二者的矛盾导致了美国内战的发生。另一个“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塞恩斯特罗姆更用怀疑的眼光来考察所谓的美国神话，他把激进派的怀疑论和后比尔德派的新技术（数字统计和社会心理学原理）结合起来，写出了他著名的《贫穷与进步》一书，向人们充分证明了19世纪晚期美国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工业发展对社会对立的加剧。在这些“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笔下，美国历史成为一部阶级或经济利益斗争的历史。这样，他们就找到了能够指导他们重建美国新社会的行动方向。

（二）现代理念。在“新左派”的史学观念里，历史研究乃“当代之事”，过去的一切都是为了实际的需要而保存至今。为此，他们强烈反对新保守派史学一味只为过去的历史传统歌功颂德，而无视社会现实问题的做法。他们认为其前辈的学说并没有替当时的美国历史提供一个“有用的过去”。<sup>[8]</sup>所谓“有用的过去”，就是强调历史指导的功能，将历史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在“新左派”史学家的心目中，史学的社会功能是第一重要的，历史最大的功用就是替他们寻找美国急进改革的先例。斯陶顿

<sup>①</sup> 即，认为奴隶制是一所学校，使黑人奴隶开始接触现代文明，奴隶制是完美的慈善制度。

• 林德 (Staughton Lynd) 曾直言不讳地说, 必须从历史中找出可用的激进主义的传统, 以便作为建立新的激进社会的指导。<sup>[8]</sup>

“新左派”鉴于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许多缺憾而怀疑“如此一个不完美的国家, 何以会有一个和谐的去呢?”<sup>[10](P14)</sup>因此, 他们在解释美国历史时特别强调它的冲突过程和激进传统。从这里, 我们看到“新左派”的史学观点明显是基于一种现代意识立场的, 具有明显的当代性, 对过去提出了一连串的新的解释。在“新左派”看来, 历史作品是不能托诸于少数“独坐高楼”的史家去写的, 而必须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火热生活中的人来撰写。

对当前时事的重视就意味着对那种纯粹历史 (即不包括当前斗争的历史) 的轻视。一般“新左派”史学家的研究活动都不是按照历史学科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对话形式进行的, 而是服从于外部文化界和政治界所关心的问题。在他们的命令之下, 历史女神脱去纱裙, 穿上戎装, 为当代社会问题呼喊, 为社会美德而战。<sup>[8]</sup>客观来说,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不因现实状况而任加取舍和解释是史学研究立足之根本。我们在此分析的新左派史学的现代性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它的力量源泉和特色所在, 也是它致命的一个弱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害于新左派史学的历史价值的, 有时难免让人对它的一些研究结论提出质疑。

(三) 下层意识。正是在浓厚的激进主义和现代意识的熏染下, “新左派”史学家们第一次在美国史学史上迸发出一种强烈的下层意识。他们在批驳新保守派史学的过程中, 多次指出并批评其张扬的权贵意识和明显的精英色彩。他们说, “新历史学是为一个只包括高等人物和贵族的社会, 为‘美国名流社会’服务的”,<sup>[8]</sup>他们只代表上层社会的利益, 而听不到广大社会底层群众的声音。

在“新左派”外交史学家们的慧眼之中, 作为金融集团利益代理人的统治者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时, 考虑的重点首先是上层金融集团的利益, 而根本不考虑下层人民的处境。尽管表面上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起主要作用, 但他们不可能提出什么替代方案, 控制信息扩散是政策决策人操纵权力的主要手段, 公众只能对外交政策被动地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他们希望在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能有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新左派”史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杰西·莱米西 (Jesse Lemish) 认为, 新保守学派关于美国历史“和谐一致”的观点之所以错误, 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注意到“和谐”的社会上层, 而忽略了社会下层。他强烈谴责新保守派史学家只是一味地考察统治阶级, 认为他们“或者让一个精英的观点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 或者根本忘记了他们并不了解大多数人心里在想什么。”<sup>[11](P3-29)</sup>他呼吁通过分析社会底层来研究美国革命, “自下而上”地重写美国的历史, 认为这样所得的结果也许要比从社会顶端研究所得的结论更接近事实。而“新左派”奴隶制史学的代表——吉诺维斯 (Eugene D. Genovese) 正是这样做的, 他始终反对把狭隘的政治史作为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橱窗。在他看来, 按照“杰佛逊-杰克逊-罗斯福自由传统”为框架研究美国历史的传统政治史就是精英史, 其中没有下层民众的影子和话语权利, 是不完整的。他一直坚持从下往上写历史, 写人民大众, 拒绝写大人物, 主张透过历史的表象找到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他把透视历史的深层潜流、通过了解下层群众运动的潮汐来认识“美国海洋变化的盛衰”作为自己研究的目的。<sup>[12]</sup>

1974年, 在他被人们称为“吉诺维斯史诗”的宏大著作《奔腾吧, 约旦河; 奔腾吧, 奴隶们创造的世界》一书里, 吉诺维斯通篇所述都是“奴隶们的世界”, “主人们”只是配角, 只是扮演主角的奴隶们创造世界的助手。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新左派”由下而上写历史的信仰。他的众多论著正是这一不懈努力的结果。

#### 四、结束语

作为 20 世纪 50-6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美国“新左派”史学以激进主义为标榜,



以改革美国社会为目的，从当时社会的需要出发，以阶级冲突的“二元论”分析入手，对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考查，自下而上地对美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批评，试图以此找寻到解决美国现实问题的历史良方。

当“新左派”史学在美国史坛崛起时，它的激进观点并不讨人喜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戴维·唐纳德（David Donald）教授在《美国历史评论》（AHR）主编向他征求关于发表昂格尔那篇关于“新左派”历史学家的稿件的意见时，他明确表达了对昂格尔文章中所写人物的轻蔑。<sup>[13]</sup>

尽管“新左派”史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以其特有的激情不懈地致力于对美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关系的揭示，造成了美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革命性变动，极大地活跃了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讨论。众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加以创造性的和灵活性的运用，“新左派”历史学可以告诉人们许多关于复杂历史事件的重要东西。就连对“新左派”史学抱否定和排斥态度的戴维·唐纳德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把“新左派”史学逐出美国历史学界将使历史学科做出非常大的牺牲，“因为沉闷而心满意足的历史学界需要关心思想、社会参与和这些持不同意见者们所展现的热情和活力。”<sup>[13]</sup>“新左派”史学正是以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和活力四射的治史激情，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史坛上留下了自己的清晰印迹，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史学的主旋律。

#### [参考文献]

- [1] 张友伦. 丰纳教授谈美国现代史学 [J]. 山东大学学报, 1982 (5): 8-13.
- [2] Hillingsworth J, Rogers, Commentary on 'Consensus and Continuity' in Post Wa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 Robert Allen Skotheim, *The Historian and The Climate of Opinion* [C] - Massachusetts 1969
- [3] 刘绪贻, 杨生茂.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 [4] [美] 约翰·海厄姆. 对“美国利益一致论”的崇拜——使我们的历史单一化 [J]. 世界历史译丛, 1980 (1): 25-32
- [5] 转引自关于美国“新左派史学”和“一致性理论”的讨论 [J]. 世界史动态与资料, 1978 (9): 5-15
- [6]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M] - New Jersey, 1963
- [7]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Second Edition) [M]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Iwan Unger,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HR), LXXII (July 1967): 1237-1263 (欧文·昂格尔的这篇论文的译文发表在《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上, 牛其新译)
- [9] 转引自黄绍湘. 评美国“新左派”史学 [J]. 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0 (2): 1-10
- [10] Iwan Unger, *Beyond Liberalism: The New Left Views American History* [C] - Waltham, Massachusetts Xerox College Publishing 1971.
- [11] Jesse Lemis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Bottom Up [A], in Barton Bernstein, *Toward a New Past 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C] - New York, 1968
- [12] 吕庆广. 美国奴隶制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 [J]. 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9 (6): 36-40
- [13]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HR), 1968 (74): 531-532

责任编辑: 郭秀文

# 清末禁烟背景下的海军经费筹措\*

◎ 刘增合

[摘要]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 鸦片税收用于各项新政事业, 创建海军就是其中之一。庚子以后, 重兴海军呼声渐高, 海军经费筹措的希望寄托在对鸦片税的整顿上。1906年开始的禁绝鸦片运动却使得海军经费筹措的进程受阻。1908年清廷虽降旨重兴海军, 但经费迟迟不能筹措到位。清廷内部、各省督抚和民间人士之间, 围绕速兴和缓办海军, 歧见迭出, 纠纷不断, 概见鸦片禁政对海军兴复的复杂影响。

[关键词] 清末禁烟 海军经费 海军兴复 鸦片税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105-06

鸦片禁政是清末旨在改良社会、配合新政改革的重要行动, 得到朝野各方的推重, 颇著成效。然而, 鸦片税收很早就与海军经费的筹措密切相关, 庚子以后朝野筹议兴复海军, 多数人将经营和整顿鸦片税厘作为海军重兴的主要财源。1908年兴复海军的上谕颁布后, 各省推行缩期禁烟, 税收短绌势成定局。海军经费筹措因财政困绌迭生波折, 海军兴复的愿望难以落实。鸦片禁政与兴复海军之间, 因缘凑泊, 关系非浅, 值得深入探讨。

## 一、鸦片税与海军经费

同光之际, 清廷海防经费中大量使用鸦片税。鸦片贸易合法化后, 各海关对进口鸦片按照划一税率征收, 入款大增。1884年洋药税占全部进口税的一半以上。<sup>[1]</sup>李鸿章在天津等地经营的海防事业大量使用洋药关税,<sup>[2](P784.1474.1760-61)</sup>其他各种与海防事业相关的制造、修理等开支也较多地从海关洋药税中指拨挹注。<sup>[3](P410-420)</sup>1887年清廷对洋药实行税厘并征, 甲午战争之前, 海关征收的鸦片厘金总数(不含鸦片税)已经达到4576万海关两。<sup>[4](P40.158)</sup>1885年至1888年间, 英人自印度输华鸦片以每年77800箱计算, 中国税收每年即可增加620余万两之巨。<sup>[5]</sup>清廷对此项业绩甚为满意, 上谕称:“税司由我而设, 洋税自我而收, 现在海关税入增至一千五百余万, 业已明效可观”。<sup>[4](P158)</sup>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因得运用该款的一部分, 向英国增购海关巡船三艘, 分别命名为“开办号”、“厘金号”和“专条号”, 以资志念。各省海关中, 洋药税厘或土药税均有拨解海军经费者,<sup>[6]</sup>但数目不算很大。中英双方谈判鸦片加税问题期间, 曾纪泽建议李鸿章, 应该运用加税之后增收的鸦片税款办理南北洋海军之用。<sup>[7](P24-25)</sup>后因郑工需款浩繁, 加之内务府大建颐和园, 洋药税款增加的部分被挪用较多, 海军虽需款不费, 然亦无可如何。<sup>[8](P117-119)</sup>

1895年威海卫海军燧师以后, 海军兴复问题仍不时被人提及。关于海军经费筹措的议论五花八门, 要言之, 多将希望寄托在整顿鸦片税收上。陈炽主张重税鸦片以办理海防, “事由渐开, 当以渐

\*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暨南大学“引进人才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刘增合, 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禁。渐禁之法，非重征其税不可。集成巨款，既可以筹海防，逆计将来，复可以消除隐患”。重税之法，五年倍征，三十年加至六倍，以其款办海军之用。<sup>[9](P68)</sup> 90年代后期，士子大夫中主张以鸦片税厘办理海军的呼声甚高。《福报》就有相关报道，<sup>[10](P21-22)</sup> 户部将各关洋药税厘征集起来，该报推测是与兴复海军有关。薛福成曾提到柬埔寨等处实施官膏专卖做法。<sup>[11](P404)</sup> 国内有人建议对洋药税收进行整顿，以备海军兴复之用：“洋药之税既无可加，而亦无庸加，则惟有俟其熬膏后，再议抽厘税，土则其权在人，抽膏则其权在我。宜照新嘉坡、西贡港例，设官膏局于通商口岸，招商承充，认定缴饷之数，准其将生土熬成熟膏，分运各处销售。凡吸者只准卖熟膏吸食，不许购生土自煎，其又私自熬膏者，一经查出，律以私铸之重罪，则洋土可全数归公，私土并无处可买，而中国土浆亦照此办理，岁赢银钱何下数百万！”<sup>[12](P5)</sup> 1904年12月30日，贝子溥伦提出三种洋土药税整顿方法，即“清其源”、“截其流”和“暂定权宜之法”。<sup>[13]</sup> 三种措施，不管采取哪一种，洋土药税收“所筹各款均应专拨整理海军之需”。摺上，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召见军机大臣时，强调海军兴复之紧迫，派令溥伦前往各国考察海军制度，非常赞同兴复海军。<sup>[14]</sup> 此后，朝臣与疆吏，甚至民间舆论对海军兴复问题备加关注，筹款对策迭见刊报。

驻英使臣汪大燮认为，日本投入海军的款项约为“三百兆元至四百兆元之谱”，我方海军的投资花费应不低于300兆元。<sup>[14](P890)</sup>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清廷财政困绌的现实来说，尤为不赀。汪大燮通过汪康年转告瞿鸿禨、那桐等人，这笔巨款必须借贷外资，但筹还的办法应作准备。他建议整顿洋药和土药税收，以此项收入作为举借外债的后盾，函曰：

海军既需如此巨款，非借贷所能为功。即使借贷，亦必须准备偿还。是筹款为要矣。筹款非空言所能济……惟于洋土药中筹之。禁烟事已定，计实行交涉，想不甚难办。今洋药岁约六万担，土药倍之，共约十八万担之谱。即少算，亦必在十五万担之上，若归官收买发卖，只筹本千五百万金可资周转。盖一面收一面发，不过过手而已，且尚可将货抵押银行，故须本并不甚多也。倘定计官收官发，于禁烟亦有把握，每担加价二百金实不为多，十五万担可得三千万金，岁减一成，十年可得百六十兆金，连税厘约得二百兆金，计将近三百兆元矣。即筹足三百万元亦有把握也……兄思惟有洋土药加价一事所得颇多，而不扰民。已具节略呈师矣。<sup>[14](P890,903)</sup>

“节略呈师”一语，自然是托汪康年呈交瞿鸿禨等人，瞿系朝中重臣，甚得慈禧优眷，建言海军事宜，瞿氏堪可倚重。

实际上，鸦片专卖进展甚缓。现实的情况是洋药税款多用于筹还赔款，土药税虽实行统税制度，入款亦大为增加，但陆军编练需款浩繁，万难腾出余款用之于海军。拟议中的海军捐成效未具，自难有所展布。所以至1907年8月之前，海军一事实实际上并未有所措置。

## 二、兴废两难

威海燔师以后，海军衙门被撤，十几年来中央并无统辖海军的专门机构。1907年7月，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建议庆亲王奕劻，中国应该速兴海军，“若再因循，不但内乱蜂起可虑，恐列国亦将生心，请速实行整顿，以壮贵国声威”。<sup>[15]</sup> 日使此言对朝臣应有较大的影响。于是设立海军处，暂隶陆军部。<sup>[16](P119)</sup> 专门机构建立后，海军兴复就进入具体运作阶段。

清廷重兴海军恰逢鸦片缩期禁政时期，洋土药税厘的短缺始露端倪，抵补成效难以预计。因而朝野对海军兴办一事冷热有别，根因均与财政问题相关。中央财政因禁政加速而捉襟见肘，虽然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奏请放缓禁烟的步伐，主张递年减种，并倍增鸦片税率，所得收入挹注于海军，但禁政大势已成，碍难再行退缩。<sup>[17](P19)</sup> 其间朝野筹措海军经费的对策迭见报刊，五花八门，但不切实际者居多。清廷宣布载洵、萨镇冰为筹备海军大臣后，陆军部与海军大臣等会商，确定了筹办海军的七年规

划，必须为海军筹措 1800 万两开办经费和 200 万两常经费。其中，开辟军港经费 150 万两，购舰经费 1650 万两，前者两年内拨出，后者分四年匀拨。至 1909 年 10 月，必须从全国 18 个省和度支部筹得开办费 1134 万两，常经费 168 万两。<sup>[18] (P671-676)</sup>

清廷虽有明诏举办海军，经费规划也初见眉目，但庞大的经费数额却无法筹措。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人士对海军问题颇有看法。较早反对重兴海军的言论出现在 1908 年 6 月，此论冒着被指责为“无爱国心”的风险，提出缓办海军的观点。<sup>[19]</sup>持此观点者在民间居于多数。有的人甚至警告清廷说，固执于兴复海军，恐怕堕入“未蒙其利，先蒙其害”的困境。<sup>[20]</sup>针对柄政者屡屡提议举借外债兴复海军，有的批评揭露外人诱惑清廷加强军政的阴险意图在于控制中国的财政，以外债来左右中国的税政，“若借债练乌合之兵，直速其亡耳。”<sup>[21]</sup>国外有人对本国诱使中国耗费巨资购买自己的军舰也颇为不满。<sup>[22] (P347)</sup>外人在中国兴复海军一事上的企图确实值得深思。

各省正处于鸦片禁政高潮时期，土药统税收入渐禁渐少，因之对中央派认海军经费一事颇有意对抗，敷衍塞责者居多数。山东、湖北等省认为“奏派各款为数甚巨，若再加此款，深恐无以应付，反滋贻误”，咨复陆军部的电文中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sup>[23]</sup>浙江厘饷局官员对抚宪交议拨解海军经费十分为难，发给巡抚增韞的禀文说：“局库频年以来以收抵放不敷甚巨，如部拨专款之酒、膏各款均已挪垫一空，实无的款可指。惟海军关系重大，既奉宪饬，于无可腾挪之中勉为设法，自当勉为其难，遵由局库项下逐年认捐经费五万两，按年筹解，以济要需；至常经费，委系无力担任，应请饬由司道关粮各库合力分筹，俾无贻误。”<sup>[24]</sup>浙江向称富庶，厘饷局在省级财政机构中属于较为活便的局所，大宗入款均由该局掌管，如此为难甚为少见。广西作为贫瘠省份，度支部也要其勉为筹解，桂抚张鸣岐虽认解 50 万两开办费，但却没有明确的款可供指拨，“惟有极力搏节，设法腾挪。”<sup>[25]</sup>甘肃省被灾严重，陕甘总督只得要求缓解这项派款。<sup>[26]</sup>广东是较为富庶的省份之一，要求动用关税解付海军经费，但却遭到度支部的反对，因之无款可解。<sup>[27]</sup>各省认解的海军经费总数仅仅 500 万两，距离开办费 1800 万两尚差太远，不敷甚巨。陆军部和海军处不得不函电交驰，屡屡督催各省迅即将认解款项解拨。<sup>[29]</sup>

京中官员对现时海军开办颇有意见。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在摄政王召见时，力言不可将海军视为急务。<sup>[30]</sup>汤寿潜向清廷密陈存亡大计时，认为应先将赔款问题解决，以防止外人监督中国财政，海军不可不办，但不可立即举办。<sup>[31]</sup>有的御史认为编练陆军优先于海军之兴复，“陆海二军同时举办，断断无此财力。愚臣之意，拟请将海军暂作缓图，先注意陆军，仍照陆军部奏定期限，于宣统四年一律成镇，边僻省分款项不足者，由部接济，勿粉饰外观而不求实际，勿强人所难，而令窘迫省分反事诿卸，盖无米之炊，虽巧妇亦将束手。”<sup>[32]</sup>持此见解者随着财政清理的进展越来越多。清廷要臣对各省和中央的财政困境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自赵侍御（指赵炳麟——引者）调陈预算决议起，度支部始将国家历年经费出入之内容，和盘托出。盖数十年来，各省销费未报部者，有四百余起之多。无论民不知，即朝廷亦不知也。财政之紊乱，一至于此”，<sup>[33] (P994)</sup>权贵纨绔亟亟于整军经武，对中央与各省的度支进项和财政困绌并不十分在行，固执于兴复海军，加之摄政王载沣对此十分热心，对建议缓办者称之为“因噎废食之计”，着眼于海牙和平会上免致被外人讥笑，特别是将海军视为军国经脉，决不可缓。<sup>[34]</sup>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政府对海军重兴的基本立场。

尽管清廷在会议政务处集会和内阁讨论时，多次研究筹款和经画方略，但始终未能有大的进展，且问题很多。前已述及，海军兴复的关键在于财政的支持力如何，各种筹款献策缤纷杂乱，无一实际者。在这种情况下，度支部作为中央财政机构，其态度倾向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 三、部臣矛盾

海军的兴复高潮出现于 1908 年秋季之后，恰逢各省为迎接外人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纷纷实

行缩期禁烟，成效已开始显著，土药税款短缺的趋势愈发明显，拨解中央的土药税收不得不减少，地方土药税款的拨还也受到严重影响。次第出台的抵补措施鲜有成效，上下之矛盾随之激化。度支部尚书载泽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清理财政，一旦清理完毕，即举行加税免厘，预计每年岁入可增加三千余万两，那时办理海军自当裕如，目前办理必定捉襟见肘。<sup>[35]</sup>海军大臣提议举借外债筹措海军经费，载泽极力反对，认为海军并非是生利事业，与路矿各政性质不同，海军经费“无论如何拮据，决不能有一毫外债掺入，纵有摄政王之严谕勒令借债，本部堂亦必力争”。报界抱之以赞赏的态度。<sup>[36]</sup>铁良意欲整顿盐政，所得款项用之于海军经费，但度支部侍郎绍英坚决反对，此事也受到梗阻。<sup>[37]</sup>海军的筹款问题顿时陷入僵局。

自从 1908 年 8 月 13 日清廷明降谕旨振兴海军以来，度支部始终对此不抱信心。报界尚透露说，由于抵补鸦片税的印花税举办不见显效，载泽曾经要求收回重兴海军成命，<sup>[38]</sup>并对摄政王的海军兴复计划暗中抵制，对经费筹措的态度相当消极。其内情和纷争为报界所侦知，有关报道揭示出真相：

惟摄政王原拟派肃邸、铁尚书、萨军门三人协力筹办，谕中所派泽公系庆邸所保，非必欲其协同筹画也，因此事经费最巨，非度支部统筹兼顾不能为功，此次又恐度支部意存畛域，盖前年铁尚书曾奏请开办巡艘，约须开办经费一千五百万两，请由度支部筹拨，其常年经费则归陆军部自筹，当时奉旨交度支部议奏，迄已两年，未见议覆。铁尚书并商允枢臣，面催数次，泽公每以尚未筹有的款为辞。庆邸有鉴于此，因请添简泽公。泽公亦颇知其意，故于已经谢恩后，忽又恳请收回成命，现虽降谕挽留，恐泽公终以筹款不易，难免观望耳。<sup>[39]</sup>

载泽控权欲望强烈，海军协办不可谓闲职，其采取漠然处之态度，亦可见财政之窘困程度。1909 年 2 月 21 日载泽终于借故提出辞呈：“（清理财政）头绪万端，急需综理。以奴才绵薄膺此艰巨已觉万分踧蹙，听夕靡遑。至筹备海军事属兵谋，既未尝习战昆池，顾何敢预论横海；况造端伊始，尤为重要，抚躬循省殊未能堪。伏乞圣明体念下情，准予收回成命，俾奴才得专力财政，藉图报称。”<sup>[40]</sup>摄政王对此忧心忡忡，海军基础初奠非度支部配合无可推进，于是降旨挽留载泽。载泽辞职未成，只得敷衍。在陆军部的官署内，两次议论海军事宜，经费筹划仍是最重要的事端，“铁尚书则不置一词，泽公更不甚过问”。<sup>[41]</sup>度支部在 7 月份密奏财政窘迫的摺件中，对海军兴复一事也隐隐批评，指责此事纯为不分缓急和轻重，对财政构成极大压力。<sup>[42]</sup>度支部督催各省派认海军经费，但从各省督抚回电来看，除了湖南、河南两省指定的款外，其余均为设法腾挪或稍宽期限。海关税收关系要需，万不能令其认解。<sup>[42]</sup>海军经费的筹措迟迟不见成效。

海军处对这一困境亦无可如何，只得与枢府协商，将海军兴办问题交给资政院，作为开院时的正式议案，并由宪政编查馆通飭各省咨议局，定为各局的长期性议案，随时筹画。<sup>[43]</sup>一度沸沸扬扬的海洋捐和海军公债在海军大臣等人的推动下，跃跃欲试，却为载泽和摄政王阻止，海军经费引发的政治性危机开始隐现。<sup>[44]</sup>清理财政中，各省各部均应裁汰冗费，海军经费经过度支部核算后，开办经费已达到 2000 万两，载泽坚请海军大臣必须核减 1/3 或 1/4。<sup>[45]</sup>1910 年 5 月海军处由于订购军舰和建筑军港，要求度支部将各省认解款项和该部认解经费垫付海军处。据报界称，载泽认为已经垫过 1000 万两，现在无款可垫。载洵与之理论多次，几至发生冲突，矛盾激化的程度已很严重。<sup>[46]</sup>舆论对此事态度明确，“我国之缺点多多，并不仅海军一部分事，即举其切要者言之，而海军之兴复与否，亦确乎不在其列，则瘁全力以循之之无谓，夫何待言！”<sup>[47]</sup>

不但民间反对性舆论出现，各省督抚中亦有人率先阻止此事，两江总督张人骏对海军处的设军港选址问题、海军经费问题等均提出质询。<sup>[48]</sup>其他各省大都敷衍延宕。对开办经费的需款数量，萨镇冰的计算为数千两，而载泽的观点相去甚远，抵牾纠纷在所不免。摄政王虽有拨内帑之意，但动用家底究属大事，一时遽难决断。<sup>[49]</sup>海军大臣载洵屡屡赴欧美考察海军，挥霍巨资，每次皆需数 10 万两，



而且经费均由度支部拨付。载泽对这一事十分不悦，表示拒绝支付此项经费。<sup>[50]</sup>度支部与海军处矛盾由萌生而激化，载泽与载洵的争执不断。海军处要求度支部拨款 900 万两，而载泽由于土药统税局卡几乎全部裁撤，入款大减，故只答应拨给 100 万两。财政与军政矛盾难以调处，致使载泽辞职意愿颇坚。摄政王及各要臣虽极力融合此事，但载泽去意犹不见改，可见矛盾至深。<sup>[51]</sup>外有各省督抚之责难，内有军谘处、陆军部及海军处大臣的不满，度支部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载泽尚书更是难容于内外。<sup>[52]</sup>以财政拨款的纷争为契机，清廷内部暗潮迭起，权贵与朝臣中内讧不断，相互攻讦，朝代末年的溃决特征已经十分明显。

海军兴复正值陆军扩张趋势，而鸦片禁政实施导致中央和各省进款缩减，盐政实行集权式整顿又遇各省阻遏，印花税实施不具成效，因之，在财政匮乏的背景下，陆军与海军孰先孰后颇不易抉择。一般倾向于择其一端先行实施，如陆军练兵计划的完成就是当务之急，而对海军则主缓图、取守势。但海军大臣载洵却表示，应令各省节俭，俭省糜费可达 1000 余万两，用之于海军，如此时降旨缓办海军，“必为各国所轻视”。<sup>[53]</sup>海军政策中的速办与缓办成为清廷各部和各省争论的重要问题，资政院议员也对此事抱以关注，甚至专门提出议案，要求缓办海军。1910 年 11 月初资政院召开的石桥别业会议上，有的议员在发言时特意表明自己主张缓办的政见，多数议员纷纷赞成。<sup>[54]</sup>

军谘处大臣载涛亦看重陆军利益。8 月 16 日会议政务处讨论会上，他表示，海军问题应循序渐进，不应操之过促，应先将陆军编练完成，然后再从事海军建设，若同时并举，财力断难敷用。这一观点得到载泽的声援和支持。<sup>[55]</sup>实际上，海军经费自始至终并未得到多少，政争虽急，但度支部并未多拨款项。该部前后认解的大额款项只有邮传部赌路经费 500 万两，<sup>[16] (P122)</sup>各省认解绝对数额虽亦不少，但实际解到的款项却少之又少。海军兴复的 7 年计划颇具辉煌，最终不得不成无米之炊，断难有所作为。

清末鸦片禁政本身虽属良政，但各项新政改革因缘相结，牵一发全身俱动，禁政导致洋土药税大幅度减少，而鸦片税厘缩减却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海军兴复进程受挫。清廷财政一毁于甲午对日赔款；二毁于庚子之役，国用大窘，坍塌之局隐然铸成；三受制于鸦片禁政，数千万金之土药税厘化为乌有。清廷热衷于整军经武，财用耗费更巨，度支日窘。庚子以后，海军重兴牵动朝野视听，初期的经费筹划虽寄希望于鸦片税厘的整顿，然而缩期禁种罂粟在各省迅速实施以后，财政抵补措施却不奏效，海军经费的筹措和供给几乎陷入断炊断粮的地步。度支部与海军处、陆军部的纷争愈加激化。载洵柄政之后，财政局势更糜烂不堪。督抚保权抗争，朝臣内讧加剧，中央与地方之间输攻墨守，隳局已成，即有大力亦绝难挽回，良可深思。

## [参考文献]

- [1] 郭卫东. 不平等条约与鸦片输华合法化 [J]. 历史档案, 1998 (2).
- [2]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 (鸿章) 全集 [C]. 收入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Z]. 692-696.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1.
- [3] 林崇墉. 沈葆楨与福州船政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 [4] 戴一峰. 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 [5] 薛福成. 庸盦全集 [C]. 海外文编: 卷 1 [Z]. 望龙学社, 光绪 21 年刻印.
- [6] 安徽巡抚奏为风阳关一年期满征收土药税银考核数目摺 [Z]. 一档: 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 84-379.
- [7] 李文忠公 (鸿章) 全集 [C]. 海军函稿: 卷 2 [Z].
- [8] 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第 3 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9] 赵树贵、曾丽雅编. 陈炽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0] 海军筹费 (录《福报》) [N]. 集成报: 第 1 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年影印本.
- [11] 薛福成. 出使日记刻 [A]. 载氏著.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2] 中国各省裁兵减厘议 [A] .万国政治艺学全书: 政治丛考卷 66 [M] .清末铅印本 .
- [13] 贝子溥奏敬陈管见上备采择摺 [Z] .第一历史档案馆: 总理练兵处档案全宗 .
- [14] 兴复海军之消息 [N] .大公报, 1906- 02- 08.
- [15] 日使忠告政府速兴海军 [N] .申报, 1907- 08- 01.
- [16] 罗尔纲 .晚清兵志: 第 2卷 [A] .海军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7] 世续等 .德宗景皇帝实录: 卷 59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8] 度支部奏拨海军开办及常年经费摺 [A] .张侠等编 .清末海军史料 [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2.
- [19] 论政府集议举办海军之期限 [N] .申报, 1908- 06- 19.
- [20] 论重兴海军事 [N] .盛京时报, 1909- 03- 07.
- [21] 释公债 [N] .盛京时报, 1909- 06- 01.
- [22] [美] 斯蒂芬·豪沃斯, 王启明译 .驰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 1775- 1991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 [23] 海军经费之难筹 [N] .大公报, 1909- 04- 03.
- [24] 浙省认筹海军经费之为难 [N] .申报, 1909- 09- 21.
- [25] 桂省认筹海军经费之竭蹶 [N] .申报, 1909- 10- 07.
- [26] 甘省筹认海军经费之为难 [N] .申报, 1909- 10- 10.
- [27] 粤省海军经费不准动用关税 [N] .申报, 1910- 03- 02.
- [28] 各省认解海军经费数目 [N] .大公报, 1908- 07- 23.
- [29] 部饬分筹海军经费 [N] .盛京时报, 1909- 09- 09.
- [30] 刘廷琛奏请缓办海军 [N] .申报, 1909- 09- 05.
- [31] 汤寿潜奏陈存亡大计 [N] .申报, 1910- 03- 19.
- [32] 请缓办海军专办陆军 [N] .盛京时报, 1910- 04- 19.
- [33]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 下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4] 摄政王不愿缓办海军 [N] .大公报, 1909- 09- 02.
- [35] 泽贝子财政之计划 [N] .大公报, 1909- 03- 01.
- [36] 力驳海军外债 [N] .盛京时报, 1909- 03- 12.
- [37] 绍侍郎反对以盐款办理海军 [N] .盛京时报, 1909- 03- 24.
- [38] 论重兴海军之方法 [N] .申报, 1909- 02- 24.
- [39] 商议筹办海军情形 [N] .申报, 1909- 03- 01.
- [40] 奏请收回筹画海军基础之成命 [N] .申报, 1909- 03- 02.
- [41] 筹办海军之为难 [N] .申报, 1909- 03- 09.
- [42] 度支部咨奏财用窘细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摺 [Z] .一档: 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 523- 4107.
- [43] 议颁海军筹款之议案 [N] .大公报, 1910- 03- 05.
- [44] 政府不赞成海军公债之举 [N] .大公报, 1910- 04- 20.
- [45] 议核减海军开办经费 [N] .大公报, 1910- 05- 24.
- [46] 海军处迫令度部垫款 [N] .盛京时报, 1910- 06- 01.
- [47] 论兴复海军之近情 [N] .盛京时报, 1910- 06- 04.
- [48] 江督奏请缓办海军之卓见 [N] .盛京时报, 1910- 06- 22.
- [49] 拨用内帑筹办海军原因 [N] .申报, 1910- 07- 17.
- [50] 度支部难为无米之炊 [N] .盛京时报, 1910- 08- 09.
- [51] 泽尚书辞职述闻 [N] .盛京时报, 1910- 08- 18.
- [52] 财政难之一斑 [N] .盛京时报, 1910- 10- 01.
- [53] 洵贝勒不欲缓办海军 [N] .申报, 1910- 11- 19.
- [54] 资政院对于重兴海军之异议 [N] .大公报, 1910- 11- 05.
- [55] 涛贝勒亦议缓办海军耶 [N] .申报, 1910- 08- 24.

责任编辑: 杨向艳

· 岭南文化 ·

# 客家历史文化的承传方式

## ——客家人“来自中原”说试析

◎ 郑德华

[摘要] 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 既曾是客家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同时又是当代客家人心目中历史的核心。这种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念, 实际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我们应该用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即不仅着眼于文献的搜集和考据, 还要认真探讨形成群体观念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 以及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 从而加深我们对客家方言群体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 客家 “来自中原”说 形成 承传方式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111-06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客家研究逐步掀起了一个新的热潮。海内外一些地区和国家相继成立了客家研究的专门机构, 甚至还有大学创立了客家学系, 招收研究生, 为客家研究的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sup>①</sup>而就近年出版的有关客家研究的论著来看, 亦有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对一些地区, 如四川、陕西、深圳等地客家人聚居点的调查, 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素材和新的线索。<sup>②</sup>诚然, 客家研究仍有不少课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尤其是涉及有关当代客家方言群体一些特征及其来源的研究。例如较其他汉族方言群体, 客家人有较强的家族社群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的核心是什么, 它是在怎样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 为什么能在方言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同而成为主流的观点? 尤其是这些特别的历史文化如何在客家方言群体中承传等。本文拟以这方面为论题, 作一初步的探讨。

### 一、客家人心中历史的核心

如果我们比较汉族不同的方言群体, 很容易发现客家方言群对自己群体的历史特别重视。虽然, 不同姓氏、不同地方的客家人, 在叙述他们家族的源流历史故事时各有不同, 但他们的远祖“来自中原”这一说法却是共同的。当然, 有些客家人在演绎来自中原的历史故事时, 会给人一种牵强的感觉, 以至不少人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不过,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种说法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时, 便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说认同的广泛性的注意。毫无疑问, 客家人把来自中原作为他们方言群历史的起点和根源, 很大程度是与中国文化“慎宗追远”一脉相承, 同时又是与血缘、文化正统观念密切相关的。亦即说, 客家方言群体对自己家族源流的重视, 来自中国宗族社会结构在历史上的长期影响; 而中原文化正统论的滥觞, 则又是客家人特别强调他们来自中原的另一原因。回顾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的客家研究, 其中重要的论题就是客家人的来源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 因有人提出客家人并非

---

作者简介 郑德华, 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澳门)。

① 华东师范大学1966年创立了客家学系与海内外客家研究的发展情况, 参看孙晓芬编著:《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 第3页。近年台湾对客家的研究也有长足的发展, 客家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

② 参看《学术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客家文化研究专辑)1999年12月;《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等。

来自中原的看法，曾经在社会上掀起几场风波，参与者远远超出学术界的范围而扩大到社会上的方言群体。<sup>[1](P5-11)</sup>反映了在客家人心目中，对远祖来源的执着和重视。可见，客家“来自中原”一说，既曾是客家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又是当代客家人心目中历史的核心。这种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点，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所以，应该用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即不仅着眼于文献的搜集和考据，还要认真探讨形成群体观念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以及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从而加深我们对客家方言群体的认识和了解。

## 二、“来自中原”说的形成及其传递

当我们审视客家“来自中原”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发现有几个主要因素曾经起作用，最后促成了这种看法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

### (一) 历史上客家文化人的影响。

在我们具体追溯客家文化人对客家群体观念上的影响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在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精英文化一直是主流文化。换句话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士大夫阶层，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客家文化亦不例外。当我们具体追寻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的由来时，客家文化人的影响清晰可见。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最早把客家人来自中原的看法写成文字的，是广东和平县人徐旭曾。他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写的《丰湖杂记》中，讲述了广东客家人的来源以及语言、风俗。他非常肯定，客家人来自中原的衣冠旧族。<sup>①</sup>徐旭曾是客家人，早年在清朝吏部和四川等地任官。他的背景、地位和经历，使他的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徐旭曾的文章，更可进一步发现，他有关客家人来源的看法，是受同代的客家文化人宋芷湾和周慎轩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徐旭曾并非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的首创者，而是一个集成者。<sup>②</sup>但无论是徐旭曾、宋芷湾、周慎轩或其他人，他们都是客家人中士大夫阶层的人物。

在徐旭曾写成《丰湖杂记》之后，即从嘉庆十三年到同治年间（1808—1874年）编写的一些广东县志，已经有客家人的专门条目，研究客家方言的作品亦开始出现。<sup>③</sup>说明有关客家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已经在士大夫阶层中受到重视。

咸丰六年至同治七年（1865—1867年），在广东开平、台山、高明等9个县爆发了长达12年的土客械斗（按：“土”、“客”指广府话方言群与客家话方言）。这场民间的武装械斗，其中一个社会效应，就是引起了岭南地区文化人对客家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尤其在客家士大夫阶层，反应更是强烈。于是，有关客家人的论著不断面世。而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亦随之而在客家士大夫阶层中强化。如客家籍的近代政治家、诗人黄遵宪，在他的作品中，亦谈及客家人的来源问题。他十分赞同他的友人林达泉的说法：“客民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sup>[2](P160)</sup>可见在19世纪后半叶，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的影响在逐步扩大。<sup>④</sup>

当代研究客家问题最有成就者，毫无疑问是客家籍的罗香林教授。他的《客家研究导论》以及一

---

① 嘉庆年间，徐旭曾在广东丰湖书院任教。他曾向门生讲述广东客家人的来源。一位姓韩的学者把它记录下来，便成此文。原文并无题目，见《和平徐氏谱》所记徐旭曾著的《丰湖杂记》。罗香林的《客家史料汇编》第一册（香港：中国文化协会，1965年3月），录有此文。

② 有关徐旭曾对客家问题研究的贡献，以及他所受同时代人的影响，参看拙作《晚清以来客家史研究述评》载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史集刊》第2卷（1986—1988年），第95—123页。

③ 如赵俊等修，李宝中、黄应柱纂《增城县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就有增城的客家人多从英德、长宁、永安、龙川、嘉庆州属县迁来的记载，并说他们一般为佃户，与当地有一定矛盾。原书未见，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海书店，1985年），甲集，第393—394页录有这段文字。

④ 有关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研究客家问题的作品，参看拙作《晚清以来客家史研究述评》。这些作品，均持客家来自中原的说法，包括西方学者的作品。

系列有关客家人的著述，无论从方法论，乃至引用的文献资料，都超越前人。在解释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方面，罗香林更是利用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移和族谱的资料，提出了客家人从中原南迁的时间和路线。他的看法虽然并非无懈可击，发表以来的60多年，也陆续有质疑和反对者，但并没有影响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可见罗氏的研究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经过罗氏的研究和整理，不仅在学术界成为一种著名的论点，在国内、港澳和海外客家人社会，均广为传播，造成重要的社会影响。

罗香林在归纳、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客家人南迁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自东晋至唐朝（317-879年）。受五胡乱华的影响，由中原迁至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西，沿长江南北岸，以至赣江上下游止。

第二，自唐末受黄巢事变的影响到北宋末年（880-1126年）。由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第一时期的旧居，迁至安徽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以至广东东北部边界上。

第三，自南宋到明末（1127-1644年）。受金人南下和宋室南迁的影响，部分客家先民，由第二时期的旧居分迁至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

第四，自清初至同治年间（1645-1867年）。受满人南下和内部人口膨胀的影响，由第二、第三时期的旧居，分迁至广东的中部及滨海地区，以及四川、广西、湖南、台湾，少部分迁至贵州南部、西康的会理。

第五，咸同年间（1856-1867年）。受广东中、西路地区的土客械斗及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部分客家人从广东的中、西路迁往南路和海南岛以至海外。<sup>①</sup>

如果说，把客家问题的探讨真正带进学术研究的殿堂，罗香林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话，他在客家方言群中对他们祖先“来自中原”一说的认同方面，同样是影响至深。我们在近几十年客家方言群出版的杂志、报刊、书籍，特别是海内外同乡会、商会、联谊会和宗亲会印发的文献资料中，几乎毫无例外可以找到罗香林有关客家人来源的文章，以及介绍、浅释他的观点的著述。在当代客家方言群中，“来自中原”一说的观点，通过罗香林条理化和理论化，大大加强了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作为客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对客家方言群毫无疑问具有特殊的魅力。但最关键的，恐怕还是他的确从学术的角度强化了客家研究，同时又在推广和普及客家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从而加速了客家研究理论成果大众化的过程。中国精英文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在这里又增加了一个当代实践的案例。

## （二）口述历史和传说故事的文化传播。

在以宗族为基层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口述历史和传说是历史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尤其是在下层民间社会，这种方式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自古已有学者提倡注意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利用。如司马迁提出的“行千里路”，注意收集、提炼流传于民间的素材，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可惜的是，在中国文化学术传统中，这方面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扬光大。到了后来，甚至变成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出现严重的忽视民间口述历史和传说故事，忽视现场收集资料的倾向。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传中的不足之处。<sup>②</sup>

若与其他方言群相比，客家人在口头表述能力方面亦是较为突出的。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正是透过口述历史和传说故事，使这个观念在方言群中广为流播，其实例比比皆是。

广东翁县出身的当代民间歌手杨一，是客家人。他写了一首有关故乡的歌谣《小镇》“小镇上住

<sup>①</sup> 需进一步了解罗香林对客家研究的贡献，除参看《晚清以来客家史研究述评》外，还有拙作《罗香林与客家研究》《香港时报》1987年12月16日，第9版。

<sup>②</sup> 当然，我们在利用这种资料时，亦不能不知道，在口述历史和传说中，往往夹杂着一些不够严谨和精确之处，应当小心加以区别和印证。另外，所谓口述历史和传说故事，在传递的历史过程中，有时会被文化人记录下来，但经过整理的资料，如果仍然主要以口头的方式传递，我们仍可以把它归作为口述历史和传说故事对文化传播影响的部分。



的全是客家人，年老者总是说着从前，祖先从战乱的中原，迁到了这里成了作客的人。”<sup>[3]</sup>

当然，歌手杨一并不是学者，他写《小镇》亦并非在做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而是透过对社会生活锐利的观察和描述，用歌声去表现基层社会的现实。然而，由于他对客家人社会生活的熟悉，所以在这首朴实无华的民间歌谣里，歌手实际上为我们描述了客家社群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歌谣的文字虽然精简，但从表现社会文化现象的角度看，内容含量却十分丰富。首先，歌词的第一句便点明歌曲描写的对象是客家人；第二，客家人爱讲自身的历史故事，其主讲者都是一些老年人；第三，历史故事的主题是他们的祖先，如何因战乱而来自中原；第四，他们来到这里变成“作客身份”的主人。<sup>①</sup>

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承传方式的角度去分析，便可以发现，这首歌谣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客家人用口头历史和传说故事传递社群历史文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文化学的观点看，可以视为社会历史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即利用口述历史和传说故事去完成人类文化的延续。

我们从大量的实地考察报告和文字资料中发现，客家人用口头历史和传说故事来传递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经历多次迁徙，来到闽粤赣，是有许多方式和渠道的，用“源流歌”是其中之一。例如客家人的黄姓，多称为“江夏黄”。他们有一首《黄氏源流歌》“梅江江上旧华堂，阆阆相传江夏黄。百里华封留政迹，千年翰院擅文章。绵绵世泽留子孙，赫赫家声继汉唐。如见普谱应起敬，今人远仰昔高阳。”<sup>[4] (P190)</sup>

歌词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首源流歌是梅县客家黄氏的作品。他们家族江夏黄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的业迹。他们对同宗的族人，有着联谊的传统。而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古代的“高阳”。高阳据今人的考证，在今河北省中部，白洋淀西南，汉代置县，属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带。<sup>[4]</sup>

客家人的源流歌虽然已写成文字，但使用的方式是对歌，即用互唱自己宗族源流歌的方法辨认亲疏，若是相同，说明是同宗的族人。如上面举的江夏黄的源流歌，能唱出者，说明同是江夏黄的后人。而学会了唱江夏黄的源流歌，也就在无意中了解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原这一观念。从客家人源流歌的内容和功能，我们可以窥探到客家人如何运用口头方式传递历史文化。口头文化功能的多样性，恐怕亦是客家文化的一种特色。

江夏黄，是客家黄姓重要的一支。他们的后裔，除在梅县外，现分布地区甚广。但即使如此，他们对祖先及源流身份的认同，却是十分清晰的。原因是江夏黄一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家族文化传递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据记载始自宋代的黄峭公。<sup>②</sup>他在与众子孙分别时，让其中一子写了一首诗，用以给后人作识别同宗族人的根据。凡是能念出此诗的黄姓人，均为江夏黄的后代。我们不妨把这首诗称为《认宗诗》其诗有下面几句：“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惟愿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sup>[5] (P103)</sup>

从源流歌到认宗诗，江夏黄族形成了他们传递宗族文化的特殊模式。而江夏黄姓一族的祖先来自中原这个历史讯息，也就在宗族文化的传递中代代相传。

据大量的资料显示，客家人为了传递家族源流讯息，还往往把本族各代男丁按辈分排班的字固定下来，编成有意思或无意思的词句，像歌谣一样，让家族的后人熟背、遵从。<sup>③</sup>这种风俗习惯，一来

---

① 歌词的最后一句，要与第一句连起来理解。既然在作者的家乡住的全是客家人，那他们实际上已成了当地的主人。这里所说的“作客的人”，应作那里的客家人不忘祖居地解释。

② 黄峭公，北宋真宗祥符元年茂申科第9名进士。曾官江夏，故有“江夏黄”之称。他有子21个，孙83个。因时世纷乱，只留长子侍奉，其余诸子分往粤闽各地。在登程分别时，作诗一首（按：另一说法为“命子作八句诗而别”，参考下注所征引书），作为后世同宗的识别。见《蕉岭程官部黄氏家谱》载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3月，第188页。

③ 如广东连州市城西上河村廖氏现采用的班辈排名，是根据该村咸丰十三年重修宗祠碑记上所刻的班辈词句：“国家兴隆 定有贤良 缙承基绪 世代修积 乃生才俊 光耀门庭”。参见廖国柱主编《中国廖氏通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385页。

可以让本族人按字辨认辈份，同时亦便于在外乡找到同宗的族人。所以，老一辈的客家人，大都能熟背家族的辈份歌。这种特殊的宗族文化，为客家人追寻族源、辨认宗亲带来许多方便，实际上，也就为保留宗族发展历史和远祖“来自中原”这一重要观念提供有力的保证。

### (三) 族谱、堂号和楹联的传递。

在客家历史文化中，族谱、堂号和楹联是文字资料的重要部分，亦是客家人传递祖先“来自中原”观念的渠道之一。

重谍谱，是客家人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与客家群体在形成过程中不断集体迁徙，因而培育了强烈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尤其在宋代以后，中国的宗族文化明显有平民化的倾向，社会基层的文化开始抬头，平民宗族无论在组织、意识上都有长足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世家大族和基层平民宗族并存的局面。<sup>①</sup> 基层平民宗族模仿社会上层世家大族的模式，编家谱、族谱，而客家人正是其中活跃的一群。虽然目前存世的客家谍谱，大部分是清以后的作品，而且当中难免有站在维护本宗族的立场，带有某些不确切的成分，但毋庸置疑，族谱中仍有不少值得参考的资料。罗香林利用族谱研究客家的来源和迁徙，其结论亦得到颇多学者的认同。<sup>②</sup> “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香港客籍学者赖际熙在《崇正同人系谱》中，亦明确写下客家人源自中原的观点。<sup>[6](卷2“卓氏条”)</sup>

我们在客家人的家谱、族谱中，一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的记载。这种有关宗族来源的文字，大体写在“序言”、“族源”、“世系”等部分。<sup>③</sup>

族谱，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中国人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基层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sup>④</sup> 族谱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慎宗追远，而且无论在维系宗族团结和内部社会秩序，延续宗族传统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曾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族谱在中国宗族历史上曾享有崇高的地位，而写进族谱的东西，在宗族内部自然拥有权威性。客家人来自中原的观点，在族谱中广为记载，无疑使这种说法成为客家人认同的主流观点。

除了族谱之外，用文字表达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的还有堂号和楹联。

客家人的住所喜欢用堂号，这种习俗无疑来自古代的文人雅士和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在堂号中，我们常常看到用古中原地名命名的堂号。诸如“颍川堂”、“江夏堂”、“清河堂”、“南洋世泽”、“东鲁旧家”等，以示对祖先的缅怀。据一些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初作的调查，梅县包、戴、邓等100个姓氏，其堂号所表示的祖居地，主要有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甘肃、山东，而江苏、湖北、湖南、安徽占少数。可见，当代梅县在家族渊源的概念上，中原地区无疑是他们心目中祖先的原居地。<sup>⑤</sup>

在中国文化中，楹联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文学艺术形式，张贴楹联亦是一种普及的民间习俗。每逢节庆、喜庆，以及宗祠、厅堂等地，多有楹联张贴。而客家人的楹联，除具备一般楹联的特色之外，

---

① 笔者认为，在中国宗族历史发展史上，宋代理学的形成，对宗族文化亦产生巨大影响。基层的宗族文化得到重要的发展机会。于是，中国的平民宗族开始逐步发展为中国宗族文化的主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看拙作《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1-82页。

② 有关罗香林研究族谱的成就，主要参考《客家史料汇编》。另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还有相当数量的未刊稿。近年有学者质疑罗香林利用族谱研究客家问题的可靠性，如赵以武在《浅议客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见《学术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客家文化研究专辑”1999年12月，第76-80页），就提出类似的观点。但这种看法目前仍非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如何利用族谱资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因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常常看到基层大众文化，除模仿学会上层精英文化外，还喜欢寻找与精英文化的渊源和关系。族谱中往往有攀附名门望族的现象，就是基层大众文化寻找与精英文化的渊源和关系的反映。历史上的这种现象，是不同阶层文化互动的反映。

③ 参见《客家史料汇编》。

④ 中国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为：族谱、宗祠和族田（或称祭田、蒸尝田、学田等）。

⑤ 参见吴炳奎：《客家源流新探》“梅州加100姓的族源、祖源及祖居地考查表”，见《客家源流与分布》第67-73页。

还常含有传递家族历史文化的特别功能。如“渤海家风千古盛，延陵世宅万年兴”（香港新界沙头角吴氏楹联）、“先祖长陪渭水竹，后裔犹记陇西人”（深圳葵冲李氏宗祠楹联）。<sup>[4]</sup>

这些把家族祖先来自中原写入楹联的作品，在客家方言群中极为普遍。所以，凭着堂号和楹联辨认客家人，成为一种最普遍使用的方法。

当然，也有些当代的客家人，透过楹联追寻到自己远祖的例子。

广东梅县的颜姓家族，传说他们是山东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人，但一直找不到具体的根据。近年他们的族人颜长江（记者），根据他们乡下的颜姓族人均贴有：“鲁国世泽，陋巷家声”的楹联，在山东曲阜纪念颜回的庙宇里，找到写有“陋巷故址”的石碑和“陋巷井”，从而找到梅县颜姓家族来源的一个重要根据。<sup>[7]</sup>这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为楹联对历史文化信息的传递作用，作了生动的说明。<sup>①</sup>

近年，有些学者采用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为证明客家人来自中原，多次迁徙提供了新的证据，使这种观念在客家方言群体中更为稳固。不仅如此，这些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客家人在中原南迁的过程中，还曾经有回迁的现象。现在河南、陕西等地的一些客家的聚居点，就是南方客家回迁的结果。<sup>②</sup>客家回迁中原以方言岛的形式存在，说明了客家人虽然来自中原，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已变为一种新的方言群体，不可能与远祖的群体一下子融合。

应当承认，过往对中国文化演变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视精英文化而轻视大众文化的倾向。而对两种文化的互动、影响，更是缺乏研究。客家人对自己祖先来自中原观念的形成和传递，的确给了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历史上的大众文化不仅有其丰富的内涵，而且有着自己的承传方式。这种方式既有来自社会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独特的基层文化的根。只有把两种文化同时作深入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文化多元的特色和发展轨迹，而从这一角度看，对客家人来自中原观念的剖析，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 [参考文献]

[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M]·兴宁：希山书藏，1933.

[2] 黄遵宪·（光绪十七年）与胡晓岑书 [A]·见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 [C]·中文出版社，1991.

[3] 杨一·行走的歌者 [N]·广州日报，2000-05-28 (A7) .

[4] 转引自杨耀林·深港客家源流 [A]·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 [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

[5] 黄玉钊主编·客家姓氏渊源 [M]·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办公室、梅州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出版，1989.

[6] 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 [M]·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24.

[7] 颜长江·毛里求斯岛上的中国兄弟 [N]·羊城晚报，1999-12-28 (24) .

责任编辑：杨向艳

---

① 我们在引用这个例子之余需要作一些补充说明。若要证明梅县颜姓是颜回的后裔，还要作大量的考证、调查工作。颜长江先生的发现，只能作为推断的线索和根据之一。

② 客家人回迁中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河南光山县的客家人。据当地的资料记载，在黄巢之乱和宋室南渡的时候，这里的人纷纷举族南迁，散落于江之左右。至元末明初，部分南迁的宗族又从江西的鄱阳县筷子巷迁回河南光山县。并带回过年祭祖供品插筷子的习俗，以纪念江西的祖先。参考陈美豪执笔：《客家源流纪行》凌双匡：《江西鄱阳湖畔是客家先民第一次迁徙的主要聚居地》《客家源流与分布》第84-91页。

# 客家文学的繁荣、得失与期望

◎ 罗可群

[摘要] 客家文学的繁荣为客家文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分析客家文学的现状,为进一步锻造精品,走向世界提出建议:一、增强客家意识,创作富有客家味的作品。二、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艺术手法的创新相结合。三、提倡达摩面壁精神,认真琢磨,反复锤炼。四、提倡直率的文学批评。

[关键词] 客家文学 客家意识 精品 走向世界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117-03

我在《广东客家文学史》中提出:“有精品,就可以使客家文学上档次,使之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有精品,就可以留住客家籍的读者,而且还可以吸引非客家籍的读者。因此,必须去掉浮躁的毛病,反对粗制滥造。要有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造出举世公认的精品。”友人不以为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创造精品,并非易事,岂能期望过高?你来试试”。我一时语塞。但名人早已说过,美食家不一定是厨师。笔者仍坚持要厨师做出“绝妙佳肴”,让受众能品尝到客家文学之美味。

## 一、客家文学的繁荣

在上世纪末,人们曾为“客家文学”的命题争论不休。《梅州日报》的副刊《梅花》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其中,马卡丹“客家人写,写客家人”的主张(1998年2月6日),朱伟杰“客家文学应该是一个文学流派”的论述(1998年5月1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客家文学的作品也接二连三地面世,出现繁荣兴旺景象。客家文学用实绩表明了自己的存在,用事实驳斥了否定的论调。

喝梅江水长大的程贤章,在创作了反映“改革风云与客家地域文化”的《神仙·老虎·狗》(1991)之后,写出了标志着“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围龙》(1998),新世纪后又推出了《大迁徙》(2003),反映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母亲是英德客家人的谭元亨,则有三大卷《客家魂》(1996)出版。最近,香港钟毓材的客家风情小说《故乡别传》又在《梅州侨乡月报》连载。此外,北京、福建、台湾等地,还有了不少客家小说。长篇小说大量涌现,是客家文学繁荣的最重要标志。

方兴未艾的人物传记是客家文学的一大特色。自福建著名作家张永和的《胡文虎》等客家名人传记系列和黄伟经、刘发清主编两大卷的《客家名人录》面世后,各类近代以来的客家人物传记,有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入传的有丁日昌、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等历史名人;有当代企业家,如《曾宪梓传》(夏云);有艺术家,如《艺海逆舟——林风眠传》(刘世敏)。令人鼓舞的还有“客属院士系列报道”,作者梁礼忠在艰难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把客家人引以为骄傲的科技精英一一介绍给广大读者。此外,过去极少涉及的宗教界也有了客籍人的专门传记,以梅县阴那山灵光寺住持释瑞基法师为传主的《缘深觉觉》(李国泰),于1999年在香港出版,2002年再版。

抒写客家人情怀,反映客家人生活的诗歌散文更是遍地珠玉,不胜枚举。旧体诗词和对联,本是客家人之所长。作者遍及大陆和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他们或组织诗社唱和,或个人观感留情,赋诗填词,佳作迭出。作为后起之秀的新诗,以其新颖的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打动读者,

作者简介 罗可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广州,510420)。

老诗人野曼宝刀未老，常有新作。老干部黄飞山唱出了两千余首《夕阳里的晨曲》（2003），以八部大型组诗反映一位客家知识分子坎坷的人生际遇，表达了复杂而又极真实的思想感情。广东“射门诗社”的新诗，充满了客家土地的芳香和时代气息。台湾黄恒秋等的纯客家方言诗更是独具一格。林雨纯、郭洪义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男儿》反映新一代客家人的胆识、胸襟和才干，深受好评，影响全国。散文华章，亦琳琅满目。万振环的《归来》被选入20世纪优秀散文200家。福建马卡丹的《回望中原》（1997）、广东罗青山的《狗哥哥、猫弟弟及其他》（1998）等都颇有客家味。随着旅游业的兴旺，有关客家风土民情之作亦大受欢迎。罗滨的“风物诗话”系列，旁征博引而文笔清新，格外引人注目。

山歌和山歌剧创作亦有佳绩。国家一级编剧罗锐曾在继《漂流的新娘花》、《红丝结》、《啼笑冤家》后，又与林子祥合作，创作了备受赞誉的山歌剧《等郎妹》荣获2002年广东省文艺调演一等奖。

恕我孤陋寡闻，然而，上列材料足以说明：客家文学园地姹紫嫣红，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

## 二、客家文学的得失

客家文学的繁荣，为客家文学创作出世界精品奠定了基础，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但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客家文学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

先看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程贤章先生的长篇小说关于客家风情的描写、方言俗语的成功运用，使人读来倍感亲切。《神仙·老虎·狗》和《围龙》都已相当成熟，故事生动，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众多评论家早有赞誉好评。但是，称得上“客家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的《围龙》在语言方面仍有粗疏之处，个别句子经不起推敲；在事实上把陈炯明误为陈济棠（P34），把王瑶误为余冠英（P351）。虽然“这是小说，不是历史”，也许有人认为不应苛求，但它毕竟是“硬伤”，令人遗憾。最近面世的《大迁徙》又在挖掘客家历史文化方面着力。程伯年届古稀，仍笔耕不辍，其精神令人钦仰。我殷切希望程先生反复锻造，创造出有世界影响的精品。谭元亨的《客家魂》三大卷：《世纪之旅》、《客家女》、《千年圣火》足有140万言。它通过教育世家三代人的命运，歌颂了客家人的“硬骨头”人文精神。作者善于想象，文笔流畅，将近百年的历史浓缩其中，实非易事。但它却缺乏“客家味”，对客家的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的特点还表现得不够明显，因此它在客家地区的影响不如《围龙》。

客家人物传记的通病则在于只重人物事迹之铺叙。目前多数客家人物传记对人物生活道路轨迹的记录较为清晰，对其贡献介绍较详尽。然而对传主心灵的展示则普遍不足，没有丰满的形象。人们爱读客籍院士的传记，不仅希望了解他们的科学成就，更强烈地盼望能知道他们是如何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正果”的。遭挫折时灰心过么？磨难中消极过么？困惑时动摇过么？如此等等。只有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充分展示，才能引起读者心灵的震动，共鸣，或受启迪，获得阅读的满足。

“有感而发”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客家人的诗歌创作的主流循着现实主义路线发展。阅读当代客家人的诗歌，我常被诗人的纯真感情或深刻思想所打动，时而释卷凝思，有所感悟；时而拍案称好！然而，目前所读到的诗歌基本上都是零篇碎页，迄今未见大气磅礴、令人回肠荡气的史诗式作品。1982年香港出版的《文丛》第4期刊有《客家史诗》（李吉奎），长达396句，分“序曲”、“开辟”、“文明”、“风物”、“血泪”、“丰碑”、“黎明”、“胜利”、“归心”、“展望”十大部分。“歌诗一束千秋史”，它形象概括了客家人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通俗而富有文采。我一直盼望能有规模更为宏伟、刻划更为精细、剪裁更为得当的史诗。

由于种种原因，戏剧创作还处于低潮时期，优秀作品实属凤毛麟角；至于极有发展前途的影视文学，目前也还未出现公认的佳作，殊为可惜。总之，当代的客家文学要走向世界，还有一段距离。

## 三、对客家文学创作的期望

诚然，举世公认的精品创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首先，要有强烈的客家意识，才能创作富有客家味的作品。所谓客家味，就是具有客家特点，而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文学风格。这是客家文学与非客家文学最重要的分野。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懂不



懂客家方言，是能否使创作有客家味最重要的前提。不懂得客家方言，就谈不上客家味。客家人写客家人，作家对客家的风土民情和语言文化有切身的体会，客籍作家自然是得天独厚。但真正要使自己的作品有客家味还是要花大力气的。客家味的获得，要靠生活积累，要像有些长期生活在家乡的客籍作家那样，真正与父老乡亲休戚与共，同甘苦，共命运，对父老乡亲的经济状况、政治理想、文化生活、审美要求及其七情六欲都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写好真实的客家人。至于非客籍作家写客家，当然也是大好事，但难度很大。有一位从四川来广东的女作家，要我提供资料，表示要写一部反映客家妇女生活的长篇。我坦诚地说：“你真的要写，我建议你到梅州地区去住三、五年”。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若不在客家地区生活，哪有生活积累？哪里会有客家意识？又怎么能创作出真正能反映客家人的作品呢？创作《客家魂》的谭元亨先生已经是“半个客家人”，但我读他的作品总还有“隔”的感觉。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虽然作为“知青”去过客家地区，但他的客家生活的积累还不够深厚。其次，要有客家味，还须向鲜活的民间文学吸取营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认为它是“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客家民间文学是最能体现客家人特点，最为鲜活的口头承传文学。客家山歌、客家谣谚、客家民间故事等等对客家民系来说，应该是一种识别标志，它是维系客家社区的生命线，更是客家文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客籍作家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从清末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李金发，对客家山歌的搜集、整理和成功运用，都充分说明了向鲜活的客家民间文学学习的重要性。1929年出版的李金发编纂的《岭东恋歌》，七、八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被视为客家文学中的瑰宝，这便是明证。一位作家若有几百首、上千首的客家山歌娴熟于心，客家味自然就出来了。“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愈有客家味的作品，愈能走向世界。

第二，理性分析要通过形象表现，要将深刻的理性思考与艺术手法的创新结合起来，文学精品必须以艺术的方式体现作家深刻的理性思考。宣扬客家人的美德，歌颂祖辈光荣固然必要，却容易误导读者，产生阿Q精神，而缺少危机感，丧失忧患意识。对客家族群的弱点要作冷静的、理性的思考，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要敢于创新。传统的现实主义固然是好东西，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但像李金发的《弃妇》那样，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又有何不可？随着眼界的扩大，读者的审美意识也在起变化，只有采用多种艺术手法，才能满足读者日益扩展的审美要求。因此，必须在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致力于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

第三，要有达摩面壁的精神，沉下心，认真琢磨。精品的可贵在于“精”。只有千锤百炼，去粗存精，才能达到“精”的水平。下笔千言，立马成文，暴发户式的创作，固然有其可钦羡的一面，但创作上的速成与锻造精品的要求却大相径庭。本来有条件“更上一层楼”的作家，或因查考不勤，或懒于修改，或过于自信，或急于出版，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讹错，从而遭人诟病。非客籍作家余秋雨是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他的粗率，对读者有误导，才会冒出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纠误之作。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有志创作精品的作家们深思。在我看来，进行文学创作不必“太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此乃天理。有了好题材、好构思的好稿子之后，能否暂时搁一搁？自己再多看几遍？是不是像鲁迅先生那样，尽量把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字斟句酌，反复再三，力求完美。

第四，提倡直率的文学批评，为精品的出现鸣锣开道。大陆的文艺批评界，客籍俊彦不少。北京的温儒敏、蓝棣之、童庆炳，湖北的古远清，广西的卢斯飞，上海的丘峰等都是客家人。因为“不隔”，评判客家文学作品较能切中肯綮。他们长期从事文艺评论工作，有较好的文艺理论修养，见多识广，定能为客家文学的发展出谋献策。但目前，对当代的客家文学作品大陆文艺批评界关注很不够，介绍、评述、分析的文章有限，涉及面不广。对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对不足之处的批评还比较缺乏。旁观者清，作家因“身处山中”而难于察觉，有赖于批评家的帮助。客家文学史上有文人相重、相亲的传统。互相切磋，坦言得失。发扬这一传统，将有助于精品的制造。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张资平早期小说与客家文化

◎ 巫小黎

[摘要] 客家文化从整体上作用于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创作。张氏早期的恋爱小说是客家山歌的故事化,是客家民间歌谣隐型结构在小说中的具体外化。客家人历史上形成的“男人在外乡,女人在故乡”的家居模式对张氏小说人物关系的安排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制约和影响。张资平早期小说表现了作者复杂的乡土情感,深蕴着客家人的恋乡情结,同时又与“五四”时代主流话语汇合,大胆暴露和批判客家文化中的落后消极因素和残酷野蛮的陋习,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命运是客家妇女苦难人生的缩影。他早期的小说是生动的客家文化风俗史,是认识、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珍贵文本。

[关键词] 张资平小说 客家民俗与文化 客家妇女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120-05

客家文化从整体上作用于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创作,影响作家的情感态度、思想倾向和艺术思维。他早期的小说很大一部分是以故乡梅县客家人的劳动与生活场景为活动背景。小说人物关系的安排,人物的命运及叙事结构、情节模式等都深深地烙下了客家文化的印记。

## 一、客家风情录

张资平早期以故乡梅县客家人的劳动与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是一幅幅色泽明丽、感情浓烈、多姿多彩的客家风俗画卷,他以写实的笔法和抒情的调子,将客家人的生活情境艺术地摄入小说文本,真实、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客家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宗教礼仪、人生态度、价值追求等。

1924年,张资平在蕉岭羊子山矿厂任经理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梅岭之春》<sup>①</sup>就是一幅绚丽多彩,诗意浓郁,富有浪漫抒情气息的客家风情画。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名叫保瑛的16岁山村少女和比她年长一倍多的堂叔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本身虽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的地方,但它却获得普遍好评。据张资平回忆,当时黄侃(季刚)就特别赞赏这篇小说<sup>②</sup>。文学史家们也特别看中它,把它编入各种选本<sup>③</sup>。小说充满生活气息和富有诗意的描写,勾画出一幅鲜活的客家山村民俗风情画卷:风景秀丽的山村,树木葱笼,瓜果飘香,炊烟袅袅,蓝天白云之下,长林浅水之间,采樵的姑娘,摇橹的哥哥,情韵悠扬的歌声,随风飘荡;汨汨的流水,吱吱的橹声,是他们最美妙和谐的伴奏。

通常情况下,张资平正面实写客家人的劳动与生活场面,把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内容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直接展示客家人的性格、气质、精神追求和生活理想的情况不多,而是通过在小说文本中嵌入富有独特韵味的客家山歌歌谣,在刻画小说人物的同时,细致入微地表现客家人热爱自然,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淳朴天性,将客家人独特的山居情境和客居命运暗示出来。如《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三七晚上》等,就在故事讲述中不时插入与情节、人物命运、环境气氛和谐吻合的客家山歌

作者简介 巫小黎,佛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 佛山,528000)。

① 羊子山,实名叫羊子殿。这里沿用小说篇末标注的地名。《梅岭之春》原载《东方杂志》21卷20期。

② 如郑伯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出版;朱文华、许道明主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三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歌谣。这些山歌 歌谣就象影视剧中的背景音乐，读者不难从中捕捉到客家文化的丰富意蕴和客家人的某些生活内容，并由此进一步去认识客家人的历史、命运和生存处境。

客家山歌多为情歌、恋歌，它是客家民间社会下层人民的口头即兴创作，内容多为男欢女爱，粗犷质实中带点野性之美。它非常率真、直白地体现出客家人的婚姻爱情理想、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也是客家人憨厚质朴中透出几分灵秀的心性特征的外化形式。客家民众爱唱山歌，客家文人也大多喜欢山歌。黄遵宪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因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故“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收入《人境庐诗草》<sup>21</sup>。李金发在法国留学时曾有过将客家山歌译成法语，把它介绍给欧洲读者的念头，这事后来虽然没有做成，但却促使他编成了一本《岭东恋歌》。他认为：“其辞句组织的妙丽，真有出人意料者，记得我当年于赤日停午，闲行于峰峦起伏间，辄闻悠扬的歌声，飘渺于长林浅水处，个中快慰的情绪，和青春的悲哀，令人百思不厌也”<sup>23</sup>。客家人对山歌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下面的山歌分别录自张资平的小说和李金发编选的《岭东恋歌》从中可感受到客家人的创造：

底事频来梦里游，因有情妹在心头。早田六月仍无雨，溪水无心只自流。/妹住梅州乌石岩，郎家滩北妹滩南。摇船上滩不用楫，摇船下滩不用帆。/郎似扬花不住飞，与郎分飞牵郎衣。山高树绿郎门远，惟见郎从梦里归。/半是无情半有情，要将心迹话分明。伤心妹是无情草，乱生溪畔碍人行。——张资平：《晒禾滩畔的月夜》

日头毕出凹里黄，有情心肝来恋郎。虽然不是亲妻子，赤肉兼身总动肠。——李金发：《岭东恋歌》P84

南风不当北风凉，亲夫不当夜来郎。夜来郎子有话讲，亲夫一觉到天光。——李金发：《岭东恋歌》P101

客家山歌曲调哀婉缠绵，一唱三叹的咏唱中透出许多无奈与感伤。如泣如诉的基调中饱含着无限苦痛与辛酸。客家青壮男子多外出求学、打工或经商，妇女留家守宅，夫妇之间聚少离多，感情上欢乐时少，愁日苦多，山歌便成为他们抒唱离情别绪的最好工具。因此，山歌实际上是客家男女感情生活得不到应有满足时的一种心理补偿方式。周作人说它是“感情的体操”，是“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的山村男女寻求感情慰藉和痛苦解脱的一种娱悦方式，现代性心理学说的意淫。<sup>[4] (P118、124)</sup>

长期浸淫于客家山歌文化氛围中的张资平，在经过 10 年留日生活之后，又回到阔别的故乡，青少年时的文化心理积淀浮出意识层面，惊喜地发现山歌所含的独特文化意蕴，并自觉地将它转化为小说创作的资源，以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创作的思想养料，植入现实生活的一些人和事，因而就有了那些以多情浪漫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恋爱小说。可以说，客家山歌正是张资平小说中求爱 思恋 一偶合 偷欢 一生离 死别的叙事模式的依据、情感资源与形式资源。在我看来，张资平的那些恋爱小说其实就是客家山歌的故事化，是客家民间歌谣的隐型结构在小说中的具体化。

张资平在小说文本中嵌入客家山歌，丰富了小说的内容，拓宽了小说的意义空间，使之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也为读者理解小说人物的命运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又丰富了草创时期新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在提高作品的表现力，加强小说的地方特色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这也是作者本人热爱家乡，富有深厚乡土感情的曲折表现。

## 二、客家的文化进取精神

张资平的小说，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生动的客家文化风俗史，透过他的作品，读者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和认识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

客家人几乎都居住在田少山多，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贫困偏远山区。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客家青壮男子多秉承客家先民东移南迁，流离辗转的历史情景中激发出来的开拓进取、发奋向上的创业精神，别妻离子，远赴南洋各埠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创业机会——当地人称之为“过番”<sup>①</sup>。另一条进取之路则是以文治贫，以学翻身。张资平自己就是“书包翻身”的具体实践者和成功者。

梅县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与读书求学等文化活动相关的俗谚、歌谣，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客家人崇

<sup>①</sup> 《嘉应州志》“俗谓往南洋者曰番客”。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七》有《番客篇》。

文重教的风气之盛之炽。譬如：“蟾蜍婆，咯咯咯，不读书，冇老婆<sup>①</sup>。”“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等等，本来与文化活动没有任何关联的生活事象，在客家人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却被很自然地打上文化的印记，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一个男人，如果胸无点墨，就好比有眼无珠，不能看书读报，不能自立于社会，甚至还有一辈子打光棍的危险。反之，知书识礼则可望肥马轻裘，娇妻美妾，尽享荣华富贵，即便月里嫦娥，也会顾盼生情，爱意缠绵。尽管这不见得就是事实，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和鞭策的殷殷之意，却也传达出客家人的价值观念：读书求学是求生存的一种基本能力。故有谚曰：“养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当然，客家人所以钟情于文化治贫的进取之道，重要的一点，还因为他们来自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原腹地，明显高出山地的文化视野和远大胸怀，陶冶了他们热爱文化，崇尚文明进步的秉性。这样，出洋打工、经商和读书进取，一文一武的创业模式就成为客家人寻求经济解放，开拓新的生活空间和发展前景，改变苦难命运的有效途径。而且，文武之间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著名诗人、雕塑家李金发当年得以在法国留学六年而衣食不愁，无忧无虑，就幸得有在毛里求斯的父兄作经济后盾。出身贫寒的一代宗师林风眠，当年能够远赴法国研修美术，也是靠了一位海外经商的远房亲戚的资助。

张资平虽然没有在南洋群岛各地生活的经历，而他的小说却不乏东南亚的热带风光，异域风情。张资平生活的时代，梅县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偏居一隅，但当地住民却眼光开阔，与外界联系非常频繁、密切，社会的开放程度也较高。与海外的频繁交流，自然带来某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知识，为革故鼎新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有效地激活当地的文化活动，促进文化建设和发展。客家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生境遇，经由张资平的艺术加工，就有了一批活跃在南洋群岛各地的客家小说人物。如橡胶商人凌士雄，为了生计不惜铤而走险替人贩运假钞的杨松卿，在南洋替人开车的吕阿根等。就是《梅岭之春》中那位和堂侄女有了性关系而怕舆论谴责的小学教师吉叔父，最后也只好逃到毛里求斯当家庭教师。所以，作者在《中积期化石》里说，由于贫穷落后，村中的少年“都争先恐后，渡过南支那海，到澳洲和亚细亚洲交界地方去筚路蓝缕，做英吉利和荷兰国殖民地的开劈功臣。”这类文字，与其说是创作，倒不如说就是 20 世纪初期客家人的生活实录。

在张资平小说中，还有另一类型的人物，如黄广勋、谢克欧、刘文如、宗礼江、吕广、吴梅等可以文化人身份自傲的先生和书生。他们是小说中最受年轻女性青睐爱慕的美少年。在客家人看来，一个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经由读书走出大山的书生结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养出读书人为骄傲和自豪。所以，为人父母者，即便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学业前途上疏忽大意。对这种客家文化进取情怀，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资平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中积期化石》等书中领略到。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积期化石》中的天厂，就是一位望子成龙的慈父，他为了能让儿子出国留学，实现文化治贫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说到了万死不辞的地步。他弥留之际给远在日本求学的儿子留下的临终嘱咐就是好好用功，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报答亲恩，还特别叮嘱：父亲死后也不必回家奔丧服孝，“如遗父命，便为不孝”。在这里，孝和不孝的内涵有了新的特定内容。小说中的韦天厂的原型正是张资平自己的父亲——一位中年丧偶，“从小康坠入困顿”，但又文明开通，思想进步的穷秀才。

张资平这个家族，从他的曾祖伯张其翰在清道光二年（公元 1822）中举到清末 80 多年间就考取过五个举人。张资平的曾祖父张其翮也是一位举人，他是在他的哥哥张其翰——中举之后的第 12 年，即清道光十四年（公元 1834）中举的。我们尽管可以说，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早有郎才女貌，“红袖添香夜读书”和“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人生理想的范型。但如果承认明清以降梅县考取进士、举人的人数，远远超出

<sup>①</sup> 冇，客家方言，没有之意。



其他同类型地区的事实，你就不能不惊叹这客家文化进取精神之历史积淀。

### 三、客家习俗的反映与反思

客家人一文一武的创业模式，派生出与之相关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具体到家庭结构模式上，因男人在外乡，女人在故乡，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男女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失去应有的平衡。为了不影响生产和生活，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客家妇女必须承担比其他地方的妇女更多的艰辛和苦难，独立负起“支持家庭门户的责任”，<sup>[31](P4)</sup>同时扮演“主内”与“主外”的双重身份与角色。她们必须上侍奉公婆，下养育儿女；内操持家务，外勤于耕种；担水劈柴，洗衣做饭，农牧渔猎，无所不能，无所不干。因此，张资平笔下的女性，大多赤裸一双天足，头顶烈日，肩挑手提，足下生风。这是客家妇女性格和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客家妇女苦难悲剧人生的缩影。

张资平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客家妇女的命运和不幸人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客家社群为解决劳力不足的另一途径就是买童养媳。客家人日常所说的“等郎嫂”、“细薪舅”，指的就是童养媳。童养媳是封建宗法制农业社会买卖婚姻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它不为客家人所独有，而是老中国的祖传，沈从文还有专门写童养媳悲剧命运的小说，如《萧萧》。客家人娶童养媳一般是在女婴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回领养，婆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调教儿媳。待童养媳稍大，她就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必须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以媳兼婢，一物两用”是买童养媳最实在的“好处”。下面是一首“细薪舅”自诉其苦的歌谣：“日头一出千条须，阿妹上山割蕃箕。蕃箕割得多，婆婆见到笑喃喃；蕃箕割得少，骨头沫渣骂得了。爱骂尽渠骂，心里想得化。只怨耶嫉穷，细细教厝嫁。<sup>①</sup>”一个童养媳，再苦再累都没有人会同情可怜。

在张资平早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这种风俗习惯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县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极为盛行。尽管张资平没有像《萧萧》这样直接以童养媳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小说，但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养媳，像《冲积期化石》中的刘四妹：“三岁那年，……照这村里盛行的买婚的习惯，……到她舅母家里，和她一个生下来才满三个月的表弟结了婚”；《梅岭之春》中：“才周岁的保瑛”，“嫁到了一个三岁多的丈夫”；《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岁那年，由她的父亲作主”，“做了一种酬谢品”“定给”一个商人“做媳妇了”，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是一位没有露过面的角色）等也是童养媳。蓄养童养媳的种种“好处”，只是就家族或家庭利益来说的，其价值立场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基础上的。倘若就当事人双方而言，童养媳的买卖则是充满着罪恶和血腥的野蛮行为，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及情感选择的自主，其实质是将女人看作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产。张资平用的写实手法真实、清晰地记录下了历史上客家妇女的不幸。他笔下那些童养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人物。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就是客家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命运就是无数客家妇女不平命运与苦难人生的代表和缩影。他以艺术的手段展示了宗法制农业社会劳动妇女的不幸人生，以创作实践积极回应“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主张。这也说明，张资平的文学活动与创作从一开始就与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

青壮男子长期在外谋生，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男女之间正当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有的男人一去三年五载，或十年八年，夫妻之间常常音讯不通，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有时外出的男人早已客死他乡，或者因苦于漂泊流浪缺少温暖而另娶新妇，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张资平的一位堂伯父张淑皋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因为长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妇，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果新妇

<sup>①</sup> 日头，太阳。千条须，喻指朝阳光芒四射。阿妹，客家话指姑娘，这里是童养媳的自称。蕃箕，叶像羊齿样，生长在山上的草本植物，客家农村用作燃料。骨头沫渣，客家土话，意指统统、无论什么；了，读作 lǎo，整句是说什么话都骂。尽，任由。渠，第三人称代词。耶嫉，爹娘、父母。细细，年纪小小。教，使。厝，我。



旧人互相仇视，两方儿女形同敌人。小说《她帐望着祖国的天野》就是以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主人公，带着中日两国血统的小女孩秋儿的原型就是张淑皋与日本妇人的女儿。<sup>[5]</sup>

长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条件许可，自然不会拘于纲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乡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一任青春老去，红颜瘦损。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胆僭越陈规去寻求个人幸福的女性。李金发曾极为生动地描述过：“他们的结合是这样：男子们知道某姓的妇女在工作，遂三三五五结队去游山，隔远便唱极有意义和地位的山歌，去引诱他们，女人们有意结交，便反口酬唱，迨愈行愈近，男子们便开始调笑，或强迫地去摸抚其自然伸展的奶子，再放肆一点”，那些男女们也许就在辛勤劳作之余，桑间濮上，幕天席地“干起他们所最愿意干的事情来”。<sup>[3](P5)</sup>当年鲁迅说，张资平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知道“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女人的性欲冲动”，比男人还要强烈，你不找她，“自己跑来了”，<sup>[6](P230)</sup>看来确是说到了点子上。但鲁迅有所不知的是形成和产生这种两性交往方式的现实原因及其生活依据。而且，从更深一层思考，读者不难明白，鲁迅的认识潜藏着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夫权意识，他的评价是男性权威话语的思维惯性和心理定势对他制约与诱导的结果。

在现实中，那些试图超越古老礼制秩序去寻求感情和欲望满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归案”则身败名裂，性命不保。那些“为纲常名教之所系”的族人，对犯了“罪”的女人的惩处办法是：

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一任族人鞭打，最后就用锥钻刺死她。——《梅岭之春》

妻子有外遇，丈夫的族人是有这种特权的——得任意鞭打那个女人的特权。美瑛曾目击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那个女人给残毒的几个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最后的幸福》

经过十年留学生活，接受过现代科学文明洗礼，有了异质文化作参照之后的张资平，显然为这类不人道的陈规陋习感到痛心和愤慨。因此，他以新文化运动亲历者和先驱者的姿态，对不幸女性命运倾注无限的同情和怜爱，有意识地将它艺术地摄入小说文本，暴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恶性，显示出作者应有的思想倾向和对客家文化中野蛮残忍的落后成份所持的批判态度，成为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中一个响亮的音符。因此他的小说，理所当然地汇入挖出病痛，引起疗救，表现被压迫民族人生苦难的创作主潮，这些无疑是现代启蒙思潮影响下早期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收获。

张资平小说中那些活泼浪漫、富于人性光辉的女性，有着热爱自由、追求幸福的天性，可是，最后都一个个窒息、凋谢，这不能不令人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在新文学尚未在文坛站稳脚跟，鸳鸯蝴蝶、神魔鬼怪、侠客大盗依然在文坛占据大部分地盘的时候，张资平却能以极其平民化的姿态和人道的立场，写出凡人的苦与乐，喜与悲，幸与不幸，“单就这一点，便可使反对张资平的人所加的误会完全钩销”。<sup>[7]</sup>

但也应该看到，张资平小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把过多的笔墨和兴趣集中到两性间的调情、嬉戏和对人物的性特征描写之中。作品中占据小说重心的是两性间的感情纠葛。主人公的情感变迁、心理历程、性格特征几乎始终在同一层面上滑行，未能向更深更高的层次掘进，因而模糊、冲淡，甚至遮蔽了作品的主题，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和思想深度，当然也就难以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其后期的创作更是完全陷入商业化写作的泥淖之中。这是张资平，同时也是新文学的巨大遗憾。

#### [参考文献]

- [1] 张资平·创造季刊时代 [N]·上海：大众夜报·不夜天·1948-07-04.
- [2]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山歌 [Z]·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 李金发·岭东恋歌·序 [Z]·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9.
- [4] 周作人·猥亵的歌谣·见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30.
- [5] 张资平·创造季刊时代 [N]·上海：大众夜报·不夜天·1948-06-20-21.
- [6] 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7] 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 [J]·清华周刊（41卷）·1934（3-4）.

责任编辑：陶原珂

## · “辽金文学研究态势”笔谈 ·

[编者按]近20年来,辽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其它学科相比,辽金文学研究仍处于“弱势”,如何加强弱势学科的研究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于暨南大学召开之际,我们约请了辽金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以往研究得失的回顾与反思,为这一弱势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125-13

# 对弱势学科与方法论的思考

◎ 邓绍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有一部分已经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最受关注,比如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中的“四大名著”,而辽金文学虽然也有元好问这样的大家,但总的来说是不大受重视的。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从文学史研究的全局发展角度,来谈谈辽金文学的研究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百废待兴,古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回忆起80年代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方法论的引进和丰富,所谓“新方法的爆炸”。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看,当时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组织工作,我记得无论《文学遗产》还是《文学评论》等召开的座谈会,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求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领域的研究。当时我们认识到,这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具有全局性意义,而非仅仅是一个局部性问题。比如元代文学史中的戏曲研究是显学,五四以来有不少名家,而元代诗文研究方面则非常薄弱。所以我们在编《元代文学史》的时候,多花力气于诗文方面。还有一些文

化现象,这似乎是一些具体的局部的小问题,但是,累加起来却成了全局性的问题。我还参加过在甘肃武威举行的五凉文学研讨会。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南,文化人主要聚集于建康,而另有一小部分文化人则向西行,聚集于张氏父子把持的凉州,类似于抗战时期文化人聚集的桂林。这样的史实,在文学史上根本就不会提到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地域文化及文学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些若明若暗的现象弄清楚了,对了解南北朝文学乃至文学史整体都是有意义的。清诗应当是一个“大国”,但那时也成了研究上的薄弱环节,苏州大学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文学遗产》与他们联合召开清诗讨论会,起过一定作用。当时近代文学研究也需加强,我们与各地研究者联合召开讨论会并坚持下去,也收到了好的效果。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来看辽金文学研究。我一向认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兴旺发达,应当至少有如下三个标志:首先,此一领域内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应当具有基本的规模;其次,学术论文及论著不断出现,而且出现被学界公认的优秀著作甚至权威性著作;再次,出现

一批专攻或兼攻辽金文学的学者，其中还应出现一些被学界公认的优秀学者。我看辽金文学研究的奋斗目标也大致如此。辽金文学文献资料方面，像《全金诗》、《全辽金诗》、《全辽金文》等都出版了，尽管在这方面有前人的基础可以参考，但是辽金文学研究者的整理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他论著也多有成绩与创获。从学术研究来看，过去对金代文学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金代文学就是赖元好问以传，没有元好问，就没有金代文学。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全面。我们当然承认元好问是大家，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在金元之交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做了大量挽救和保存文化的工作。元人所谓“斯文命脉赖元、杜诸公为主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元好问请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称号，其用意即在于保存文化传统与人才。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所做的这些保存金代文学文献乃至文化的工作，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所以，过去研究金代文学集中在元好问身上并不奇怪。但就金代文学史全面研究来说，视野必须要更广阔。五四新文化革命以后，首先撰文推崇王若虚的是郑振铎先生，可称独具慧眼。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辽金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上不断推进，不断深入，是在创造历史。把辽金元文学研究深入推进，这决不是一个细小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事关文学史研究的全局。

自然，辽金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由于前人的积累较少，在辽金文学研究方面往往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文献资料校正的问题。我们知道，清代人编辑的《全唐诗》后人的补充、校正甚至批评意见都不少，因为其中出现了张冠李戴、同名重出等情况。可能这种情况在辽金元作家作品方面也不会少见，比如元代诗人萨都刺的《雁门集》中就有他人作品混入，卢琦的《圭峰集》中他人诗作更多，还有编集人故意作伪现象。我的同事杨镰先生正编纂《元诗全编》他说此类问题不少。又比如针对王树林先生的《金末诗僧性英禅师考论》一文，有的先生提出注意不要与元代英上人相混；元代英禅师的

作品很多见于张羽的集子。还有，在杨宏道的集子里，我偶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元诗四大家”之一杨载的诗歌，还有送张雨的诗，杨宏道去世的时候张雨还在南方，未到大都，怎么会有杨宏道在大都送张雨回南方的诗呢？王树林先生告诉我，杨宏道集子里混入别人的诗作不止一两首，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辽金作家别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在一代作家的作品全集、主要的别集以及历代汇评整理方面，还有不少辨析考订工作要做。

元代杂剧的起源方面，至元年间元准的诗里已经看到了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流行于世的消息。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北曲杂剧到忽必烈至元年间才出现。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中提到，“其备则自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备”即完备，完备不等于开始。杨维桢《沈氏今乐府序》说“出于关（汉卿）、庾氏（天锡）传奇之变”，我们知道关汉卿在元杂剧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单指关汉卿创造杂剧，那是一种形而上的说法。如果我们注意到杨维桢《宫词》“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那么，是否在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大蒙古国”为“大元”的时候有人“进剧编”？有没有可能在金末或蒙古国时期，杂剧就已经出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加强金代文学的研究，有可能找到“备”之前的一些线索或材料，从而改变或补充文学史上对元杂剧起源等重大问题的传统看法。

在研究元诗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元代宗唐风气可以上溯到宋、金。明初瞿佑讲到元代诗坛“举世宗唐恐不公”，我发现，实际上元代“举世宗唐”的局面是由两股潮流合力形成的。金代后期诗人宗唐，南宋末年诗人也开始宗唐，但两者之间还有区别。宋末元初如戴表元、仇远、白斑等人的宗唐（仇远说“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从其言论及创作来看，尚未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之分，因此诗歌创作上也呈现各种风姿；而金代诗人如元好问等则主要推崇盛

唐。关于金代宗唐的起源问题，我跟张晶先生的看法有点不同：他认为金代宗唐起源更早，我还是传统的看法，认为基本上是从赵秉文开始的。赵秉文的老师王庭筠推崇宋代苏轼、黄庭坚，而赵秉文后来改弦更张，主张学习唐诗。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师承家法，不能越雷池一步，赵秉文此举因此被人目为与师争名。赵秉文改变门庭，改崇宋为宗唐，这是传统师法上的一个叛逆，也是金代诗风的重大转变。举这个研究元诗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为了研究元代诗歌的发展，我们必须上溯到金代文学。

随着我们对辽金文学研究的深入，很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成绩，至少有所补充，有所完满，甚至有所突破。这对研究者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文学史薄弱环节的重视，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对新方法的引进和借鉴。新方法的引进对开阔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模式是很有作用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规律性现象，其间也就有吸收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结果，最终衡量一门学科或一种学问兴盛繁荣的主要标志是质量的提高和学术的深度。因此，上世纪 80 年代新方法热中出现的强调方法更新就是一切的片面观点逐渐被扬弃了。从 20 多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实践来

看，扶植弱势学科，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设性的。20 年来很有成绩，而且逐渐形成各个研究队伍，出版了不少开拓性的著作，虽然不像方法热那样有声势，但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可观，所以我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新方法的引进。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两种现象在 20 年前几乎同是学术界着力呼吁和提倡的，所不同的是，扶植弱势学科并没有出现“热”，更没有什么“爆炸”。

马克思曾经说过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话，如何看待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显学总是能吸引人，它的影响与弱势学科总是不同。但弱势学科也自有它的吸引人处，这里的开拓和原创机会或许更多。我在前面说的衡量一个学术领域兴旺发达的三个标志，其实也是由“弱”转“强”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查一下 1949 年——1966 年 6 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那 17 年间的金代诗文研究论文只有 10 篇（其中 9 篇论元好问，1 篇论王若虚），诸宫调论文则有 11 篇，对照一下 1980 年以来的辽金文学的研究状况，真可说是恍同隔世。20 年间来了一个“大跃进”，数量与质量上都在飞跃前进。使辽金文学研究由“弱”转“强”，用流行的话来说，做大做强，改变一门学科的面貌，不就是创造历史吗？

## 辽金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张 晶（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24）

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感受到了两种趋势：一是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增加带来的研究队伍的扩大；二是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而引起的学术创新度的弱化。因而，古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初应当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辽金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自然也面临着这样

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方法论热”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使文学研究呈现出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脱离研究对象客观情况、仅凭主观臆想的空谈之作。辽金文学的

研究者们则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检视辽金文学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给人以颇为笃实的印象。无论是个案研究，抑或是史的建构，都是在大量的文献分析基础上进行的。辽金文学研究这些年来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薛瑞兆、郭明志、狄宝心、阎凤梧、刘达科、康金声、王庆生等学者，都在辽金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薛瑞兆、郭明志两位教授整理校点的《全金诗》（四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所收金诗比清代郭元釭的《全金诗》增加了近一倍。阎凤梧、康金声编《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将辽金两代之诗合编为一帙，规模颇全。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是目前元好问诗文集最为完备的版本。王庆生点校增补的《金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比原来的《金诗纪事》增补了 240家。刘达科在金代文献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值得重视的，他这两年先后发表了《辽金元史志书目通览》、《建国以来元曲选本书录》、《今编全集型辽金元总目叙录》、《辽金元书目剧目通览》、《辽代文学史料保存整理述论》等文献研究的论文，对于辽金文学文献的研究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文献整理和研究是辽金文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它是凭借着坚实、熟练的考辨工夫进行的。近年来的辽金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辽金文学研究上升到一个新境界开拓了道路。

辽金文学研究原来缺少史的建构，而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已有数位学者撰写并出版了专史，如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4年）、《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陶然的《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等专著都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这些辽金文学史著作，体现了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建立在扎实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而又对辽金文学的发展作了客观的描述。

辽金文学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史价值。辽金

两代均为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王朝有着文化上的差异性和互融性。中原文化是以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为其传统和核心的，北方的游牧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互相冲击与互相交融中得以成熟和提高，中原文化也因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刺激而生发出新的活力。这种文化的互动在辽代和金代都是非常典型的，对于辽金文学独特风貌的形成是至为关键的因素所在。在新时期以后的辽金文学研究中，文化学、民族学的视角就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切入点，由此也带来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样态。张晶较早出版的《辽金诗史》即是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建构的文学史著作，在这方面，作者是有理性自觉的。黄震云的辽代文学研究也是以文化背景的描述作为支点的。对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创作风貌的考察，也多有从文化角度切入的，从而使元好问研究呈现出理论层次的延伸，如狄宝心从文化角度对元好问所做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情形。胡传志在他的专著《金代文学研究》中，对《中州集》进行了文化意义的阐释。赵维江的《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也是一篇很有学理而又密切结合辽金文学实际的力作。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辽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在这两个时代都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留下了他们的作品，而且有突出的特色。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背景，又因为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和汉文学的传统，故其创作有着特别的美学素质。近年来的辽金文学研究学者多有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深度考察，如对辽代王室耶律倍的文学创作的探究，对契丹女诗人萧观间、萧瑟瑟的诗词成就及其成因的揭示，都体现了这种角度。在金代文学研究中，女真帝王完颜亮和金章宗的诗词都有不止一篇的专文研究。女真诗人完颜璘也有专文论及，周惠泉有《完颜璘研究》收入其《金代文学论》一书中。张晶也有几篇文章论述了辽代契丹诗人和金代女真作家的创作。台湾学者郑靖时的《金源女真人诗作评析》对金代女真作家的发展概况作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完颜亮、金世宗、金章宗、完颜璘等作



了个案分析，很有学术价值。

注重哲学、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是近年来辽金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辽金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渊源，而在哲学、宗教领域既有深受中原哲学、宗教传统影响的方面，又有特殊性。可以说，辽金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的颇具特色的一页。譬如全真教作为金元时期的重要宗教流派，其社会影响及其对文学的浸染都是非常广泛的。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哲学、宗教的层面对辽金文学进行开掘，取得了颇有厚度和深度的成果。降大任的《元遗山新论》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意义，对元好问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在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研讨会的论文中，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辽金文学的文章有十来篇，颇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趋势。如李正民的《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张晶的《李纯甫的佛学观念与诗学倾向》、张兵的《从〈西游录〉看辽金元时代的一次佛、道斗争》等文章，都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佛道思想对辽金文学家的重要影响，从而揭示了如元好问、李纯甫等作家的艺术风貌的一些深层原因。全真教是金代的特殊宗教，全真教中人又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这次研讨会的论文有几篇是专论全真教道士诗词创作的，如许兴宝的《王重阳词简论》全面地研究了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词作，徐翠先的《谈丘处机山水景物诗的审美特征》把丘处机的山水景物诗的审美特征和诗人的全真道思想背景联系起来考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这些论著展示了近年来辽金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辽金文学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不是热门的领域，但并不能因此而无视辽金文学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整体中的地位和贡献。辽金文学研究的崛起，对于文学史的当代发展，不仅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史撰著的格局或结构。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著作鲜有将辽金元划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则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变。在带有史的描述性质的研究著作中，现在一般都将辽金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断代进行研究。辽金文学学会成立之后这段时间内，有关的研究更呈现出

这种态势。如新近出版的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的《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即以辽金元的山水诗为其第四编，傅璇琮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通论》以《辽金元文学通论》为其独立的一册，等等，都说明了最新的文学史编著格局是以辽金元为独立的部分的。这比起以往的文学史多以辽金附于宋代文学之后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于辽金文学的研究实绩使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份量日益加重的结果。在这个格局中，辽金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文学史一个阶段的辽金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有机部分，与文学史的上下段都是血脉贯通的，在其内在的机理上有着连续性和传递性，尤其是对后来的元明清文学，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辽金文学又有着文化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汉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这就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理路提供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切入的最佳案例。我们要考虑的是，这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如何通过文学的内在审美机制发挥其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揭示的是辽金文学的独特文学风貌的文化成因，这个机理的解释和阐明，不应是大而化之的，而要从文学内部得到合理的说明。

辽金文学还缺少一部成熟的、带有经典意义的通史，这种通史应该建立在更多的专史基础上，并以更多的个案研究为其客观内涵。我以为这是辽金文学研究应该捧出的一个硕果。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开拓空间，而且，辽金文学研究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献工作还要先行。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辽金文学文献有待于整理、研究的还有许多，还有一些重要的别集未得到校点出版，如赵秉文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王若虚的《滏南遗老集》等。《河汾诸老诗集》虽然已有排印本问世，但质量很不理想。文献的校点整理，其意义也许并非都能得到理解，但对于辽金文学研究来说，我以为是再上一个层次的重要基础。另外，已有的辽金文学研究成果，从文体的角度看，多以诗、词为主，绝大多数的研究都

集中在辽金时期的诗词上。事实上，辽金时期的其它文体，如文、散曲、杂剧等，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现在的研究明显不足。在元代臻于鼎盛的杂剧、散曲等文学样式，在辽金时期已经开

了端绪，对它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其意义是超越辽金时代的断限的，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的发展丰富，会有更重要的贡献。

## 金代文学文献研究的成就及不足

◎ 薛瑞兆 (黑龙江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金朝的文学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战火的损毁与偏见的影响，金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未得到应有重视，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自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 1979年)问世后，先后涌现出姚奠中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薛瑞兆的《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张正义的《河汾诸老诗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年)，阎凤梧的《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年)，王庆生的《增订金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等。这些文献著作各有特点，为金代文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金曲的整理，近 20 多年来成果迭出，如凌景埏的《诸宫调两种》校注(齐鲁书社 1988年)，朱楚平的《西厢记诸宫调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年)、《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年)，蓝立冀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巴蜀书社 1989年)，廖珣英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中华书局 1993年)等。但是，由于受金代文学史整体研究不系统与各体研究不深入的制约，以上所举多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影响了各自的学术价值与使用价值。

如元好问的《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存史，为保存金代文献作出了杰出贡献。但由于所涉人物前后跨越百年，有些仅凭传闻，或资料匮乏，使得这部“史诗”蒙上厚重的灰尘。近年来，周惠泉、胡传志等有所考订，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然而这方面还须全面深入研究，不断清理。

清郭元釭的《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开了清人研究整理金代文献的先河。一是增补了元好问等金末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与《中州集》相比，“卷六倍之，人几三倍之，诗倍之”，当时称“一代之作苞括无遗”。二是小传之下参以《归潜志》及金元人铭表题跋并说部诸书，为深入了解金代诗人提供了方便。三是自《中州集》问世后，越元明两代，第一次给予金诗积极评价，谓“清真淡宕，有宋诗之新而无其鄙俚，有元诗之丽而无其纤巧。文质得宜，正变有体”，将金诗提升到一代人文之作的高度。然而，《全金诗增补中州集》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一是收录范围缺少广度与深度，遗佚甚多，如《道藏》、《永乐大典》、《诗渊》中保存的金人诗作，郭氏未见。二是编辑体例不尽合理，如增补的诗作，除少数别集外，均未注明出处；再如，郭氏将诗人分为帝藻、诸相、名家、异人、道释等十六类，依类聚编次，而不是以时代先后为序，造成诸多混乱：同一诗人的作品被分置两处，同一题目的组诗被拆散，同一时期的诗人不相关联。三是对《中州集》及增补的诗人与作品未作任何考订，真伪混杂，舛误亟多。

清张金吾的《金文最》是现存最早的金文汇集。由于编者识力与获取信息手段的局限，问题也非常突出。一是误收非金人作品，如宋赵子崧《观堂铭并序》、宋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序》、

宋王易《北岳诗序》、元刘文蔚《平野亭赋》。或因收集金文心切，对署以“金人”的文章，即便颇有疑窦，也不肯割爱。二是滥收“外国”遗文，如辑入夏张陟《大夏国葬舍利碣铭》、夏贺宗寿《密呪圆因往生集》虽与其凡例吻合，却不伦不类。三是掺入假冒诏疏，如《下宗翰狱诏》及宗翰《狱中上熙宗疏》、《諭爱王诏》、《以南迁诏》、《罪己诏》等，这些假冒诏疏大体宋人所为。四是失名可考而未考，如《朗然子刘真人诗跋》、《水云集后序》、《投龙碑》、《晦明轩重修证类本草跋》等。此外，以帝王名义颁布的诏令册文及檄书出自翰林词臣之手，而姓名大都埋没了，如能悉心搜求，有些可以还其本来面目，如《更定官制诏》、《诛宋兗诸王诏》、《增上太祖尊谥册文》、《上钦仁皇后尊谥册文》、《增上睿宗尊谥册文》、《增上孝成皇帝尊谥册文》、《立楚王为皇太子册文》、《大赦天下诏》、《增上孝成皇帝谥号议》、《諭孟宗献诏》、《諭沁州刺史李穰诏》、《立原王为皇太孙册文》、《立原王为皇太孙制》、《郑王允蹈伏诛布告中外诏》、《封长白山为灵应王册文》、《诏宋吴曦诏》、《赐国用安铁券文》等等，均出自金代名家之手。五是署名有误可考而未考，如宗弼《上宋高宗书》七篇、完颜元宜《增上睿宗谥号议》、纥石烈良弼《上世宗尊号册文》、李石《加上世宗尊号册文》、乔宸《座中铭》、完颜宗浩《复宋知枢密院事张岩书》、完颜匡《复宋参政钱象祖书》、完颜用安《諫哀宗迁蔡疏》等，也都张冠李戴，剥夺了那些翰林词臣的冠名权。此外，题下标注年代讹误颇多，作者排序屡见前后颠倒。这些问题均因对作者及作品缺乏研究所致。

金代文学文献的当代研究亦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兹举《全辽金文》为例。《全辽金文》的精华在金代部分，新辑作者及作品若干，特别是在山西境内征集碑石资料，有所发现，但是疏漏之处亦不少。一是沿续了《金文最》的全部谬误。二是小传考订粗疏，对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仅限于抄袭拼凑，而没有经消化形成自己的见解。例如李献能小传：“贞祐三年，状元及第。”此说源自《中州集》卷六《李右司献能》、《金

史》卷一二六《文艺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金刘祁《归潜志》卷二：“南渡，擢南省魁，复中宏词。”则未言廷试第一。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四《史学优登科岁月》“钦叔二十三省元赐第，中廷试宏词科。”亦未言廷试第一。贞祐选举，史载较详。当时，赵秉文主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后来，竟以省试第一传为廷试第一。而廷试第一者另有其人。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五九所载金人《进士题名碑》明谓贞祐三年，词赋状元程嘉善、经义第一刘汝翼。碑版凿凿，应无可置疑。再如施宜生的生卒年标为一〇九一至一一六三，依据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正隆四年冬，（施宜生）偕移刺辟离刺使宋。宜生自陈：“昔逃难脱死江表，义难复往”。力辞，不许。盖是时海陵谋伐宋，故以宜生往使，以系南士之心，与用蔡松年为相之意同。宜生既归，以辟离刺至宋不逊，不即以闻，被杖。五年，除翰林学士。次年，中风疾。大定二年，致仕。三年六月卒，年七十三。

文献出处却注为“《金史》本传”。而《金史》卷七九《施宜生传》所记与之南辕北辙：

（正隆）四年冬，为宋国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庾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砚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刺使还以闻，坐是烹死。

施宜生传因背离事实而成为《金史》的严重舛误之一。《全辽金文》的结论与出处如此不符，也成为其中的严重舛误之一。再如延安学名下收《二苏坟诗跋》小传无考。今按，清吴式芬《裙古录》卷一六《司农苑公题二苏坟诗》著录：“武虚谷考为贞祐间刻，后有史学、屈子元二跋。”所谓延安学，即延安史学。而《全辽金文》漏钞“延安”后之“史”字，以藉贯充任姓名。《中州集》卷七云：“史学字学优，延安人。正大中，省试第一，释褐武阳簿，辟卢氏令，卒官。”

此外，一些作者在《中州集》、《遗山先生文集》、《金史》等文献中俱有墓铭、传记，却置之无考，如姚孝锡、耶律履、杨伯仁、冯翼、高有邻、赵搃、吕子羽、赵思文、袁从义、李大方、王仲元、高怀贞、张弥学、吕卿云、田特秀，等等。涉及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不少小传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一些文章本身就有关于作者的资料，却漏抄错抄。由此导致多数小传经不起推敲，支撑全书的基础塌了。三是辑佚疏漏严重，许多现存文献未能利用。如《满洲金石志》、《山右石刻丛编》、《常山贞石志》、《山左金石志》、《定襄金石考》、《陇右金石志》、《陕西金石志》、《江苏金石志》、《陶斋藏石记》等，均未见徵引，致使大量金文遗佚在外。四是编校极为草率，如题下标注年代谬误不少，小传重收问题亦未能杜绝，文献出处标注不规范，标点错误几乎随意拾取。其中，地名解释尤为典型。如“古丰”姚孝锡，释曰：今河北丰润。所谓古丰，亦称安丰、丰县，隶徐州，其《忻州庙学碑》即署“徐州姚孝锡撰”。（《（光绪）山西通志》卷九五《金石记》）燕京之丰润与徐州之丰县，相距何其远也。“碣石”赵衍，释曰：今河北昌黎。此说以为曹操东征乌桓赋诗《步出夏门行》之地，其实指西域碣石国，都城疏勒（今新疆喀什），后迁至伽师（今新疆伽师），金时属西辽。赵衍先世碣石，后徙居北平，系出辽勋臣之后。“永安”张著，释曰：今河南永安。实际上，永安即大兴，指中都燕京。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永安钱》

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

大兴名永安，自辽代行之。开泰元年，命为永安析津府。（《金史》卷二四《地理志》）金灭辽后，置卢龙军节度使。天德四年改曰永安，贞元元年又更为大兴。（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迁都燕京改元诏》）

如上所述，金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整理有成绩有问题，喜忧参半。但是，无论经验或是教训，都为今后的研究整理积累了宝贵财富。黑龙江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即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准备，全面系统地整理出《金代文学文献集成》。

这部“集成”包括：一、《全金文》四卷。《金文最》收作者450余人、文章1500余篇，这次新编增至作者800余人、文章3000余篇，同时为作者立传。二、《全金诗》修订本四卷。金元好问《中州集》收诗家251人、诗作2060首，清郭元釭《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收358人、5544首，这今次整理增至500余人、12000余首，小传修订吸纳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三、《全金词》一卷。分上编（文人词）与下编（道家词），辑佚有所突破，小传更为简明确切，标点校勘的质量也显著提高。四、《全金曲》一卷。收入《刘知远》（残本）与《西厢记》等两部诸宫调，以及历来被视作元曲的部分散曲作品。金曲结集的意义在于说明，所谓元曲，包括散曲与杂剧，实际形成于金代，是金曲的延续和发展。因此，确切地讲，这些形态应称之北曲，以使时代归属问题趋于客观；而诸宫调包含了北曲的全部要素，是北曲杂剧的源头之一。

这部“集成”强化了辑佚工作，在“全”字上下功夫，重点搜寻新的“矿藏”。一是金石文献著作，如清陆继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以往罕见徵引，收藏了不少金人篇章；再如建国以来诸多金代碑石考古发现，包括已公开发表与未公开发表的，数目相当可观。二是释道典籍，如明正统《道藏》本保存着丰富的金文，日本京都藏经书院本《续藏经》也收有一些金代名家作品。三是金代医学发达，医书流传亦多，间或附以序跋，前人拾掇不少，仍有遗佚。四是方志如文献渊薮，虽经时贤检阅，远未采尽。相信经过这次收集整理，会为今后金代文学的研究及深层理论总结提供良好的基础。

#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 胡传志 (安徽省高校首批特聘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安徽 芜湖, 241000)

辽金先后与两宋并列对峙, 辽金文学后来又融入元代文学之中, 这是辽金文学独特的外部文学环境。因而, 将宋辽金元四代文学综合在一起研究, 不仅有利于拓展辽金文学研究的领域, 还能揭示宋元文学中的有关问题, 对推动宋元文学研究有突出的建设性意义。

## 一、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

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相隔遥远, 两者之间交流不多。但在有限的交流中, 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由于两者水平颇为悬殊, 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由高向低——由北宋向辽国——的输入。这种输入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图书、典籍的传播。使辽归来的苏辙曾上书朝廷, 推测“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 “北界无所不有”, “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栾城集》卷四十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由此来看, 实际传入辽国的典籍数量可能相当多, 绝非魏野、欧阳修、苏轼等少数诗人的几部著作。这些北宋文学作品必然会普及汉文化, 提高辽国文人的汉语水平, 推动辽代文学的汉语创作。另一种途径是双方互派的使节。北宋文人出使辽国, 其中包括欧阳修、苏辙等一流文人, 与辽国文人唱酬, 同时, 辽国文人亦出使北宋, 与北宋接伴使如苏轼、王安石等交往应酬。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会激发辽国文人的创作兴趣和热情, 在北宋文人的熏陶与奖掖下, 辽国文人的创作水平必然提升。遗憾的是, 辽代文献现存较少, 辽代文学如何具体地受益于北宋文学, 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理论上, 民族融合是双向的, 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些使辽宋人进入辽国后, 创作多少会受到北方风土人情的熏染, 而在与辽国文人交往酬唱中, 也很难排除投其所好的成份。宋天圣三年(1025)李维等人使辽, 李维奉辽圣宗之命, 即

席作《两朝悠久诗》, 诗成后辽圣宗大喜(参见《宋史》卷二八二《李维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宋至和二年(1055)王拱辰出使辽国, 应邀参加辽兴宗混同江钓鱼(即辽金统治者独特的“春水”习俗), 亦奉命赋诗, 深得辽兴宗的爱重(参见《辽史》卷二十《兴宗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这些“命题作文”虽然已经失传, 但其主旨已被辽帝所规定, 这些诗歌一定符合辽帝的要求, 风格也应符合辽帝的欣赏趣味。李维在诗中“自称小臣”, 就是迎合对方的表现。余靖更是作蕃语诗, 将契丹语与汉语交错在诗中。这种迎合实际上就是辽人文化心理对宋代诗歌的渗透。当然, 这种渗透主要体现在具有外交性质的使辽诗中, 主要体现在其旅途之中。但辽文化的成份是否渗入使辽后的诗歌中? 是否再扩散传播、影响他人? 南宋的姜夔尚且据他人之言, 写下表现辽人风俗的《契丹歌》, 这一信息表明, 辽人的文化深入北宋境内, 影响北宋文学, 似非子虚乌有。

辽被金灭亡后, 一些文人进入金王朝, 如韩昉、虞仲文、左企弓、张通古、任熊祥等人, 他们与入金宋人一起共同组成了金初的文人队伍, 即所谓“借才异代”。这些文人由辽入金, 与女真统治者的关系较为密切, 大多占居要职,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创作承续着辽代文学的传统, 对金代文学产生哪些影响? 由于他们的作品存世较少, 为研究这一问题带来不少困难, 但仍值得关注。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的后代。第一代入金辽人作品少, 成就有限, 第二代、第三代情况有所改观, 如出身于辽的文人韩汝嘉、耶律履等人, 他们身上仍然流淌着辽人的血液, 辽代文学的因子绵延在他们的创作中, 他们的创作仍然对金代文学构成影响。这些都需要具体认真的分析。



## 二、金代文学与北宋文学、南宋文学

金代文学是在北宋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初的文人主要是北宋文人。无论是词坛上的“吴蔡体”还是诗文领域，基本上是承续北宋余脉，尤其受到了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深刻影响。这一层面的关系比较清晰，当代学者也有这方面的探讨，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有关金诗与江西诗派的论述，张晶关于金初宋人偏离宋诗的阐释，<sup>[1]</sup>还有笔者关于“苏学盛于北”的分析，<sup>[2]</sup>都是这方面的成果。

相对而言，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的关系更值得关注。这种关系大体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对立政权下文学的对立关系。对立政权的存在，于双方文学本身就具有复杂的意义。南宋那么多爱国主义作品（包括范成大等人使金途中的作品）都是政权对立的产物。对立方往往会限制双方文学的融通、交流，使得双方与对方保持距离，追求各自的独立性。这在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些，金代的“国朝文派”就是与南宋文学相对立的概念。元好问的“北人不拾江西唾”、“以唐人为指归”的诗论也都是以南宋文学为背景的。只有结合南宋文学这一宏观背景，才能正确理解金代文学中的一些问题。与金代文学不同，南宋文学以正统自居，人多势众，文人们对金代文学心存不屑之意。

其次是南宋文学对金代文学的影响。清人赵翼所持的南宋文献未入金源说，已为学者所否定。目前可以考定传入金朝的南宋文献有60余种，其中包括诚斋体诗歌、辛弃疾和陈与义词、《苕溪渔隐丛话》等文学文献。当时实际入金的文献会更多。这些文学作品传入北方，都曾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响。金人赵秉文有类似诚斋体的诗歌，元好问词有近似陈与义词的沧桑感和言外之味，亦有近似辛弃疾词的风貌，就是很好的见证。

第三是金代文学对南宋文学的意义。这一点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金代文学起步晚，成就有限，对南宋文学的发展似乎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的例子是金初词坛以吴激、蔡松年为代表的“吴蔡体”，他们的成就未必高过同时的南宋词人，但他们所继承的苏

词传统通过蔡松年的弟子辛弃疾传到南宋，与南宋词学汇合，从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从现存资料来看，传入南宋的还有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在南宋有何影响？与此相关联的是，金代的重要历史事件（金王朝的灭亡）在南宋文学中有何反映？陆游诗中就涉及到金国的一些历史事件，笔者已有初步探讨。<sup>[3]</sup>

在这种南北对立中，还有一些适合作比较研究的对象。像元好问与陆游有许多共同点，二人差不多同时，都长于律诗，都学习杜甫，翁方纲称之为南北诗坛的两雄（“金源南宋分疆后，天放奇葩角两雄”）。透过他们的异同分析，或许能揭示出南北文学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 三、金代文学与元代文学

金代文学与元代文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元代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以金代文学为基础，像诗歌以元好问为代表的北方传统为主导，戏剧在金代基础上发扬壮大，这些几乎为学界所公认。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跨段研究向来比较薄弱，加上学界不太重视金代文学，不太重视元代诗词文这些传统样式，导致很少有人能全面深入地探讨二者渊源关系。即使在元杂剧这种热点领域，也还没有理清由金至元的发展脉络。其中比较关键的金亡前后到元王朝建立这四五十年的时间，是由金到元的过渡时期，许多文人由金入元，辗转漂泊，沉浮不定。其间文人的生存状态、创作情况，尤其是不太知名的文人命运，还没有清晰的描述。文人的活动对元代文学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似乎也没有有份量的论述。这一时期是元代文学的源头，弄清这一段历史，既有利于揭示金代文学对元代文学的影响，又有利于解释元初文学中的诸多问题。

### [参考文献]

[1] 张晶·辽金诗学思想研究[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

[2] 胡传志·“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J]·文学遗产，1988（5）.

[3] 胡传志·陆游笔下的北方及相关问题[J]·中国韵文研究，2004（2）.

#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

◎ 赵维江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0)

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的文学相比, 辽金文学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所发生的地域范围是在中国的北方,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北方文学”或“北朝文学”(实际上, 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它主要由“北人”(包括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文人)创作, 所运用的也主要是北方民族语言(包括汉语与少数民族语), 其内容所反映的是北方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 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更是浸润着北方文化的传统意识和价值取向, 同时, 北方社会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也影响到其艺术形式及风格的构成。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地域文化的视野在辽金文学研究中较之于其它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有着更重要的特殊意义。

一般来说, 天下一统的局面, 会促使南北文化走向融合, 而在南北分治格局, 则又会强化两个系统的文化差异, 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也随之而减弱或增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楚辞和《诗经》代表了诗坛上南北文派的源头;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坛又一次南北分流, 南北体派风格差异由此而再度显性化, 从而造成了“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这样鲜明的南北区别; 两宋辽金时期的文学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三次南北分流的产物。辽金文学与共时并存的两宋文学相比, 其地域文化色彩更为深厚。北宋实为南北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 南宋虽偏安南方, 而官僚文人阶层中相当大一部分为南渡的北方士人; 至于辽金两朝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则基本上由北人构成, 故地域文化因子对于主要由文人士大夫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其作用也较之两宋更为深刻和明显。

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 从地域文化视角去评论作家作品, 是一个重要方法。对于辽金文学的

北方地域文化特质, 古代学者也有着清楚的认识, 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八认为, 元遗山“生长云、朔, 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 以宗社丘墟之感, 发为慷慨悲歌, 有不求工而自工者, 此固地方为之也, 时为之也”。赵氏从特定地域中的地理环境和时代政治两方面分析遗山豪健慷慨之风的成因, 其思路是颇有启发的。

20世纪的辽金文学研究, 始于苏雪林、吴梅、陈衍等人(著有《辽金元文学》、《辽金元文学史》、《辽文学概述》、《辽诗纪事》、《金诗纪事》等)。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 一开始就对辽金文学所产生的特定的北方地域文化环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吴梅《辽金元文学史》谈到金代文学时指出: “其士大夫之润色鸿猷者, 多产于幽并燕赵鲁之间, 得其山川雄深浑厚之气, 习其北方整齐严肃之俗, 发为文章, 每能华实并茂, 风骨遒上, 绝胜江南之柔弱。”不过, 这方面的研究, 由于辽金文学研究领域的长期冷寂而未能得到更为深入而具体的探讨。在辽金文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而初成规模的近20年中, 对于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文学关系的揭示, 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课题和探寻目标, 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上, 成为学者们格外着力之处。如上世纪90年代周惠泉发表专著《金代文学发凡》及有关辽金文学研究的一系列论文, 以宏观的视野, 从契丹、女真族粗犷剽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上, 探讨辽金文学的文化意蕴和特色, 确定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的重要地位。张晶所著《辽金诗史》及其《金诗的北方文化特质及其发展轨迹》<sup>[1]</sup>《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sup>[2]</sup>等一系列论文, 显示了更为自觉的地域文化研究视野和方法。又如刘泽、降

大任、李正民、詹杭伦、黄震云、狄宝心、胡传志及笔者有关辽金文学的著述，也都有意识地从不同的侧面探讨和揭示了北方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和辽金文学的北方文化特质。

长期以来的辽金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拘于视野偏狭而产生的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的文化特质及内蕴相偏离和相悖逆的矛盾现象。我们认为，文化视野的本质是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立场的体现。我们强调辽金文学研究中的北方文化视野，是基于辽金社会两个特殊历史事实：一是其统治民族为非汉族的契丹和女真人；二是辽金两朝始终与两宋王朝相并峙。这两个事实，限定了我们所说的北方地域文化视野的概念界域。

第一个事实决定了北方地域文化视野不同于“正统”的中原文化视野。契丹、女真立国后虽然实行汉法，逐渐汉化，最终纳入到了华夏文明的发展链条中，但其本族文化实属于不同于中原农业文明的草原文化，而历来试图阐释辽金文学的学者，往往注意到辽金文化与一般汉文化趋同的方面，而对于中原文明受到草原文明的冲击、浸染及由此引起的文学变异则缺乏敏感和识力。如关于金代文学的性质问题，或认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sup>[3]</sup>或认为“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sup>[4]</sup>还有学者认为：“女真人统治下的北中国（即金朝）文学”，“不仅作者绝大多数是汉人，而且作品的思想和风格也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sup>[5]</sup>很明显，这些观点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基于中原农业文明的汉文化，“正统”的中原文化认同立场导致了对上述第一个事实的忽略，限制了研究者的文化视野，也削弱了其结论的科学性。其实，中原文化虽然也是以古代北方社会为主要发祥地，但北方地域文化概念在辽金时期已与其它历史时期（包括统一王朝和南北分治时期）大不相同，一是地理上它向北大大推移；二是民族和文化属性已掺入了更多的异质成份。民族的斗争与融合，文化的互动与同化（尽管汉化为主要趋势），使得这种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学已不可能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变易而不产生某些新质素。对此，周惠泉、张

晶等人关于金代文学的民族文化融合性质与“北朝文派”的论述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第二个事实决定了北方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金朝与南宋隔江而治的状况，造成了当时北方地域文化与南方地域文化两大文化范型分化与强化的趋向以及并行发展的格局，这对于辽金文学的阐释和评价，便涉及到一个文化上的认同和立足点的问题。无疑，辽金文学的阐释者都在试图对产生于北方的文学原生态以文化还原，但遗憾的是，由于南北朝共时异域的空间组合，许多阐释者在观照辽金文学时自觉不自觉地将宋代文学作为批评的标本和准的。由于辽金文学本身的发育不足和意识形态中夏夷之辨等观念的作用，辽金文学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人们已经习惯了将宋代文学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乃至全部，所以对辽金文学的批评标和思路便很容易脱离两朝文学所依托的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从而使其特有的属性和优长被忽略和抹煞。这个问题实际在金元时代就已存在，当年元好问编辑《中州集》后曾自题诗道：“邴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元氏拈出“气”、“实”来作为审美标准，以此评判中州诗词，认为北方文学的水平未必在南宋文学之下。在此，元氏实质上提出了一个文学批评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如果以南方文化的审美趣味来要求诗词创作，高雅的情韵和华美的形式便被提到了首位，中州诗词的审美评价也自然会被降低。这一点在清人厉鹗对中州词的评价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厉鹗《论词绝句》针对元好问诗中的观点反讥道：“《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厉氏也是想给中州乐府一个公允的定位，结论迥异于元氏，其原因便是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厉氏在对北方文学进行文化还原时，由于文化认同的立足点仍然未离南宋词所生存的南方文化土壤，导致了他未能进入北方地域文化的视野，真正了解和认识其审美价值，也就无法认同元氏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作为出色词学家的厉氏对于词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十分敏感，其《张今涪红螺词序》曾

借用禅宗和画论的“南北宗”之说来论宋词：“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可惜的是他由于文化认同的错位，并没有将稼轩为代表的“北宗”一派纳入北方地域文化的视野去理解其艺术精神，而只是将其作为南方词的一个分支来看待。事实上，一个更大规模的体现着北方文化特质的“北宗”词派原本存在于当时与南宋并峙的金朝词坛上。稼轩本为金人，学词于金，史载他曾受业于金词名家蔡松年，今存辛词虽皆作于南宋，但其词体范式和词学精神则与金词主流——即北宗体派一脉相承，所以南宋词坛之“北宗”实为金朝北宗词派之流衍。<sup>[6]</sup>由上例不难看出，我们主张辽金文学研究中北方地域文化视野，并不是要求简单地将北方文学纳入观照的范围，或者仅注意到其创作的北方地域特色，而是要将北方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以此来感悟、分析和评价产生于北方之地的文学。

北方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并非只是概括出几条普泛的规律或特色，它应当是一项内容复杂而具体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由语言构成的文本是地域文化得以承载的前提，所以文献的辑佚、考辨、笺释，作家生平、交游和创作经历的考据等，当是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工作。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也离不开北方地域文化的视野，比如金词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已出现了明显的“类曲”倾向，<sup>[7]</sup>致使有的作品词曲难辩，如果不注意这种情况，在文献研究时就会出现武断的误操作。北

方地域文化作为辽金文学产生的环境和承载的内容，它必将从多方面影响和制约文学的发展和性质，所以北方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也应当关涉到从特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不同层面和侧面，如北方地理环境、北方文化生态、北方民族关系、北方民俗民性、南北文化关系、北方学术传统、北方文学传统等等。这每一个方面都可成为辽金文学研究的一个有力切入点，由此会发现许多新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更明晰地作出分析和判断。这里重要的问题是，不应将北方地域文化只看成涂在辽金文学上的一层油彩，而是应着力于揭示这一文化系统与文学的血脉关系以及赋予文学的内在精神。

#### [参考文献]

- [1] 张晶·金诗的北方文化特质及其发展轨迹 [J]·江海学刊, 1991, (2) .
- [2] 张晶·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 [J]·学术月刊, 1989, (3) .
- [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4] 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 (前言)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5] 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 [J]·文学遗产, 1982 (4) .
- [6] 赵维江·金元词论稿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7] 赵维江·略论金元词的类曲倾向 [J]·齐鲁学刊, 2003 (3) .

本栏责任编辑: 王法敏

· 文 学 ·

#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两次错位

◎ 张建华

[摘要]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的第一次错位是上世纪 50-70 年代, 欧美文论的主导是一种内部研究, 而我们则把文论的外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 难以为继。第二次错位从 80 年代初开始, 全球化语境正在形成之中, 欧美文论的主导倾向由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 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中国文论则由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 大力探讨文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

[关键词] 内部研究 外部研究 错位 批评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3-0138-05

一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中国与外国 (主要指欧美) 文学理论与批评几乎是绝缘的, 这是中国当代文论与外国文论的第一次错位。这次错位是付出了代价的。就在我们闭关锁国的年代, 欧美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多种声音、多种取向、多种价值观、多种逻辑起点的繁荣局面。从作者系统看, 有社会历史方法、传记方法、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精神分析方法、原型批评; 从作品系统看, 有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艺符号学; 从读者系统看, 有阅读现象学、文艺阐释学、接受美学; 从社会-文化系统看, 有文化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历史主义等等。雷内·韦勒克为《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撰写“文学批评”条目时说: “人们把 18 世纪和 19 世纪称为‘批评的时代’, 不过 20 世纪才真正当得起这一称号。不但数量甚为可观的批评遗产已为我们接受, 而且文学批评也具有某种新的自觉意识, 并获得了远比从前重要的社会地位。”确实, 对于文学批评来说, 20 世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每一个学派的带头骁将通常都自信十足, ‘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他们往往大张其辞地强调自己的犀利之处, 并且适当地贬抑其它学派作为反衬。在制造舆论的时候, 这些文学批评学派经常会有意无意地遗忘乃至隐瞒自己的理论盲点。”<sup>[1](P300)</sup> 中外文论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末的错位表征是: 欧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导研究是内部研究, 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外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 难以为继。

中外文论发展中的第一次错位, 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政策上向前苏联一边倒, 过分依傍前苏联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与前苏联, 在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内在结构方面颇为相似, 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方面多有迭合, 在某些审美方式和审美标准方面趋向默契。中国与前苏联, 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 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师承关系。早在 20 至 40 年代, 瞿秋白、鲁迅、周扬等就开始介绍、宣传俄苏文学理论与批评。据有关不完全统计看, 从 1950 年到 1962 年的 12 年间, 中国就翻译、出版前苏联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著作有 11 种, 比如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等的文论著作就有 7 种。波斯彼洛夫、斯特洛维奇、卡冈、季莫菲耶夫、涅多希文、布罗夫、叶果

---

作者简介 张建华,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405)。



罗夫、万斯洛夫、洛特曼、奥夫相尼柯夫等的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先后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其中，季莫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多希文的《艺术概论》等，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发生过重大影响。前苏联学者还纷纷来中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开班授课，编撰、印刷他们的文论教材和讲义，如北京大学请了毕达科夫，北京师范大学请了柯尔尊等等。当时听课的大多数人是新中国第一代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师和专门研究机构的文学研究者，这无疑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前景。事实上，建国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学术思想体系，一直被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奉为权威性、主导性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模式。

当时中国与前苏联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理论批评的文学意识形态化色彩。理论批评的文学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作为一种批评模式，也应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譬如，当代欧美文学理论批评中就有包含文学意识形态化的显在或潜在的成分。英国的克·考德和特里·伊格尔顿、美国的马尔科姆·考利、法国的皮埃尔·马歇雷、德国的西奥多·阿多尔诺等这些理论批评家，他们或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或直接从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出发去研究文学现象。乃至包括特别注重艺术形式分析，并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认为“社会性的文学只是文学中的一种，而且并不是主要的一种”的雷内·韦勒克，在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却时时表现出对近代欧美文学批评与其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之间联系的密切关注。由于他们所研究的文学艺术客观上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因而他们在理论上每一项有意义的开拓，实际上都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部类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关系。中国与前苏联在理论批评实践中出现的简单化、绝对化以及庸俗社会学的偏差，把文学意识形态化抬高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曾一度对美学、心理学、语言学角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采取粗暴拒斥的态度，一概视为唯美主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从而限制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用客观的眼光看，前苏联文论也曾经给中国带来过一些有益的启示，如把理论批评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它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重视用反映论来解释文学现象；二是对人道主义与文学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理论批评的文学意识形态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第一，文学问题的政治化，堵塞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普遍知识，扼杀了一些敢于独立思考、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批评家的创造性思维。如当时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中“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观点进行商榷，只不过强调文学要写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结果遭到长期批判。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在对西蒙诺夫的观点表示基本认同的前提下，建议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同样遭到长期的政治围攻。第二，文学的哲学化，使文学理论与批评囿于哲学的视角，不能充分揭示文学的特殊规律，丧失了理论思维与批评实践应有的活力。巴赫金在《语言艺术创作中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一文中说，“要克服方法论上的众说纷纭，只能从人类文化的统一整体出发，对艺术的事实和独特性作出系统性的哲学论证。”又说：“诗学如果不以系统性的哲学美学为根据，其基础本身将是不巩固的和偶然的。有系统性前提的诗学应该是语言艺术创作美学。这个界定强调诗学对一般美学的依赖性。”巴赫金是睿智的，他既看到哲学对诗学的影响，更看到美学对诗学的作用。然而，哲学化的文学理论，一旦涉及具体的文学现象时，便暴露出它的苍白无力和混乱无序。哲学化的文学理论，缺乏理论自身的方法论，特别缺乏美学的方法论，在揭示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时有削足适履之嫌。第三，50年代前苏联文论，滋生、培养了一些自称“左派”的人物。50年代前苏联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批判见长，把文学理论与批评当作社会理论与批评。这种不良的理论思维定势和习惯也传染到了中国文论界。它不仅给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带来了障碍，也给我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不正常因素。第四，由于50年代前苏联文论自身的封闭性、保守性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论的霸权话语地位，使我们的文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既失去了与外国（主要指欧美）20世纪文论交流、对话、沟通的可能，又割断了与本民族传统文论的血脉联系。这种文论模式使得中国当代文论自

我萎缩，造成理论批评家思维能力的钝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当代文论形态，实质上把文学的“外部研究”推到极致，把文学理论与批评绑到政治的战车上，把正常的文学社会学变成庸俗社会学。“庸俗化主要表现在把物质与精神关系简单化，把现实与文学关系绝对化，用社会特征代替审美特征，用政治代替艺术，主张绝对的功利、实用主义。当把社会学方法绝对化起来，使它丧失了自己的界限，其时牵强附会、失去分寸的结论就将出现了。”<sup>[2](P110)</sup>在当时的中国，“其恶劣影响，极为深远。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上最沉痛的一页，比起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错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sup>[2](P136)</sup>其所造成的中外文论发展中的第一次错位，教训是沉重的。

## 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正当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如火如荼地介绍欧美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时，欧美与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悄然呈现出另一种错位现象。错位的表征是：正当我们把欧美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新知识大量引进的时候，相反，欧美却在摆脱原有的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之后，开始转向早已兴起的人文主义式的理论与批评，转向社会学、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转向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等等。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指出：“事实上，自 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回归到新批评以前的旧式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之上。”<sup>[3](P121-122)</sup>米勒是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位怪杰，在所谓“耶鲁四人帮”（哈特曼、布鲁姆、米勒、德曼）中，米勒的理论是不断否定和嬗变的理论，他曾跻身于新批评阵营，又是日内瓦学派意识形态批评的主将，而后又成为解构批评的中坚人物，实际上他也在“转移”。米勒的描述，正是整个欧美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一种概括。而正当欧美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研究发生“一次普遍的回归”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研究也在发生重大转向，但恰恰转向于被欧美所质疑、修正，乃至被取而代之的那些原有的理论与方法；而那些受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厌恶、诟病、否定，乃至摈弃的东方式的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体的理论与方法，却正是欧美所向往、追求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要抛弃的外部研究，恰好是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要汲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追求的内部研究，恰好是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要摆脱的。这种理论与方法的错位，似乎有点围城的意味：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美国著名学者拉尔夫·科恩邀集欧美 20 多位文论名家联袂撰文，由他主编的那部《文学理论的未来》实际上也传递着中外文论相互错位的信息。在这部论文集中，20 多位撰稿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未来作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各位学者既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和功力，又保持着比较公允的态度和独立的判断，因而使这部文集的学术探讨有较大的深度和广度。该书在文本、社会与文学、妇女与文化、历史与叙述、艺术与哲学等几个层面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对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女权主义以及意识形态与批评的关系等方面相当重视，突出了其综合性及跨学科趋势，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该书对文学理论与批评在 20 世纪末乃至 21 世纪的发展态势和走向作了前瞻性的评估和预测，并以其权威性和信息量而被誉为“理论批评的里程碑”。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部文集传递了中外文论错位的重要信息。这种隐性的错位，是受政治、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其它非文学学科成果的影响以及其本身的嬗变和更迭形成的，并非中外（欧美）有组织、有目的的交流与对话的结果。拉尔夫·科恩在该书“序言”中展望未来，提出四个方面的看法。一是“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欧美一些学者正在把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有关社会民主运动结合

起来，给文学理论与批评以新的界定。二是“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解构目标的废弃”。一些学者指责解构主义理论家“没有解决文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学讲述了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和情感，讲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整体性”<sup>[31](P10)</sup>，对伦理问题漠不关心。而解构主义理论家譬如保罗·德曼在后期实际上梦想解构主义称雄天下的同时，已经看到其理论自身的不足。据米勒介绍，“在德曼的《阅读的隐喻》一书中，就已有了一个关于文学与历史、心理学、伦理学的关系的精心构想、阐述详尽的理论。他在生前最后两三年所致力的工作就越来越集中于这类问题上；这无疑是已成当今文学研究特征的这场向政治、历史、社会的几乎带普遍性的转移的又一例证。”<sup>[31](P126)</sup>这就说明原来的解构主义过于自恋、膨胀的目标遭到了质疑和废弃。三是“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有一段时期，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文化化学研究与应用日益广泛，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联系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四是“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一些学者例如文学接受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沃尔夫冈·伊塞尔，就提出要建立“文学人类学”，即把人类学思想引入文学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文学类型理论的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科恩的上述四点概括与描述，勾勒了世纪之交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我国文学理论家钱中文把上述欧美文论的嬗变概括为三点：“一、文学理论研究趋向正在转变，这已不是一个人的看法；二、这一转变还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一个‘急剧变化’，或者说是一个‘大规模的转折’；三、开始这大规模的转移是1979年。”<sup>[41](P248)</sup>那么，文学研究向哪里转移呢？这就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向着外部研究转移。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对于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来说，真正形成了完整理论系统的确实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它有不少创新。它以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真的成了一种独立的形态，也使得文学成了一种纯粹独立的东西了。然而，近百年过去了，认识有所深入，人们发现文学现象要比理论复杂得多。不管怎么说，文学就是文学，它是纯粹的、独立的，但另一方面，它总是要指向社会的，并将社会、历史、政治、伦理、道德哲理、宗教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而成为一个有机体。而内部研究使文学好象纯洁了、独立了，回到自身了，但解构高潮一过，注重内部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回过头来看看，原来外部研究废弃不得，而且成绩斐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文学研究，各有长处，都有局限。双方的交叉研究，将是一种取长补短的综合，可能真正会描绘出文学的‘独立’形态来。”<sup>[41](P249)</sup>这当然是一种摒弃了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张扬了亦此亦彼的合理诉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欧美现代哲学思潮、文艺思潮以及各种文学理论批评流派，一下子闯入了中国文坛。当时，不少人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研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的切入口。有的不加选择地急忙把欧美的某些只具有局部价值、甚至谬误不少的理论与方法，或欧美人士自己都已发现严重缺陷的东西移植过来，宣称这是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要把它们确立为我们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主体。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把近百年来流行于欧美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与方法，硬是“操作”了一遍。例如以语言学、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如修辞、话语、语音、语句、语法、节奏、格律、文体、叙事、作品类型、风格、功能、结构的研究，常被研究者称作是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形成理论中的向内转趋向，为的是使文学理论“回到自身”。同时还有好些阐发人文主义思想的学派，它们张扬艺术的主体性，和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流派相呼应，同样表现了向内转倾向。同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熵、平衡态、反馈、热力学定律，诸如此类的名词组成了自然科学进军文学的一次大规模实验。人们在刊物上看到一大批挟有图表、公式和自然科学术语的论文。不少批评家试图抑制个人的经验性描述而代之以分类、统计与归纳。虽然数学在文学研究中的真正运用还为数甚少，但这些论文却显出向数学靠拢的迹象。不少论文不过用深奥的科学名词装点人所共知的常识，作者的思想路线似乎很难接近一些文学的根本问题。这个时候，人们有理由开始怀疑：这些研究方法究竟能同文学批评合作到什么程度？

应该说，这对封闭既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起了某种激活作用，这种理论上的借鉴与探索，

打破了原有的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大大地拓展了理论思维空间，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形成了多元并举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格局。其中有一部分学者吸收欧美文学理论观念、方法，他们在理论的着眼点上仍想建立与中华民族相适应的审美理论和方法体系，其表现是当时国内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例如以人类学本体为核心的主体论文学观，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象征论文学观，以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关系为内容的艺术生产论文学观，还有审美意识形态论，传统的唯物认识论文学观，等等，初步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多样形态的发展趋势。这些多元的文学观的探讨，现在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偏颇和失误，但它们毕竟属于探索性的理论思维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流派（这里说的“文学批评”的涵义，不是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在内的泛批评概念，而是着眼于与当代文学发展同步的文学批评实践的成果）也形成了新的格局：有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观、新启蒙主义、新传统批判观、新自由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先锋（或谓新潮）文学批评，等等。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观将继续从政治对文学、社会对文学的要求出发，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并制约着其它各个派别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新启蒙主义与新传统批判观则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传统和革新两个角度提出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要求，同时也从这两个角度汲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潜力；新自由主义批评体现着文学艺术在民族内部的融化程度；先锋文学批评则从外国（主要是欧美）文学批评的变化中继续获得动力。

中外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两次错位，是怎样造成的呢？概而言之，第一，社会变革、历史运演、民族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促成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刻变化。中国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情况，众所周知，毋庸赘言。例如，美国黑人文学运动、女权主义运动都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斗争色彩的民主运动。有趣的是，80 年代正当中国学者厌恶并挣脱文学与政治因素联系、挂钩之时，美国学者却把民主政治运动引入文学运动和文学研究之中，而且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第二，中外文学理论与批评各自的转向与变迁，是文学研究实践的多样化产生的结果。所谓多样，就是在主导思想指导下，要看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形态是多样的。一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二是文学理论问题本身也是多样的，它们的内涵各不相同；三是文学作品现象十分丰富，并且文学创作的发展富于动态性、实验性。求新求变，是人类理论思维的共同心理。第三，文学理论与批评自身的不断嬗变、更新、创造与发展，也形成它自身的发展趋势。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变化，具有不间断性的特点。中国 50—70 年代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搞的是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审美的方法并未受到重视。这种社会学批评发展到极致，竟出现“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局面。后来不少人不分社会学方法与庸俗社会学的区别，往往把它们捆在一起加以挞伐。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此时，社会学方法自身确实需要从学理层面审视自身了。例如，形式主义开创了文学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后来新批评、结构主义学派对其作了丰富与发展，各自形成了研究的规范化程式，其修辞学式的倾向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现象学、精神分析、阐释学、接受美学等学派的研究，或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或具有各不相同的人文主义特征。尽管这些文学研究流派各具特色并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入，但它们大抵掩饰了文学的社会性特征。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到这种地步，本身确实需要突破了。

#### [参考文献]

- [1] 南帆. 冲突的文学 [M].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2] 钱中文. 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 [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
- [3] [美] 拉尔夫·科恩. 文学理论的未来 [A].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4] 钱中文. 文学理论: 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陶原珂



· 学海酌蠡 ·

## 《元史·阎复传》勘误一则

◎ 赵树廷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H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3-0143-01

《元史·阎复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3772页)载:阎复“七岁读书,颖悟绝人,弱冠入东平学,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按:此文的“严实”为“严忠济”之误。

首先,阎复到东平府学读书是在严实去世之后。所据有二。(1)元好问《遗山集·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曰:严实“庚子(公元1240年)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寝。”可见,严实卒于公元1240年。而袁桷《清容居士集·阎公神道碑铭》曰:阎复“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因而,阎复当生于公元1236年。严实薨时,阎复仅四岁,显然未及“弱冠”,“肄进士业”。(2)袁桷《清容居士集·阎公神道碑铭》曰:“世祖皇帝应期握图,肇函诸夏,文经武纬,各当厥职。时则有严忠武公披荆剪芜,扶植儒学。……郛之得人号称至盛,而阎(复)、徐(琰)、李(谦)、孟(祺),世名以四杰焉。”这段引文中有两点值得重视。首先,阎复在府学读书时,扶植儒学的是“严忠武公”。而《元史·严实传》载:“中统二年,追封实为鲁国公,谥武惠。”自此以后,史籍中均称严实为严武惠公。可见,“严忠武公”并非严实。其次,严忠武公“扶植儒学”之事发生在“世祖皇帝应期握图,肇函诸夏”之时。而元世祖是在公元1251年后掌管漠南诸夏之事的。《元史·世祖本纪》曰:“岁辛亥(公元1251年)

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此时,严实已去世11年。

其次,阎复到东平肄进士业是在严忠济新建府学之后。(1)阎复与徐琰、李谦、孟祺并称“东平四杰”,他们到东平府学读书是在严忠济领东平行台时。《元朝名臣事略·太常徐公》曰:“中原版荡之后,郛学久废,严侯(忠济)修复,以养生徒。……人才辈出,……翰林学士阎复、太子谕德李谦、浙东按察使孟祺、礼部侍郎张孔孙、太子赞善夹谷之奇等是也。”(2)《遗山集·东平府新学记》对严忠济修学的时间有详细记载:“今嗣侯(严忠济)蒞政,……(东平府学)湫隘殊甚,非弦诵所宜,乃卜府东北隅爽垲之地而增筑之。……始于壬子(公元1252年)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公元1255年)六月初。”此时,阎复也到了肄进士业的年龄。

再次,阎复在东平府学读书时“师事名儒康晔”,而康晔是由严忠济聘为东平府学教官的。《元史·宋子贞传》载:“实卒,子忠济袭爵,……作新庙学,延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又,道光《高唐州志·乡贤祠记》载:“澹轩先生,讳晔。……右辖严侯忠济镇东平,先生门人翰林学士复斋徐公世隆为幕客。时方调兵经略江淮,首议修复泮宫,兴学养士。职教者,非耆德宿望不可,遂起先生于高唐,当儒林祭酒以主师席。”

由以上考辨可以证明,《元史·阎复传》中的“严实”为“严忠济”之误。

## 《释名疏证补》的“先谦曰”探微

◎ 魏宇文 (嘉应学院副教授,广东 梅州, 514015) 王彦坤 (暨南大学教授,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H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3-0143-01

清人王先谦(1842-1917),所撰《释名疏证补》是清代整理研究《释名》之集大成著作。很多学者认为王先谦只不过是在毕沅《释名疏证》的基础上,集中了王启原、叶德炯、孙楷、皮锡瑞、苏舆、王先慎等人的校

释,参酌吴刊顾校本、成蓉镜《补证》、吴翊寅《校议》和孙诒让的《札迻》汇录而成是书,无多少己见。然而据本人统计,《释名疏证补》中“先谦曰”按语共247条,约占《释名》全文词条总数(据胡朴安的统计是



1502条<sup>[1]</sup>的16%。其中，王先谦在毕沅等人的疏证下再做补述的有156条，而在毕沅等人无注词条之下加注的有91条。这些按语有鲜明的特点，不乏有价值的观点。

从类型看247处“先谦曰”按语，可分两大类：出示吴校<sup>[2]</sup>和自为疏证。其中：出示吴校112条，占“先谦曰”按语的45%主要是文字校勘。王氏通过吴刊顾校本指出版本异文，绝大多数（101条）不加论断。例如：

①《释言语》“廉，敛也。自检敛也。”先谦曰：“吴校‘廉’下补‘检也’二字。”

②《释长幼》“青徐州曰媮，媮，忤也，始生时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先谦曰：“吴校‘州’作‘人’。”

王氏未作明确表态，但可看出他是倾向于吴校的。例②“青徐州”显然与全书的“青徐人”（凡4见）不一致。王氏出示吴校只有11条是表态的，例如：

③《释亲属》“父，甫也，始生己也。”先谦曰：“吴校‘始’上有‘甫，始也’三字，是。”

④《释州国》“齐，齐也，地在勃海之南，勃齐之中也。”先谦曰：“吴校下‘勃’作‘如’，是。”

王氏用断语“是”表明他的疏证是可信的。如例④“勃齐之中也”，“勃齐”不可解，从吴校作“如”方文意通顺。“如齐之中”意谓齐国居天下中部，犹如肚脐居人身中部。“如”作“勃”，袭上文“勃海”而讹。

自为疏证的有135条，约占“先谦曰”按语总数的55%。这是按语的精华部分，内容包括音韵、文字、词汇等，例不赘述。“先谦曰”按语的价值体现在三方面。

(1) 文字校勘。其按语指出文字的讹误、衍脱等，对于比较《释名》各版本之优劣，恢复《释名》之原貌具有参考价值。例如：

⑤《释言语》“啜，啜也，心有所念，啜然发声也。”毕沅曰：“段云此‘啜’字当是‘咄’之误。”先谦曰：“啜，非‘咄’字之误。《诗》‘中谷有蕓，啜其泣矣’，毛传：‘啜，泣貌’，成国正为此诗作注。《说文》‘啜，忧也。’

王氏按语极精辟。《说文·口部》“咄，相谓也。”段玉裁注：“谓欲相语而先惊之之词，凡言咄嗟、咄喏、咄咄怪事者，皆取猝乍相惊之意，《仓颉篇》曰：‘咄，啐也。’《说文》‘啐，惊也。’李善注：‘曹植《赠彪诗》引《说文》‘咄，叱也。’《广韵·没韵》‘咄，呵也。’“咄”与“心有所念”“啜然”义不合。故王氏据毛传非之，以“啜”训“啜”，属《释名》中常见的同声符字为训，音义并相合。

(2) 意义解释。或疏解词义，或阐明因由，或补证理据，或纠正错注，不一而足。例如：

⑥《释姿容》“摩娑，犹未杀也，手上下之言也。”

先谦曰：“今人读‘未杀’为平声，乃‘摩抚’之意，其音即为‘摩娑’，知声义通转也。”

⑦《释言语》“厚，后也，有终后也。”先谦曰：“俗薄则罔终，惟厚者能有终后也。”

(3) 发凡起例。这类按语揭示《释名》训释条例，对读者深一层理解《释名》原文颇有帮助。例如：

⑧《释山》“大阜曰陵，陵，隆也，体隆高也。”先谦曰：“‘陵’‘隆’双声。汉林虑避讳改隆虑，亦用双声字改也，林陵音同。”王氏指出此处是“双声为训”。

⑨《释言语》“助，乍也，往相助非长久也。”先谦曰：“助从且声，与乍声之字，段氏音韵表皆在古音第五部，今助字开口呼之，则得与乍叶之音矣。”王氏指出了“助”、“乍”古韵同部，揭示了刘熙“叠韵为训”的体例。

“先谦曰”按语偶然也存在错误之处。例如：

⑩《释姿容》“据，居也。”毕沅曰：“《说文》‘居，蹲也’，是即‘踞’字”。先谦曰：“《晋语》‘今不据其安’，韦注：‘据，居也’。《左僖公五年传》‘神必据我’，杜注：‘据，犹安也’，是‘据’为‘安居’之义。毕说似非。”

王氏引《晋语》韦注、《左传》杜注证明“据”有“安居”之义，而疑毕沅注非。然以“安居”为解，则与“释姿容”义不合，王氏错矣。

⑪《释宫室》“榭，隐也，所以隐榭也。或谓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谓之栋，栋，中也，居屋之中也。”毕沅曰：“‘望’与‘葢’音亦相近，此下又别出‘葢’。”先谦曰：“‘望’与‘葢’音似不近，此义他书不见。”

毕沅以为“葢”、“望”音近义通，而王氏疑之。其实，“葢”古音属蒸部明母平声，“望”古音属阳部明母平声<sup>[3]</sup>，韵则“蒸”“阳”旁转，声则明母双声，且“望”指“屋栋”，“葢”称“屋脊”（《释名·释宫室》“屋脊曰葢。”），显然同词异字。毕氏之说不误，王氏所疑无据。不过，与“先谦曰”的价值相比，其存在的不足，只是白璧微瑕而已，无伤大雅也。

## [参考文献]

[1] 胡朴安. 中国训诂学史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2] 吴(志忠)刊顾校本, 王先谦所说“吴校”即为是书.

[3] 参见唐作藩. 上古音手册 [M].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本栏责任编辑: 陶原珂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介

# 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 陈永祥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510405)

[中图分类号] D829 71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5) 03-0145-01

2004年10月, 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的学术专著《龙与鹰: 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硕果。

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鹰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的标志。这两个国家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以来, 已经走过了200多年交往的历史。期间, 既有平等互利的早期岁月, 又有侵略与被侵略的百年沧桑, 还有严重对抗的“冷战”时代, 至于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常化轨道, 那已是20世纪下半期的事了。

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节拍, 恰好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大潮相吻合, 从而显示出考察中美两国交往历史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正如梁碧莹教授自己所言: “把任何一个历史领域的研究置于整个历史研究的汪洋大海中, 它仅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微不足道, 但将其研究清楚, 揭开历史的谜底, 对于今人了解过去、启导未来仍不失其学术意义”。(该书第6页)

梁教授致力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凡20余年, 其研究重点是近代中美关系史。可以说, 《龙与鹰: 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是梁教授长期求索探研的结晶。全书共9章, 约40万字, 对1784年至1949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该书最具特色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材料和方法新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 材料创新和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主要表现。历史研究, 离不开史料; 有了史料, 也要进行一番爬梳整理, 不可遽下结论, 更不能主观臆断。梁教授在书中引用各种中外文献和书籍达255种之多, 其中不乏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可贵的是, 作者在搜集史料的方法上独辟蹊径, 充分利用了那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者对某一史事的评论和看法, 这些评论和看法既具真实性和可

信性, 又有时代感, 从而使逝去的历史得以还其本来面目, 使后来的研究者仿佛如临其境。例如, 作者在“第一章——广州口岸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的论述中, 就是利用曾任“中国皇后”号船货管理员和美国驻广州第一位领事山茂召亲身记录其广州之旅的《山茂召日记》再现了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真实概貌。又如, 在“第六章——中国与美国博览会”中, 作者根据时人的记录, 对中国人参加1876年费城万国博览会和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进行了考察, 展示了中国工商界参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活动情况,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 此举“是中国实业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次, 对中国实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将产生持续的影响”。(该书第300页)

第二, 在开阔的研究视野下, 突出了广州地区的中美关系。近代中美关系是在欧美列强处于资本主义青春期而中国处于封建主义垂暮期的大环境下发生的, 因而, 中美关系的发展总是受到第三国因素的影响。该书第七章中的“美国与鸦片战争”、“蒲安臣与‘合作政策’”两节, 就涉及到中美关系中的英国因素; 第八章的“‘门户开放’与‘特殊利益’”一节涉及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杜鲁门主义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一节则涉及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 从而显示了作者研究中美关系的广阔视野。

不仅如此, 作者在对近代中美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时, 注意“博”与“约”的相互结合, 重点关注了广州地区的中美关系, 因为“广州是中美关系的肇事地, 又是最早通向世界的门户, 在广州寻觅中美关系的足迹大有必要, 通过研究和寻觅, 从中亦可发现中美关系中几个‘第一’。”(该书第5页) 如中美关系肇事于美国第一艘商船首航广州;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最早通过广州这个窗口了解对方的; 广州又是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士涉足的地方和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由美国人操办

的西医医院出现的地方。该书第一至第四章对发生在广州地区的中美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从而使这一地区中美关系的发展足迹有了清晰的轮廓。

第三，从新的角度，对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给予了特别关注。美国方面，作者重点研究了美国商人、首届驻广州领事山茂召，第一个登上广州口岸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对美国传教士的评价问题上，作者既充分揭露“美国传教士无疑是殖民侵略的一支力量，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美国传教士适应了西学东渐的潮流，把传教和宣传西学结合起来，在客观上起了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该书第 215-216 页）这样的见解，显然

超越了简单化、单一化倾向。中国方面，作者除了考察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之士徐继畲、驻美公使伍廷芳外，还另辟专章，在第九章着以浓墨，专门研究了世界伟人孙中山与美国的关系。作者之所以重点考察这三个人，是因为前者与近代广东有密切联系，后两者则均是广东人，正好体现了作者重点关注广州地区中美关系的思路。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该书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未予论述，似乎有点遗憾。其实，这正是作者的智慧之处。因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曾是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已涌现了不少成果，在梁教授看来，自无必要在该书中赘述，于人于己不失为一种劳动的节约。

## 评《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

◎ 周 力（暨南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D824 D99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3-0146-02

暨南大学刘华副教授的学术著作《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在 2003 年度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出版了。该书的出版为华侨问题研究及我国涉侨法律法规、尤其是国籍法的研究乃至修改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背景资料。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日趋重视，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 80 年代都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对此问题空前重视，2002 年，中国社科院正式成立海外华人研究中心，随即又有《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2 卷全部出版问世。该书作者自 1987 年即开始涉足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在十余年的课余研究中，作者的研究渐次集中到华侨的国籍问题。华侨的国籍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该书面世前，国内外已有不少涉及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该书则在具体某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的基础上，对产生于近代中国的华侨及其国籍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法规、国籍立法进行整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全面的述评，应该说，其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详细地占有资料，分析历史事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氛围，从而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律动的脉搏，是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法律研究的起点。而全面地研读前辈学者以及同时代学者们的相关著述，掌握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精髓，则是一本新著推陈出新的基础。正因如此，该书作者力求做到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占有资料。通观全书，在资料的占有方面，该书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搜集了近代中国颁布的全部国籍法及主要的双边（涉及国籍问题的）国际条约。二是为了便于和其他国家的国籍立法相比较而搜集了其他重要国家及华侨寓居较多国家的国籍法。三是作者的前辈和同辈学人的同主题研究书籍和论文，有解放前的也有港澳台的。由于拥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基本资料，该书的撰写也就有了相应的纵深度与厚重度。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具有三大特色。

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对最早的涉侨国籍双边条约——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我国内地学术界与台湾学术界以往对其评价截然不同，内地对其评价甚低而台湾刚好相反。该书在学术气氛相对宽松和中美关系较好的新时期则能对其作更客观一些的评价。又如对洋务派，该书对他们在保护华侨方

面的历史贡献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再如对华工出国问题,以往过多强调了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对他们的需要和西方资本家在其政府强权的支持下对他们的掠拐诱骗,较少谈及华工们自身出国谋生内在的求生求富之原动力,该书对此问题颇有一些不俗的新观点。还有对北京政府的评价,以往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都对其评价不高,但该书从侨务政策、涉侨立法及保护华侨的角度对其有较高评价。

二是采用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比较研究方法。该书的写作广泛采用了比较研究法。例如将清政府的《大清国籍条例》与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国籍法》进行比较;将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国籍法》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国籍法》进行比较。比较它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及时代背景;比较它们相关条文的增删修改;比较它们颁布实施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此外,还对国籍立法上的血统主义原则和出生地主义原则的利弊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比较;对对中国国籍立法影响甚大的西方两大法系——英国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国籍立法上的重大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对比分析并论述了它们对中国政府国籍立法的影响和中国政府国籍立法之渊源与继承。

三是基本做到了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兼采所跨学科之长,摈弃所跨学科之短。该书研究的内容跨法律与历史两大学科。作者在将中国近代国籍法的内容和国籍立法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中,将国籍立法放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国籍立法的历史和人文背景。于是该书既有中国历届政府颁布的不同国籍法版本比较研究的简约,更有大段国籍立法历史人文背景分析的细致,将在西方人本主义环境中产生的国籍法在移植到中国的东方文化土壤中成长壮大、发挥作用的历史作了一个基本素描。

当然,作为一本兼跨历史与法律两大学科的新著,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

首先是该书对国外学者关于国籍法研究的成果借鉴

吸收不够。例如,该书研究所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比较研究法,但该书的比较却主要限于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版本之国籍法的比较,而没有与其他国家国籍法的比较。虽然该书研究的着眼点在中国的国籍立法,但是,如果没有对其他国家国籍法的透彻了解,要对我国的国籍法进行比较并评析我国国籍立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难免会导致叙述基础的不足和某些立论之偏失。

其次是该书撰写中存在跨学科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和风格不能水乳交融之问题。该书的研究内容跨法律和历史两学科,作者的本意是希望能采两学科之长,撰出一本克服前人著述不足的中国国籍法研究的新著来。虽然作者兼有历史和法律的知识背景及一定的研究能力,但毕竟历史和法律是两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在某个研究专题上将两者结合是可行的,但如果缺乏对两学科知识背景精深透彻之把握,做起研究来,就难免在某些方面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显现出一些水乳难以交融之状。

再次,该书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及其得出之结论恐怕属于不能与时俱进的偏颇旧论。该书在结语中强调,中国政府在新世纪仍要坚持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既定政策不动摇。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当前,国际社会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在新世纪呈现出一种增长的态势。据新华社前不久的一篇报道:目前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承认或接受双重国籍。而中国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令越来越多想回祖国创业的外籍华人被视为外籍人士,单一国籍制度致外籍华人产生“国籍苦恼”,因此,我国的现有国籍制度正面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这就是说,在21世纪是不是仍要坚持单一国籍政策不动摇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而该书的结论与这些新情况的出现相悖,显示出作者对形势的变化是不敏感的,对未来政策的预测和建言也是前瞻性不够的。

总之,该书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同时可读性也很强的新书,相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收获。

责任编辑:郭秀文

## Main Abstracts

### **A Reflection on Marx's View of Subject**

*Liu Senli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remaine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Marx's view of subject and probes the meaningful realm in succession. Firstl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ubject strengthened must lead to that the sociality penetrates individual subject in many forms and then mass become non-personality. Secondly, the model of dichotom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e. the analytic model of "I (we) - it" is not abandoned in value dimension. Thirdly, the inner heterogeneity of group is neglected on traditionally subjective position, which could be taken formenacing seriously the groupsubject no matter if they can become the subject reasonably. Lastly,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about social identity in groupsubject. All of these issues would be arguable in modern time.

### **On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political justice**

*Wang Xincheng*

With regard to the philosophy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searching for ultimate explanations of human being and society within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justice has become the modern plan that has taken place of the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But this plan cancelled not only the ultimate freedom itself but the aspiration to ultimate freedom as well and hence landed itself into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Hegel saw clearly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modernity, so he tried to overcome it with a compensatory plan. But he got bogged down in the abstract affirmation of such an ethical entity as nation. Marx founded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political justice, i.e. he established an alternative plan which aimed to destroy modernity.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it was just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had laid the standpoint for Marx's new philosophy that aims to 'alter the world', and meanwhile paved the way for his practical philosophy.

### **World's History: How Comprehend the Present**

*[Germany] Hanna Schissler*

The author argue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history didactics that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of today's world, textbooks and curricula must embrace world history.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he world's history might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 is not 'out there' somewhere, but that it saturates our lives and that we are part of it. It might help to endure the ambiguities of this modern world, and it might aid i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turn to fundamentalism. In addressing the present world in its historicity, the world's history might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gain a better orientation in this modern world, and perhaps to ease somewhat the inequalities that permeate the world in which knowledge has become a crucial means of participation.

### **Micro-history in Current Italian Historiography**

*Zhou Bing*

Micro-history is one of the new trends in the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t incorporates the methodologies of anthropology, especially that of Clifford Geertz, and focuses on the microscopic studies of individual persons, family groups, and village communities. Italian micro-historians are the pioneers in this realm, and have formed a distinct school. Their approaches influence the historiographies of all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 **On the Twice In-consona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Zhang Jianhu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iticisms, there was the first in-consonance happened from 1950s-1970s, whe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theories were lead by an inner study, while in China we were developing an external study of literature to its utmost. The result was that both went into impasses with difficult continuity. The second in-consonance started from 1980s, when a globalized dialogue environment was forming and the leading trend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theories was marching from inner study to external stud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were marching from external study to inner one, devoting great endeavor on studying the problems of literature itself's theory and laws.



# 岭南人文图说之十七——沙湾·留耕堂



古建筑上精美的木雕，见证着历史的沧桑。



透着岭南文化气息的镏耳尾。



在一个假日里，以一份闲散的心情，悠游在沙湾北村的小巷，看炊烟袅袅，听鸡鸣狗吠。悠长的巷道里传来木屐踏在青石路上的清脆响声，一个久远的记忆就此复活了。

镏耳大屋，用蚝壳为原材料修建的壳花墙、青石板小路、里弄和砖雕、木雕装饰物，是珠江三角洲古民居建筑的特点，坐落在番禺沙湾的祠堂——留耕堂，则是这一切最典型的代表了。留耕堂由沙湾何氏族人兴建于元代，历元、明、清三代，先后三次大修。祠堂面积达330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平面呈南北长条形，主要建筑包括山门、仪宫、钓鱼台、享殿、寝殿、东西两廊和村祠。留耕堂边的玉虚宫内，悬于梁上的粗大盘香，终日香火缭绕。

留耕堂所在的北村村道胡同，依然都是用青石板砌成的小路，里弄里仍时常可见围在一起打牌聊天的人们。窄街小巷里，不时可以见到镏耳大屋高耸的屋檐，以及壳花墙上的一只只蚝壳，这一切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离海并不遥远。

图/新元 林科 文/雨田



以蚝壳为材料修建而成的壳花墙。漫步于古村悠长的巷道，时间仿佛都停滞不前了。

# Academic Research



清曙 许钦松 作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 510050 电话: 020-83846163  
排印: 广州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010349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网址: [www.gdskl.cn](http://www.gdskl.cn)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64  
国外代号: M268(北京399信箱)

期刊基本参数: CN44-1070/c\*1958\*m\*大16\*148\*zh\*P\*¥8.00\*3200\*32\*2005-3